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三十五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 · · · ·

第 · · 五 · 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三十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主编 胡 华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开

本850x1168 1/32 印张11 插页8 字数 244,000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平) 16,000

ISBN 7_224-00230X/K·6

统一书号: 11094·222 定价: (平)2.60元

 毛泽东博览 网站编辑
www.mzdbl.cn

目 录

廖承志	杨世兰 蒙光励	冯誉川 王怀洲	(1)
杨嗣震	刘林松	黄学盛	陈思明 (67)
李 良			张军孝 (78)
吴先清			赵子劼 (91)
钱壮飞			叶炳南 (103)
张子华	李海文	苏忠深	(127)
李 白		王正玲	(146)
沙文汉		姜沛南	(165)
陈 刚		何盛明	(208)
熊寿祺	中央民族学院 《熊寿祺》编写组		(230)
龚饮冰		龚育之	(261)
邓 洁		叶 晔	(271)
田家英		彭亚新	(299)
鲍罗廷		翟作君	(324)



廖 承 志



杨 嗣 震



李 艮



吴 先 清



钱 壮 飞



张 子 华



李 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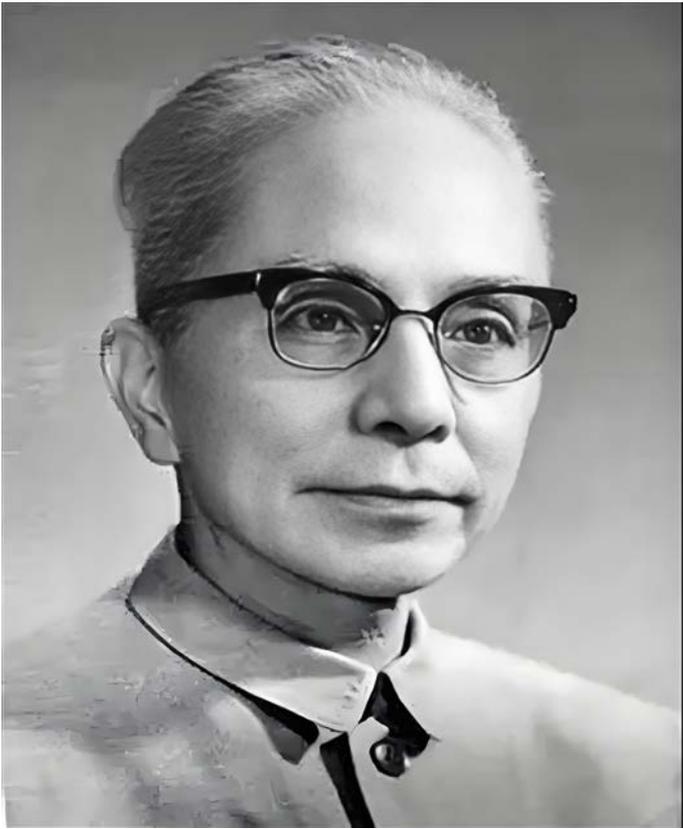
沙 文 汉



陈 刚



熊 寿 祺



龚 饮 冰



邓 洁



田家英



鲍罗廷

廖承志

杨世兰 冯釜川

蒙光励 王怀洲

廖承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

出身于革命家庭

廖承志，广东惠阳县人，一九〇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清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一）出生于日本国东京大久保。他的父亲廖仲恺、母亲何香凝是国民党著名的元老，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他出生时，父母亲为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正在日本东京留学。他们希望孩子长大以后，能够继承革命先辈的志向，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因而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承志”。

早在廖承志出生的前五年，即一九〇三年秋，廖仲恺和何香凝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多次聆听孙中山的演讲，因而萌发了革命思想。他们还接受孙中山的重托，在留学生中广为结交，物色爱国志士，“结为团体，以任国事。”^①他们先后和留日的革命青年赵声、秋瑾及黎仲实等密切来往，并在留日学

^①《建国方略》，载《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7页。

生中做了大量工作。一九〇五年秋，他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为最早的会员。入盟之后，他们更加积极地从事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他们在东京的寓所，成了革命党人的通信联络站和聚会场所。廖仲恺曾多次奉孙中山之命，不顾个人安危，秘密回国进行革命活动。何香凝则一身担任了许多联络和勤务工作，被孙中山亲昵地誉为“奥巴桑”（日语，意为“管家”、“阿姨”）。他们都深得孙中山的信赖和倚重。

廖承志出生后的第二年，廖仲恺在日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同年秋，回到了祖国，在东北边务督办大臣陈昭常幕中办理延吉归还祖国的交涉事宜。廖承志和母亲仍旧留在日本，母亲雇请一位叫“叶姨”的乳娘哺养他。他在回忆幼年的生活时曾经深情地写道：“我的乳娘是一位刚强的白瓜子脸的叫叶姨的日本女子。因此，我是在大久保出生，又是靠日本女性的乳汁长大的。我儿童时代的一半血液是日本女性赐给的。”^① 三岁时，他随母亲到香港暂住。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广东军政府成立，廖仲恺被推为广东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年底，他随同母亲回广州居住。一九一三年八月，因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二次革命”失败，他随同父母亡命日本，住在东京的千驮谷。

在千驮谷的日子里，他度过了天真烂漫的童年。童年的廖承志很顽皮。据他回忆，有一次，父母亲带他去玩具店，母亲给他买了一把长柄刀，他“不禁欣喜若狂，不顾地方就把刀舞起来，因此立即被母亲斥责。”他垂头丧气地跟着母亲坐人力

^①廖承志：《我的童年》，载《廖公在人间》，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49页。

车回家，在返抵千驮谷家前，竟大意地将那把刀掉在车轮中，弄断了。他大声哭喊，最后“被父亲在屁股上狠狠地打了几巴掌，才醒定过来。”^① 还有一次，在东京过年时父亲请客，当父母送客出门时，他把桌上剩下的酒一饮而尽，醉了，就钻到日本式“榻榻米”房屋放被褥的柜橱里睡大觉去了。到了晚饭时，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他，全家都急坏了，正愁闷间，突然柜门作响，才发现他在里面^②。他幼年时的调皮，长大后就变成了活跃、好动、爱开玩笑的乐观性格。

廖承志从小聪颖好学，爱好读书，特别喜欢画“公仔”（广东话，即人物之意）。他“对书本简直是着了迷，洗澡也舍不得放下。他常常拿一本书进浴室，泡在浴缸里半天不出来，水凉了也不知道。”^③ 六岁时，他们搬到了涉谷新居，母亲和父亲施行更为严格的教育。朱执信有空时也来考他的算术，而他的父亲总是笑嘻嘻地在旁边观看他握着铅笔时小手的动作。当他“张开口想打呵欠之际”，他的父亲就对他“投以炯炯的目光，简直象动物园的虎眼一样”，使他不得不“急急停止打呵欠。”^④ 由于他的聪明、勤奋，加上家庭严格的要求，他的学业进步很快，一九一五年，在他刚满七岁的时候，便顺利地通过了考试，一下子考入了东京晓星小学读二年级。

由于廖承志的父母都是革命党人，所以，当他刚刚懂事的时候，便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一九一四年七月，他六岁

①④廖承志：《我的童年》。

②《丧弟的哀痛——廖梦醒回忆她的弟弟廖承志》，载1983年《中国建设》纪念廖承志专刊。

③廖六薇：《承志弟二三事》，载《廖公在人间》第175页。

时，家搬到了涉谷，仅步行五分钟，就可到达青山六丁目孙中山的住宅。在这里，他首次见到了孙中山。此后，他常常陪同父母去孙家，与孙中山、宋庆龄等有了更多的接触。一九一六年三月，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声中，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年仅八岁的廖承志，跟随父母，参加了孙中山于四月在东京组织的“帝政取消一笑会”，并荣幸地倚靠在孙中山的怀里摄影留念。客观环境的影响，使少年的廖承志，有了强烈的爱国心。一次，有个日本人在他堂姐廖六薇家作客，他也在场。他痛恨日本欺压中国，当场画了一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漫画^①。这不仅表现了他出众的才华，而且也表明爱国的种子已经在他心坎中开始发芽。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廖仲恺和何香凝四出奔走，为革命事业操劳。廖承志也跟随父母，奔走于广州、上海和日本之间，备尝艰辛。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他随同父母亲离开日本，五月初抵达上海。一九一八年六月，由于第一次“护法运动”的失败，他随父母再度亡命日本。一九一九年他又随同父亲回到了上海。在上海时，由于他不懂普通话和上海话，无法入正式学校读书，他父亲在十分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抓紧他的学习，在留沪一年多的时间里，坚持每日给他教授英语两小时，使他的学业不至于荒废。一九二一年底，他随同父母返穗时，才进入广州培正中学读书。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军阀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在叛乱前两天，诱禁了他的父亲，母亲为了他和姐姐廖梦醒的安全，托人把他们送到了香港。因此，他又不得不中途辍学。

^①廖六薇：《承志弟二三事》。

廖承志的童年和少年是在动荡的岁月中度过的。颠沛流离的生活，锤炼了他的意志，家庭严格的教育，殷切的期望，使他不断成长。一九二二年六月，他的父亲身陷囹圄，仍念念不忘对他及姐姐的教育。当时，廖仲恺写了一首《诀醒女、承儿》的诀别诗，诗云：

女勿悲，儿勿啼，
阿爹去矣不言归。
欲要阿爹喜，阿女、阿儿惜身体。
欲要阿爹乐，阿女、阿儿勤苦学。
阿爹苦乐与前同，只欠从前一躯壳，
躯壳本是臭皮囊，百岁会当委沟壑。
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
尚有一言须记取：留汝哀思事母亲^①。

正是这苦心孤诣的教导，呕心沥血的培育，指引着廖承志走上革命的征程。

投身革命的洪流

一九二三年初，留驻广西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以拥护孙中山为名，进军广州，把陈炯明驱逐出广州。孙中山于一九二三年二月由上海重新返穗，复任陆海军大元帅，三月一日成立大本营，廖仲恺于二日被委为大元帅大本营的财 政 部 部

^①何香凝：《我的回忆》，《回忆与怀念》，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第33页。

长。同月，廖承志由港返穗，入广州岭南大学中学部学习。

岭南大学是一所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地处宽阔的珠江环绕着的河南岛之中（现址是中山大学）。他在这里学习更加用功，喜欢提出一些不容易解答的疑问，以至不同的看法，如对教科书中关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功业的评价等，说明他是好动脑筋，不迷信古人的^①。在那段时间里，他与华侨子弟、共青团员之间以及与共青团领导下的新学生社社员之间都能合得来，互相之间来往甚密，尤其与日本学生草野心平最好。他还常常带同学们到他家里，面聆廖仲恺和何香凝的教诲。他的家，成了青年学生聚会的场所^②。

这时的廖承志，显得更加懂事和勤劳了。据他自己回忆：“假期回家就给父亲擦皮鞋，他的白皮鞋被我擦得生光发亮。父亲当上黄埔军校党代表，穿军装时的绑腿多半是我帮他打的。”^③不仅如此，在革命潮流的冲击下，廖承志的思想觉悟也得到提高。一九二四年八月，他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和李少石（当时名叫李振，后来成了他的姐夫）等参加政治活动更加频繁^④。也就是在这年，他见到了著名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后来廖承志在回忆这一情况时写道：

那是一九二四年夏秋之间。广州依然闷热，但在傍晚时分，已渐觉凉风习习了。百子路老家的树影里，霎然间

①思慕：《六十年故交》，载《廖公在人间》第17页。

②司徒慧敏：《我心中不灭的长明灯》，载《廖公在人间》第25页。

③汤晓丹：《廖公谈影片廖仲恺》，载《廖公在人间》第98页。

④1984年1月8日访问廖梦醒记录。

出现一个人，浓黑的眉毛，锐利的眼睛，行动敏捷，举步如飞，向父亲点一点头，便转入隔邻的大门。跟着，是卫兵的吆喝声：“敬礼！”

“那是谁？”我急忙问父亲。他笑了。“他你未见过？就是共产党的大将周恩来！”“呵……。”^①

对周恩来的折服、敬仰，使廖承志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好感。随着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反帝反封建的坚定立场，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更深深地吸引着他，强烈地扣动着这个年轻人的心。

一九二五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为了声援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省港大罢工爆发了。六月二十三日，广州各界人民十万人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到沙基时，英帝国主义水兵开枪扫射，当场死、伤多人，造成了“沙基惨案”。廖承志和他的姐姐廖梦醒等以及岭南大学的师生们，参加了这次游行示威。其时，他的帽子被一颗子弹打掉了，幸免于难。在这次惨案中，岭南大学有一位教师和一位同学遇难，在校的一个英国老师却说死得好，愤怒的学生便举行罢课。廖承志参与了学生罢课和工人罢工的领导工作，团结广大师生，赶走了那位英国教师^②。

国民党改组后，随着共产党人的加入，给它带来了新鲜血液。但是，其中的腐败分子并未清除。他们既互相勾结，又互

^①廖承志回忆周恩来的文章手稿，原件藏广州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廖承志的回忆时间上可能有出入。周恩来是1924年11月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

^②1984年1月8日访问廖梦醒记录。

相攻讦，有时“告状”告到廖仲恺那里去，深为廖承志所憎恨。据廖承志回忆，有一次他帮父亲整理书信时，看到了薛岳揭发许崇智腐化堕落的信，同时也看到了许崇智倒打一耙，提出要严办薛岳的信。廖承志便在信封上注明“很重要”。廖仲恺匆匆看过这两封信之后，叹了一口气，就出去了^①。廖承志敏锐地察觉到了国民党内部的黑暗面。孙中山逝世后，由于他的父亲坚定不移地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国民党内右派势力便集中攻击他的父亲，最后竟然采用最卑鄙的手段，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收买凶手暗杀了他的父亲。他的母亲把“精神不死”的横幅挂在自家的大门上，以表示对国民党右派的抗议。她还慷慨激昂地表示：“苟利于国，则吾举家以殉亦所不惜。”母亲坚强的革命意志，革命到底的决心，给年轻的廖承志以深刻的影响。随着“廖案”案情陆续在报纸上披露，国民党右派勾结帝国主义者杀害他父亲的内幕得到进一步的揭发。为此，他怒不可遏，悲愤交加，发誓要继承父志，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从此，他对国民党完全绝望了，并决心要寻找中国共产党^②。

一九二七年初，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之间的斗争进一步加剧。他的母亲深恐国民党右派再暗害他家，斩草除根，先后把他们姐弟俩送到日本去。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他以他母亲的好友伍琼石为保证人，考取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读书^③。在东京的日子

①廖承志对父亲的片断回忆，未刊稿，原件藏广州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

②1982年8月30日廖承志在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揭幕式上的讲话，原件现存该馆。

③据《廖承志早稻田大学成绩表》，影印件存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

里，他参加了“早大”的学生组织文化思潮研究会，还参加了中共东京特支领导下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刻苦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在中共东京特支的领导下，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九月，他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被日本当局拘捕，几天后获释。十二月，关东妇女同盟请他的姐姐廖梦醒去参加座谈会。在会上，廖梦醒宣传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办托儿所等好事，并宣传共产党人提倡男女平等等主张。会后，警察把他们姐弟俩一起拘捕。当警察问廖承志在日本认识什么人时，他很机智，说出了一位名人的名字，警察害怕起来，便把他放了^①。廖承志出狱后，仍然斗志昂扬地参加各种革命活动。由此，早稻田大学便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学费未纳，长期缺席”为由，开除了他的学籍。同年三月十二日，留日学生中的国民党反动分子打起纪念孙中山逝世的旗号，进行反共活动。中共东京特支为了粉碎反动分子的阴谋，发表了两个声明，即《对时局的声明》和《告士官生书》，反对蒋汪勾结，号召留学生不要违背孙中山的革命精神，继续革命，保卫祖国，不要被反动派所利用。“纪念会”的文艺演出一开始，廖承志就乘关灯的机会，把印有两个声明的传单雪片似的撒到人们身旁，有力地揭露和抨击了反动分子反共反人民的阴谋^②。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共东京特支发起召开留学生大会，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杀我同胞、占我济南。会上决定成立反日大同盟，继续开展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运动。廖承志是广东旅日学生同

^①1983年9月28日访问廖梦醒记录。

^②黄鼎臣：《廖公的青年时代》，载《廖公在人间》第14页。

乡会的骨干。通过这个同乡会，他做了许多工作，团结了很多人投身到反帝斗争中来^①。由于他参加革命活动，再次遭日本当局拘捕并被驱逐出境。

一九二八年七月，廖承志回到了上海，在反日大同盟上海分会工作。反日大同盟上海分会是一个公开的群众爱国团体，受中共江苏省委的直接领导，任务是联系工商学界，宣传抗日。廖承志负责编辑《反日新闻》。他撰文绘画，又快又好，所编的墙报很受欢迎。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同年八月，经关键介绍，廖承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走上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的光辉道路^②。入党后不久，他以更大的热情，到“济难会”工作，为营救被捕的同志而奔波。

新的考验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廖承志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到了德国柏林，转为德国共产党党员，担任德国国际海员工会执行委员，同时就读于柏林亨德第二大学政治经济专业^③。一九二九年十月，他被派往汉堡领导中国海员运动，任汉堡国际海员码头工人总工会俱乐部支委、书记。在汉堡，他不辞劳苦，经常到船上去，向中国海员们揭露国民党反革命派的罪行，宣传共产主义，深受海员们的欢迎。为了更好地领导海员们进行斗争，他

①黄鼎臣：《廖公的青年时代》。

②廖承志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年、月和介绍人系根据新华通讯社编发的《廖承志的一生》所载。

③廖承志自述，载1933年3月30日上海《新闻报》。

在每条船上都组织了统一的工会。他创办了《海员半月刊》，十四日出一期，其内容：“（一）简单社论，（二）中国新闻，（三）国际海员新闻，（四）船上新闻，（五）漫画。”^①他利用会画漫画的特长，每期都穿插了一些漫画，使之图文并茂，宣传效果很好。由于他艰苦深入的工作，加上采取了生动活泼的宣传形式，在短时间内，工作便打开了局面。在汉堡，他还参加了反帝大同盟，为国际反法西斯的斗争做出了贡献。

在德国的日子里，生活是很艰苦的，斗争也极其复杂，但廖承志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并热情地宣传革命。何香凝为了探望爱子和宋庆龄，同时也为了考察德国革命的情形，让廖承志一九三〇年六月去法国巴黎把她接到德国柏林来。当胡兰畦见到廖承志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胡兰畦写道：“当时我还不知道廖承志同志是共产党员，只觉得他那落落大方的风度和豪迈的气质使我非常钦佩。他喜欢谈论革命，谈论世界的趋势，听口气他是个共产主义者。当时我对盲动路线存着反感，廖承志给我详细解释共产党同样反对盲动主义，并给了我一些有关材料，使我受到很大教育，引导我坚定走革命的道路。”^②在廖承志的影响和教育下，不久，胡兰畦便向党组织呈递了入党申请书。廖承志在柏林与母亲住了不到一个月，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又匆匆告别慈母，回到了汉堡。同月底，他被国际海员工会派往莫斯科参加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此期间，曾和蒋经国先生有过交往。次年春，又被派往荷兰的鹿特丹，领导中国海员工

^①廖承志致瞿秋白函（1929年10月10日），原件藏中央档案馆。

^②胡兰畦：《回忆何香凝先生》，载《回忆与怀念》第195页。

作，建立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西欧分会。他以海员的英语教师身份为掩护，领导海员罢工取得胜利。六月，被荷兰警方拘捕，关押六周后驱逐出境。他又重新回到了汉堡，在海员中活动。九月，领导汉堡中国海员罢工取得了胜利，遭汉堡警方拘捕，几天后被驱逐出境。十月，他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十二月抵莫斯科，一九三二年初回到了上海。

那时的上海，正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蒋介石继续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廖承志不畏强暴，继续坚持革命斗争，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全国海员工会中央党团书记，积极领导工人运动。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八日下午，当他前往上海山西路五福弄九号开会时，由于叛徒王其良的出卖，在罗登贤、余文化被捕两小时之后，他也被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和公共租界警方拘捕。被捕后，他机智地与敌人周旋，并以高超的智慧，在法庭内外与敌人展开斗争。当敌人问他的同党时，他带公共租界的巡捕和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的探员前往光裕坊八号，侦探员才知道这是国民党著名元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何香凝的家。他用这种巧妙的办法，把自己被捕的消息，告诉了家里人。翌日，何香凝通电全国，声称：“余愿与儿共留囹圄，惟不愿留外国囹圄，要求解往华界，即死亦愿在华界，不在租界。”三月三十一日，宋庆龄、蔡元培等所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此发表声明，严正指出：“犯罪者必有犯罪行为，始可定罪。即使被告为共产党员，或曾参加反帝或工人运动，亦非法律所不许，苟无特别活动，应即立刻释放。”并聘请吴凯声、马常律师，出庭为之辩护。同月三十日上午和三十一日下午，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一庭先后两次开庭审判。在法庭上，廖承志声称

他“系奉母亲命令与一茶商欧阳纯接洽，将茶叶运赴东北慰劳抗日将士，竟遭逮捕，理由何在？”驳得法官哑口无言。继由公安局带叛徒王其良出庭作证，王指控廖承志“系共党海员工会书记”。廖承志当即声称：“我与此人从未谋面，自有生以来，今日尚属第一次见面，彼之供言，尽属狂言。”使得叛徒尴尬不堪，听众哗然。三十一日晚，何香凝乘车前往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的家。她见了吴铁城，便厉声责问：

“要说骂蒋介石是我骂得最多，你有胆量就把我抓起来，为什么大敌当前，你们不去抗日，反而囚禁这些无辜的青年？”并要他答应，要么把她的孩子放了，要么连她也一起抓起来。吴铁城无可奈何，只得答应请示后再说。在多方面的努力下，国民党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四月一日晚，经何香凝和柳亚子担保，廖承志终于获释^①。

廖承志回到家里以后，认识了住在他家楼下的国民党元老经亨颐之女经普椿。他们经常在一起畅谈，廖承志还为她画像。频繁的接触，共同的理想，使他们萌发了真挚的爱情。一九三三年八月，他的姐姐、共产党员廖梦醒回到家中，按党组织的指示，交给他一支内装通知他去川陕苏区的香烟。他看了以后，欢喜若狂，便匆匆准备踏上新的征途^②。

自从他的父亲被国民党右派杀害之后，他很少同母亲在一起团聚，加上母亲心脏病经常发作，需要人照顾。他又何尝不想留在母亲的身边，侍候她老人家呢！他自己也刚刚尝到初恋

①以上材料见1933年3月29日至4月2日上海《申报》、《新闻报》；廖梦醒：《我的母亲何香凝》；经普椿：《承志和我》；以及笔者1984年1月8日访问廖梦醒的记录。

②1983年9月28日访问廖梦醒记录。

的甜蜜，又何尝不想留在恋人的身旁，享受爱情的馨郁芳香！但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他悄然地走了。行前他留下了三封信，一封给他妈妈，一封给柳亚子，一封给经普椿。在给经普椿的信中，他写道：“如果你真正爱我的话，请再等我两年。”^①在给柳亚子的信中，他饱含激情地写道：“我觉得，与其偷生来安慰爱护我的少数的人们，不如失掉爱护我的人们的安慰——因为大多数人的幸福是在前途等着，这是历史的命运所给予人类的重担。这重担也许是很重，但是我只能这样做了。如果世间真有上帝其物的话，我只祈求他能减少我母亲的苦痛。”“也许将来，中国的孩子们不必这样地离开他们的母亲吧。能这样，很多人的死便不是徒然的了。”^②

在长征路上

一九三三年八月，廖承志离开上海，前往川陕革命根据地。他在沿途党组织的掩护下，闯过重重险关，到达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通江，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和他一起到川陕根据地的还有罗世文。他带来了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一本敌军密码电报破译法。在这以前，红四方面军侦察电台无法把空中截获到的敌军电报破译出来，对敌人的动态难以掌握。但是，有了廖承志带来的“破译法”以后，红四方面军侦察电台就大显身手。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到一九三四年九月，四川军阀刘湘纠集各地军阀部队二十余万人，先后向川陕革命根据地

①经普椿：《承志和我》，见《廖公在人间》（代前言）。

②廖承志致柳亚子函，原件藏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

发动“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侦察电台依靠“破译法”，不断破译敌军来往电报，对敌军的兵力部署和行动企图，都了如指掌，为红军取得反“六路围攻”战役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遵义会议后，红四方面军侦察电台截获破译敌军的情报，按中央军委指示，及时转发给红一方面军。红一方面军由于掌握敌军的动态，取得了“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跳出了数十万敌人追击的圈子，从而在战略转移中从被动走向主动。

廖承志入川陕革命根据地后，被任命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省工会宣传部部长。一九三四年初，反“六路围攻”战役开始不久，又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由于廖承志能文能武，会写会画，知识渊博，才思敏捷，朝气蓬勃，非常活跃，在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激烈战斗中，他领导政治部的干部把工作做得生动、有力，激励着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受到部队的好评。

廖承志和罗世文抱着极大的革命热情来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希望为川陕革命根据地建设贡献力量。但是，他们逐渐看到张国焘推行“左”倾错误，给川陕革命根据地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特别是对张国焘残杀革命领导骨干和知识分子的军阀主义严重错误非常愤慨。他们为了捍卫革命利益，冒着危险，对张国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希望他能认识和改正错误。谁知张国焘因廖承志带来了党中央批评他没有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的信，早就心生嫌隙；现在又给他提意见，因此就更对廖承志和罗世文憎恨不满，并不断予以排斥和打击。一九三四年六月，张国焘指令保卫局对廖承志和罗世文进行秘密审查。保卫局余洪远如实报告说廖承志、罗世文没有问题，就被张国焘调出保卫局。同年十月，张国焘派杨立人审问廖承志、罗世文

后，给他们罗织了“莫须有”的罪名，扣上了“蒋介石特务”的帽子，不顾廖承志和罗世文的申辩，就把他们秘密关押在巴中县省委机关所在地东山的一间破庙里。不久，张国焘到破庙审问廖承志，阴阳怪气地问：“中央为什么派你来？派你来干什么？”廖承志对张国焘这样无视党中央，与中央分庭抗礼的言行，十分愤慨，冷冷地回答道：“中央派我来接受川陕苏区党组织分配工作的。”张国焘接着又问罗世文：“党中央是什么时候叫你来川陕苏区的？你们四川党组织与国民党有些什么关系。”罗世文义正辞严地回答说：“我们四川党组织同国民党进行生死的斗争。”^①张国焘见廖承志、罗世文据理力争，毫不妥协，遂恼羞成怒，宣布开除他俩的党籍，下令把他们长期关押起来。由于廖承志是廖仲恺、何香凝的儿子，加上廖承志会画画，川陕革命根据地印发钞票要用他刻蜡纸，所以，张国焘才没有杀他。

一九三五年五月，红四方面军为接应中央红军，西进川西北，开始长征。廖承志被张国焘派兵押着同红四方面军一起长征。六月，红四方面军到达四川西北的懋功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廖承志知道后，甚为高兴。他想到红军两大主力会合后革命力量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发展，党中央一定会帮助张国焘改正错误，自己也可能回到党的怀抱。但是，张国焘没有改弦更张，而是反对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带领红四方面军南下，直到公开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

对于廖承志的处境，毛泽东、周恩来非常关心，长征路上一直在打听他的消息。一九三六年二月，毛泽东、周恩来在陕

^①郭久麟：《罗世文》，重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北特意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电示张国焘，批评“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和扩大化，至一营一连被捕”；同时明确提出“鉴于历史教训，盼兄负责检查，使扩大化、偏见与单凭逼供刑讯等错误早告肃清”；对廖承志“须保全其生命，并给以优待，此为代表团所切嘱。”^①这使张国焘更不敢轻易杀害廖承志。但是，张国焘并没有检查自己在肃反工作中的扩大化错误，仍然继续监禁廖承志。

一九三六年七月，由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长征来到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在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坚持斗争下，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抗日的方针。廖承志被押解着同红四方面军又一次过草地。一天，廖承志在一个山坡上远远望见张国焘和一个身材不高，长着胡子的人谈话。当廖承志被押解着走到他的面前时，突然那个长胡子的人走过来问他：“你是廖承志同志吗？我是任弼时。”廖承志在被“开除”党籍，被押解一年多的情况下，突然听到党的领导干部又称自己是同志，心里一股热流流向全身，眼眶涌出了热泪。任弼时紧紧握住廖承志的手，见他衣衫褴褛，又有武装人员押解，立即惊异地质问张国焘：“这是怎么回事？”张国焘十分狼狈，支支吾吾。任弼时明确地告诉张国焘：“如果他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他，请告诉我。”^②不久，廖承志在任弼时的关心营救下恢复了局部的自由。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

① 《红四方面军战史参考资料》。

② 郭久麟：《罗世文传》。

后，党中央特派周恩来前来迎接红四方面军北上。十一月初，在从海原通往预旺堡的大道上，周恩来和红四方面军会合了，并碰见了廖承志。当时，他多想与周恩来倾诉自己的遭遇和意见。但他想到张国焘是个心狠手毒的家伙，这样做会给周恩来带来麻烦。他正在踌躇的时候，周恩来已走到他的面前，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给他以极大的安慰和力量。当天晚上，廖承志被周恩来派通讯员叫到司令部去，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在座，张国焘也在座。张国焘明明知道周恩来认识廖承志，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就认识吗？”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问廖：“你认识了错误没有？”“认识得深不深刻？”“改不改？”廖承志一一作了回答。当天，周恩来留廖承志吃饭时，周恩来只和张国焘谈话，不再理会他，饭后就叫他回去了^①。不久，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廖承志和罗世文等解除了监禁，恢复了党籍。

廖承志在被监禁近两年时间的逆境中坚持革命原则，始终保持对革命事业、对党忠贞不渝的情操，时时处处以革命大局为重的高贵品质，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所感动、钦佩。廖承志被押解长征中，部队给他刻连环画的任务，他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每天都完成任务。如果任务重，那怕再晚，他也不休息。当别人都进入梦乡，他仍然在油灯下工作。他常对一起工作的同志说，部队当前急需精神食粮，刻图任务很重要，很紧急，宁肯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尽快刻出来。廖承志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也严格要求其他同志。一次，他看到一张印得不清的样品很为生气。他说，我们的工作一定要认真细致，不得有丝

^①参见廖承志：《教诲铭心头，恩情重如山》，《周恩来总理八十诞辰纪念诗文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毫的马虎，更不能出现差错，这是对工作负责。随后，他认真而又温和地给工作人员讲解如何调墨，如何印刷的技术，使连环画的质量越来越好。同时，廖承志在长征中，凡部队开大会需要挂马克思、列宁的像，他就出来画好；需要大标语，他就出来写好。任务完成后又被关起来刻连环画。对此，他从来未有过半句怨言。廖承志虽被关押，但他对工作人员和押解他的战士都是无微不至的关怀。一次，负责押解他的两个战士因病掉队牺牲，他知道后心里很难过。而当他见到其他战士情绪低落时，连忙安慰说：“不要难过，眼下条件艰苦，路途远，困难多，你们一定要注意爱护自己的身体。”说着，把自己的干粮袋硬塞给年纪小的战士，帮助战士整理行装。这些战士看着廖承志憔悴虚弱的面孔和交给他们的干粮，无不感动得流下眼泪^①。为了鼓舞士气，廖承志常和战士们一起放开嗓子歌唱。他唱民歌、唱军歌，还教战士们唱《国际歌》。雄壮的歌声感染了饥饿、疲惫、默默无声的行军队伍，不少指战员都跟着唱起来，歌声激励了红军战士胜利前进的步伐。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廖承志随长征部队到达陕北保安，在红色中华通讯社负责编译外国通讯社电讯稿，包括德、日、法、英四国文字的电报翻译工作。当时，条件艰苦，没有办公桌，他就把电报稿装在自己口袋里，边走边译，有时走在路上还在翻译，并把各国情况综合起来，供中共中央领导参阅。翌年一月，他随中共中央迁往延安，和徐冰、陈克寒等一起筹备、出版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周刊，向全国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四月，他被任命为党报委员会

^①严长寿：《廖承志在长征路上》，《星火燎原》1984年第3期。

秘书。他在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每期《解放》杂志的“时事短评”栏里，几乎都有他写的文章。在《日本当前的政潮》和《林铤滚蛋，近卫上台》两篇短评中，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在《上海爱国领袖被起诉》和《所谓苏州“审判”的更新》等评论中，抨击了蒋介石政府迫害爱国人士沈钧儒等“七君子”的罪行，提出国民党必须“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爱国犯”。在其它的“时事短评”文章中，他还嘲讽了汉奸、特务的卑鄙伎俩，声援十九路军抗战等等。他的文笔犀利，语言生动，使人振奋。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发表了长篇专论：《怎样实施义务兵役制》，具体阐述了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的“逐步从雇佣兵役制转变为义务兵役制”的重要意义及实施的条件、办法等。总之，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他激扬文字，挥斥方遒，表现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对于救国救民复兴中国的正义战争的强烈责任心。

廖承志到了延安后，由于国内和平局面的出现，延安与国民党统治区开始有了通邮。他即写信给分离多年的老妈妈和姐姐。在这些通信中，他向母亲宣传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希望母亲为促进国共合作的形成而努力。他指出：“现在国共合作的关键不在我们方面，而是在国民党方面。因为日寇的挑拨离间，可以使许多胆小之徒东疑西忌，而致联合战线不能迅速形成，这是很可惜的。因此，我们诚恳地等待国民党当局。所以为促进国共合作计，我想最大的工作是给那些疑神疑鬼的人解释明白。”“要重新实现民国十三年局面，必须得好好努力，日本是不让我们合作的，自然从中极力破坏，坏分子的捣乱阻挠也就更加明目张胆，希望你能好好团结一切赞成合作的人士共同前进，这是中华民族极

需要的。”^①七七卢沟桥事变和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何香凝、廖梦醒积极参加上海人民支持我军抗战的工作。廖承志对老妈妈和姐姐的抗日热情非常钦佩。他在八月三十一日的信中写道：“全国抗战发动今日，每一个中华儿女都负着光荣的保卫祖国神圣职责，我虽然明知上海已成为炮火连天之地，但也坚信你们唤醒民众，号召民众参战工作，必定更加加紧。我虽然顾虑着你们的安全，但为祖国设想，更希望你们们的坚决往前，不屈不挠的奋斗。”^②同时，他在信中，坚决地表示为了抗战的胜利而牺牲一切。他写道：“我很想去看你们，可是战争正在进行，一切的一切都只能为着战争的利益而牺牲。我们这里已成为整个战争的左翼要地，在战略中心下组织西北群众，号召西北群众工作，也就唯有加紧地落在我们身上。个人虽想来看你们，但整个工作要求，都不许我离开此地。我个人也唯有在工作中的加紧中，遥祝你们的安全，遥祝你们的努力。这是我难过的事，但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也唯有依靠于全国的母亲，女儿们，儿子们，能够忍受当前的难过，能够抹下满眶的热泪，去为祖国的前途拚至最后一滴血。我们的母子间，今日还能通信，可是连通信的可能都丧失的不知多少。我们也只好忍受它，我们也只好勇敢地接受这锻炼，也唯有让我们大家来担受这重担吧。”他还指出：“持久的抗战已经发动，经历的磨折困难才开始，以后也许我们还要忍受更大的锻炼，以后遭遇的难过事恐怕也十倍于今

①廖承志给母亲的信（1937年4月6日、6月20日），复印件存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

②廖承志给母亲、姐姐的信（1937年8月31日），复印件存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

日。如果我们能见面，那是更好。如果没而见面的时间更拖长，（原文如此）我们也唯有忍受，让我们在民族抗战胜利的旗帜下再庆祝我们的会面好了。”^①在这里，字字珠玑、熠熠发光，显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为了祖国的生存、民族的解放，而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表达了他对抗战的最后胜利充满信心。正是这些革命精神和正确的认识，使他积极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去。

在抗日的烽火中

一九三七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二次合作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廖承志奉中共中央之命，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十月底，南京告急，他和叶剑英、李克农等七人分乘两辆破旧小汽车爬山过河，绕道长沙，于十二月到达武汉。一九三八年一月初，廖承志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决定，离开武汉，前往香港，组织半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为在香港顺利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在廖承志未到达香港前，周恩来特地当面告诉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说明由于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敌，赢得了海外广大华侨的钦佩，纷纷捐助物资、药品和款项。我们需要在香港设立办事处接收，请转告香港总督加以关照。因此，廖承志到达香港不久，在中共香港市委的协助下，很快在香港皇后大道中十八号设立办事处（公开的招牌是“粤华公司”，表面经营茶叶批发生意）。廖承志任办事处主任，并作为八路军、新四军的代表，领导南方各省的工作及八

^①廖承志给母亲、姐姐的信（1937年8月31日）。

路军广州办事处。在香港，他见到了分别多年的老妈妈何香凝和姐姐廖梦醒，并于一月十一日和经普椿结婚。

廖承志在主持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工作期间，出色地完成了为八路军、新四军筹集资金和物资的任务。他通过各种方式，大张旗鼓地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战、英勇杀敌的事迹，动员广大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和国际友人为八路军、新四军募捐。在他的努力下，募捐了大量的款项、医疗器械和药品、车辆与物资。与此同时，廖承志更以他所具有的独特的身份和地位，在海外享有的声誉，为人民抗日武装力量能够得到更多的援助，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例如，由于廖承志的特殊身份，海外华侨捐款给八路军、新四军，可以把款项直接汇给香港华比银行廖承志收。这样，既手续简便，又能得到海外华侨的充分信任，大大促进了海外华侨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支援。在当时要由香港一家银行代收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捐款，显然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其他人能够办到的，只有廖承志的特殊身份和威望才能办到。这是因为当时香港华比银行的华人买办邓文田和邓文钊，是廖承志的表兄弟，所以才能使用这个汇款地址^①。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还在香港《大公报》刊登启事：“各界同胞捐赠的物资、款项，均由敝军驻粤港代表廖承志收转。”^②廖承志还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密切配合，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团结了很多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推动了很多国际组织和华侨团体从世界各地募集了大批款项、物资和药品、医疗器械

^①梁上苑：《追忆廖公在香港的时候》，1983年7月19日香港《大公报》。

^②1939年2月5日香港《大公报》。

等。这一批批的物资、款项，廖承志以极端负责的精神和周密的安排，及时安全地转运到武汉、延安。同年十月，广州沦陷后，又通过越南海防转运到延安，极大地支援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党领导的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抗日斗争。廖承志虽然暂时离开了八路军、新四军战场，但他为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廖承志主持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工作不久，即同八路军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一起，遵照中共中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精神，与国民党广东当局余汉谋、国民党南雄县县长莫雄谈判，交涉释放了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数百人。这批获释的党员和进步青年随后分配到各地参加了抗日斗争。

在这期间，廖承志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的立场和主张。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溃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危机。国民党亲日派“再战必亡”的亡国论调一时甚嚣尘上。为中华民族生存而战的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回答中国能否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廖承志根据党的洛川会议精神，于一九三八年初发表了《收获与教训》一文，指出：虽然大片国土沦丧，众多同胞牺牲，“可是这些血和泪砌成了中国一座新的血肉长城，显示了中华民族可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曙光。”^①回击了国民党亲日派“再战必亡”的谰言，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的斗志，大灭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凶焰。他在文章中还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中流砥

^①廖承志：《收获与教训》，救亡出版社1938年2月版。

柱。他还指出，为了坚持抗战，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必须批判和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坚持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参加抗战的全面抗战路线。

一九三八年四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张文彬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广东党的代表会议，成立中共广东省委，廖承志被任命为省委委员。

为了向海外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以及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寇的战绩，廖承志组织和扩大宣传阵地，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在香港推动表亲邓文田、邓文钊兄弟出面，办了蜚声海外的《华商报》，大力支持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办的《光明报》、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宋庆龄主办的《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和马国亮办的《大地画册》等报刊，以及范长江、夏衍、黄药眠等主办的国际新闻社和乔冠华、胡一声等主办的香港中国通讯社等。在广州由郭沫若、夏衍等开办的《救亡日报》，也得到廖承志的大力支持。此外，廖承志在香港还组织出版了英文版的毛泽东著作，这是毛泽东著作在香港第一次印刷和出版。他亲自安排把这些著作寄往欧美各地，让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他和八路军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还利用当时广东余汉谋支持抗日的时机，在广州公开出售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书籍。

廖承志为了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抗战，不辞劳苦地深入到各阶层的群众中去，曾应广州中山大学学生的邀请，在中山大学的大钟楼作了政治时事报告。他那激情的语言，透辟的分析，提高了广大青年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认

识，增强了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鼓舞了他们投身抗日斗争的热情。一九三八年夏天，国民党顽固派对武汉蚁社和山西牺盟会等爱国抗日团体非法“取缔”，并对其成员进行迫害。广州的国民党顽固派马上呼应，叫嚣“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滥调，并封闭了广州新华日报分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坏抗战的倒行逆施，引起全国人民的义愤。为了揭露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阐明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团结抗战的一贯主张，廖承志以新华日报分馆的名义，在广州市哥仑布酒店召开进步文化界人士、爱国青年和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会上，他针对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反共滥调和封闭新华日报分馆的反共活动，作了严正声明，公开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和摧残抗日青年的罪行。在会议进行中，一个特务伪装进步，说国民党强迫学生进行军训，是对青年的法西斯压迫，提出要反对国民党进行军训。参加会议的青年一时分辨不清是非，拚命鼓掌。这时，如果我们赞同这种“意见”，国民党顽固派就可大造我党破坏军训、破坏抗战的舆论。廖承志当即识破国民党的阴谋，指出：“军训，就是要搞军事训练。现在全国抗战，人人都有舍己卫国的职责，作为青年学生，是要学会一些必要的军事知识和技术的。要准备武装抵抗侵略，是应该参加军训的。至于在军训工作里面有缺点，可以向当局提出意见，要求改善。”^①他这样一说，听众恍然大悟，那个特务就噤若寒蝉了。国民党顽固派这一手失败后，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一个科长跳了出来，气势汹汹地叫嚷什么“共产党破

^①杨康华：《我的追念》，1983年6月27日《南方日报》。

坏团结”，“共产党就是汉奸”。会场听众对他的反共狂言极为愤怒，高声喊打。这时，潜伏在楼梯旁边的特务打手，正想趁机捣乱会场大打出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廖承志不顾个人安危，大义凛然地高声说道：“请大家安静，我们要枪口对外，团结抗日。有什么不同意见都可以讲。但是，无论是谁，都不能动拳头。这位先生讲的话不对，大家愤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开会完全是讲道理的。”接着，他庄严地说：“我就是共产党员，我们是坚持抗日的，是坚持团结抗战的。倘若日寇有一天打到广东来，我们共产党员一定到最前线浴血奋战。你这位先生大概是国民党员，希望你也同我们一块去战斗。到时你会在哪里呢？请你用事实来回答吧。你刚才讲的话是破坏团结抗战的，也违背你们蒋委员长的讲话的。我们谁爱国，谁坚持团结抗战，人民和全世界都会看得清清楚楚。”^①他的这番话，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主张，深得与会者的支持和拥护，击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使中共的威信在群众中大大提高。当散会时，大家高呼“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英勇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抗日战争胜利万岁”等口号。会后，中共广东省委号召全体党员向廖承志学习，学习他革命的坚定性、高度的原则性和斗争的灵活性，学习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讲究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和艺术^②。

廖承志为了巩固和扩大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广州，特别是在香港这个极其复杂的环境中，施展了他那善于争取人、团结人，善于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才能，对港澳

^①杨康华：《我的追念》。

^②《广东工作综合报告》，原件存中共广东省委档案馆。

同胞、海外侨胞、国际友人，直到陈嘉庚那样的大侨领，都作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团结工作，把大批大批的人团结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廖承志在团结各界人士时，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共产党人要善于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和要善于把“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①的策略思想，取得很大的成绩。一九三八年三月底，廖承志从香港回到广州，宴请二十年代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请司徒慧敏作陪。当司徒慧敏知道被邀请的人名字后，很诧异，因为那些人都是当时国民党的中高级军官，其中有少数人参加过反共反人民活动，还有人是当年在东京青山会馆进步学生集会上，拔剑而起进行捣乱的人。廖承志耐心地向他解释说：这些人都是职业军人，大多数是为了当官发财而入士官学校的。但不要忘记，其中也有一些人在士官学校学习过程中走向进步，如士官许崇耆（许崇智的弟弟）参加进步学生行列，终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代初期投奔江西红军。所以人是可以改变的。今天是团结抗战的局面，他们都是我们的老相识，即使从前是“武斗”的双方，今天也得携起手来。他还风趣地说：他们当年被人称为“士官牛”，既然牛可以为国民党反动派驱使，也可以在反对侵略、保卫祖国的目标下为革命事业服务，我们要争取他们，共同奋斗。后来的事实证明廖承志的远见卓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当年他宴请的这些人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有一些人离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营垒；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有人宁可到香港经商也不参加

^①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0页。

反人民的内战；有的毅然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如解放战争中，新华社报道的第一批国民党军官起义将领的名单中，有一个名叫麦霞冲的，就是当年廖承志宴请的人。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二十一日广州沦于敌手。在日军登陆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电示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和中共广东省委，“要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区”^①。廖承志接党中央电示后，即在香港召集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书记梁广、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和海员工作委员会书记曾生等开会，研究在东江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廖承志在会上指出，要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在敌后建立我们的基本部队，开展游击战争。根据会议决定，十二月二十四日，他派曾生、周伯明、谢鹤筹等率领一批党员和香港爱国青年前往惠阳坪山，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曾生等回到坪山后，根据廖承志的指示，成立中共惠（阳）宝（安）工作委员会，动员群众把收藏的武器贡献出来抗日，号召青年学生、青年农民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很快建立了一支有一百多人的人民抗日武装。这支抗日武装建立后，在惠阳淡水周围铲除伪政权，惩办汉奸，并收复淡水镇，成立了东江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与此同时，由王作尧率领的东莞人民抗日武装也发展起来，成立了东（莞）宝（安）惠（阳）人民抗日游击大队。这两支东江抗日游击队成立后，廖承志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利用国民党政府的命令组织自卫军》指示的精神和广东的特点，提出了党在东江敌后建立抗日武装，以自发组织的抗日群众面目出

^①廖承志：《东江纵队史·序言》（1982年12月3日）。

现，争取国民党番号，以利于生存和发展。中共东江特委和曾、王两部队领导遵照他的意见，经过努力，分别取得了第四战区第三游击挺进队新编大队（曾部）和第四游击挺进队直属第二大队（王部）的番号。部队接受国民党番号后，取得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更有利的支援，使部队得到迅速的发展壮大。曾、王两部保持党的组织和独立编制，到一九三九年底发展到一千七百多人。这支东江人民抗日武装在同敌人的浴血奋战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威震祖国南疆的东江纵队。

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沦陷后，叶挺从新四军来到粤北，准备开展华南抗日游击战争。廖承志配合叶挺向当时任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的余汉谋进行统战工作，余任命叶挺为东江抗日游击总指挥部负责人。廖承志与其他同志协助叶挺在深圳设立指挥部，并将曾生领导的游击大队编为指挥部的特务营。不久，蒋介石闻讯大惊，责令余汉谋取消原任命，要叶挺立即离开东江。中共中央考虑到同国民党统一战线关系，便通过廖承志告知叶挺返回新四军。

为了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发展壮大，廖承志不仅在港澳地区、海外华侨中动员广大爱国青年学生、工人回东江参加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而且还竭力发动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募捐款项、物资支援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一九四一年以前，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的被服、军鞋和药物，大部分是经廖承志发动华侨、港澳同胞捐献的。同时，他还推动和支持南洋华侨救乡总会和香港惠阳青年会、余闲乐社、香港海陆丰同乡会联合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参加东江抗日斗争活动。“东团”成立后，在香港设立总团办事处。“东团”在廖承志的领导和关怀下，发展很快，队员从二百余人发展到五

百余人，并先后回到东江地区参加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这对中共在东江地区建立和发展人民抗日武装，起了很大的作用。

廖承志对广东东江游击队的关怀，不仅是在物质上支援，而且更重要的是领导这支游击队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一九四〇年三月，国民党广东当局在蒋介石的驱使下，对广东东江游击队发动军事围攻。东江抗日游击队的领导干部以为这是国共分裂，内战即起，决定东移国民党统治区海陆丰地区。部队沿途受到国民党顽军的围追堵截，到达海陆丰后，处在国民党顽军的包围之中。这时，弹药缺乏，给养不继，处境十分困难。在这严重关头，廖承志向中共中央报告情况。中共中央于五月八日给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东江特委发来紧急电示，提出：“曾、王两部仍应回到东、宝、惠地区，大胆坚持抗日。”^①廖承志立即派干部把中共中央指示和款项转送给部队，并指示部队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不管困难多大，都必须回到惠、东、宝抗日前线和敌后，坚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部队在当地党组织的支持和廖承志的具体安排下，胜利地回到抗日前线。一九四二年一月，香港失陷后，廖承志把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与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南方局联系的电台呼号交给东江游击队，从此东江游击队能够直接地及时地得到中共中央的指示。这对东江抗日游击队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廖承志还十分关心珠江三角洲人民抗日武装的创建和发展。早在一九三八年春，他在香港就鼓励吴勤^②回广州组织抗

^①《东江纵队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吴勤大革命时曾参加中国共产党，任南海县四区农会会长，南海县农团团长，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往南洋。抗日战争爆发后到香港，拟回乡参加抗日斗争。

日武装。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广州失陷后，吴勤根据廖承志的指示，发动爱国青年在广州郊区成立了抗日义勇队。这支抗日武装在廖承志的支持下改编为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简称“广游二支队”）。为了把这支抗日部队改造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廖承志在一次广东省委会议上提出要派党员干部到广游二支队去。他还提出在改造这支抗日武装时，要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既要提高警惕，又不要“过河拆桥”。十一月下旬，廖承志派廖锦涛带队的澳门四界救灾会回乡服务团，到广游二支队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在廖承志的关怀下，广游二支队与中山、顺德抗日游击队在抗日的烽火中，得到发展壮大，成为活动在华南抗日战场的三大主力之一。与此同时，廖承志还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亲自指导冯白驹领导的琼崖工农红军改编为抗日游击独立总队的谈判工作。结果，该部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取得了公开合法的地位。

在此期间，廖承志满腔热情地组织爱国青年奔赴抗日前线。由于廖承志向海内外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使中共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广大华侨、港澳爱国青年纷纷向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和广州办事处提出去延安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要求。廖承志对这些爱国青年的抗日热忱总是满腔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介绍他们前往八路军武汉、重庆、西安办事处，然后转赴延安，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据不完全统计，经廖承志领导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广州办事处先后介绍到八路军、新四军去的爱国青年、爱国华侨、港澳同胞达一千多人。这些青年在党的教育下，经过长期艰苦的锻炼，许多人成

为党和军队的干部。这对加强和壮大人民军队的力量，开展抗日斗争，起着很好的作用。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同日，日军进攻九龙。二十五日，香港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香港前，廖承志根据毛泽东关于“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①的思想，分析了英国有同我们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可能，从而在香港积极促进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他曾领导广东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代表尹林平与英方代表会谈。港英当局代表提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牵制进攻香港的日军。我方提出港英当局应开放民主，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保卫香港，并要求英方供给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武器装备；英军司令当时表示同意我方要求。虽然由于香港很快沦陷，计划未能实现，但为后来东江纵队与英军方面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香港的沦陷，使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被困在香港、九龙。这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原在国民党统治区，他们在那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宣传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击日寇的战绩，抨击国民党片面抗战、消极抗战的错误，因而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他们遭到国民党的进一步迫害，在国统区无法立足，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撤退到了香港。这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到了香港后，廖承志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的指示，领导和支持他们创办报刊、成立新闻局、通讯社，宣

^①毛泽东：《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64页。

传抗日，给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走狗以打击，引起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走狗的仇视。香港沦陷后，日军到处搜捕抗日分子，限令文化界人士前往报到。他们的处境非常危险。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对这批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安全非常关心。当日军向港九发动进攻的当天，中共中央即急电周恩来、廖承志，要多方设法保护他们撤出港九。南方局周恩来急电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广东东江游击队的领导人，要他们坚决执行党中央指示，不惜任何代价，不怕牺牲，营救滞留在港九的文化界精华、著名爱国人士和一些国际友人。廖承志接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周恩来的电示后，立即领导组织营救工作。当日军进攻九龙不久，廖承志即指派乔冠华、叶以群到九龙，把能找到的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迅速撤退送至香港；一时找不到的，立即通过交通站通知他们转移。这批人到了香港后，大部分集中在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廖承志逐个向他们询问情况，给他们落实住处，交待联系方法。对原住在香港的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则帮助他们立即搬家转移，除了规定的单线联系外，断绝一切来往，并且要求所有的人一律改穿“唐装”，以小商人、店员、职员身份隐蔽起来，等待撤退的通知。他除了细致地布置营救撤退工作外，特别对每一个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进行革命气节的教育，请“大家珍重自己的历史”^①。与此同时，他向粤南省委书记梁广传达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等的电报指示精神，要求做好营救的准备工作。一九四二年元旦，廖承志和连贯冒着生命危险，星夜偷渡到九龙，在上海街的一幢楼房里，和广东东江游击队政委林平、广东粤南省委书记梁广开

^①郁风：《他能使人快乐》，载《廖公在人间》。

会，研究营救工作。会议决定全力以赴，坚决完成党中央给予的任务，并且具体研究了营救工作的部署。第二天，他和连贯、乔冠华从九龙往西贡，坐船过沙鱼涌，前往惠阳东江抗日根据地。临行前，他把八路军办事处的机要干部潘静安留下来协助刘少文工作，并把营救对象名单和身上仅有的几百元港币和美钞交给潘静安。廖承志到达惠阳东江抗日根据地后，即召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人曾生、王作尧等人开会布置护送工作。随后，他沿惠州、老隆北上韶关，沿途向中共东江前方特委、后方特委、粤北省委等党组织负责人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安排接应及护送工作。同时，他还布置连贯留在老隆，负责调度惠州、老隆、兴梅一线的转送、接待工作；乔冠华留在韶关主持文化人向省外转移。在廖承志的领导安排下，广东省党的各级组织和东江游击队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机智勇敢地从香港日军的严密统治下，营救了抗日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共八百多人。他们中有何香凝、柳亚子、陈汝棠、李伯球、邓文田、邓文钊、邹韬奋、茅盾、夏衍、胡绳、戈宝权、张友渔、黎澍、胡风等。同时，还营救了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夫人上官德贤等十余人，以及英、美、荷、比、印等国际友人近百人。这次营救工作，不仅营救的人数众多，而且无一损失，受到中共中央的表扬。这样出色的营救，使得朋友或敌人都感到十分惊奇，无不钦佩廖承志的领导才能和他对朋友的高度关怀。这一工作的胜利，不仅营救了一大批文化界著名人士，加深了中国共产党与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患难与共的友好关系，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而且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威望，发展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铁窗生涯

一九四二年一月初，廖承志安排好营救滞留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工作后，来到韶关，随后转到乐昌县坪石镇，参加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破坏。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南方工委组织部部长郭潜被捕。郭潜经不起敌人的威迫利诱，成了可耻的叛徒，并向特务供出廖承志在乐昌。郭潜写一字条伪称上级指示要廖承志去桂林，安置疏散回来的文化人士，并由国民党特务分子庄祖芳伪装南方工委交通员持郭潜写的字条和现款一万元，于五月三十日奔向乐昌坪石镇。当晚，庄祖芳利用和廖承志接头的机会，将廖承志秘密逮捕。特务怕廖承志在韶关关押太久出事，于六月五日，将他押解到江西泰和马家洲集中营。

廖承志在敌人集中营，始终坚贞不屈，无所畏惧，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贵品质和英雄气概。开始，国民党特务对廖承志进行“突击审讯”，强迫提供线索。但是，廖承志除承认敌人早已知道的共产党员身份外，一切都拒绝回答。国民党特务这一诡计失败后，便采取所谓“疲劳审讯”的办法，不分昼夜，持续进行审讯，不给片刻休息，妄图通过肉体上的折磨，迫使廖承志屈服。但是，廖承志经受了这一考验，坚守党的秘密，怒斥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反动行径。结果特务依然一无所获。接着，特务又施行第三条诡计，派一个特务伪装进步人士安插在监狱中，企图在日常的接触和共同生活中骗取信任，以便获得线索。历时两

个月，廖承志高度警惕，特务的阴谋又一次破产。他们又施展诡计，指派叛徒郭潜现身说法，对廖承志进行劝降。可是，叛徒刚刚开口，廖承志便高声怒斥，大骂：“叛徒，你不配跟我谈，滚！滚！”郭受怒斥后，如丧家犬，夹着尾巴逃跑了。集中营头子施锦亦企图用伪善办法，装得“和蔼”，给予“优待”，以达到软化的目的。但廖承志根本不为所动。特务、叛徒们都说廖承志“十分顽固”。这正好说明了廖承志宁死不屈的高风亮节和高贵品质。他在狱中写给周恩来以及他的老妈妈何香凝、姐姐廖梦醒、夫人经普椿的信，还有诗词，漫画等，也都充分反映了他的革命精神。在给周恩来的信中，他说：“希望你们相信小廖至死没有辱没光荣的传统”，并在信的最后一句写上“中国共产党万岁！”^①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贞。他给夫人经普椿的信中写道：“他们逼迫我投降，是可忍孰不可忍！倘必要时，惟有宁死不屈而已，希告各友放心。……不幸时，勿再以我为念！新生的孩子倘健在，可名曰继英，取继续英勇事业的意思。”^②给他母亲、夫人的诗词，同样表达了一个共产党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革命气节：

拜别慈母

半生教养非徒劳，
未辜双亲自足豪。
碧痕地夕留播众，
不负今晨血溅刀^③。

^{①②③} 《廖承志的一生》，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诀 普 禧

往事付流水，
今为永诀卿。
卿出革命门，
慎毋自相轻。
白发人犹在，
莫殉儿女情。
应为女中杰，
莫图空节名。
廖家多烈士，
经门多隽英。
两代鬼雄魄，
长久护双清^①。

辞世 南柯子

半生浑大梦，梦后莅东风。风消雨散尽成空；空剩如虹，壮气曜苍穹，默默心情遥寄白云中。留得枯骨待残冬，待到冬过春还遍地皆红^②。

廖承志还在狱中画了不少漫画。这些漫画，表现了他对革命的忠贞，对国民党特务的抗议。例如，在一幅《史可法率兵守卫扬州城》的画中，题词为：“男儿自古谁无死，留得芳名照汗青。”在另一幅画中题诗：“长青劲节身，霜雪任侵袭，借问林间叟，如我有几人。”^③

在敌人的监狱中，廖承志坚持斗争。他和后来被捕关在一起

①②③ 《廖承志的一生》。

的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一起，教育、鼓励难友要保持革命气节，对党忠贞，坚持斗争。当他知道涂振农（中共南方工委宣传部部长）被捕后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而叛变时，非常气愤，并设法告知了组织，以避免敌人扩大破坏。

廖承志在狱中不放过教育人的机会。狱中一个姓姚的工作人员同情他和难友的处境。他经长时间的考察，对其进行启发教育，这个年轻人觉悟后，冒着生命危险为廖承志秘密送信到韶关交给经普椿，最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到了延安^①。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中统特务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将廖承志移交给军统特务看管。廖承志被军统特务用汽车押到赣州，“劝”他写信给蒋经国，被他坚决拒绝。几天后，特务又用飞机将他押解到重庆歌乐山，先后关在杀人魔窟“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渣滓洞、黄家院和白公馆。有一天，监狱当局给廖承志做衣服，理发。后来，来了一辆小汽车，载着廖承志在歌乐山上转来转去，然后带到一幢房子中，坐了大约十分钟，蒋介石走了进来。廖承志看了蒋介石一眼，坐着连动也未动。蒋介石假惺惺地问：“近来身体好吗？”廖承志反问蒋介石：“难道你不知道吗？”蒋介石经廖承志这一反问，甚为难堪。沉默一会，蒋介石说：“你不要忘记，你是廖仲恺、何香凝的后代，你这样做对得起他们吗？”廖承志义正辞严地回答说：“我只有这样做才对得起他们。你们挂着廖仲恺的招牌，干的是反共反人民的勾当，是你们对不起廖仲恺。”蒋介石又说：“如果放了你，想留你在我身边，怎样？”廖承志斩钉截铁地回答：“办不到！”蒋介石还不死心，又说：“那放了你，你放后又

^①经普椿：《承志和我》。

跑到那边去，于心不忍。”廖承志责问蒋：“怎么，你还想发动内战？！”说罢立即起来准备走。蒋介石连忙说：“回来还有话跟你谈。”廖承志大义凛然地说：“没有什么可谈的，你们用刀也罢，用枪也罢，我的脖子已经洗干净，等着。”说着头也不回的走出房间^①，充分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贵品质。后来，每当同志们称赞他的革命精神时，他却说：“我只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②

由于廖承志过去对革命的贡献和他在狱中的顽强斗争，一九四五年六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时，他虽然仍在狱中，但代表们都钦佩他的坚定立场和英雄气节，一致选举他为中国共产党候补中央委员。

廖承志被捕后，党中央想尽一切办法进行营救。当周恩来接到廖承志秘密托人送来的信和漫画后，对国民党的反共罪行表示极端的愤慨，对廖承志视死如归的坚定立场和英雄气概表示钦佩。他向国民党当局多次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释放廖承志、叶挺和一切政治犯。但是，国民党蒋介石一直没有答应。廖承志的老妈妈何香凝要到重庆，蒋介石也不让去。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断交涉，特别是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到重庆谈判，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双十协定》，蒋介石表面上不得不同意“释放政治犯”等条款。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后，中共代表团又据理力争，要求释放廖承志、叶挺等。同时，宋庆龄、何香凝也不断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廖承志的要求。一九四五年底，国民党军队进攻邯郸解放区时，第十一战区副长官马法五、四十军副军长刘世

^①据廖承志写的回忆。

^②许涤新：《钢铁意志，赤子心》，载《廖公在人间》。

荣、参谋长李旭东等人被我俘获。我党和国民党经过多次谈判后，我方释放马法五等人，国民党才答应释放廖承志和叶挺^①。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廖承志被释放出狱。那天，周恩来亲自接他回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受到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廖承志又回到了党的怀抱。但他一出来就关心仍被囚禁的叶挺将军。当《新华日报》记者访问他时，他说：“希望被禁的政治犯都自由。”

在解放战争胜利声中

廖承志出狱不久，就积极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一九四六年四月二日，他受中共中央指派，以军调部重庆三人小组中共代表身份飞往广州，和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谈判有关东江纵队撤退到山东的问题。早在一月中旬，停战令下达后，军调部第八小组就到了广州。但是，张发奎却发表了一个荒谬声明，说广东无共军，污蔑抗战有功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是“土匪”。中国共产党为了换取全国的和平，决定东江纵队北撤山东。廖承志到广州后，和军调部第八小组中共代表方方、尹林平一起，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双十协定》的原则，与国民党代表张发奎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廖承志以“东纵”在抗战中的伟大战绩和营救国际友人、盟军飞行员的事实，严正驳斥了张发奎的谬论。与此同时，他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作必要的让步，终于达成了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的具体协议，即规定了北撤的登

^①廖承志：《教诲铭心头，恩情重如山》。

船地点、人数和期限。从而保证东江纵队主力胜利北撤到山东烟台，配合了中共中央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任务的实现。

廖承志胜利完成东江纵队北撤的谈判任务后，回到重庆。四月八日，秦邦宪、叶挺、王若飞、邓发等人由重庆乘飞机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全部遇难。事件发生后，廖承志非常悲痛，写了《邓发同志》^①一文，以志哀思。他写道：“如果说中国海员工人及其培育出来的干部是中国革命运动在长江以南的有力的动力之一的话，那么，应该说邓发同志就是这支队伍中最光亮的楷模之一。”^②他常说，我们活着的人，千万不要忘记这些同志，我们要把他们未竟的工作担当起来，加倍努力地民族的解放而斗争。

同年五月初，廖承志奉命随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飞往南京，任中共南方局外事委员会副书记（书记周恩来）、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发言人，并为《群众周刊》撰写和审查文稿。他工作认真、负责，常常坚持工作到深夜。肚子饿了，就到巷口买几个茶鸡蛋，吃完又接着干。当时，负责最后审稿的李维汉，曾对廖承志有过这样一句评语：小廖的文稿怎么改他也乐意接受。

全国内战爆发后，廖承志于九月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当时，新华社是党报、通讯社和广播电台三大中央宣传机构的统一组织。在新华社一起主持各部门工作的，还有艾思奇、陈克寒、吴冷西、胡绩伟、廖盖隆、范

^①1946年4月19日《新华日报》。

^②经普椿：《承志和我》。

长江等。在工作中，他发扬民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特别是倾听反对意见和对他的批评意见。他善于用人所长，常说要让“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工作中，廖承志对工作人员的文章、每件工作都一丝不苟。钱俊瑞回忆，一次审议关于大后方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社论稿，廖承志和他改了至少八遍，但他还不放心，仍嘱咐交给毛泽东主席看过才发稿。社委会决定要他写的稿子，他总是亲自动手，从不让别人代写^①。

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被我军粉碎后，被迫改为重点进攻。中共中央、毛泽东于三月十八日主动撤离延安。在中央撤出延安前，廖承志被毛泽东、周恩来找去布置任务，指出：新华社转移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当延安电台一停播，晋冀鲁豫电台就必须接上，保证陕北电台的声音不中断。廖承志执行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率领新华社大部分干部开赴晋冀鲁豫解放区。经过两三个月的长途跋涉，他们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安全转移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涉县，建立了第二陕北广播电台。廖承志到达晋冀鲁豫解放区后，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由于他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文字广播没有中断过一天，口语广播因广播技术原因，也只中断三天。国民党在一个很长时间内，以为陕北电台还一直留在陕北，其实新华社早已在太行山广播了。

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到一九四八年五月，廖承志领导的新华社虽然远离党中央，但是，他牢记出发前周恩来关于“必须事事向党中央请示”的叮嘱，坚持将各地送来的战报向党中央请示，由毛泽东修改后发表，从而使世界各国人民听到中国人民

^①钱俊瑞：《胸怀世界，永留人间》，《廖公在人间》。

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因此，廖承志领导的新华社曾受到中共中央的多次表扬。但是，在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报道中，由于没有及时请示毛泽东、周恩来，不加选择地传播了一些包含“左”倾错误的通讯或文章，如宣传“贫雇农路线”、“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贫雇农说了算”、“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错误口号和主张。这些错误，经党中央、毛泽东批评后，很快纠正了。廖承志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一错误，召开编辑会议，传达党中央指示，动员编辑部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检查。他在会上作了深刻的检讨，主动承担了责任，并向党中央写了检查报告。在廖承志率领新华社全体工作人员前往平山县西柏坡与党中央会合后的第一天，他就去见毛泽东、周恩来，向他们作检讨。毛泽东对他说：“你的错误是严重的，但也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在座的周恩来说：“我嘱咐你要向中央请示，为什么只是战报作了请示，土改宣传就不请示呢？你要留下来整风，向中央和新华社同志作检讨。”^①廖承志听了批评后，以对革命负责的精神，再次向党中央作了认真的检讨。

一九四九年三月，在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廖承志被增补为中央委员。进入北京城后，四月，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联络部部长。不久，他又兼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

廖承志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后，亲自请金山、张正宇、张瑞芳这些享有盛名的艺术家到剧院工作，同时，又请夏衍写信给上海的石羽、路曦、王斑、江水、等一批艺术家，请

^①廖承志：《教诲铭心头，恩情重如山》。

他们参加剧院工作。当两支文艺队伍会师后，廖承志号召“用两个拳头建设剧院”，奠定了剧院艺术发展的组织基础。四月十二日，廖承志提出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建设的总体思想，这就是：“要努力使青年艺术剧院成为全国最好的剧院，要不断有示范性的戏剧演出”；“要有模范的青年工作作风，培养少年儿童的艺术干部”；“要通过有效的方法，示范和影响全国各地的青年文艺团体和艺术工作者。”同时，他还主张剧院领导人即使他们能力很高，在原则上要低于艺术专家的薪金；要经营得法，尽量少用国家拨款；对艺术、技术、行政各类人员实行奖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廖承志的领导下，很快就建设成为我国第一流的剧院。

五月五日，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廖承志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的青年运动和今后中国青年的基本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高度评价了在解放战争中青年运动的伟大作用，提出了在革命胜利后中国青年的奋斗任务。

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廖承志被推选为主席。八月，他任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团长，出席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第二次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大会和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会。九月，他作为青联推选的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和平友谊的使者

建国初期，廖承志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政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华侨事务委员

会副主任等职务。一九五三年，他继续当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他还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副主席。

一九五一年三月，廖承志受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托，任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团长，到朝鲜慰问。他率领慰问团在炮火连天的朝鲜大地上，慰问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访问了朝鲜农村，会见了金日成主席。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他和志愿军的同志交谈，了解到我军还没有打破美军的空中优势，急需飞机大炮。他和代表团的同志们，特别是工商界的代表一起商量，准备回国后开展一个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并指定慰问团的一位上海工商界的代表，在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为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提出。彭德怀深表感谢。代表团回国经过天津时，廖承志接见了新华社记者，请记者向全国人民转达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的建议。这个建议很快得到党中央和周恩来的肯定和赞许。为完成这个任务，廖承志又同慰问团的同志们一起，分头到各大区、各大城市宣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的将士们。

为了推动世界和平运动，一九五二年三月，宋庆龄、郭沫若等发起在北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廖承志受任负责筹备。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条件较差，筹备工作上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廖承志日日夜夜，废寝忘食，以至后来周恩来不得不给廖承志下命令：休息好再干。为了开好这次会议，揭露美帝残害朝鲜人民，大搞细菌战的罪行，会前廖承志曾组织世界一些著名科学家前往朝鲜和中国东北调查，终于取得了

确凿证据，把美帝的滔天罪行揭露于世。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取得的成就，是与廖承志的努力分不开的^①。

一九五五年四月，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著名的万隆会议，廖承志被任命为代表团顾问。在大会期间，廖承志频频会见外国朋友和印尼华侨，宣传我国的外交政策。万隆会议通过了我国倡导的亚非会议十项原则。在万隆精神的影响下，第三世界的团结从亚洲、非洲扩大到了拉丁美洲。

一九五六年，廖承志率代表团参加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举行的亚非拉团结大会。会上，有人提出了笼统的裁军口号。为解决这一问题，他精辟地阐述了我国的主张，说：“我们历来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如果提出普遍裁军问题，我们应看看现实，该裁谁的军？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的军。而对于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来说，他们为了捍卫民族独立，维护人身自由，拿起大刀、弓箭和石头进行斗争，他们有什么可裁？”他的这一论述赢得了亚非拉人民的热烈拥护^②。

五十年代初，西方帝国主义者封锁我国，廖承志动员比利时有威望的王太后来我国访问。毛泽东会见了她，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在家接待了她，送画给她。当她回到布鲁塞尔时，不顾美国政府的威胁恐吓，在家里举行记者招待会。这位王太后捧着毛泽东的像片，对满屋的各国记者说：“我是从东方中国来的，那里的人民勤劳、通情达理。毛先生是个明智的人，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你们要放弃偏见。”这一新闻轰动西方舆论界，认为是中国一大胜利。一九六一年，在廖承志的推荐下，

^①刘宁一：《豪情如火的廖公》，载《廖公在人间》。

^②朱子奇：《一位心胸似海的人》，载《廖公在人间》。

巴金率代表团参加东京反原子弹世界大会，获得很大成功，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称赞^①。

整个五十年代，廖承志参加了许多为民族独立，为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进行了一系列友好访问。除上面提到的外，重要的还有：一九五一年，率代表团到斯里兰卡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一九五三年三月，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赴苏联参加斯大林葬礼。一九五四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在柏林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一九五五年六月，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出席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一九五五年十二月，随同宋庆龄访问印度。一九五六年十一月，随同宋庆龄访问缅甸。一九五七年三月，出席在东京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六月，出席在科伦坡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全体会议；十二月，作为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出席在开罗举行的亚非团结大会。一九五八年七月，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在瑞典举行的国际裁军会议；十月，任中国人民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团长到丹东迎接最后一批志愿军从朝鲜回国。一九五九年二月，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一九六〇年四月，率代表团出席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举行的第二届亚非团结大会；十一月，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赴莫斯科参加庆祝苏联十月革命四十三周年纪念大会，并出席八十一个共产党及工人党第二次大会。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率代表团参加在巴勒斯坦加沙举行的亚非人民团结组织执行委员会会议。在这些活动中，廖承志广泛结交国际友人，为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

^①朱子奇：《一位心胸似海的人》。

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著名的世界和平战士，中国人民友谊与和平的使者。

中日友好的奠基人

廖承志是中日友好事业的奠基人。从一九五二年中日两国民间开始正式来往的时候起，他就是中国负责对日工作的领导人。他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站在中日友好的第一线，废寝忘食，费了不少心血，在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中日两国友好关系，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方面，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廖承志在和日本朋友的交往中，做到真心实意，以诚相待，光明磊落，恪守信义，赢得了日本朝野的信任和爱戴。日本国前首相铃木善幸称赞廖承志“不愧为献身于日中两国友好事业的不可多得的卓越人物”，“我国国民对于廖承志先生的深情厚谊，子孙万代永不忘怀”^①。

一九五二年五月，日本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代表、日本参议员高良富等，应我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邀请来我国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日本友人。廖承志当时正担负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的筹备工作，非常繁忙，仍亲自领导了接待工作，并参加会谈。在中日双方代表努力下，于六月二日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随后，高良富一行还积极参加了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的筹备会。同年十月，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在北京胜利开幕，以中村翫右卫门、南博为首的日本代表团前来与会。廖承志为了协订大会日程中规定

^①铃木善幸：《献身日中友好事业的卓越人物》，《廖公在人间》。

的要通过的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同日本代表团领导不知会谈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从而使大会顺利通过了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

一九五三年一月中旬，廖承志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领导代表团同日本红十字会会长岛津忠承、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内山完造、日本和平联络会代表畑中政春为首的日本三团体代表团，就协助日侨回国问题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廖承志阐明了我国政府关于在中国的日侨的立场和政策，他说：

“在全中国大陆解放后留在中国的守法的日本侨民得到了我国人民政府的保护，他们过着和平的生活，他们也可以和日本国内自由通讯。……凡是愿意回国的日本侨民，我国政府都努力协助他们返回日本。”在他的努力下，完满地达成了由日本方面派船分期分批接回归国的日侨；同时，也达成了把愿意回中国参加建设的爱国华侨分期分批用船送回中国的协议。当日本运送归国华侨和接收回国日侨的“兴安丸”等三艘船先后到达天津港时，廖承志都亲自前往欢迎和欢送。他的这一行动对中日友好事业的发展，对华侨回国献身于社会主义建设，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具有深远的意义。

日本红十字会为了感谢中国红十字会的帮助，邀请中国红十字会访日。一九五四年十月，以李德全为团长、廖承志为副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抵达东京。这是一次轰动日本列岛的友好访问，受到了难以形容的热烈欢迎，掀起了战后第一个中日友好高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访日代表团，廖承志等成为战后中国访日的开路人。

一九五九年秋，日本前首相石桥湛三，自由民主党元老、著名政治活动家松村谦三来华访问。廖承志与他们 是青年时

代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读书的同窗，有着特殊的友谊。他们愉快地回忆过去的情谊，恳谈了中日友好的重大意义，决心为促进中日友好关系和贸易的发展，排除障碍。一九六二年九月，松村谦三应周恩来、陈毅的邀请，第二次来华。廖承志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达成了以积累方式，通过建立长期综合贸易关系，推动中日关系前进的协议。接着，日本前通商产业大臣、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企业家高碕达之助率大型经济代表团来北京，会谈中日贸易发展问题。廖承志为中方首席代表。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根据一九六二年九月周恩来和松村谦三关于扩大中日贸易会谈的宗旨，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采取渐进的积累的方式，为进一步发展两国的民间贸易进行会谈，并签订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从此，中日贸易除了友好贸易之外，又建立了廖——高备忘录贸易的新途径，这就是当时在日本赫赫有名的 LT 贸易。“中日贸易备忘录”，不仅使中日经济贸易关系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是恢复中日邦交的纽带。日本朋友把 LT 贸易与友好贸易称为车的两轮，推动着中日关系不断前进。

廖——高贸易渠道开通不久，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又酝酿互设常驻贸易机构的问题，并于一九六四年四月达成协议。同年八月十三日，中国在东京设立了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接着日方在北京设立高碕办事处驻北京联络事务所。九月二十九日，中日双方以此常驻机构为窗口，互派了九名常驻新闻记者。这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实际上是向中日建交的过渡。

一九六三年十月五日，中日友好协会成立，廖承志任会长。他在成立大会上讲话指出：中日友好协会的成立，“标志

着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它象征着两国人民友谊的光辉未来。”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廖承志的党政重要职务都被剥夺了，但是，他的中日友好协会会长一职，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始终保留着。他担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整整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他从世界和平大局和发展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出发，会见过数不胜数的日本访华代表团和各界朋友。廖承志为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呕心沥血。正是由于他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才使得广大的日本朋友，包括一些曾敌视过中国的人，都受到了感动，认清了只有同中国友好，才对日本有利。日本前首相铃木善幸高度赞扬廖承志为中日友好关系建立的功勋。他说：“一衣带水的日中两国，相互关注、相互尊重，但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不幸的灾难和裂痕。被称为既是近邻又是远邦的国家，要恢复邦交，如此艰难事业得以完成，完全靠两国众多的先辈们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廖承志先生披肝沥胆，不屈不挠的精神，方能连接起今日的日中两国牢固的友好纽带。”一九七二年九月中日建交，廖承志作为周恩来的重要助手、外交部顾问，参加了建交会谈的全过程。他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等。在此期间，他即使是吃了安眠药已经入睡，但只要接到参加会谈的电话通知，必定赶到。周恩来知道他身患心脏病，劝他不要参加，但他总是坚持到底。

一九七三年日本樱花时节，应日本十几个民间团体邀请，廖承志率领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访问日本，受到日本朝野空前的热烈欢迎，在日本掀起了中日建交后中日友好的新高潮。访问期间，在田中首相接见全体团员的茶话会上，廖承志把北京萌芽的日本山樱的三片叶子，送到田中首相的手里，说：“象

征中日友好的山樱花树，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茁壮成长了！”这时在首相官邸的大厅里，响起了一片欢腾的掌声。访问期间，廖承志夫妇还出席了大平正芳、小坂善太郎、川崎秀二几位老朋友子女的婚礼，看望了弥留中的石桥湛三先生，接着又出席了石桥的自民党党葬，还为松村谦三、高碓达之助、浅沼稻次郎几位老朋友扫了墓。这些活动充满着他同这几位老朋友的特殊情谊，在日本朝野中引起巨大的反响。周恩来在谈及廖承志一行访问日本活动的盛况时说，这是中国和日本的特殊关系、特殊情况，在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中日两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廖承志为了完成中日人民的这一任务而竭尽全力。他对来访的日本朋友都强调中日两国人民必须世代友好下去。对来访的官方人士、政党首领，总是坦诚相见，反复申述要记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教训，珍惜中日两国人民两千年的友好历史。一九七八年八月，日本国园田外相访华，同中国外长在和平友好条约上正式签字。同年十月，廖承志陪同邓小平访日，出席二十三日两国政府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这又使中日友好关系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为了迎接缔约后中日友好的新形势，廖承志积极促成建立中日友好人民公社，大力推动发展友好城市关系。一九七九年五、六月间，廖承志率领由全国十五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务院各机关共六百人组成的第一艘“中日友好之船”访问日本。中日友好之船绕列岛一周，停靠十个港口，遍访了三十三都、道、府、县，一百七十四个城市，播下了大量的友好种子。

一九八二年十月，是廖承志母校日本早稻田大学建校一百

周年纪念。早稻田大学决定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廖承志高兴地表示接受，并决定亲自去母校出席授学位仪式。但是这年夏天，他不慎跌伤了腿，造成骨折，只好委托孙平化代为接受。孙平化和廖承志长子廖晖在日本参加中日建交十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在早稻田大学总长室接受了廖承志的名誉博士证书和博士服。

侨务工作的卓越领导者

廖承志的祖辈、父母和他本人都是华侨。他对海外侨胞有深厚的感情，同他们有广泛的联系。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九年，他担任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何香凝）。一九五九年起，他一直担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长期负责国家的侨务工作，协助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制订了一系列侨务政策。他关心和维护海外侨胞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关心和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为贯彻党和国家的侨务政策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赢得了海内外侨胞的爱戴和尊敬。

解放初期，在土地改革中，廖承志协助中央人民政府制订了《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由政务院公布。《办法》作出了华侨的房屋不动、侨汇不动等项照顾侨胞利益的规定。但是，在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左”的倾向，出现了没收华侨地主房屋、没收侨汇的现象。一九五二年底，廖承志奉中央指示亲临广东解决这一问题。一九五三年，中共华南分局为此专门召开了华南分局第一次华侨工作会议。廖承志耐心地向参加会议的区委县委和侨务干部解释党的侨务政策。他说：“广东大张旗鼓进行土地改革中，关于华侨

土地财产的处理有着一些问题，这次会议的中心就是要把这些问题加以明确解决。”“农民得到了土地，基本上解决了生产资料问题，这是最主要和最基本的。至于其他生活上有些困难，不能希望从打华侨主意来解决，这些主要依靠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来解决。如果仅仅为着眼前的满足着想，那么，把华侨一切搞光，也还是达不到这目的的。同时，为了争取国外侨胞，适当照顾是必要的，应该很好地向农民说明，这个照顾即使是让步，也是好处多，直接的害处少。对农民来说，不但对将来好，就是对现在也好。”他要求参加会议的“区党委、县委的同志向土改工作队和县区干部很好地进行宣传，农会也要谈一下，使大家摸清总的精神”；“要求广东侨委党组在广东省委的领导下亲自下去参加土改复查工作，并限期向中侨委党组报告。”^①本来，广东等地在土改中发生侵犯华侨利益的“左”的倾向，不是廖承志个人的责任，可是他对华侨回国观光团讲话时，曾特地为这个问题诚恳地表示歉意，使许多侨胞非常感动。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根据廖承志的意见，作出了提前改变华侨地主、富农成份的决定。

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关于解决我国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的有关指示，廖承志和中侨委的同志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日，廖承志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向中央提出了解决华侨双重国籍的四条建议：“第一，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理应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由我国政府和有关政府之间经过谈判达成协议，才能获得合理解决。第二，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

^① 《廖承志同志在华南分局第一次华侨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3年1月）。

题，必须严格根据本人自愿的原则。华侨可根据本人自愿选择侨居国国籍，或保留中国国籍。第三，华侨要选择侨居国的国籍或保留中国籍，任何方面均不应加以人为的限制、干涉和阻止，而应予以谅解和赞助。第四，选择了国籍的华侨或侨裔，如果要求变更国籍，那么，在履行正常脱籍手续之后，就有权利这样做，这是不应加以拒绝的。”^①关于华侨居住国的华侨资本问题，廖承志和中侨委向中央建议：“在这些国家中会发生民族资本和华侨资本矛盾，但是华侨资本是构成当地国民经济的一部分，我国鼓励华侨资本和当地民族资本合作，发展有利于当地的国计民生的事业。”^②鉴于许多侨胞在居住国参加当地经济建设的同时，有一部分还积极要求与祖国经济合作的实际情况，廖承志向中央建议，对于华侨归国的要求，我们不应消极对待，而应该热诚地欢迎他们回来。希望南方各省，特别是适合于种植热带亚热带作物的地区，大量吸收归国华侨和侨眷参加经济作物和农业生产，并努力把便利侨汇、争取国外华侨寄回更多的贻家汇款工作做好。中共中央根据廖承志的意见，先后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颁布了《华侨申请使用国有的荒山荒地条例》，以周恩来总理名义，颁布了《华侨捐资兴办学校的办法》和《华侨投资于国营投资公司的优待办法》。

上述指示和法令由中央公布后，一些地方对“归国华侨要采取检查从宽、一律免税”的体会不深，甚至发生抵触。廖承志指出：这是自缚手脚的做法，必须防止这种倾向。与此同时，在华侨回国投资的问题上，一度又出现了强迫捐献的倾向。廖承志针对这一情况，在《中央华侨投资委员会关于辅导

^{①②}廖承志在中共八大会议上的发言。

华侨家乡建设的意见》（草案）上批示道：一方面说不要强迫命令，一方面又开列了大批清单，结果又必然形成新的强迫命令，对这点我很担心，故建议透彻说明自愿与禁止强迫捐献。

对于归国华侨的安置，廖承志也是关怀备至的。他十分强调要办好国营华侨企业，作为安置归侨的基地。一九六〇年，因印尼排华，数以万计的印尼华侨被迫返回大陆，廖承志亲至广东，夜以继日地主持安置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妥善安置了这批归侨。

在城市对私有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中侨委根据廖承志的意见，与有关部门商定，在改造范围和留房方面对华侨、侨眷给予不同程度的照顾。

一九六二年，国务院为了使各级干部和群众对“海外关系”有正确的认识，在廖承志的指导下，中侨委写了《关于“海外关系”的问题》的报告，以澄清人们对海外关系的各种糊涂认识。接着，廖承志又到广东，向侨区干部专门作海外关系问题的报告。他郑重指出，对“海外关系”不作具体分析，就会出现“左”倾，殷切告诫大家要从积极方面对待海外关系。这些，都很有利于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团结广大华侨、归侨和侨眷。

建国后，华侨为了让下一代接受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希望祖国把他们的子女培育成才，不少人把子女送回祖国学习。一九五五年二月，廖承志与高教部党组书记杨秀峰、教育部党组书记董纯才联名向周恩来请示筹办华侨学生大学进修班学校，以适应日益增多的华侨学生到大陆上大学的需要。报告上说：“我们认为华侨学生尚未考进大学，不属高等教育部，而在高中毕业之后，则已超越教育部应管范围，可是从侨委会来说，属于

华侨事务是责无旁贷的。”由于廖承志等的努力，办起了多所华侨学生补习学校，为华侨学生升大学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一九六〇年初，廖承志倡议在福建泉州创办华侨大学。他亲自任华侨大学校长，对聘教师、建校舍，以及购置图书、仪器等，都给予规划和指导。海外华侨也大力支持华侨大学的创办，踊跃捐款并送子女回国学习。这样，华侨大学创办当年就接收了两千多名归侨学生。

在六十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廖承志要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有关部门，注意改善华侨学生的生活条件，特别要求华侨大学宁可让教职工住草棚，一定要让学生住好一点的宿舍，使他们住的宽一点。

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华侨政策受到“四人帮”的严重践踏，廖承志也受到冲击。一九七二年，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廖承志恢复工作，任外交部顾问，不久又主持国务院侨办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廖承志在落实华侨政策上进行了坚决的拨乱反正。

一九七八年一月三日，廖承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批判“四人帮”所谓“海外关系”问题的反动谬论》的长篇文章。文章指出：“我们要对侨眷、归侨一视同仁，不能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认真落实各项侨务政策。”“对于华侨、侨眷、归侨出入国探亲，对于中国血统的外籍人到我国探亲、旅游以及有外籍亲属的中国公民出国同亲人团聚，我们要给予方便，简化出入境审批手续，并且对入境的人热情接待，提高服务质量。对华侨愿回来为祖国建设事业服务的，要求回来定居、投靠亲属的，应予欢迎并给予妥善安排。对华侨

学生要求回国升学的，我们应积极创造条件，设立华侨学生补习学校，高等学校也要酌情招收华侨学生。”这篇文章，对动员全国各方面共同为侨务工作而努力起了很大作用。

一九七八年，中央根据廖承志的意见，作出了复办暨南大学的决定，廖承志任董事长。六月，暨大复办后在广州召开第一次校董会。廖承志在会上提出兴办医学院和华侨医院问题。他说：许多华侨、港澳同胞多次提出，希望国内建一个现代化的华侨医院，为华侨、港澳同胞服务。现在我们准备在暨大新办一个华侨医院、一个医学院，并决心把它办好。在廖承志的倡议、支持下，来自全国各地近三百名讲师或主治医师以上的医疗、教学、科研骨干，支援了暨大医学院、华侨医院的创办。

一九七八年以来，越南当局残暴迫害、大肆驱赶长期同越南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华侨和华裔，使得数十万难侨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廖承志根据中央的指示发表严正谈话，并亲临广东等地部署难侨安置工作。一九七八年六月，他到湛江港为前往越南接难侨的商轮送行。接着，他又与有关部门协商，迅速创办了一批新的华侨农场、华侨工厂，在不长的时间内，使二十五万难民得以在祖国安居乐业。

一九七九年，广东、福建两省根据廖承志的意见，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重戴地、富帽子的侨户，发了《改变成分通知书》。一九八二年，在国务院侨办召开的广东、福建等省的二十个城市落实华侨政策座谈会上，廖承志强调应优先照顾、尊重归侨知识分子。

在负责侨务工作期间，廖承志对陈嘉庚、庄希泉、蚁美厚等著名华侨十分尊重。一九四九年，廖承志受中共中央委托，

多次派人同当时还在泰国的蚁美厚联系，要他回国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蚁美厚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当时我非常激动，我想自己是华侨当中普通一员，只不过在抗战中尽了一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廖公就把我记住，国家就给我这么大的荣誉。”廖承志对陈嘉庚有关侨务的许多意见，总是虚心倾听，诚恳接受。对于陈老发展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和陈老提出的有利于国家的建议，他都不遗余力予以支持。陈老每次到北京，他在百忙中也亲自去访问，征求陈老对侨务和国家大事的意见。他还在百忙中抽空接见来访的侨胞和外籍华人，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他平易近人的作风，使来访的侨胞和外籍华人感到格外亲切。早在五十年代，在归国华侨中就流行这样一句话：“回北京，三件大事，毛主席接见、天安门观礼、听廖公做报告。”廖承志能深入浅出地传达中央在不同时期的侨务政策，象点滴入地的春雨一样，滋润着广大华侨、归侨和侨着的心。他不愧为党的侨务工作的卓越领导者。

为祖国的统一大业鞠躬尽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收回香港主权、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的大团结、大统一，已经提上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为动员各界爱国人士、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国外侨胞为统一祖国的千秋功业而努力，廖承志忘我工作、鞠躬尽瘁。

廖承志对将来收回香港主权后仍保持它的繁荣，作了很大努力和贡献。早在一九五八年，他就负责港澳工作。在港澳，从普通市民到有社会地位的教授、工商业家和银行家，他都能

谈得来，都能交成朋友，香港人士称他为“知港派”。近年来，中英为香港问题进行接触和谈判时，他为稳定香港人心、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做了极其出色的工作。他会见了香港联成轮船有限公司董事长包玉星、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香港大学校长黄丽松、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马临、香港《明报》社社长查良镛、香港新鸿基证券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景禧、香港联沪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唐翔千、香港知名人士利铭泽、香港美丽华大酒店总经理杨志云、香港东亚银行总经理李国宝、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费彝民等。许许多多的香港朋友对中英谈判及香港的前景有疑虑时，都愿意请教他，都以能听他一言为慰。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七日，廖承志出席香港新界人士参观访问团在北京举行的宴会时，向访问团申明了中国对处理香港前途问题的立场。他明确表示，中国将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收回香港后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决策，廖承志公开肯定了香港流行的“港人治港”的提法，对稳定香港人心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九八三年五月三日，廖承志在北京会见安利肖氏集团董事长肖汉森夫人时，肖汉森夫人问：“北京的政策，我们很信任，不过如果你们这一辈退休了，会不会改变？”廖承志回答：“绝对不会！”肖夫人又问：“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后，香港人的物业及财产，会不会没收？”他笑着答：“绝对不会”。在中英就香港问题进行接触、谈判，香港人心浮动的日子里，他的谈话在稳定香港人心、保持香港繁荣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廖承志为使和平统一台湾这一政策形成千百万广大海内外中国人的行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九七八年十月，廖承志随邓小平访问日本，经过香港时，会见了香港联成轮船有限公司董事长包玉星。廖承志向包玉星阐述了中共的和平统一政策。他说：“为了国家的和平统一大业，愿意把以前封闭的门户打开。今后，只要坚持这样做，大陆与台湾的骨肉同胞有一天必定能够团聚。”包玉星对廖承志说，全世界的中国人占百分之九十九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盼望着国家的统一。廖风趣而又满怀信心地说：“我不赞成祖国统一的人没有百分之一那么多，最多只有百分之零一点。”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有一次，廖承志和一批从日本回国办事的台湾省籍华侨谈话。有一位被国民党杀了亲人的台湾同胞，对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一时想不通，廖承志说：“国民党杀了你的亲人，也指使暴徒杀害了我的父亲，还杀过我们共产党的人，我们为什么还要提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为了实现统一祖国的大业，我们不计个人恩怨呀。”促使这位台湾同胞质疑而来，满意而去。一九八一年，他会见原台湾《政治评论》月刊社社长马璧，说到台湾问题，廖承志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台湾的老朋友完全可以放心。我希望台湾同大陆之间不必把精力花费在理论争辩上，我们海峡两岸要多进行些实际接触，以消除隔阂，在实际行动上把我们的民族感情表现出来。”一九八二年冬天，旅美多年的原国民党某高级将领回国观光，廖承志在北京接见了她，使他深受教育。他返美后来信说：“虽是初次见面，却有旧友重逢之感，对于祖国之行种种情景，不时回味。”以后，他在旅美的中国人中宣传中共的和平统一政策，取得了令人满

意的效果。

廖承志与蒋经国是世交。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廖承志致信蒋经国，以振兴中华相勉，以忠孝两全相劝，殷切期望台湾当局捐弃前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信中说：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谕察。”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

“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

“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①

廖承志致蒋经国信的发表，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震动。香港《天天日报》社论指出：当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苏联曾派越飞来华，推动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合作，并使共产党员个别加入国民党，而负责洽商接引的，就是廖仲恺先生。但后来共产党员都被排除清肃，而廖仲恺先生亦不幸被刺身亡。廖承志目睹此情，感于团结的失败，孙中山先生“容共政策”的被挠断，亦毅然加入共产党，在极艰苦中致力于革命工作，以迄至今。

香港《中报》社论指出：综观廖氏一生，在时间上，他跨越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和共产党领导的共产革命。在个人身世，他整个家庭的历史几乎就是国共恩怨的具体表现。也正因为他所具有的这种特殊身份，而使他在中共所提出的国共第三次合作设想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廖承志致蒋经国信发表后，台湾一些“知名人士”写了文章，胡说廖仲恺是反共的，廖仲恺的死，是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搞的。为此，一九八二年八月三十日，廖承志在广州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揭幕仪式上发表讲话指出：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

^①1982年7月25日《人民日报》。

日，暗杀我父亲廖仲恺的元凶是胡汉民、吴铁城、邓泽如等人，同时强调这是个历史问题，决不影响当前的和平统一大业^①。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

在此以后，廖承志又多次表示，只要台湾当局愿意，他可以亲往台湾，举行和平谈判。一九八三年他会见台湾原《政治评论》月刊社社长马壁时说：“蒋经国先生是不会忘记我的，我也不会忘记他的。据我知道，他也是思念故乡的哟。我在七月份致蒋经国的信函中已经说过，我也可以去台湾同他见面，他若是来北京，我们更是热烈欢迎。”

涓涓细流，汇成江海，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短短的几年里，“中国应当早日实现和平统一”，已成为全中华同胞的强烈呼声和海内外舆论的重要话题。祖国，正向着和平统一的最后归宿接近，这一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的形成，廖承志所发挥的作用，是别人所不能代替的。他的功名将永垂青史。

廖承志长期患心脏病，为了更好的为党为人民工作，一九八〇年他冒着生命危险前往美国做心脏搭桥手术。他说，与其带病工作效率不高，不如少活几年，更好的工作。他心里明白，做心脏搭桥手术后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因此，手术后整整三年，他承担了比一个健康人还多的工作，几乎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有时一天会见日本朋友、外籍华人、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华侨，多达七、八起，直至深夜。回到家中，还阅读大量重要文件，最后在床上，还翻阅港澳等外地书报。许多朋友都劝他注意健康，他总是一笑了之。

廖承志在党的第八次、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全国代

^①廖承志：《历史问题要说清楚》，1982年8月31日《人民日报》。

表大会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还是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九八三年六月，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被提名为国家副主席候选人。正当党和人民委他以重任，正当祖国统一大业期待他做出更大贡献的时候，一九八三年六月十日，廖承志因心脏病抢救无效，在北京与世长辞。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廖公在人间》，三联书店 1984 年版。
2. 《廖承志的一生》，新华社出版 1984 年版。
3. 《廖承志——一个伟大的爱国者革命家》，《中国建设》1983 年 9 月。
4. 《东江纵队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5. 中央档案馆馆藏有关廖承志的资料。
6.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存有关廖承志的讲话和批件。
7. 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存有关廖承志的资料。
8. 访问孙平化、彭光涵、杨荫东、黄四明、郑伟荣、廖梦醒、李涓等的记录。

杨 嗣 震

刘林松 黄学盛 陈思明

杨嗣震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党员，从事农民运动的先驱之一，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和革命活动家。他的战斗的一生，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鲜红的一页。

杨嗣震，幼名宜鹏，学名三阳，曾用名志白，原籍江西省九江马回岭土门垅杨家村，一八九五年三月二日（农历二月初六日），出生于湖北省黄梅县孔垅镇。父亲杨学益，跟着祖父在孔垅经商，开了一间“杨茂盛”号杂货店。母亲张氏，生育七个儿女，嗣震排行第二。

一九〇八年，杨嗣震在孔垅镇读完五年私塾后，考进了江西九江同文书院。这是美国教会开办的一所学校。在这里，杨嗣震接触到了西方的文化和思想，开扩了知识视野，思想上也发生了变化。他感到，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比起封建帝制的清朝来，要进步得多。后来，他阅读了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等书，对清政府的黑暗腐败和民族危机的深重，有了更深的认识；对那些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党人，深为敬仰。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杨嗣震以为中国从此会出现生机。可是，不久，袁世凯又夺权执政，中国依然是封建割据、民不聊生的社会。杨嗣震对祖国的命运，深感忧虑。

一九一四年，杨嗣震以优异的成绩，升入附设于同文书院的南伟烈大学。在新文化运动中，杨嗣震接触到大量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及思想文化，遂有了去国外留学的打算。杨嗣震在南伟烈大学毕业后，一九一七年春，决定到日本继续求学^①。动身赴日之前，他在九江给家里写了几封信。其中一封，抄录了一首诗：

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若不成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间到处有青山。

在另一封家书的末尾，他作诗一首，内有两句道：“寄语慈亲莫倚闾，国家多难不容私。”^②家书中的豪情壮语表达了这位热血青年关注祖国命运、舍家为国、志在四方的远大抱负和高尚情怀。此时，他改名师震，冀望今后干出一番震动社会的事业。

一九一七年六月中旬，杨嗣震东渡日本，寓居东京“松叶馆”，补习日文。是年九月，他与彭湃、李春涛等留日学生，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就读于专门部政治经济科^③。

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初期，他和彭湃等人，曾笃信基督教。

① 《杨嗣震给杨牧英信》，1917年6月26日寄自日本。原信现存杨涤亚处。杨牧英为杨嗣震的大妹，时在江西九江儒励书院读书，杨涤亚是杨嗣震的四弟。

② 《杨涤尘回忆录》（1984年7月），杨涤尘是杨嗣震的三弟。

③ 彭泽：《对彭湃烈士的点滴回忆》，未刊稿，原件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他们十分欣赏基督教的“博爱”思想，“认为基督教也可以救国”。一九一九年以后，“日本社会主义思想渐次普遍发达”^①，杨嗣震等人的思想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逐渐认识到基督教不能彻底解决社会问题，于是开始转为研究社会主义学说。

一九一九年九月，“早大”对社会主义感兴趣的学生，组织了建设者同盟。不久，杨嗣震、彭湃、李春涛等人也加入了这个组织。同盟的成员，重视对农民问题的研究，他们希望通过学习和研究，找出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措施，建立一个合理的新社会。他们研究劳动运动诸派别及其学说，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很赞赏，对无政府共产主义也感兴趣。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杨嗣震受到感奋，认为俄国的革命经验值得学习。于是，他同彭湃、李春涛等留日同学，于一九二〇年组织了进步团体“赤心社”。赤心社的成员，不定期地举行学会，学习过《共产党宣言》、日本河上肇的《社会主义问题研究》等书刊；讨论过十月革命问题。杨嗣震、彭湃等人，多次听过“早大”进步教授山川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演讲；还到过京都帝国大学，听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讲课。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赤心社的成员又参加了日人堺利彦、韩人权无为发起组织的“可思母俱乐部”。这是一个国际性的社交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除日本、中国、朝鲜人外，还有俄国、印度、南洋群岛及欧美国家的学者。他们多是一些左翼的文化人，有著名的社会主义者高津正道，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等。俱乐部成员，每月开一次会，探讨各种国际问题。

在参加各种进步的学术活动中，杨嗣震逐步认识到马克思

^①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1924年1月30日），载《晨光》第2卷第1号。

主义是变革社会、改造世界的革命思想武器，从此摈弃了诸家学说，潜心研究马克思的著作。

一九二一年五月，彭湃因祖母病危，在“早大”参加毕业考试完后便提前回国。李春涛也于是年夏回到潮州，后出任金山中学教务长和代理校长。杨嗣震则因为回国川资不足，暂时滞留日本。这期间，他同施存统（又名复亮）住在一起。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后不久，杨嗣震由施存统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中国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认为，用教育来唤起民众，是改造社会的最好途径。杨嗣震的看法也是这样。但所不同的，他提出了为无产阶级办学的基本指导思想。一九二一年九月，他在东京给李春涛写了一封信，恳切祈望他为无产阶级求学开放学校。信上说：“现在的学校，乃是有产阶级的学校。那无产阶级的青年男女们，就不能入这样学校，受高深的教育了。纵然有的，亦不过少数罢了。我很盼望你！在这有产阶级的学校中，暂为开辟为无产阶级青年男女们，到求高深学问的一条新路！这一件事，我想你必很愿做的！请做罢！请做罢！”^①信中表达了杨嗣震为无产者办学的拳拳心意。

一九二二年初，彭湃担任海丰县教育局长（在此之前任劝学所长），聘请杨嗣震和李春涛到海丰任教。为了实践从教育入手变革社会的理想，杨嗣震对彭湃的聘请欣然应纳，立即从东京启程回国，于三月十二日到达海丰^②，出任海丰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长。

① 《杨嗣震给李春涛信》（1921年9月18日），载《金中月刊·进化》，1921年10月。

② 《陆安大事记·民国十一年》，载《陆安日刊一周年纪念册》。

他是第一个到海丰开展革命活动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此时，李春涛已辞去金中代理校长的职务，也应聘到一高任教，担任国文教员。

杨嗣震到职后，按照为无产阶级办学的指导思想，根据当时条件，锐意进行教育改革。在学校中创造了民主气氛，主动接触学生，学生们都喜欢亲近他。林道文、颜汉章、余汉存等学生，就经常进出于他的房间。

为了宣传、发动群众，锻炼和培养学生，杨嗣震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他到海丰才一个多月，就协同彭湃组织了海丰历史上第一次纪念“五一”节的盛大游行。

因五月一日至四日下雨，原定海城各校五一集队游行延至四日举行。是日，彭湃高擎“赤化”大旗作前导，各校列队随行。游行队伍一边呼喊口号，一边散发传单。其中，一高散发的传单最具特色，其中指出：“今日的学生，就是他日劳动者的后备队，无产者的后补员。”^①队伍行进途中又遇雨，而且越下越大，但从教育局长、校长到学生，都没有人离队避雨。队伍继续前进。雄壮嘹亮的歌声，惊动了在街道两旁屋廊下避雨的群众。游行之后，各校集中在公共运动场举行集会，杨嗣震登台演讲，明确指出“五一运动纪念日，即是社会运动的纪念日”^②。

声势浩大的庆祝五一游行，使海丰的地主豪绅十分震惊，他们向陈炯明诬告彭湃等人将要实行“共产共妻”。没有几天，彭湃被革去教育局长职务。李春涛不久也离开海丰。杨嗣震因为学生盛情挽留，仍旧留下来当校长。

①②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

在杨嗣震、李春涛的教育培养下，一高的学生，不少人后来参加了革命并成为党的干部。其中，林道文、颜汉章两人在“二战”时期先后担任过东江特委书记，为革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杨嗣震到海丰后不久，就着手建立了海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成员共有八人。

庆祝五一游行带来的风波，使杨嗣震认识到，革命运动如果没有民众参加，是难以持久和获得成功的。他和已被撤去教育局长职务的彭湃商量如何开展农民运动的问题，并积极支持彭湃投身农运工作。杨嗣震在主持学校教学工作之余，经常同彭湃到乡下做贫苦农民的串联发动工作。七月二十九日，彭湃组织起来的海丰第一个农会——赤山六人农会秘密成立，开始了海丰农民运动的第一步。经过彭湃、杨嗣震他们的辛勤工作，不久，赤山农会的会员增加到三十人。十月二十五日（农历九月初六），召开了赤山约农会成立大会；“嗣震、钟彝、陈修都到场，加入的增至五十余人了。”^①彭湃办农会，杨嗣震是一位重要的催促者。他在给团中央的一封汇报信中谈到了这一情况。信上说：“我因见得到农民是我们帮忙最〔重〕要的分⼦，所以当时我就催促彭湃兄办农会。”^②

杨嗣震不但身体力行地协同彭湃搞农运，还经常以“辟云”的化名，把调查了解到的海丰农会及农村情况，向社会主义青年团及团中央书记施存统作汇报。他在给团中央执行委员

① 《彭湃给李春涛的信》（1923年2月9日），《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② 《辟云给子由的信》（1923年6月18日），《彭湃研究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会的一封信中，就详细汇报了海丰各农会的活动情况以及刚成立的总农会近况，并附上了总农会所辖分会和海丰各农会田佃情况表。信中喜悦地说：“依总农会计划，明年（旧历）或可提出减租问题，农村的阶级斗争不久就勃发了！”^①

一九二三年二月，杨嗣震同女高校长陈淑娟结了婚。这时，他患了严重的脑弱病（神经衰弱），医生要他好好休息。他决计辞去校长的职务离开海丰。但是，受到他革命思想熏陶的学生，硬是不让他走。他为这些生气勃勃、情深意切的学生所感动，答应只当一席教员，校长一职是坚辞不受了。

“七五”农潮后，彭湃被迫离开海丰。杨嗣震也被解聘。是年冬，他离开海丰辗转到了上海。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同共产党建立合作关系。为了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开展革命工作，杨嗣震于是年初和陈淑娟一起回到了潮州。不久，他接受揭阳县榕江中学的聘请，到该校任教。当时，榕中左、右两派势力的斗争，十分激烈。杨嗣震到校后，旗帜鲜明地支持左派组织新学生社，指导他们开展学习和活动。他还积极与榕城镇的进步组织——店员工会进行联系，取得他们的支持，以巩固和扩大左派的力量。他负责主编榕中校刊《榕声》，经常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宣传革命思想。

杨嗣震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多种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当时的榕中学生许涤新说：“我第一次知道马克思的名字，是从杨老师那里听来的。我第一次见到马克思的肖像，是杨老师给

^① 《辟云给团中央的报告》（1923年2月20日），《彭湃研究史料》第3页。

我着的。”^①杨嗣震喜欢踢足球，在球场上也结交一些学生球友。他抓住运动前、后的时机，在自然的攀谈中，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

是年冬，岭东新学生社曾散发《宣言》声讨统治潮汕的军阀洪兆麟。杨嗣震手头上也有一份。一天，他把第七届学生陈克叫到房里，让他看了《宣言》并抄下了一份，下署“陈克录自岭东新学生社”，登载在校刊《榕声》上。这下可惹了祸，反动当局立即出动军警到榕中抓手抄者及其“后台”。幸得杨嗣震事先听到风声，及早避开，免遭毒手。陈克则在进步学生的掩护下，爬墙逃脱。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榕声事件”。

杨嗣震离开揭阳后，到广州找已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的彭湃。经彭湃的推荐，在农民部担任英文翻译。

一九二五年二月，广东革命政府组织了第一次东征，杨嗣震随军征战，在周恩来领导的政治部任科员^②。三月上旬，东征军挺进潮汕后，杨嗣震随周恩来主任进抵揭阳榕城。在杨嗣震的引见下，周恩来在下榻的学宫接见了榕中新学生社代表江明衿、揭阳县商民协会骨干肖斧等，听取了他们关于全县革命团体情况的汇报。当周恩来听到揭阳有组织的革命力量已近一千人时，高兴地说：“这就不错了！你们取得的成绩，同杨嗣震老师在这里开展工作是分不开的。”^③他鼓励大家要很好地做宣传工作，唤醒工人和农民。此后，杨嗣震被任命为陆丰县教育局局长。

第一次东征胜利后，具有进步思想的彭湃的哥哥彭汉垣出

①《访问许涤新同志谈话记录》，1984年7月31日。

②吴雄华：《潮州社会主义运动纪略》。

③林声望、卢位美、林希民等1959年提供的材料。

任海丰县县长。他授意县教育局，聘请杨嗣震再次到海丰一高任校长。杨嗣震接受了聘请，于四月中旬，又同陈淑娟一起来到海丰。

四月二十五日，一高正式开学。杨嗣震在繁忙的校务中，辛勤著文阐述马克思主义。

四月二十七日，他在《陆安日刊》上发表了题为《孙中山经济学说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的文章。从五月十一日起，《陆安日刊》又连续刊载了他的专著——《社会主义之研究》。杨嗣震的这篇力作，标志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作者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历史地位：“马克思的出现，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新纪元，也是人类生活史的新纪元。”

就在这一个月，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发动的反革命叛乱。不久，杨嗣震也同彭湃一起返回广州。

一九二五年十月，杨嗣震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举行的第二次东征，在东征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担任组织科长。十一月初，东征军光复了潮汕，总政治部担负起接管旧政权及除旧布新的重任。杨嗣震在周恩来主任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

十二月二日，汕头市成立了“收回教育权委员会”^①。周恩来主任在成立大会上讲了话。他着重谈了从帝国主义教会手中收回教育权的重要意义，希望委员会的同志努力工作，做出成绩来。总政治部杨嗣震、刘康侯等出席了会议。会后，该会成立了总务、调查、文书三个部门，分工开展具体工作，杨嗣

^①《收回教育权委员会成立》，载1925年12月3日《汕头星报》。

震当选为总务部负责人。

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十二月上旬，东征军总指挥部在潮州城创办了一所军校——黄埔军校潮州分校。蒋介石兼任校长，何应钦任分校教育长（后又升为代校长），周恩来兼任政治部主任。杨嗣震被委任为潮州分校政治部组织科长兼政治教官^①，负责教授《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课程。此后不久，他又被金山中学聘请为兼职英文教员。

杨嗣震身体力行，积极参加社会上的政治活动，多次出席民众重大集会。他还经常撰写文章，揭露、鞭挞帝国主义的侵华罪恶。国民革命军在广州正式誓师北伐，杨嗣震调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从此，他离开了潮州分校。

北伐军总政治部中，共产党员同其他政工人员一起，在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领导下，积极开展部队和民众的政治工作。当北伐先遣队越过衡阳后，杨嗣震与少数政工人员，随同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赶赴前线参预军事。

八月下旬，北伐军连续取得了汀泗桥、贺胜桥战役的重大胜利，前锋于九月一日进逼武昌城下。在攻城的日子夜夜，杨嗣震跟随邓演达，冒着弹雨在前线督战。他还同总政治部的其他工作人员，把忠孝门城外一带工厂的工人组织起来，为部队构筑工事，运送伤员，有力地配合了攻城战斗。

十月上旬，城内守军第三师参谋长及团长贺对廷，携信出城向北伐军接洽投诚。十日，北伐军攻克武昌。献城部队改编为北伐军第一混成旅，旅长贺对廷，杨嗣震被委任为混成旅政治部主任^②。

^①广东省档案馆资料：《金中周刊录抄》。

^②《杨浣尘回忆录》（1984年7月）。

稍后，杨嗣震升任第三十军政治部副主任兼秘书，驻军河南；旋又调回武汉继续担任总政治部秘书之职。

“七一五”汪精卫集团叛变后，宁汉合流，形势日非。七月下旬，第二十军军长贺龙从武汉率部开赴南昌参加起义之前，曾在武昌候补街三十二号（杨嗣震寓所）同杨嗣震密谈了一个多小时^①。此后，杨嗣震秘密离开部队，到了江西九江。

南昌起义爆发后，部队南下广东。杨嗣震受党组织的派遣秘密赶赴潮州，准备联系李春涛等人，发动群众做好策应工作。到汕头后，获悉李已遇难，悲痛不已，于是又潜入潮州，不幸被工贼认出，报告了国民党潮州驻军军官陈太运。是夜，敌人包围了杨嗣震下榻的猴洞寓所，将他逮捕入狱。

在敌人的淫威面前，杨嗣震正气凛然，铁骨铮铮，表现了共产党员威武不屈的亮节高风。

九月十五日（农历八月二十日），这位坚强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被反动派枪杀于潮州西湖边^②。

树木葱茏的飞鹅山，掩埋着烈士的忠骸。杨嗣震用无愧于共产党员光荣称号的革命的一生，实践了他早年借诗抒发抱负的壮志豪言：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①②}吴雄华：《潮州社会主义运动纪略》。

李 良

张 军 孝

李良，字育初，笔名愚痴。一九〇八年九月五日出生于陕西长安县细柳姜仁村一个农民家庭。十二岁至十五岁他在本村附近的府君庙县立第八高小上学。在此期间，深受二七罢工和革命思想的影响，阶级觉悟不断提高。一九二五年，学校校长马威如聘请其姑夫樊月亭任教，未能按期到校，耽误学生功课，激起公愤。李良与周志学等十余人亲自质询校长，提出：如不能到期任教而耽误学生课业，误人子弟，可另聘贤能前来任职。马威如坚决不肯，并训斥李良等不安分守己。同学们不满马威如的高压和欺侮，在李良和周志学等领导下，发动了驱逐校长马威如的学潮，并派部分学生前往教育局请愿。学生的强烈要求，迫使县教育局不得不撤换马威如的校长职务，重新委派校长，聘请教员^①。

一九二六年春，李良考入西安省立第三中学。他在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下，参加了雷晋笙、吕佑乾等创办的西北青年社（该社为共青团的外围组织），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接着，他在共产党员张含辉等领导下，与同班同学吕凤歧、陈子敬等积极参加驱逐反动校长和教员的学生运

^①1980年访问柴栋生记录。

动。同年夏，反动军阀刘镇华率镇嵩军围攻西安期间，共产党员刘含初、赵葆华、雷晋笙、吕佑乾等，在西安省立一中举办西安暑期学校，李艮与张新发、徐汉儒、康居仁、王芾南等五百多人参加了学习。当时，开设的课程有：《社会主义》、《唯物史观》、《列宁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及古典文学、文艺理论、诗歌等，雷晋笙、刘含初、赵葆华、黄平万、吴化之等共产党人先后在学校讲课^①。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李艮建立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坚定了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革命信念。这一年的秋天，他由张含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②。随后，李艮在共青团西安地委工作，把全部精力投身到艰苦的反刘（镇华）、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中去。

一九二六年冬，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联军赶走了刘镇华，解除了西安的围城以后，中国共产党长安中心县委（管长安、蓝田、户县、咸阳四县）正式成立。陈嘉惠任中心县委书记，张国藩、庞诚斋任县委委员^③，五楼、河池等地也分别成立了党的区工作委员会，团县委和各区的共青团组织也相继成立。党立即领导农民群众，同反动豪绅势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年底，党组织派李艮担任中共长安县五楼区委书记。他到秦镇以教书作掩护，深入广大农民群众之中，领导了五楼区反对地主豪绅阶级，废除苛捐杂税的农民运动。

为了加强对农民运动的具体领导，一九二七年一月二日，长安县召开了全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大会一致通过首先成

^①1980年访问王芾南记录。

^②1980年访问陈子敬记录。

^③《中国共产党在长安地区革命斗争史》（初稿），1960年编，存长安县档案馆。

立长安县农民协会筹备处作为农运的领导机关，并立即建立各级农民协会和进行发展会员的工作，为成立县农民协会创造条件。农民协会筹备处成立不久，党根据县农代会的决定，在西安城内的开通巷开设了长安农民运动讲习班。这个讲习班的宗旨是：“造成很忠实、很勇敢、很可靠、能吃苦耐劳的领袖，率领大家共同组织农民协会，为大家永久做谋利的事情”^①。农民们把自己的子弟送到讲习班，进行为时两个月的政治学习。共产党员刘伯坚、魏野畴、杨明轩、张含辉等分别担任《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科学概论》等课程的讲授，李艮专门向学员讲授《农民运动须知》的课程。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四日，在共产党员李艮、徐汉儒、康居仁的直接领导下，五楼区两万多农民群众隆重集会，宣告区农民协会成立。截止二月十五日，仅月余时间，全县已经有一百五十多个村和三个区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会员发展到两万多人^②。在农民协会成立的同时，各地农民纷纷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废除旧团局，改编红枪会，组建了由农民协会直接领导的农民自卫军。

一九二七年三月五日，长安县农民协会成立后，李艮和徐汉儒在五楼区采取开办农民讲习所、识字班、夜校及平民学校等方式，向广大农民进行以宣传灌输革命思想为中心内容的文化教育运动，使他们认识到只有推翻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革命道理。当时，长安有名的大恶霸张林旺、刘大汉，横行乡里，欺压贫民，残酷勒索贫苦农民钱财，

^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第 128 页。

^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 第 125 页。

心狠手辣。广大贫苦农民虽然对其恨之入骨，但无人奈何他们。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在五楼等区开展起来以后，他们不仅拒交私吞的大量赃款，而且反动气焰极为嚣张，竟勾结反动驻军，企图包围五楼区农民协会，屠杀农协干部。广大农民群众获悉他们的阴谋后异常愤恨，遂在共产党员李良、徐汉儒、康居仁等领导下，清算了他们的罪行，并处死了张、刘二人，为民除了害，把他们剥削得来的财、粮全部分给贫苦农民，广大农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①。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在李良等领导下，长安地区的农民运动在党和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形成了空前未有的高潮，成为全省农民运动最发达的县份之一。东至汤峪口、鲸鱼沟；南至终南山；西至沔河两岸；北至渭河，在这个广阔的原野上，革命的烈火到处都燃烧了起来。

大革命失败后，长安党组织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在党内开展了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及其影响的斗争，使广大党团员认识到大革命的失败是惨痛的，前进道路上遭受的挫折是暂时的，革命力量的重新恢复和最后胜利是一定能够实现的。一九二七年冬，李良担任长安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后，同县委书记张新发、团县委书记杜松寿等，一起领导全县党团员和革命群众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他领导三桥农民亲手处死了大恶绅杜某^②，对企图反攻倒算的豪绅地主阶级给予了沉重打击。

在白色恐怖的艰苦条件下，李良的革命警惕性是很高的。他曾多次与县委的负责同志计议，在做每一项工作时，要随时

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第130页。

② 1980年访问丁世丰记录。

估计到可能发生的不幸和意外，以及我们应付敌人的斗争策略。他提醒大家到省委机关去（别人领去）不看门牌，到一个同志家里去吃饭或接头，进门须到后院观察，计划好一旦有敌情如何逃脱。他还向县委同志讲述如何从敌人活埋中死里逃生，并亲自带领大家到灞河沙滩中作试验^①。

一九二八年四月，省委秘书处被敌人破坏，王德安、李嘉谟、任礼、校明济、徐九龄、方鉴昭等共产党员被捕并惨遭杀害。长安党团县委机关被迫迁出城外，在农村坚持斗争。这样一来，县委负责同志有时得打短工度日。李良经常接待在他家乡附近地区工作的同志吃饭。

一九二八年六月，李良和张新发、杜松寿等十多人参加了中共陕西省委在长安窑头召开的长安县党的代表会议。在会议上，省委书记潘自力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性。对于如何正确开展党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并决定成立户县特别区委，直属省委领导。窑头会议后，长安县党的工作在李良和张新发、杜松寿等领导下，又有了新的发展和起色^②。

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对敌斗争，一九二八年下半年，长安县委又在西安城内太阳庙门四十六号，建立了党的秘密工作机关。党组织要求凡住县委机关的同志，必须以一个住家户的面貌出现，避免敌人的怀疑和监视，掩护党的工作。李良即把妻子从农村接来，住在地下党县委机关，为党的事业而夜以继日地工作。省委的指示经常通过李良传达到党团县委各负责同志，然后贯彻落实于具体工作中，而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

①1979年杜松寿写的《追忆李良同志》。

②《中国共产党在长安地区革命斗争史》（初稿）。

题，又是通过李良汇报省委，听取指示后予以解决。一九二八年十月的一天晚上，当长安县委的几个负责人李良和张新发、亢惟恪、杜松寿等，在县委机关准备召开会议的时候，由于叛徒祁庭贵的出卖，李良与张新发、亢惟恪、杜松寿以及潘自力等，先后被捕，致使长安党团县委遭到严重破坏。

李良被捕后，被关押在红城（即现在新城）宋哲元的省政府里。宋哲元和他的军事裁判处处长肖振瀛审问李良，他坦然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宋哲元大声喝道：“你为什么要当共产党？当共产党是犯法的，要杀头！”^①李良昂首挺胸，坚定地回答：“当共产党是为了革命，干革命就不怕杀头，怕杀头就不当共产党！”^②李良紧接着反问宋哲元：“当共产党干革命，是为穷苦人民谋利益，为了打倒军阀，为民除害，这是光明正大的事，犯了什么法？”^③他一席坚定而激昂的言辞，使宋哲元感到用威吓是难以征服李良的。当时，坐在宋哲元旁边的肖振瀛凶狠的吼道：“你这小子看看主席（指宋哲元）是什么人？”李良厉声答道：“就象大门口的石狮子（当时省府大门口两旁有两个大石狮子），整天吃老百姓肉，喝老百姓血，是吃人的军阀！”^④宋哲元硬的一套失败后，又企图用升官发财来引诱李良自首，同样遭到李良的严辞痛斥。宋哲元见引诱不成，恼羞成怒，便以“枪毙”相吓唬。李良从容镇定地回答：“要杀就开刀，要吃就张口，要想让我反革命是办不到的！”^⑤宋哲元暴跳如雷，大声命令：执法兵把李良押起来！从此，李良便被关押在西安西华门街军事裁判处看守所达两年之久。

^{①②③}1979年杜松寿写的《追忆李良同志》。

^{④⑤}1968年刘映胜写的《大义凛然——法庭上李良痛斥宋哲元》。

在关押期间，李良自始至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同其他革命同志一起坚持了狱中斗争。他的父亲和妻子从乡下来探监，见面后心情非常沉重，为他的性命担忧。而李良却跟往常一样，对父亲和妻子说：“我的一切很好，请你们不要挂念，我不会轻易地死掉，干革命吃点苦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回去吧！”①一九三〇年冬，宋哲元在蒋阎冯中原大战中失败后率军离陕，杨虎城率部迅速进入潼关，一举夺取陕西。当时，西安形势一片混乱，趁此有利时机，李良和潘自力、贾拓夫、吉国桢、李大章等被捕的大部分同志越狱逃了出来，而且很快找到了党组织。李良在狱中的表现，受到中共陕西省委的高度赞扬。随后，组织派他到杨虎城所属唐嗣桐旅任书记官，负责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有一天唐嗣桐突然把他请来询问，说：“你以前在教育界，为什么现在又来从军？”李良机警地答道：“因为军界有实力，所以来军队了。”紧接着他从刘镇华围攻西安，杨虎城部坚守城池斗争八个月，到中原大战后杨部的崛起，无不说明军队的实力所在。李的回答使唐嗣桐非常佩服，从而消除了对李良的疑心。不久，中共陕西省委调李良以省委委员兼任中共渭南县委书记，并由张文华协助他恢复、整顿遭敌破坏的渭南党组织。一九三一年初，李良准备发动渭南贫苦农民，开展分粮、分财、分官产的年关对敌斗争，由于党内认识不统一，年关斗争未能开展②。

一九三一年七月，李良担任中共陕西省委执行委员兼西安市委书记。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下午，李良代表省市委在西安高中（现西安市二十中）召开了西安各校学生反日救国会负

①1979年访问靳春清记录。

②1980年访问张文华记录。

责人（实际上是各校党组织的负责人）会议。他在会议上首先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政治形势，同时指出国民党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已来到西安，将于次日在民乐园礼堂，向西安各校学生发表讲演。据党组织得到的可靠消息，戴季陶讲演的主要内容将是打着所谓“开发西北”的幌子，继续宣扬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压制学生的反日爱国运动。为此，李良指示西安各校学生，在西安学生反日救国会的统一领导下组织起来，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日驱戴的学生运动^①。四月二十五日，西安各校学生两千余人，聚集于民乐园礼堂。陕西省教育厅长李百龄站在主席台上宣布开会，紧接着戴季陶高视阔步走上讲台，以斯文的声调，开始了他既臭又长的所谓“讲演”。什么“西北落后”要“开发西北”；什么“忍辱救国”、“信赖蒋委员长”、“不要听信共产党的抗日宣传”；什么“攘外必先安内”、请大家“不问国事、安心读书”等等，会场上顿时群情沸腾，议论纷纷。有的学生痛骂戴季陶鬼话连篇，是日寇娘胎里生的；有的学生打断戴季陶的讲话，提出一系列质问要求他当场回答；甚至有一个学生气愤地高喊：“打！”一呼百应，学生们将预先装在衣袋里的砖块、瓦片接连不断地向戴季陶抛掷过去。戴吓得丧魂落魄，战战兢兢，匆匆跑入后台，在李百龄的陪同下连小汽车都未敢坐就偷偷地溜走了^②。学生们拥出民乐园礼堂，烧毁了戴季陶乘坐的小汽车，而后有组织地上街进行示威、游行。学生们沿途高呼：“反对不抵抗主义！”“立即出兵抗日，收复失地！”“打倒戴季陶！”“戴季陶滚回去”等口号。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第210页。

^②1980年访问苏执中记录。

学生运动爆发后的当天，李良又一次到西安高中主持召开各校党支部负责人联席会议，指示他们继续坚持斗争，扩大政治影响，发表通电要求全省及全国各地学生，声援西安的学生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这一斗争坚持了半月之久，后来虽然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但它充分反映了西安学生的阶级觉悟和爱国精神，谱写了陕西革命斗争史上的光辉篇章。

一九三二年春，陕西渭北灾荒严重，广大劳苦群众的生活非常困难。中共陕西省委派李良和贾拓夫等赴渭北巡视和指导工作。李良写了《对于‘怎样领导群众去分粮’的批评》等文章，在省委机关刊物《斗争与学习》上发表。他指出三原在分粮斗争中，只限于农民联合会会员和县委委员等少数人，不能广泛的动员群众，以及仅仅分配豪绅地主的粮的错误，明确提出我们必须通过分粮“发动群众斗争，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开展群众分粮斗争”。“在分粮时告诉群众，我们单独分配豪绅地主的粮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更进一步的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苦的劳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也只有这样，才能根本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①。

一九三二年六、七月，北方各省联席会议期间，李良代理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职务，主持省委日常工作。八月，党中央派曹长清（即孟用潜）任省委书记后，李良担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同省委宣传部长贾拓夫、军委书记汪锋、团省委书记刘映胜等，一起领导了陕西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工作。不久，省委派李良前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担任政治委员职务。在此期间，由于他执行了一套“左”的计划，主张在仅有六、七户人

^①1932年《斗争与学习》，存陕西省档案馆。

家的五顷塬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而且也只限二十天全部分配完土地，并命令游击队进攻敌人的坚固据点，致使红军游击队遭到惨痛失败^①。而后，李艮被调回省委工作。

同年九月，蒋介石为了分化和控制西北地区，补充邓宝珊（时任甘肃省行署主任）军队一批德国制造的新式武器。杨虎城得知蒋的所为后，内心非常不满，但表面上不露声色，暗地却派他的部下杨子恒率部化装成土匪，准备在途中截获这批武器，而杨子恒便委托南汉宸具体办理此事。南汉宸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中共陕西省委。省委迅速派李艮赶赴陇东重镇平凉，利用这一时机领导兵变，夺取武装，以加强我红军游击队的力量。

李艮来到平凉以后，首先通过陇东特委负责人刘杰三等三人，了解了当地的有关情况，接着即同邓宝珊随营学校教导大队李妙哉商谈在教导大队发动兵变的行动计划。当时决定：待邓宝珊随营学校教导大队接运武器到达平凉以西七十里之蒿店时举行兵变，然后迅速带起义部队由镇原、西峰镇以北或庆阳以北地区开赴陕甘边境。九月十八日兵变爆发后，李艮和李妙哉带领近四十名起义队伍，宣布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李妙哉任支队长，李艮任政委。这就是当时震动陕甘边地区的“蒿店兵变”。

蒿店兵变失败后，李艮曾住在旬邑党的负责人崔廷儒家里，指导旬邑地区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工作。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入川北和陕南地区以后，陕西省委为了加强陕南红军游击队的领

^① 《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地区斗争简史》（征求意见稿）第77页，1981年编。

导，迅速发展、壮大陕南武装力量，策应红四方面军继续北进，扩大川陕根据地，即通知李良由旬邑返西安参加省委紧急会议。李良回到西安于同年十二月九日，向省委写了《高店兵变的报告》，叙述了兵变的经过和失败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随后，他又接受了省委交给的新的任务。

一九三三年初，李良以省委委员的身份，前往陕南参与领导和组建红二十九军的工作。同年二月十三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在西乡县红庙子正式成立，陈浅伦任军长，李良任军政委^①。接着，李良和陈浅伦在西乡县马儿岩召开了党员及积极分子会议，检查了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号召红军指战员要深入广泛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以进一步扩大陕南革命根据地，推动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

红二十九军成立后，在李良和陈浅伦、刘瑞龙、孟芳洲等领导下，高举武装斗争的红旗，在陕南地区辽阔的土地上，同敌人进行了大小二十多次战斗，打退了敌人的数十次进攻，不仅开辟了纵横面积达二百五十平方公里的根据地，还扩大了四百多平方公里的游击区^②；同时，有力地牵制了敌人，支援了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与党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及游击武装南北遥相呼应，使陕南革命斗争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红军武装斗争的胜利，根据地的逐步扩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陕南军阀为了扑灭这支刚刚诞生的人民军队，在军事进攻失败后，又采取在红二十九军内部收买叛徒和一些没有改造好的民团头子的手段，以达到瓦解红军的目的是。

^①1984年7月18日《陕西日报》。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第226页。

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红二十九军主要领导干部在西乡县马儿岩召开会议的时候，红军内暗中通敌的张正万等利用部队驻地分散、军部兵力空虚之机，率兵突然包围会场并开枪射击。参加会议的干部和警卫人员仓促应战，由于寡不敌众，致使四十余名干部壮烈牺牲，这就是惨痛的“马儿岩事变”。李良和陈浅伦、程子文等进行了英勇的反击后，在警卫员余兆征等掩护下突出重围，转入桃园子并藏身于玉佛洞。四月五日拂晓，李良与陈浅伦因数日粒米未进，饥饿难忍，一起到尹家岩曾家掏出四个银元，要这家给做点饭吃。曾家的儿子曾安云在红二十九军当连长时，因抢劫群众大烟拒不交出，被陈浅伦按军纪处决，曾家一直怀恨在心。这时他们巧逢李良和陈浅伦，认为复仇的机会来到了。曾家主妇一面笑脸相迎，殷勤接待他们，一面暗派女儿向张正万告密。张闻讯即派兵前来缉拿，李良和陈浅伦不幸被捕。随后，张正万将李良和陈浅伦带到磨子坪，于四月六日纠集反动神团百人开会，并命令附近老百姓前往观看。李良在刑场上临危不惧，放声大骂张正万，最后慷慨就义，牺牲时年仅二十五岁。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1927年《陕西国民日报》。
2. 长安县档案馆所存的有关档案材料。
3. 1927—1932年中共陕西省委的有关文件。
4. 1932年陕西省委机关刊物《斗争与学习》。
5. 1932年12月9日李良写的《嵩店兵变的报告》，抄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6. 刘杰三：《陇东特委的创立及其活动》，载《党史研究资料》第2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4页。

7. 阎红彦、杜松寿、刘映胜、王芾南、苏执中、刘杰三、陈子敬、丁世丰等人的回忆文章和提供的材料。
8. 高克林、汪锋、赵伯平、张秀山、吴岱峰、刘瑞龙、刘映胜、马佩勋、陈子敬、原政庭、杜松寿、苏执中、李慕愚、王芾南、陈云樵、罗承运、胡景儒、彭淑贞、张文华、丁世丰、郝晓峰、曹受祉、曹志麟、刘问津、王爱玉、靳春清、陈洁生、刘依仁、马志超、崔廷玉、崔崇岳、任致中、柴栋生、李玉亭、樊树鹏等人的访问记录和给笔者的信。

吴先清

赵子勤

吴先清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小沙渡（沪西区）领导过纺织女工运动，是中共早期的优秀妇女干部。一九二五年八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妇女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五年初冬，吴先清由党组织选派，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一九三〇年春，奉调回到上海，在浦东做女工工作。一九三〇年夏调入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因公牺牲”^①。

（一）

吴先清，一九〇四年七月出生于浙江省临海县城关。乳名荷香，曾用名吴德芝、吴仙清，在苏联时改名罗莎（玫瑰）·拉库洛夫。

吴先清的父亲吴义夫、母亲王桂英在城关镇上开设一片糕饼店，渐渐地富裕起来，置有田地和房屋。吴先清有一兄长和四个弟弟，她是父母唯一的女儿，因而特受宠爱。但父母以旧

^①国家民政部优抚局（1984）民抚字第66号文件。

礼教束缚她，不让她上学念书，要她做女工、缠足。吴先清坚决反抗家庭的束缚，坚持不缠足，要求上学念书，父母无奈，只好同意她的要求，并送她进入当时台属联立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念书。

一九一七年，吴先清小学毕业。一九一八年春，又跟从哥哥到杭州，考进了浙江省立女子蚕业讲习所（以下简称“蚕校”）。

一九一九年，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爆发后，杭州中等以上学校的爱国学生纷纷响应。吴先清是“蚕校”最早的响应者，被选为学生代表，成为“蚕校”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参加了杭州十四所中等以上学校组成的联合救国会。五月十二日，各校学生三千余人，齐集湖滨第二、三公园开大会，会后列队出发举行示威游行。吴先清不顾学校当局的阻拦，带领同学冲出校门，加入游行队伍^①。这年十二月，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爆发了全国著名的“一师风潮”。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九日，反动当局竟出动军警包围“一师”，强令学生回家，以破坏“一师”的斗争。在杭州市学生联合会统一领导下，吴先清组织“蚕校”同学加入杭州女子职业学校队伍，作为中等以上十三所学校队伍的前导，冲进了由军警把守的“一师”校门，与“一师”师生并肩斗争，直至当局收回成命、撤走军警，“一师风潮”取得初步胜利为止。吴先清在斗争的实践中，得到了锻炼和新的启迪，开始把妇女的解放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满怀炽热的爱国激情投身政治运动。但是，吴先清的爱国行动，却被校方某些守旧分子视为好闹风

^①陈宣昭：〈对吴先清同学的一些回忆和怀念〉。

潮，不守校规，不让她按时毕业，罚她留校饲养春、夏两季蚕。

一九二〇年夏，吴先清在“蚕校”毕业后，又进入哥哥任教的杭州私立美术学校习画。翌年秋，在带有戏剧性的机遇中，吴先清结识了宣中华。有一天，吴先清坐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写生，宣中华路过，见她专心画画，便停下来，站在她后面看画。吴先清不愿让别人看自己的画。于是故意把手中的画笔吸足水彩颜料，用力往后甩，把水彩溅在宣中华的衣服和裤子上，宣中华便“哎哟！”叫了一声。随着叫声吴先清回头一看，被溅者竟是自己熟知的、五四运动中浙江省暨杭州市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理事长。吴先清很不好意思，站起来道歉。这件生活中的趣事发生后，他俩密切交往，并深深地相爱。吴先清在宣中华的带领下，经常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活动。一九二二年暑假，吴先清随宣中华到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学校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讲学会。这是浙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一次盛大聚会，邀请了陈望道、刘大白、朱自清、朱光潜等人来讲学。吴先清有机会与杨之华、唐公宪等许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一起学习先进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交流学习心得和体会。一九二四年，吴先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下半年，吴先清与宣中华结为伉俪。

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形成后，吴先清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地参加国民革命运动。一九二四年“杭州工界五一节运动”^①，是国共合作后第一次公开的大规模的群众性活动。这天下午一时半，由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常务委员宣中华

^①1924年5月2日《申报》。

主持，在湖滨运动场召开纪念会，吴先清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宣传了五一节纪念活动的意义，号召女工奋起争取妇女的解放，“语极痛快”^①，与会者都夸她口才很好，很受鼓舞。

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吴先清与宣中华结婚后，即转上海工作，在上海小沙渡（沪西区）工人学校教书和从事妇女运动，活跃在曹家渡和小沙渡各工厂中，做纺织女工的工作。

一九二四年底，中共为配合孙中山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在全国发起促成国民会议运动。全国各地热烈响应，纷纷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成立^②。它的成立与吴先清等“为日甚久”的“暗中活动”^③，发动妇女群众是分不开的。吴先清“以工人运动领袖身份参加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工作。她工作努力，很有魄力，深入群众，平易近人，在工人中威信很高”^④，被选为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委员，负责庶务股工作^⑤。此后，她利用这一公开组织，更广泛地组织妇女投入“一方解决国事，一方解放女子”的国民会议运动。

一九二五年二月初，由于内外棉^⑥第八厂开除一批男工，用养成工代替，并且拘捕了前去领取工资的工人代表，因而引起了全厂工人的罢工。事情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沪西工友俱乐部，立即组织了专门领导罢工的委员会，中共中央

①1924年5月2日《申报》。

②③1924年12月22日、12月5日《申报》。

④1984年6月27日访钟复光记录。

⑤1924年12月11日《申报》。

⑥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总共有十九个工厂，在日本国内有三个厂，在上海有十一个厂，在青岛有三个厂，在东北有两个厂。所谓“内外”即指日本国内国外而言。

也指示上海百余名党员全部投入这次罢工斗争。吴先清执行党的指示，积极组织工人进行反帝斗争。她具体工作的地区，上海小沙渡的工会会员，在罢工发生后，短短几天内就由一千人猛增到六千人。

在开展工人运动的活动中，她善于当机立断，沉着、勇敢地对付险境。有一天，她和刘清扬在街上散发传单，被反动当局拘捕。她环视周围情形，敏锐地感到反动当局是把出事圈里的人全部拘留，认定他们并不知道究竟是谁散发了传单。在被审讯时，她一口咬定自己是过路人。反动当局在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只好放了她。脱离虎口后，她仍大无畏地组织工人参加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由于她在革命工作中卓有成绩，中共上海区委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指定吴先清等五人为中共上海区委妇女委员会委员^①。

一九二五年七月，国民党临时浙江省党部的右派沈定一，与戴季陶勾结，在萧山衙前沈定一家，召开所谓中国国民党临时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即“衙前会议”），企图通过这次会议来控制浙江的国民党组织，使其成为国民党右派的大本营。吴先清跟随宣中华赶到萧山参加会议，并在宣中华的领导下，团结国民党左派与右派分子戴季陶、沈定一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致使戴、沈阴谋未能得逞。

在革命工作紧张的时期，吴先清常常顾不上照顾自己的身体，就在足月临产的前期，还坚持天天外出工作，而且那时她的生活条件也极为艰难。她和宣中华住上海闸北联盛里，夫妻俩合穿一件棉衣，一个外出穿上了棉衣，另一个就只好坐在被

^① 《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存上海档案馆。

子里等着。然而这样艰苦的境地，未能减弱他俩的革命意志，双双在工作中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作出了贡献。

（二）

一九二五年初冬，党决定派吴先清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以下简称“东方大学”）学习。时逢吴先清刚生下孩子，当她接到通知后，想到这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毅然放下了出生仅十二天的襁褓婴儿（这个小女孩，因无人照管，不到满月就夭折了），离开了宣中华，乘坐苏联船，由上海直达海参崴，年底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

吴先清在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了两年，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她克服自己理论基础差和语言上的障碍，虚心向懂俄语和理论水平高的同志学习，并且注重结合自己的革命实践进行学习。因此，她在学业上进步很快^①。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传来了宣中华英勇牺牲的噩耗。吴先清悲痛万分，以坚强的意志抑制自己的感情，更发奋地学习，誓为死难者报仇^②。

在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她负责青年团的宣传工作，工作积极负责，很有魄力，为人热情，同志之间相处融洽，“旅莫支部认为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共产党员”^③。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吴先清与同学阙尊民（即刘鼎）结婚。一九二八年春，东方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为中国劳动者共

①访问刘鼎记录。

②管启蕴：《回忆吴先清烈士》。

③访曾涌泉记录。

产主义大学（以下简称中大），他们两人都转中大工作。

一九二九年冬，吴先清和刘鼎奉调回国。吴先清得到通知后，把自己不到一岁的儿子送进苏联的保育院，踏上了归途。在途经中苏边界时，恰遇中东路事变，吴先清等人滞留伯力。逗留伯力期间，他曾担任伯力俱乐部主任，在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宣传苏联的民族政策，团结外国人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一九三〇年春，吴先清秘密化装，经大连、天津回到上海。

（三）

吴先清回到上海后，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深入浦东地区开展女工工作。

一九三〇年夏，党中央把吴先清调到中央特科，在刘鼎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从此以后，她开始了特殊的斗争生活。为了开展工作，她必须乔装打扮，时而盛装艳服，进出上层社会；时而布衣布鞋，活跃在工人住宅区；时而装扮成土里土气的乡下农妇，出现在乡间。为联络各方，传送文件、情报，她一贯遵守纪律，积极勇敢地完成任务，工作甚为得力。

吴先清曾利用自己家乡的特产——黄岩蜜桔，在小街巷口开设一只小水果店，为秘密工作作掩护。那时刘鼎负责以无线电与各有关部门联络，吴先清负责收藏、传送中央文件和情报，夫妻俩一个在小楼上工作，一个在店面“做生意”，配合得很好。

吴先清具有秘密工作者特有的工作能力和灵活性，她利用敌人营垒中的“关系”开展工作。一九三〇年，吴先清调中央特科工作不久，她的弟弟吴全源由浙江陆军监狱获保得释，到上海来找她。吴先清与弟弟长谈中，知道他的被释放是得到身兼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国民党社会调查处专员等要职的陈宝骅的担保。陈宝骅还保荐她弟弟在反动当局发行的《新生命》月刊任总务主任。吴先清想利用这一关系来开展工作，征得陈赓同意后，把党的秘密联络站，设在该刊发行处的楼上。她通过与陈宝骅的“密切”交往，设法从其周围的重要人物中，获得国民党内部的一些秘密和大量重要情报，特别是对一些被捕人员在押期间的表现，了解得一清二楚。她曾通过另外一些重要关系，为贺龙的部队弄到一批军火。由于国民党对黄浦江的严密封锁、监视，贺龙派来接应的船只到不了江边，没能成功。

吴先清善于观察周围环境，行事谨慎、灵活。一九三一年十月，刘鼎在公园被捕。当她外出回家时，立即觉察到周围情况异常，便当机立断，不进家门，得以脱险。此后，吴先清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同时负责与狱中的刘鼎联络。

吴先清的嫂嫂孙儒珍二十年代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京念书时，结识了当时在保定军校念书的一些同乡，这些人到三十年代都在国民党军队内任要职。吴先清认为这些关系可以利用，于是就请嫂嫂到南京去拜访她熟悉的那些要人。嫂嫂先找到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督察处长李进德，说明来意，得到这位官员的帮助，以自己的小汽车护送探监。第二次姑嫂俩来到南京，先在中央饭店住下，再打电话给李进德。李进德怕她们有危险，把她们接到自己家里住下，然后再找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要他出面疏通。因吴先清的哥哥吴全清与周是同乡，又当过周的机要文书，所以周至柔与吴先清是熟悉的，也知道她是共产党。当周一见到吴先清便哈哈大笑地说：“绿客婆^①来

^①“绿客婆”是临海方言，即土匪婆之意。

了”。吴先清也坦然地说：“是的，我来了，今天要么你们把刘鼎放出来，要么把我也一起关起来。”^①当然，放出刘鼎并没有那么简单，但是，这次“探监”却非常起作用。吴先清一方面利用这些关系，巧妙地向刘鼎传达了组织的指示，使刘后来（指一九三二年秋）得以取保获释，回到上海。另一方面，自己在这些关系的“保护”下，也得以安然无恙地回到了上海。

在白色恐怖下，吴先清曾多次沉着、敏捷地摆脱了叛徒的跟踪。一九三二年，有一天，一个从莫斯科回来的女同学，与吴先清相对而行，吴先清知道她已叛变，就十分警惕地坐上一辆黄包车，飞快而去，摆脱了这个女叛徒的跟踪^②。一九三三年，她与刘鼎的二妹同回二妹住所，与一叛徒狭路相逢，要避开已来不及了，只得若无所知的搭讪。叛徒急于知道她的住所，吴先清灵机一动，讲了二妹的住处。分手后，她立即买好船票，送二妹回四川老家去了，自己也从同学陈宣昭家搬出^③。

在这期间，吴先清还有这样一段惊险经历：一九三二年入冬季节，吴先清怀孕了，她与刘鼎商量，决定等孩子生下后，送回四川南溪刘鼎的老家，由父母抚养。为此在春节前，她和刘鼎一起回四川老家。没想到，刚过春节，当地警察局工作的亲戚来报信，说有人来警察局告密阩家来了一对“共匪”，正在布置抓人，叫他们连夜逃出县城。那时每个县城都筑有城墙，城门在夜间关闭，仍靠这位亲戚，他们坐在箩筐里，用绳

①孙儒珍老人回忆。

②陈修良：《缅怀吴先清同志》，上海《文史资料选集》1981年第2辑。

③陈宣昭：《对吴先清同学的一些回忆和怀念》。

子慢慢地从城墙上往城外放下去，然后在长江边找到一只小船，离开了家乡，回到了上海。不久（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刘鼎化装成商人的模样，由吴觉农送至南码头，出发去苏区。此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四）

一九三三年，吴先清经中央批准，调出中央特科，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任谍报组长。为了不影响工作，她又把刚出生一个月的婴儿，送到临海自己家去，请母亲抚养。由于工作的需要，她每天都以贵妇的打扮大摇大摆地进出于上海一些重要人物的家中，其中有几家还与她来往特别密切，如陈宝骅夫妇就经常驱车前往吴先清的住所拜访，使住在隔壁的上海市公安局长闵鸿恩也对她毫不怀疑。吴先清和国民党上层人物的来往给革命工作做了有效的掩护。她深深地懂得，作为一个革命者，她的行迹必须象舞台上的演员一样，扮演什么脚色，就要演得逼真，不能露出马脚，稍有破绽，就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她为革命，冒过无数次危险，见过许多大场面，即便在一次又一次听到有人说她是个“放荡不羁”的女人时，她也要忍耐着，承受着凌辱和痛苦，仍以坚毅姿态，机警、勇敢地去完成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一九三四年夏，陈修良在日本东京，得知吴先清仍在上海负责一个组织的领导工作，即托人带口信给吴先清，把自己在东京的情况告诉了她，要求与中央接关系。吴先清一面约陈修良到上海来会晤，一面向上级汇报，讨论了陈修良今后的工作安排。陈修良一到上海就与党组织重新接上了关系，并派她在东京工作。时隔不久，吴先清与陈修良

又在东京会面了。陈修良对吴先清在不懂日语的情况下，独自大胆地跑到人地生疏的东京来的勇敢精神，十分敬佩^①。

一九三五年五月，吴先清所在组织负责人，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这一事件牵涉到吴先清和在日本工作的一些有关同志。当时党中央打电报通知吴先清，要她“迅速撤离回国”。吴先清一面立即购买回国的船票，一面迅速通知有关同志，要他们“速即离开东京，免受牵连”^②。六月，吴先清回到了上海，然而，此时此刻的上海亦非吴先清久留之地，敌人到处在搜捕有关人员，党中央又立即送她去苏联。

(五)

一九三五年九月，吴先清到达苏联莫斯科后，改名罗莎·拉库洛夫，入莫斯科马列主义学院学习。

一九三六年九月，吴先清在马列主义学院学习期满结业后，来到莫斯科近郊一个名叫“马拉霍夫卡”的招待所，以等待安排回国参加革命工作。在这里她受到早已住着的四位（三男一女）中国同志的热烈欢迎。他们也是在这里等待分配工作的。吴先清的到来和相处，给他们以极好的印象，有的说她“性格非常爽朗，而且是饱经风霜的比较老练的革命家”^③。有的说她是个“很能干的人，工作很积极，斗争性、正义感强，敢于向领导提意见。”^④大家都很尊重她。

①②陈修良：《缅怀吴先清同志》。

③李正文：《吴先清在苏联肃反扩大化时期的一段生活》，未刊稿。

④1982年6月访罗静宜记录。

在招待所等待的日子里，吴先清把大家组织起来，请苏联翻译教俄语，请有一定英语基础的同志教英语。此外，每天早晨八点钟《真理报》、《新闻报》一到，就请俄语学得较好的李正文给大家边读边翻译，让大家及时了解苏联国内和世界各国的重大事情。吴先清在招待所时，还在管理人员帮助下，找到了一九二九年回国时，留在苏联的儿子（莫阳）。母子的团聚，使她非常高兴。

一九三七年是苏联肃反扩大化极为恐怖的阶段，肃反扩大化也波及到莫斯科近郊的马拉霍夫卡招待所，使招待所的气氛与苏联整个社会气氛一样紧张起来。那个翻译一反常态，不来教俄语了，吃饭时也改变了往日有说有笑的情景，铁板着脸孔，一言不发，甚至中断他们每天早晨坚持读报的活动，就是他们已经在读的报纸，也被强行夺去。吴先清代表大家对此提出抗议，但无济于事。这一切使吴先清预感到自己和其他同志有受不白之冤的危险，曾对李正文说：“苏联的政治空气这样紧张，我们会不会因他人的诬陷，被冤枉而被逮捕。”^①果然不出所料，那个翻译以女同志房间不能住男孩子为理由，开始要她把孩子交男同志管，后来一定要她把孩子送回国际儿童保育院。接着在十一月的一天下午，来了一位苏联大校军官，叫吴先清多穿点衣服，多带点东西，有首长找谈话。其实所谓“谈话”，就是宣布吴先清是“日本间谍”而被逮捕。开始吴先清被关在监狱里，不几天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役。至此，再也没有吴先清的音讯。时吴先清年仅三十三岁。

^①李正文：《吴先清在苏联肃反扩大化时期的一段生活》。

钱 壮 飞

叶炳南

钱壮飞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情报工作人员。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底，根据党的指示，打进了国民党的最高特务机关，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向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特别是为保卫上海党中央机关的安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一九三四年四月在长征途中牺牲。

(一)

钱壮飞乳名彬生，原名壮秋，亦名钱潮。一八九六年出生在浙江吴兴县（今湖州市）城^①。父亲钱子如，在县城北门新桥堍航埠头做收购生丝的生意。母亲范氏操持家务，家境尚称小康。钱壮飞在湖州城里的浙江省立第三中学读书时，父亲即因病去世，母亲托媒为他同本城马金巷开设勇丰布店的徐家女儿徐双英定了亲，并于一九一四年结婚。第二年生了一个女儿。一九一五年，他从省立三中毕业后，考进了北京医科专门学校^②。

①关于钱壮飞的出生年代，过去的许多材料都说是1895年，本文作者从其亲属钱江、陆念兹等处获悉，他的生肖属猴，由此推算，其出生年代应为1896年。

②见中共湖州市委党史办公室1984年5月31日提供的查访钱家亲友卜雪清、徐安珍、陆念兹、陆韻清等老人的回忆资料，以及陆念兹老人1985年12月9日复本文作者的信。

在北京医专学习期间，钱壮飞结识了一位年龄比他大两岁的女同学张振华。张出身安徽桐城名门望族，祖先曾做过宰相之类的大官，家境较为富裕，经常资助钱壮飞，使他得以在医专坚持修完学业，一九一九年，他们两人从医专毕业后，就在北京成了家。后来，钱壮飞的母亲去北京看望儿子，才知道他已另有所娶，并已生了个男孩。老人家因不大喜欢这位新派的“大脚媳妇”，于是回乡把徐双英母女也带到北京来。幸好徐双英和张振华彼此都能以礼相待，和睦相处，家里一直平安无事（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家人逃难离散，钱老太太就是由张振华委托亲戚照料直至去世的）^①。

钱壮飞医专毕业后，先在北京长兴街挂牌行医，后在京绥铁路附属医院工作，并在美术学校兼课。张振华则在天坛传染病医院当医生。张振华的弟弟张暹中，是中共早期党员，对钱壮飞和张振华的思想进步，曾有过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们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并引导他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九二五年，张振华被介绍入党。一九二六年，钱壮飞也由张暹中介绍参加了党^②。

博学多才的钱壮飞，除精通医术外，还擅长书法、绘画，并能写剧本和当演员。一九二六年前后，他和张振华在北京护国寺附近，曾资助创办过一家光华影片公司。当时，他们全家都住在这家公司里。钱壮飞一面带着孩子参与影片里的角色演

^①上述钱壮飞的家庭概况，系1983年本文作者访问烈士家属时，由钱江、钱一平所介绍提供的。

^②许多介绍钱壮飞烈士事迹的文章，都说他是1925年入党的，但均未注明其依据。本文采用钱江介绍张振华夫人生前所提供的说法。

出；一面借此掩护党的地下工作。他们经常利用医生身份，把党的秘密文件或标语、传单，装进漆着红十字的医用皮包里，提着到党的地下机关或隐蔽同志的住处“出诊”；有时，他们还将传单带到北海公园等公众场所散发，或者在深夜逐一塞进沿街靠巷的住房门缝里。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大钊被捕牺牲，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钱壮飞已无法在北京安身，经组织安排，他于一九二八年初转移到了上海。开始一段时间，他找不到职业；几经周折，总算在上海市公用局找到一份抄写黄包车（人力车）执照的临时差事，才把全家从北京接到上海。这时，一家老少六七口人，全靠他一人的菲薄收入来维持，生活相当艰辛。为了改变这困窘处境，他和张振华曾一度到河南开封冯玉祥的国民军里当军医。因领不到薪饷，生活依然无着，不久又从开封回到上海^①。后来，张振华在南京路先施公司后面一家外国人开办的克美妇产科医院（后迁到赫德路—今常德路）当住院大夫；徐双英婆媳则带着孩子们在法租界甘司东路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新兴顺里四号定居下来。这时，钱壮飞已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被编入中共法南区委所属的法租界支部，支部书记是张沈川（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同在支部过组织生活的还有在北京和他一起入党的胡底（胡北风，安徽人）。有一次，法南区委书记李富春布置法租界党支部成立一个特别宣传队，专门负责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支援法商电车公司中国工人的罢工斗争。为了携带和张贴方

^①据穆欣所著《陈赓同志在上海》一书叙述，钱壮飞和张振华离开北京后先去开封冯玉祥部当军医，然后转去上海。本文根据的是钱江、钱一平等亲属所介绍的情况。

便起见，钱壮飞设计出一种只有两指宽的微型传单^①，携带方便，受到同志们的称赞。

(二)

为了对付和反击国民党新军阀的白色恐怖和屠杀政策，当时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建立了“中央特科”组织，它的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革命根据地通报敌情，以及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②。不久，党中央又决定：经过我党支部决议，可派遣一、二个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破坏工作^③。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钱壮飞在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找到一个职业，从事画广告画和招揽生意等业务。这个无线电管理处，是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官办的一个对外营业机构，专替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收发国际来往电报。它虽不是国民党的秘密特务机关，但对于我党来说，却是一个隐蔽党员骨干、掌握无线电收发技术和有关情报的一个很有用的地方。因此，党支部决定钱壮飞作长期埋伏的打算，不再让他参加其它活动。不久，李克农也来到这个管理处工作。他和李克农的组织关系被转到中央特科，直属特科二科（一九二八年四月成立）科长陈赓

①张沈川：《回忆钱壮飞同志》，上海党史调查组沈忆琴1980年5月整理的访问记录稿。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页。

③192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通告第25号。

（化名王庸，他在后期协助周恩来领导整个特科的工作）的单线领导^①。

一九二七年秋，蒋介石曾一度下野去日本，南京中央政府被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以及何应钦、李烈钧等所组织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或称“军事委员会”）所把持。蒋介石的嫡系心腹陈果夫以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为名，把留在上海的党政干部发动起来，号召各地党政人员一致行动，结成一个效忠蒋介石的政治组织，取名为“中央俱乐部”，英文名称为 Central Club，简称 C·C，这就是后来形成国民党内最大派系之一的 C·C 系的由来。中央俱乐部成立之初，曾推举戴季陶、丁维汾、陈果夫等为领导人。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南京“特别委员会”垮台，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复职后，由于中央俱乐部的一些骨干成员分任各地官吏，它的领导权便落到陈果夫及其胞弟陈立夫（留美学生，归国后曾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机要科科长）的手里，成为他们兄弟操纵的一个庞大派系组织^②。一九二九年三月国民党召开三大之后，蒋介石仍兼任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继续任副部长，陈立夫则升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从这时开始，直到一九四九年国民党统治在全国大陆崩溃长达二十年的漫长岁月中，国民党的各级组织人事大权，基本上被陈氏兄弟所操纵，形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

一九二八年冬，担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秘书长的陈立夫，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培植党羽，千方百计抓住一些要害

^①张沈川：《回忆钱壮飞同志》。

^②庞镜唐：《“中央俱乐部”——C·C的组织及其罪恶活动》，载《文史资料选辑》第 18 期。

部门，很快就把魔爪伸向了上海的国际无线电管理处。他将原来的处长挤走，然后把既是同乡、表亲又是留美同学的徐恩曾安插进去。徐到管理处后，发现钱壮飞是自己的湖州同乡，为人又精明能干，善于交际，就要他帮助自己管理业务。

徐恩曾表面上象个温文尔雅的书生，平时说话轻声细语，见人笑容满面，实际上是一个心狠手辣、贪财好色之徒。他有许多姘头情妇，既是他寻欢作乐的玩物，有的还是他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工具。例如，同他公开同居的情妇费侠就曾帮助徐拉拢收买了西门宗华、任卓宣（叶青）等一些留苏学生，甘为国民党效劳^①。当时，他还有一个姓王的姘妇，因徐怕家里的大老婆大吵大闹，要钱壮飞帮他找处合适的房子。钱壮飞向党组织作了汇报。经过研究，决定干脆把钱家所住的二楼前楼让给这个姘妇居住。这样，既可以使钱壮飞进一步取得徐恩曾的好感和信任，又为钱家获得一把十分安全的政治保护伞，有利于用来做党组织的联络点和开会的场所。果然，徐恩曾对钱壮飞亲自安排其王姓姘妇十分满意，并把钱壮飞倚为自己的左右手。一九二九年，徐恩曾一度调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建设厅长时，也把钱壮飞一家带到了杭州，简直是形影不离^②。就在这一年，浙江省建设厅举办规模盛大的西湖博览会，钱壮飞协助徐恩曾进行博览会的设计和会务的准备工作，显示了他卓越的才华和组织能力，使得徐恩曾对他更为赏识和信任。

早在北伐战争时期，设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就有一个党务调查科，专责收集和统计党内各种资料，如党员动态、成

①刘恭：《我所知道的中统》，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2集。

②张沈川：《回忆钱壮飞同志》。

份、经历等。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南京后，这个科虽增加了一项带有特务性质的调查党员思想及派系隶属的任务，仍只限于调查国民党内部的情况。但到中央组织部完全被陈果夫掌握之后，情况就不同了。他先后任命C·C系的骨干陈立夫、曾养甫、叶秀峰等人担任党务调查科长，把反共和对付党内外反蒋势力作为这个科的主要任务，使它逐渐变成势力庞大的特务系统（这个科以后扩充为党务调查处，抗日战争初期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恶名昭著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的特务组织）^①。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下旬，徐恩曾继叶秀峰接任党务调查科科长时^②，立即将此事告诉了钱壮飞，并说，陈立夫和他准备在党务调查科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以反共为主要任务的庞大特务机构，配合蒋介石对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破坏白区的中共组织，特别是准备对中央的动摇分子实行软化的“自首政策”，利用他们作侦探奸细，潜伏在中共内部进行秘密活动……。徐要钱壮飞做他的主要助手，帮助他着手建立和扩大这个特务系统。钱壮飞立即把这一重要情况向党组织作了汇报，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指示说：“你们把它拿过来！”于是，中央特科决定将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三位同志打入国民党的最高特务组织（当时国民党“军统”特务系统尚未建立），并决定他们三人成立一个直属党中央负责人单线领导的特别党

①刘不同：《国民党的魔影——“CC”团》，《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②据穆欣著《陈赓同志在上海》一书所述，徐恩曾当时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实际上做党务调查科主任。本文采用的是了解“中统”内情的庞镜唐、刘不同等原国民党人士的说法。

小组，由李克农任组长，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由党小组集体讨论决定，然后分头执行。

徐恩曾走马上任后，野心勃勃，想在创建特务系统这桩反革命事业上大干一番。他任命钱壮飞为机要秘书，要钱负责补充人员，请上头增拨经费，在各地建立基层机构，并在南京建立秘密指挥机关和秘密电台。钱壮飞在配备、选用管理电台的机要人员和行政事务人员时，就安排了一些自己的人，作为同留在上海的李克农联系的秘密交通。徐恩曾还把原设在南京丁家桥的党务调查科搬到南京中央路三百零五号^①，建立一个以他自己和机要秘书钱壮飞为中心的“大本营”，门口则挂上一块“正元实业社”的牌子。

徐恩曾的秘密指挥机关建立后，凡国民党中央党部送给他看的机密文件、电报，以及汉口、九江、安庆等地的“调查员”给他的情报，都要送到这里来。徐恩曾虽身负反共“重任”，却改变不了他那迷恋女色的纨绔子弟本性，他每天只是拎着皮包到办公室来一下，处理那些必须由他自己决定的急事和重要问题，然后借口有“要事”，溜到舞场妓院或情妇姘头那里鬼混，而把处理“大本营”的日常工作都推给了钱壮飞。所以，凡呈报徐恩曾阅处的机密文电，最先过目的往往是钱壮飞。即使是由徐恩曾批复的电报、报告和各種情报资料，也是先由钱壮飞审阅并提出处理意见后，交徐恩曾在上面签个字了事。因此，这个“大本营”里的全部机密，几乎都掌握在钱壮

^①据《陈赓同志在上海》一书所述，该地在南京中山东路5号，与中央路305号不是同一个地点；但据当时被陈立夫、徐恩曾派任“两湖调查员”的当事人蔡孟坚说，此处应在中央路305号，本文从蔡说。

飞手里了。

徐恩曾虽把钱壮飞当做心腹，非常信任，但有一件事他不放手，即国民党高级官员之间相互通报用的密码本。根据蒋介石和陈立夫的命令，只许他亲自保管和使用。因此，他把这块象“通灵宝玉”似的密码本，藏在贴身衣袋里，不让钱壮飞知道。然而这事瞒不过钱壮飞。为了搞到这个密码本，钱壮飞“规劝”徐在上妓院时不要随身带机要文件。徐果然把密码本留下，锁藏在机要柜里。钱壮飞设法终于拿到，把密码本全部用照像机拍摄下来，仍放回原处，丝毫未引起徐恩曾怀疑和觉察。搞到了这个密码本后，钱壮飞对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机密和绝密情报，也能掌握，不失时机地经李克农转交党中央。

后来，陈立夫、徐恩曾又布置钱壮飞除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外，还要搜罗其它党派和政治势力的情报。钱壮飞和李克农根据中央特科的指示，就“帮助”他们在南京、天津等地建立了一套以“通讯社”名义为掩护的半公开的情报机构。它的指导机关叫“长江通讯社”，社址设在“正元实业社”大本营隔壁的中央饭店四楼；另一个叫“民智通讯社”。两个社的负责人都由钱壮飞兼任。不久，钱壮飞又把胡底和自己的妻舅、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张家珑（张振华之弟）派到天津，在日本租界建立一个“长城通讯社”，由胡底任社长，张家珑任记者^①。李克农则以无线电管理局的广播新闻编辑为掩护，负责主持设在上海的国民党情报机关；并把钱壮飞、胡底获得的情报，通过陈赓转送给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所以这些“通讯社”，名义上虽

^①张家珑 1984 年 1 月 7 日复本文作者的信。

然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附属组织，实际上却完全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每当李克农、胡底来到南京，就堂而皇之地住进主要接待国民党高级官员的中央饭店，非常安全。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搜集来的中共党内文件，都汇集到南京的长江通讯社，钱壮飞只是在这些文件上面盖个图章，交给下面的工作人员归档就算完事。当国民党领导人要什么情报时，钱壮飞和李克农等就根据一些无关紧要的情况故意夸大其词，加以编造，以资应付。

一九三〇年四月，蒋介石因对张学良的东北军很不放心，千方百计想要搞到这方面的情报，但过去几次派到东北去的特务都被日本人搞掉了；于是，徐恩曾就将此“重任”交给钱壮飞，要钱这个“得力干员”带人前去沈阳搞东北军的情报。钱壮飞与中央特科二科科长陈赓，以及在天津的胡底等组成一个小组（实际上由陈赓领导这个小组），带着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证件和活动经费，前往东北。他们在当地中共组织的帮助下，巡视了中央特科部署在东北、华北地区的工作，同各地的地下工作者接头，带回许多重要的情报，并在东北建立了一套名义上归国民党，实际上可以向中共中央提供情报的秘密组织。他们回到上海后，就同李克农一起研究，编写出一份四万多字的有关东北情况的详细报告。这份材料，虽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价值，但因过去国民党派出的特务从来没有弄到如此详尽完整的情报，所以陈立夫、徐恩曾对钱壮飞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赞赏，连声说“了不起”，“哪来这么好的材料！”他们对钱壮飞表示“佩服之至”，不但给予嘉奖，而且把钱当作国民党特工系统的“奇才”，从此更为信赖和重用。

钱壮飞、李克农在上海为陈立夫、徐恩曾建立的情报机

关，和国民党在上海的军警机关均有联系。他们利用国民党的党、政、军、警、特各个系统之间既互相勾结、坚决反共，又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这种复杂微妙的矛盾关系，巧妙地掩护自己的工作，甚至能借他们之手除掉自己认为某些最反动、最凶恶的特务。例如，上海的国民党公安局里，有一个非常反动的侦缉队长，抓捕过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钱壮飞和李克农商议决定除掉这个坏蛋。他们定下计谋，先在上海租一处房子，布置一些共产党员住进去，还在那里放上若干被国民党搜获过的、已经毫无价值的党内文件，然后故意将此线索透露给那个侦缉队长；但当他想立即前去搜捕时，却又通过其它渠道，从侧面关照他不要马上行动，而要“放长线钓大鱼”。过了几天，等这个侦缉队长前去搜捕时，却早已人去楼空，连个人影儿也没能抓到，只拣回一些如同废纸般的失效文件。此事被其上司知道后就责问他：你早就知道为什么却不立即动手，有意让共产党逃掉？这个家伙有口难辩，无言以对；后来终于引起上面对他的怀疑，经过一段时间的“看察”，就被当作“共产党的奸细”给秘密“除掉”了。

从一九二九年底开始，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钱壮飞和他的亲密战友李克农、胡底，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置个人的生死安危于度外，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心脏里战斗，大智大勇，极其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把国民党最高特务组织“拿过来”的这个无比艰险而光荣的任务，从而赢得了我党情报战线“三杰”的称誉。如果不是后来突然发生一件意外的危急事变，他们本可以继续在这个特殊的战斗岗位上，创造出更多的丰功伟绩。

(三)

在中央特科的领导成员中，有一个叫顾顺章的人，他是在中共六大片面强调党的领导成员工人阶级成份时当选的第六届中央委员，后来又在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人原是英商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制烟工厂的一个“拿摩温”（这是上海人对“工头”的英语读音 Number One 的译音），沾染有极其严重的流氓习气，喜欢舞枪弄棒，打架毆斗，还会耍几套魔术，曾以“化广奇”的艺名在上海大世界游艺场公开演出过。五卅运动时，他参加了烟厂工会领导的罢工斗争，是个表现比较突出的“勇敢分子”，曾经负责纠察队，热衷于买枪，打叛徒、工贼和流氓。后来调到上海总工会工作。一九二七年，他参加周恩来等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担任一个武装纠察队的队长。在战斗中很勇敢，曾经受到赞扬，在上海工人中有点小名气。周恩来创建中央特科时，他参加了有关的领导工作，并担任过三科（行动科）的科长。但随后不久，他就暴露出骄狂蛮横、飞扬跋扈、极端狂妄的个人野心，在私生活方面也十分腐化。他虽多次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但总是阳奉阴违，屡教不改。为此，党中央不得不断然采取组织措施，将他调离中央特科这个要害部门。一九三一年四月，顾顺章受党组织的派遣，护送张国焘从上海经武汉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去工作。他在完成护送任务回到武汉后，竟然不顾党的秘密工作纪律，重以“化广奇”的艺名，在汉口新市场的游艺场公开登台表演魔术赚钱，并同一些舞女、交际花在一起鬼混；结果于四月二十四日在汉口被叛徒尤崇新

指认而被捕^①。

顾顺章被捕后，被押送到徐恩曾在汉口新建立的特务机关——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为何成浚）的侦缉处。这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在当天的审讯中，就叛变投敌，先是供出了中共驻汉口的秘密交通机关，以及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军团驻汉口的办事处；还出卖了直属中央特科四科领导、在英商祥泰木行一条运输船上当舵手、负责上海——汉口间秘密交通线的一位姓陈的共产党员。但这只不过是这个无耻叛徒投靠国民党的小小见面礼。他还有一个准备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的大阴谋，这就是他要把所知道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在上海的秘密地址，以及中央特科钱壮飞等人的情况，当面报告蒋介石。因此，他提出求见陈立夫、徐恩曾派到武汉的两湖“调查员”、武汉行营侦缉处的特务头子蔡孟坚^②，并说：“我知道，蔡是武汉对付共产党的负责人。”^③

当蔡孟坚亲自审讯顾顺章时，顾有恃无恐，态度十分傲慢。他对蔡说自己有个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可以在三天之内

①有些资料说顾顺章是被叛徒王竹樵出卖的。本文采用当年逮捕、审讯顾顺章的国民党武汉行营侦缉处头子蔡孟坚的说法。

②蔡孟坚于1930年8月间被派到武汉，负责两湖地区的“铲共肃反工作”，他在何成浚、夏斗寅的支持和武汉行营军法处的协助下，勾结武汉地区反动帮会的流氓头子杨庆山等人，采用软化的自首政策收买共产党的叛徒；不久，即因破坏和镇压武汉地区中共地下组织“有功”，受到蒋介石的当面嘉许，赏给他一万元奖金，并下手令委派他为少将参议，指定他主持武汉行营新成立的侦缉处，专事负责破坏湘、鄂、赣三省各城市里的中共地下组织的特务活动。顾顺章由于曾经参加过中央特科的领导工作，自然知道这个重要的国民党特务骨干的底细。

③蔡孟坚：《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台湾）《传记文学》第37卷第5期，1980年11月出版。

把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请迅速安排本人晋见总司令蒋公（指蒋介石），我将当面陈情^①。此后就不再多说其它的话，表示出一副不屑与蔡孟坚、何成浚等人谈最高机密的可笑姿态。他还对蔡提出在他到达南京之前，千万不可将他的被捕叛变的事向南京发电报。但是，蔡孟坚和何成浚等人并不把这个阶下之囚放在眼里，他们因急于抢功，于四月二十五日争先恐后地分别向蒋介石、陈立夫、徐恩曾发去特急密电，报告顾顺章已被捕叛变，有一网打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的重大计划要直接向蒋总司令面陈云云的“反共捷报”，并于当晚派特务和一排宪兵乘坐专轮，押送顾顺章去南京，而蔡孟坚本人则于二十六日早上乘飞机先去南京面陈经过。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那天，正是星期六，只有钱壮飞一个人留在“大本营”里值夜班。忽然接连收到武汉国民党特务机关发来给徐恩曾转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的六封特急绝密电报，每封电报上面都写有“徐恩曾亲译”的字样。钱壮飞一边签收电报，一边心中思忖，武汉方面究竟发生了什么重要事件？值得如此迫不急待地连发急电？这件事引起钱壮飞的高度警惕。他在空无旁人的办公室里，用拍摄到的徐恩曾那个密码本，将电报的内容译了出来。这使他大吃一惊，原来第一封电报中就这样写着：黎明（这是钱壮飞早已知道的顾顺章的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以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②。

^①蔡孟坚：《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

^②穆欣：《陈赓同志在上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82—83页。

机敏沉着的钱壮飞仔细记下了电文的内容，再按照原样把电报封好后，当机立断，决定先派自己的女婿刘杞夫（又名刘正风，湖南人，当时只是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被钱壮飞安插在“大本营”做行政杂务工作，暗中充当同上海的李克农联系的秘密交通），连夜乘火车去上海，把这个特急情报通过李克农、陈赓立即转告党中央^①。

刘杞夫走后，钱壮飞暂时还留守在“大本营”。他一面继续观察动静和考虑采取应变的措施；一面着手清理自己所经管的重要文电、帐目，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当他从陆续送来的密电中得知武汉方面已派出专轮把顾顺章押送来南京，将在一两天内即可到达时，便立即转告在民智通讯社工作的一个同志以及其他有关人员赶快撤离；并向天津的长城通讯社发去“潮病重速返”（钱壮飞别名钱潮）的急电，通知胡底等人迅即撤离隐蔽^②。这时，他思潮起伏，想不到自己经过千难万险才开辟出来的特殊战斗岗位，一下子就全部毁在这个万恶的叛徒手里，心里十分难过。第二天早晨，他象往常一样，若无其事地把这批特急密电当面交给了徐恩曾；接着装作回家休息的样子，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大本营”，立即乘火车返回上海。为了防范徐恩曾派特务在上海北火车站守候缉捕他，他机敏地从上海郊区的真如小站下了车，绕道进入市区，消失在喧闹不息的滚滚人流之中。

^①据钱一平同志提供徐双英夫人生前的回忆，那天晚上钱壮飞是同刘杞夫一起赶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告的。但据其它资料，钱壮飞当时还要留下处理一些非办不可的善后事宜（详见下文），并未立即离开南京。本文作者认为后说较合理，故未用徐说。

^②当事人张家晓 1984 年 1 月 7 日给本文作者的复信。

钱壮飞所截获的这一特急情报，迅速由李克农和陈赓转给了党中央。当时在上海负责中央工作的周恩来，临危不惧，坚毅沉着，在陈云等同志的协助下，立即指挥中央特科工作人员，抢在陈立夫、徐恩曾行动之前，跟叛徒和特务们展开了一场争分夺秒、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并采取如下的紧急应变措施：一，周密地保卫并迅即转移党的主要负责人的住址，把顾顺章所熟悉或能侦察到的党的负责人的秘书全部调换成他不知道的新人；二，所有原在上海的可能会成为顾顺章侦察、追踪目标的党的干部，都尽快地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三，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置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社会关系；四，立即废止和改变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和暗号，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应变。就在四月二十六日这天晚上，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等领导机关全部搬了家，安全地转移到新的秘密地点。经过不休不止、日以继夜地连续的紧张战斗，终于赢得了只有几十个小时的极其宝贵的时间，使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等机关避免了一场空前严重的大破坏、大灾难。

四月二十七日，顾顺章乘坐的军舰到达南京时，业已先行赶到的蔡孟坚驱车前往码头迎接。当汽车径直驶向中央路三〇五号徐恩曾的秘密指挥机关时，顾顺章就故弄玄虚地低声告诉蔡孟坚，这里就是共产党在南京负责人的通讯处：“速将徐（恩曾）先生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扣留，如钱逃亡，则全功尽弃！”“整个肃清计划，自然全部落空。”蔡孟坚听了大吃一惊，叫苦不迭。他一面十分恼火地训斥顾顺章：“你在武汉，过分大意，而且自大，如其时说出有钱匪潜伏我中央机要部门之事，我将立即采（取）防范措施，不用电报报告你已被捕而愿自首诸情，一切由我面陈中央当局，这是你（的）自我失败！”

一面立即报告徐恩曾。当徐听说被自己视为心腹亲信的钱壮飞，竟是中共中央特科派进来的地下工作者，更是呆若木鸡，震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他在惊恐交加之余，派人四出追查钱壮飞的下落，却早已“不知去向，似已证明在逃”了^①。接着，他又派中央调查科总干事张冲、顾建中等，带领大批特务，连夜赶到上海，会同上海英、法租界巡捕房，从四月二十八日早上，开始了全市的大搜捕。他们虽然以最快的动作，连续搜查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地址，以及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的住处，但都是到处扑空，什么也没有捞到。

事过几十年之后，徐恩曾在他用英文写的《一个特工的自述》一书中，还懊恨不已地自怨一生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不该重用了钱壮飞。他的上司陈立夫也以充满埋怨责备的口吻追忆说：“其时双方作渗透工作，无孔不入，可均兄（即徐恩曾）录用钱壮飞为一大疏忽”^②。当年在武汉逮捕并亲自审讯过顾顺章的蔡孟坚则在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杂志上，发表《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的回忆文章，大骂顾顺章在被捕叛变后，还要“打埋伏”、留一手，不肯立即说出有关钱壮飞的情况，致使“天机”泄漏，功亏一篑，害得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们空欢喜一场，并以蔑视的口吻说：“潜伏我中央（的）钱匪逃沪，使顾（顺章）可能发生的作用与成就，已算全部消失。”不过令人可笑的是，这个一生反共“有功”的国民党特务骨干，在时隔半个世纪后，竟然还没有弄清钱壮飞究

^①以上对话均引自当事人蔡孟坚：《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

^②1980年7月2日陈立夫致蔡孟坚的信（台湾）《传记文学》第37卷第5期第41页。

竟是谁？居然在文章中煞有介事地宣称：“我安全单位某代表杜君直接告诉我：有确实资料证明大陆陷匪后，匪政权社会部长李克农，即是钱壮飞”？！也可想见这些特务老爷们的颠预无知了！至于那个无耻的叛徒顾顺章，在自己认为可以稳立“赫赫奇功”，谋取高官厚禄的好梦变成泡影以后，也惊得懊恼万分，神不守舍。当天蒋介石虽然接见了，但对他很冷淡，只是说“你归向中央很好，中央必对你宽大，希望以后多多尊重蔡同志（指蔡孟坚）的话，事事与他合作，籍获带罪图功机会”^①。这显然只是把他当作一个特务小喽啰看待。后来，他虽然继续出卖了恽代英^②、邓演达等人，还是被国民党特务所枪杀，落得个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

钱壮飞从南京紧急撤离时，来不及把跟在自己身边的子女钱椒、钱江等一起带走，但他到上海后，经过反复斟酌，决定叫女婿刘杞夫再返回南京照料。因他在离南京前，曾给徐恩曾留下了一封信，警告徐如果迁祸自己的家人，就要把徐的丑闻隐私公诸于众。果然，徐恩曾害怕钱壮飞这样做会对自己更加不利^③，更害怕蒋介石因此追究他重用钱壮飞的责任（当时在陈立夫、张道藩等人的包庇下，没有立即向蒋介石报告钱壮飞的案件），所以虽装模作样地逮捕了钱椒夫妇，但只关押了几个月就把他们释放了。而钱江当时还是个少年，在南京街头流浪了一些日子，后来被他在上海的一位同他家关系密切的著名歌

①蔡孟坚：《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

②恽代英在上海被捕后，用了个假名并未被敌人认出，转押到南京后才被顾顺章指认出卖，旋即遇害牺牲。

③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徐恩曾终于因为伪造法币、贪污和参与中印缅国境线的大走私案，被他的对头“军统”头子戴笠抓到了把柄，告到蒋介石那里，而被撤职丢了官。

舞、电影演员黎莉莉找了回去。国民党特务机关为了追捕钱壮飞，把凡是认得他的特务都派来上海，走街串巷，到处寻找。然而，钱壮飞在党组织的严密保护下，安然无恙。他的家属也由陈赓派人保护，转移隐蔽在各地旅馆，有时一天要调换几个住处。直到钱壮飞离开上海，国民党特务的搜捕松懈下来之后，才另行找个住处安顿下来。

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徐双英、张振华两位夫人，饱经艰险困难，茹苦含辛，抚养教育子女，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和钱壮飞团聚。却不料在上海的这次分手，竟是他们夫妇的生离死别。

(四)

顾顺章事件后，钱壮飞和李克农、胡底等在上海难以存身，按照党中央的决定，他们转道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胡底后来被派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工作，被张国焘秘密杀害）。

一九三二年春，红一方面军成立保卫局，钱壮飞被任命为局长（一年后，改由李克农接任）。保卫局下设侦察、执行两个部，胡底曾在该局当过部长。当时保卫局的干部、战士，大都是从红军作战部队或红军学校选调来的年轻的党团员骨干。他们在政治上坚定可靠，忠实积极，但不少人只想上前线杀敌，对做情报、保卫工作不安心，甚至认为保卫局的干部是些呆在后方的“胆小鬼”。钱壮飞和李克农等用自己的经历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启发他们认识做保卫工作的重要性，懂得做好这项工作，比上前线作战更要艰险、困难得多。他们还根据大部分工作人员文化程度低的实际情况，亲自编写教材，帮助大家学习

文化和掌握有关情报、保卫工作的各种专业技术知识。他们的讲课内容丰富、情节生动，容易听懂并切合实用，如怎样警戒布哨、追踪或摆脱钉梢、识记和描绘不同人物的特征、搜集和传递情报、进行审讯和记录、调查分析各种资料，以至天文气象、历史地理、同三教九流等人打交道的常识，等等。在此期间，他们为培养政治上坚定、业务上内行的红军情报、保卫工作队伍，倾注了大量的心血^①。

一九三三年，钱壮飞调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局局长。稍后，红军总司令部第二局也来到瑞金乌石垄中革军委驻地，并与军委第二局合并，他改任合并后的中革军委第二局副局长^②。一九三三年八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决定，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叶坪，建立一座红军烈士纪念塔。钱壮飞承担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工程的设计任务。他把纪念塔的造型，设计成射向敌方阵地的炮弹，象征着红军烈士们冲锋陷阵、一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纪念塔于一九三四年一月落成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在塔基石碑上题了词，并刻下了这一工程的指导者和设计者梁柏台、钱壮飞的姓名。红军主力长征后，此塔曾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毁坏，现已按原样修复，矗立在叶坪广场中央，成为红色首都瑞金的重要标志之一。此外，他还积极为《红色中华》报设计刊头，创作漫画。

①曾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保卫队副队长的南京军区离休干部张文碧 1985年6月18日在南京接待本文作者访问时，所提供的有关回忆资料。

②见红军长征时任中革军委二局译电科副科长、原任湖南省国防工办副主任的邹毕兆 1984年1月23日给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的复信。

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中央军委向优秀的红军指战员颁发的红星奖章，也是由他设计的^①。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长征时，钱壮飞被编在军委纵队，离开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一路随军转战湖南、贵州等省。遵义会议后，他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未到职）。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红军主力在渡过乌江后途经贵州息烽县的流长一带时，他因躲避空袭，掉队失踪。虽然组织上当即派人四出寻找，始终未能找到。据党中央事后确认，钱壮飞已不幸牺牲。一九四五年四月，在延安召开中共七大前夕，就把他的姓名列入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编印的《死难烈士英名录》之中。但钱壮飞究竟是在空袭时阵亡，还是只身掉队后被当地土顽分子杀害，则长期无法作出定论。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日，中共贵州省息烽县委，向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报送了一份《关于钱壮飞烈士牺牲问题的调查报告》：

据查：中央红军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夜，从金沙县沙土、后山一带南渡乌江；三十日晨，大部队进入息烽县流长一带。三十一日，中央纵队和红一、三、五军团在息烽的流长、鹿窝、九庄等地活动；当天中午，三、五军团的部队在九庄遭到四架敌机轰炸扫射，有一百多名红军指战员殉难。当时钱壮飞所在的中央纵队虽未在九庄，但在此期间因各种原因掉队而流散在流长一带的二十九名红军干部、战士中，现经查明，已有十八人系被当地地主

^①邹毕兆 1984 年 1 月 23 日给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的复信。

土顽武装杀害。其中有位自称名叫‘夏树云’的‘营部秘书’，在红军大部队离开流长的第二天（即一九三五年四月二日），来到流长乡的客户寨、宋家寨一带。据现尚健在的当时目击者们回忆，这位红军干部的脸上气色很不好，走路很吃力，好象有病；年约四十岁左右，瘦高个子，留‘东洋头’（分头），外省口音，身上背有一个包袱，手拿布雨伞。当天晚上，他就被国民党的反共“清乡委员”、区长宋子楨及其爪牙罗少安等人（全国解放后宋、罗二人已被人民政府镇压枪决）密谋，骗说愿带路帮助追赶红军部队，在宋家寨右侧约一华里的山脊上，将他强行推下一个名叫“没良坑”的约有五六十公尺深的山洞，并用大石块砸下洞底，当即将其害死。前些年当地曾组织人员下洞去寻找过这位红军烈士的遗骨，但因事隔几十年之久，什么也未能找到。这位红军干部随身所携带的物品，均被凶手罗少安掳去，书籍、印章等当即被罗烧毁，只有一床黄绒军毯，现尚保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编号八四五。

中共息烽县委的报告认为：“经过反复调查和综合分析上述遇害红军干部的身材、年龄、口音、行李，以及目击者回忆其相貌，可以比较有把握地断定：一九三五年四月二日在息烽县流长乡没良坑殉难的自称夏树云的红军干部，即当时担任中革军委二局副局长、遵义会议后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未到职）的钱壮飞同志。”

钱壮飞牺牲后，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设法把他的两个儿子送到延安，由周恩来、李克农、徐特立、李强等负责抚养照料。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怀着深切追念的真挚感情说起：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钱壮飞同志在对敌斗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的确使我们的党少走了弯路，全党将永远纪念他^①！一九六二年二月，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因病逝世，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因为过去没有机会为钱壮飞烈士和被张国焘杀害的胡底同志举行追悼仪式和给予应有的评价，所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代表中共中央所宣读的李克农同志悼词中，特意加写进这样一段话：李克农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了斗争，同为革命而壮烈牺牲了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就是党和人民对钱壮飞烈士和他的战友们一生英雄业绩，所作的高度评价和定论。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穆欣：《陈赓同志在上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7月版。
2. 穆欣：《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人物》1980年第4期。
3. 周文琪：《战斗在敌人心脏的钱壮飞同志》，《党史研究》1980年第2期。
4. 张沈川：《回忆钱壮飞同志》，上海党史调查组沈忆琴同志1980年5月访问记录整理稿。
5. 钱一平：《紧急关头》，1981年6月28日上海《文汇报》。
6. 邹毕兆同志1984年1月23日复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

^①张沈川：《回忆钱壮飞同志》。

委员会的信件。

7. 张文碧：《回忆钱壮飞首长》，本文作者 1985 年 6 月 18 日访问记录稿。
8. 中共贵州省息烽县委 1985 年 5 月 2 日上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关于钱壮飞烈士牺牲问题的调查报告》。
9. 中共湖州市委党史办公室 1984 年 5 月 31 日向本文作者提供的查访钱壮飞烈士故乡亲友卜雪清、徐安珍、陆念兹、陆韵清等老人的回忆资料，以及陆念兹老人 1985 年 12 月 9 日复本文作者的信。
10. 蔡孟坚：《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台湾）《传记文学》第 37 卷第 5 期，1980 年 11 月出版。

张子华

李海文 苏忠深

张子华是宁夏早期的共产党员。一九三四年秋，曾受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派遣，巡视陕北根据地，积极推动陕北、陕甘两块根据地的联合。一九三五年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年底，受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委托，到南京同国民党人曾养甫谈判两党联合抗日问题，曾四次往返于陕北与南京、广州之间。一九三六年冬调回陕北，任中共中央统战部联络局副局长^①。西安事变时，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随周恩来来到西安工作^②。后又以八路军总部代表的身份到宁夏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历史转变进程中，张子华做出了贡献。

(一)

张子华原名王绪祥(王宿翔)，化名王少麟、黄汉等，宁夏中宁县恩和乡王台庄人。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生于当地富绅家庭。祖父和父亲曾多年担任当地引黄灌溉干渠——七星渠的负责人，从天津等处引进过先进技术，为发展七星渠灌区兴办

^①张子华干部履历表。

^②曾三：《保安·延安·西安》，1985年9月27日《人民政协报》。

过一些水利工程，同时也经营大宗枸杞等药材到天津出口。三叔王含章赴日本留学过，长期担任国民党宁夏省党部特派员。由于家庭条件比较优越，张子华虽然出生于文化落后的西北农村，但是近代科学文化信息比较容易传进他的耳朵。他从小向往科学文化，是恩和高级小学的优秀学生，曾在全县毕业班会考中得第三名。

一九二六年秋天，大革命的潮流由南向北，席卷神州大地。九月十六日，冯玉祥在内蒙古五原誓师参加北伐，邀请刘伯坚、邓小平等大批共产党员到国民军的各级政治机关工作。在国民军总部进驻银川期间，宁夏城乡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蓬勃兴起。在宁安堡驻军的共产党员刘进、刘开先曾到恩和高级小学开展工作，把校长、老师和高年级学生发动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同当地豪绅和封建势力作斗争^①。张子华在毕业班，他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提高了思想觉悟。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蒋介石等新军阀重新开战，冯玉祥驱逐了共产党人，把队伍拉到中原打内战，宁夏刚刚兴起的革命运动夭折了。西北地区群雄蜂起，战乱频繁，学校停课，社会秩序非常混乱。但是，张子华的革命热情没有熄灭。他在兰州读初中期间，继续追求进步。他面对黑暗的社会，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政府的丧权辱国不胜痛心疾首，立志要走革命道路。

一九三〇年八月，张子华转到北平。叔父王含章为他做留学的准备，送他到教会办的汇文中学续读。但是事与愿违，汇文中学的地下党活动十分活跃，张子华在参加各项进步活动

^①孙殿才简历。

中，找到了党组织，于一九三〇年十一月由北平市委职工部大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①。他为了表明立志做中华民族的儿子，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决心，入党时改名为张子华。后来，他给恩和小学张校长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说自己在北平“奔走国是”。

张子华入党以后，在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负责人饶漱石领导下工作，曾经到门头沟煤矿背煤，组织煤矿工人斗争，参加过财政部印刷局工人反对机器南迁的罢工斗争。以后，他调任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秘书，参加了天津码头、纱厂工人运动和唐山五矿工人罢工的斗争，还代理过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党团书记^②。

张子华到北平不久，他幼年的同窗好友孙殿才也到北平上学。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他向党组织介绍孙殿才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从此，他在从事工人运动的同时，和孙殿才一起以学生身份开展学生运动。

张子华性情豪爽，精明强悍，口才锋利，平易近人，善于团结群众，受到同学们的敬佩。因为他长着络腮胡，大家亲切地称他为“胡子”。当时，以雷启霖等为首的宁夏旅平学生会，是联系宁夏旅平学生的群众组织，出版刊物《银光》，宣传爱国进步思想。张子华和孙殿才积极参加学生会的活动，通过学生会团结宁夏旅平学生，开展革命工作。同时，积极支持《银光》刊登揭露宁马^③集团统治压迫宁夏人民的文章，扩大发行范围。一九三〇年冬，他们在学生会的会员中吸收进步青年阎廷栋、高立夫、吴介凡、潘钟林、征克非等组织读书会，建立

^{①②}张子华干部履历表。

^③宁马即长期统治宁夏的马福祥、马鸿逵家族。

学习制度，阅读进步书刊，如施复亮翻译的《资本论大纲》等^①。读书会的活动提高了积极分子的觉悟，加强了宁夏旅平学生的进步力量。

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在党的领导下，反帝大同盟地下组织在东城区和西城区建立两个支部，张子华担任这两个支部的联络工作，并且秘密介绍一批宁夏进步青年加入反帝大同盟^②。他根据地下党和反帝大同盟的指示，发动宁夏旅平学生数十人参加所在学校的抗日救亡运动。阎延栋和潘钟林等还参加了北平学生南下请愿团，参加卧轨、绝食等斗争，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日^③。

一九三二年，“左联”组织北平各院校请鲁迅、施复亮、侯外庐等著名教授讲演。张子华和孙殿才通过宁夏旅平学生会组织宁夏青年参加听讲，做安全保卫工作，还用宁夏学生会的油印机秘密印刷一批宣传品在讲演会上散发。同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在北平进行文化“围剿”时，《银光》等被查封，形势险恶^④。张子华冒着危险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他有时穿大褂长袍，化装成富商，出没于街市；有时着西装革履，乘黄包车，往来于院校；有时穿学生装，在宁夏同学公寓留宿。有一段时间，他在西城水月庵七号设联络点，和孙殿才、李天才^⑤等接

①吴介凡：《中国共产党在宁夏开始活动》（未刊稿）。

②徐梦麟：《宁夏留平学生会始末》，载《宁夏青运史资料》，1984年4月5日。

③访张致和记录。

④苏复涛：《张子华同志革命活动略述》，载《宁夏地方党史资料通讯》总第12期。

⑤李天才系宁夏中宁县枣园乡人，1932年从宁夏转北平做地下工作，后在天津监狱牺牲。

头。他白天在这里写传单和稿件，夜里出去写标语、散传单，饿了吃两个烧饼，生活十分艰苦^①。有一次，反动军警逮捕爱国学生，殴打群众，他腿部受伤，仍不顾个人安危，掩护群众撤退，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

一九三二年冬，宁夏反动当局指控宁夏旅平学生会是“共产党组织”，国民党特务按黑名单缉捕宁夏籍学生。同学们有的回家，有的转移，张子华仍在北平坚持和敌人斗争，和转移在郊外的宁夏学生保持联系。一九三三年春，他冒着危险到香山找吴介凡、阎延栋、殷占雄、征克非等人，动员他们回城里工作；并让吴介凡化装成洋车夫在北平后门建立秘密联络点，供饶漱石、李天才等接头。

一九三三年二月，日寇进攻热河，当地军民奋起抵抗，中共华北特委派一批党员到察哈尔去协助冯玉祥、吉鸿昌组织抗日同盟军；张子华曾带饶漱石的函件到张家口拜见冯玉祥将军。为了饶漱石在北平安全工作，张子华把办事处机关转移到同乡学生张致和寓所^②。抗日同盟军失败以后，张子华转到天津工作。不久，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饶漱石与张致和先后迁往天津，住在法租界。张子华在饶漱石的领导下，以商人身份作掩护，在开滦煤矿从事工人运动，组织罢工斗争。

一九三六年三月，张子华第一次从上海到陕北向中央汇报国共两党接谈情况，在瓦窑堡期间受周恩来的委托，介绍白区工作部王幼平到银川利用原来反帝大同盟的关系，在银川、中卫、平罗等地观察白区的形势，原反帝大同盟成员袁金璋、潘

^①访问张致和记录。

^②吴介凡：《中国共产党在宁夏开始活动》（未刊稿）。

钟林、高立夫等冒着生命危险掩护王幼平顺利地完成任务^①。第二年，袁金璋等在张子华的领导下组成宁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小组，恢复地下活动，掩护中共宁夏工委组织，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②。

(二)

一九三四年五月，张子华受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的派遣，化装成商人到天津领导纪念五卅运动九周年的活动，在召开积极分子布置罢工的会议上，不幸被敌人逮捕，关押在天津警察局看守所。敌人从他身上没有搜到任何证据，没有发现他的真实身份。他利用父亲在天津惠源长货栈经营枸杞生意的情况，在审讯时从容对答，以浓重的宁夏口音，坦然地说：“我是宁夏来的枸杞商，住在天津北大关惠源长货栈，经理叫霍荣轩。我到天津来，人生地不熟，出来看热闹被你们抓起来，不信请你们去调查！”警察局第一次派人查对时，因为霍荣轩没有得到消息，不敢承认。于是，敌人对张子华严刑拷打。但无论刑罚多么严厉，张子华一口咬定自己是宁夏来的枸杞商。他说：“我住在惠源长货栈南院，房子里挂着一个蓝布信袋，内有我宁夏商号天顺祯的来信，你们不相信，咱们去当面对证。”原来，机警而细心的张子华往日去惠源长时就留了神，警察局暗查属实，又找不到其它证据，只好将案子搁起来。

张子华被捕的消息传到北平，全总华北办事处负责人饶漱

①《王幼平同志的一封来信》，载《银川党史通讯》第6期。

②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统战部《关于袁金璋同志的政治历史结论》（1979年10月）。

石立即派张致和到天津营救。张致和化装成商人，以同乡的身份去探监。张子华喜出望外。他告诉张致和：“你对王蛮子（饶漱石）说，我没啥，一切都好。”饶漱石得到这个口信，知道他没有暴露身份，就派张致和做霍荣轩的工作，由霍荣轩出面将张子华保释出来，暂时住在惠源长货栈。不几天，他接党组织的通知，转移到大同公寓，从此脱离了危险^①。

（三）

张子华出狱以后调到中央驻北方组织工作。一九三四年九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陈铁铮（孔原）派他到陕北游击区巡视工作。他化名黄汉，于中秋节后到达清涧的河口，住了二十多天，听取了特委负责人郭洪涛和李铁轮的汇报。当时，敌人正准备对陕北和陕甘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因负伤不能指挥作战，只有将两个根据地的红军统一起来，才能战胜敌人。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两块根据地的领导人之间有些分歧意见和误会还没有消除。张子华以巡视员身份给陕甘红军领导人刘志丹写了一封信，分析斗争形势，讲明利害得失，希望两个特委召开联席会议，由刘志丹指挥两支红军并肩作战。同时，表示支持陕北特委为粉碎敌人的“围剿”，实行坚壁清野的做法和平分土地的政策。他说，这样能使人民自觉行动起来，保卫胜利果实，反对敌人的进攻。他回到北平，向北方代表汇报以后，随即给郭洪涛等人寄了一封密信，传达了北方代表的意见，同意陕北根据

^①张致和：《证明张子华有关材料》，存中宁县志办公室。

地的三个大队扩充为一个师三个团，番号是二十七军八十四师^①。陕北特委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在安定境内正式成立了红二十七军，为反“围剿”作了认真的准备。

张子华给刘志丹的信起了很好的作用。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陕北和陕甘两个特委在安定周家硷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陕甘和陕北两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刘志丹统率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大批有生力量，于五月间粉碎了敌五六万人的围攻。同时，扩大了根据地，使陕甘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联成一片^②，黄汉的名字也由此载入了陕甘宁根据地革命史册^③。

（四）

一九三五年初，张子华调到上海，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兼任联系河北省委的政治交通。这时，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严重，但张子华从不气馁。五月间，因上海地下党连遭破坏，他被派往豫鄂陕任特派员，公开身份是国民革命军四十四师一三二旅旅部参谋。九、十月间，由于留在上海的军委负责人被捕，他的身份暴露，不得已回到上海。这时，上海临时中央局已不存在，人员都已疏散。他拿着离开上海时中央局给的关系，找到了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的特科（情报系统）

①1985年8月11日延军、向安华访问郭洪涛记录。

②周树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大事记》第181页，

③高朗亭：《西北红军的组建和党中央拯救西北革命根据地史事纪实》。

的同志，接上了关系^①。从此，他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一九三六年一月，经上海地下党组织委派，张子华以中共长江局代表名义同南京政府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接触，谈判国共两党联合抗日问题。这是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秘密接触谈判的开始。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三省，又入关南下，向我国内地扩张，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抗日反蒋运动出现了新高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处于前线的北平学生率先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并且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南京政府对日寇卖国投降和加紧内战的反动政策更加孤立。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深了英美和日本之间的矛盾，在国民党内部分代表英美帝国主义利益的英美派和亲日派进一步分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不得不改变对日本侵略的态度。当时，蒋介石了解到苏联是坚决支持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为了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借以遏制日本侵华势力，不得不表示准备与中共合作抗日，因此，在加紧围攻陕北根据地的同时，又要与中共秘密接谈。蒋介石将这个重大而又秘密的任务交给陈立夫，陈立夫决定由曾养甫负责进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派劳工科长谌小岑寻找中共地下党组织。谌小岑通过左恭（地下党员）找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上海党组织派张子华为接谈代表^②。

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他在四马路的惠中旅社秘密会见特地从南京赶来的谌小岑。这是一次很不寻常的会见。五十年后，

^{①②}张子华干部履历表。

谌小岑回忆了这次会面：“我们对面坐下来，他答复我姓黄。缄默了几秒钟，我说明了来意，请他代为转达中共中央，派一位正式代表，同南京谈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答应说：‘愿为此事奔走。’”

“第二天，他来了，我们在一间清静的房间里谈了两个多小时，主要是他提出关于南京政府是否抗日的问题，由我答复。”

“黄君听了之后，再次表示他愿为此事奔走。第二天，他派了一个交通员来同我联系。交通员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印刷工人。”

“三天后，黄君来对我说，希望南京派一个人到陕北去。这天，曾养甫正好来上海，经考虑，我们一时派不出适当的人来，还是希望中共自己有人为此奔走。几天后，他来表示同意由他自己想办法，我就回南京去了”^①。

上海党组织鉴于张子华是宁夏人，又去陕北根据地巡视过，所以决定由他去一趟陕北，将南京政府要求谈判的意思及上海地下党的情况一并向党中央汇报，这一艰巨而有历史意义的使命落到了张子华的身上，这时他才二十一岁。

怎样才能进入被敌人严密封锁的陕北苏区呢？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上海党组织让张子华与受宋庆龄委托到陕北去的董健吾同行。董健吾即斯诺笔下的王牧师，曾是共产党员，这时是党的同情者。他曾是宋子文在圣约翰的同学，平素与宋庆龄有交往。宋庆龄为了推动抗日，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交给董健吾一封信^②，请他送到陕北。为了保障旅途的安全，宋庆龄于行

^①谌小岑：《周恩来给我一封信的原委》。

^②董健吾干部履历表。

前拿出一张由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签发的委任状，任命他为西北经济专员。地下党员徐汉光介绍张子华和董健吾相识，二人结伴而行，于一月上旬离开上海。但董健吾并不知道张子华的真正身份和陕北之行的目的^①。

张子华和董健吾到西安后，盘桓多日，找不到进苏区的办法，只好冒险走最后一条路，去找西北“剿共”副总司令张学良。张学良是东北军的统帅。他集国难家仇于一身，强烈要求抗日，由于在陕北连吃三个败仗，已认识到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已经在考虑是否与共产党、红军联合抗日的问题。他见到董健吾拿着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的委任状，知道了南京的意图，觉得可以更加放手地同共产党联系。当时，正值隆冬季节，大雪覆盖道路，无法通行。二月十九日，张学良与陕北电台联系以后，派自己的飞机，把董健吾和张子华送到东北军驻防的延安，并且命令延安守军派骑兵把他们护送到瓦窑堡。

二月二十七日，张子华和董健吾终于到达苏区首府瓦窑堡，受到秦邦宪、林伯渠、张云逸等的迎接。中央领导同志了解了南京各派对抗日的态度，知道蒋介石开始有了同红军实行某些妥协，准备反对日本侵略的动向，随即电告正在山西前线的毛泽东和彭德怀等人。三月四日，毛泽东、彭德怀回电提出和国民党谈判的五条原则：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

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

^①李坤：《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

五、内政和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这些原则将中共瓦窑堡会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具体化，成为国共两党接触、谈判的基础。

秦邦宪将这五条原则密写以后，交给董健吾回上海面交宋庆龄。董健吾南下以后，张子华东渡黄河，到山西省交口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汇报工作。中央对他的工作表示满意，决定派他为联络员。他回到瓦窑堡以后，学习了中央的指示精神，于四月十六日和冯雪峰一起离开瓦窑堡南下。从此，他来往于陕北、西安、南京，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奔走。

张子华和张学良交了朋友。他在西安时，常以“南京来的客人”的身份活动，既避开了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又使张学良从中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两党中央联系的情况，更加坚定了张学良联共抗日的决心。张学良常说：既然（国民党）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嘛。四月九日，张学良亲自到延安与周恩来举行秘密会谈，讨论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还就两军停战等问题达成协议。在国共两党秘密接谈过程中，东北军和红军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战斗。

（五）

四月底，张子华回到南京，同曾养甫会晤。他要求了解南京方面对联共抗日的具体办法，并希望得到文字方面的东西。五月下旬，张子华从谌小岑手中得到了陈立夫口授的四项条件：

一、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

二、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

三、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

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①。

张子华携带此件及覃振给林伯渠的信，星夜兼程，赶赴陕北。这时，红军东征凯旋，在延长一带休整，党中央正在大相寺开会。周恩来听了张子华的汇报后，欣然命笔，分别给张伯苓、谌小岑、时子周等人写信，表示欢迎国民党政策的转变，敦促他们促成此事，并邀曾养甫等人到陕北来共同“商讨大计”。这是张子华第二次陕北之行。

张子华携带周恩来和林伯渠的信回到南京，请谌小岑代为转送。为了试探国民党联共抗日的诚意，张子华提请谌小岑为他租一间房子，他要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在南京宣传抗日。由于这次谈判在国民党内绝对保密，蒋介石连身边的陈布雷都不让知道，因此，绝不允许共产党在南京公开活动。张子华再三交涉，表示一定要执行任务。曾养甫见劝阻无效，便令谌小岑把张子华关入监狱。张子华在狱中坚持斗争，用剪子剪断铁丝网要越狱。他在狱中还给张学良写信，请他帮助营救。上海党组织见张子华下落不明，也通过左恭向谌小岑要人。曾养甫见来硬的不行，便令谌小岑陪张子华回上海，再商合作一事^①。

在上海，张子华熟练地编了一份电报密码，要求谌小岑给

^①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

一个南京电台呼号，以便两党通过电台联系。谌小岑回去请示。曾养甫由于害怕由南京电台联系影响太大，给了汉口一个电台的呼号。同时，曾养甫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张子华带着密码及信件，于七月二十八日赶到党中央所在地——保安。这是他为国共合作第三次陕北之行。

中共中央对两党接谈情况十分重视。中央研究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对“最后关头”的解释是：“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蒋介石对抗日态度的进一步明确同两党接谈的情况是一致的。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发布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信中指出：“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手中。”我们早已准备派出代表同贵党代表一起，“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周恩来也于八月三十日给曾养甫写了回信。

九月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党内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同时，“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

同日，周恩来给陈果夫、陈立夫写信，希望他们向蒋介石“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并说，我方“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

九月二十日，张子华携带中共中央及周恩来的信件到达广州。当时，南京政府刚刚解决了两广事件，调曾养甫任广州市

长，陈立夫也到广东，正在外县视察。张子华将周恩来致二陈和曾养甫的信交给谌小岑，二十七日 and 曾养甫会晤，曾养甫告之，国民党方面的条件是：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同国军；三、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曾养甫还具体提出请周恩来来到广州或香港见面，并拿出为周恩来准备的护照，请张子华速回陕北。这是张子华第四次陕北之行。

第二天，张子华发电向中央报告了曾养甫邀请周恩来谈判的建议，并动身赶回西安，详细电告了国民党的四项谈判条件。十月八日，中共中央表示：为了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周恩来可以飞广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不再进攻红军，必须在行动上确实停止内战，准备抗日。事实上，国民党不但没有停止内战，反而认为两广事变已经解决，可以倾全部力量一举消灭红军，再用政治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变本加厉地围攻陕北根据地，两党高级代表谈判条件仍不成熟。中共中央于十月十四日决定周恩来暂不去广州，先由潘汉年做初步谈判。十七日得知蒋介石飞到西安，为了再做一次努力，电令张子华在西安交涉派飞机来接周恩来来西安谈判。因蒋已决心消灭红军，交涉未获结果。十月二十一日，中央将十四日的决定通知张子华，由张子华转告曾养甫、陈立夫。

张子华完成了和国民党联络的任务，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回到保安。中共中央肯定了他的工作成绩，任命他为中央统战部联络局副局长^①。

^①张子华干部履历表。

(六)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子华随周恩来于十四日离开保安，前往西安。十六日路经延安时，国民党的民团不借路，张子华拿着周恩来手书的便条，再次以“南京来的客人”身份同警卫员邱南章进城交涉。他向延安县长晓以大义，陈述利害，请他为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赶赴西安提供方便。县长赶忙随他们一同到机场，保证周恩来一行人顺利离开延安。十七日下午，张子华随周副主席到了西安。从此他以周副主席秘书、八路军总部参谋身份在西安进行统战工作^①。

张子华在西安同宁夏驻西安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他主动拜访宁夏省政府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柴成霖，会见到西安的宁夏党政要员。而且，热情接待老同学、老朋友和进步青年，鼓励他们为抗日做贡献，还介绍一些进步青年到延安抗大学习。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侵略者沿平绥线长驱直入，在包头扶持蒙奸、回奸，在阿拉善旗设特务机关，修飞机场，宁夏面临日军侵略的危险。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宁夏工作。一九三七年秋，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取得马鸿逵同意，决定派代表谈判边界和释放红军被俘人员问题。九月间，张子华任谈判代表，与柴成霖乘飞机到达宁夏省会银川。

张子华以八路军总部代表到宁夏来，马鸿逵不得不应付，但他内心却打着一套狠毒的算盘。他完全知道张子华是当年在北平闹学潮，支持孙殿英打宁夏的共产党人，早就恨得咬牙切切

^①张子华干部履历表。

齿了。他阴谋扣留张子华，派便衣监视了张子华住的银川饭店和王含章公馆。

张子华在银川住了四天，与马鸿逵谈判两次，当面递交了八路军总部的信件，要求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和释放红军被俘人员。马鸿逵只是说些表面应付的话，不谈实质问题。张子华见马鸿逵毫无诚意，就说：谈不成我就回去。马鸿逵蛮横无礼，随即说：“你那天走告诉我，我派车送！”

张子华发觉了马鸿逵扣留他的阴谋，但在马鸿逵严密控制下的银川城随便离开也不容易。他趁王含章不在宁夏之机，借口先回中宁老家看看，便找三婶黄清芳，请她派长工王德顺送他回中宁。就这样，他和警卫员一行三人离开了银川。

张子华回到家里住了三天，一家人都非常高兴。母亲只生他一个儿子，更是亲切万分，一次又一次地说，家里置了许多财产、房屋，这次回来不要走了，在家过荣华富贵的日子。张子华说：“我还没有看上你那些呢，你也不要置那么多了。有钱要多照顾自己的身体！”许多同学、亲友来看他，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他们为抗日做贡献，动员青年人到延安去学习。第四天晚上，他托人雇了一辆马车，从宁安堡直奔海源县干沟，在表哥张自箴的帮助下，顺利地通过了马鸿逵的防区。等马鸿逵发觉张子华失踪的时候，他早已翻越六盘山到达甘肃平凉八路军的接待站了^①。

张子华回到西安不久，曾在北平一起搞学生运动的同学阎延栋来找他，正好王含章路过西安，住在西京宾馆。王含章先动员阎延栋回宁夏，答应向马鸿逵推荐重用。随后，又把张子

^①访问王德顺、张宪文记录。

华和阎延栋邀到自己的房子里，以长辈身份劝说张子华脱离共产党。他说：“昨天我到你们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处长说，我们叔侄是两党，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说得我脸发红。我看你这些年跟着共产党也没有混出个啥名堂，宁夏工作、生活都好，我们家什么也不缺，还闹什么革命？东初（阎延栋的号）过去和你们一起，现在已决定回宁夏，我劝你离开这里，否则马主席、蒋公追究我串连共产党，全家跟着你受累。”张子华听了，反驳说：“离开这里，那才是笑话。你应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拿你的身份劝马鸿逵多做些有益于抗战的事。”^①一席话说得王含章哑口无言，叔侄不欢而散。

张子华在宁夏短短的十几天中，广泛接触宁夏各界人士，有不少过去在北平的老同学专程到银川来看他。他利用这个机会秘密联络国民党内部的爱国民主人士袁金璋等组成宁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小组^②，布置张致和、潘钟林在当地做抗日救亡工作。回到西安以后，他介绍中共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到宁夏找袁金璋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找到职业掩护，顺利地站稳脚跟，开展工作，使宁夏抗日救亡工作打开了新局面。当时，有不少宁夏进步青年以张子华为楷模，通过宁夏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到延安去，张子华家乡恩和堡一带先后去抗大、陕公学习的有十余人。从抗大回宁夏做地下工作的孟长友在回顾自己成长过程时写道：“张子华是我的导师”。抗日战争时期到边区参加工作的中宁籍干部张俊也说：我是由于张子华的影响才走上革命的道路^③。

①阎延栋的证明材料。

②《关于袁金璋同志的政治历史结论》，存中共宁夏区委统战部。

③访问于光谈话记录。

(七)

一九三八年一月，张子华到武汉，在中共代表团民政部担任文化组主任。二月调回延安，四月到抗大担任政治教员。

一九三九年九月，突然横祸飞来，有人说张子华在天津被捕时有叛变嫌疑，到宁夏谈判时有通敌嫌疑。当时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组织上决定对他进行隔离审查。但是，当时交通不便，地区分割，了解情况的同志远在千里之外，又无法派人到天津、银川等地调查，问题一时难以搞清。

张子华相信组织，在隔离期间，给党的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写信申诉，希望尽快做出结论。他曾托人给妻子李德贞送出一张照片，背面写：“赠给我们的孩子：延军”^①。他对革命事业始终是充满希望和信心的。但是，他隔离不久就身染肺病，不幸于一九四二年去世。终年只有二十八岁。

一九八三年九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张子华的历史做出了公正的结论，承认其党籍。一九八五年五月，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和银川市委召开会议为张子华恢复了名誉，在八里桥革命公墓安放了他的遗像。

^①王成福谈话记录。

李 白

王 正 玲

(一)

李白，一九一〇年五月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张坊区白石乡板溪村。幼名华初，参加红军后改名李朴、李白、化名李霞、李静安。

李白的父亲李荣德仅有七分六厘山岭薄地和一小栋棚屋，以贩纸为业。李白八岁时进本乡公祠小学读书，课余暇时，砍柴刈草，挑水做饭，乡亲们无不夸奖他是个聪明、懂事而又能干的孩子。

十三岁那年，李白因家庭无钱支付学费而辍学，父亲把他送到离家十多里远的“乾源裕染坊”当学徒。在这里辛勤劳动了一个月，老板给他的报酬只是几个理发钱。他一气之下，离开了“乾源裕染坊”。父亲又托人四处求情，把李白送入“太和昌染坊”。奴隶般的学徒生活，使他深感世道的不平。

一九二五年，在长沙求学的同乡王业柏、李元增、高福田等回到张坊，秘密建立共产党组织，宣传革命真理。李白顿觉空气清新，精神振奋。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工农大众要翻身解放，只有跟着共产党起来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统治。在北伐战争的推动下，湖南各地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斗争的浪潮震动着李白热血沸腾的心。他积极参加农民协会和儿童团，冲进土豪劣绅的宅楼深院，贴标语、烧地契、罚钱粮。

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老财吓得跪在地上磕头求饶，李白感受到人民大众组织起来的伟大力量，斗争劲头更足了。经过革命思想熏陶和实际斗争锻炼，他政治上日渐成熟，当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张坊区的王业柏等许多共产党人惨遭杀戮。在这风云突变，形势逆转的严峻时刻，李白毫不动摇，坚持革命，矢志不移。九月，他参加了毛泽东发动的湘赣边秋收起义。是年冬，张启龙、王首道、李元增等在张坊进行恢复党的组织，建立农民武装的工作。李白冒着生命危险，走村串户，风尘仆仆地在张坊山区往来奔波，动员了许多青年参加农民赤卫军。翌年七月，赤卫军配合红军夜袭张坊，获得了武装暴动的胜利，张坊又掀起革命热潮，李白受青少年的拥戴，担任了少年先锋队队长。他带领少先队员为乡苏维埃政府站岗放哨，替红军家属挑水送柴，还指挥队员们操练、唱歌。张坊山区呈现着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

一九三〇年八月，县苏维埃政府向赤卫军发出配合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的紧急动员令。李白闻讯后即扛起梭标，来不及向家人告别，跟随着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去战斗。由于长沙守敌工事坚固，敌我力量悬殊，红军屡攻不克，遂移师江西。农民赤卫军回到浏阳，李白等二百多名青年急切地到县委提出参加红军的要求，县委很快把这二百多人组成学兵连。学兵连沿着红军走过的路线跋涉数百里，赶上了红军队伍。李白从此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涯。

（二）

李白参加红军后，被分配在红军第四军做宣传员，随部征

战在赣南、闽西广大地区。

红军在粉碎蒋介石第一次反革命“围剿”的战斗中，先后缴获张辉瓒师和谭道源师一部半电台，总部决定利用这一部半电台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讯，并决定举办无线电训练班，培养技术人才。为此命令各军选派人员参加。训练班条件简陋，但教员王诤和刘寅自己动手，自编讲义，克服困难。不到六个月就培养出了第一批报务员。一九三一年六月，红四军党委选送李白去总部参加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从此，他与无线电通讯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宁都暴动。暴动后，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中央军委抽调一批干部到红五军团工作。其中何长工调到董振堂为军长的十三军任政委。李白这时正从训练班毕业，被调任十三军无线电队政委。十三军无线电队技术力量较强，但尚存旧军队作风。李白到任后，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要求干部和战士，同时注意工作方法。当时十三军报务员靳子云回忆说：“别看李政委长得一米八的大个，心可细着呢。战士的鞋破了，他把打好的草鞋悄悄地塞进了战士的背包；战士病了，他端水送药，嘘寒问暖；他到无线电队不久，就和大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赢得了‘老婆婆’的称号”。在李白的言传身教下，无线电队成为一支英勇善战、屡立战功的通讯队伍。

第四次反“围剿”时，有一次五军团在枫山坡与数倍于我的敌军突然遭遇，处在腹背受敌的险境之中。任军团部无线电队政委的李白，命令报务员从速架机向总部报告。但是，弹密如雨，电台无法安装。李白察看了一下地形，向监护排把手一挥：“跟我来！”监护排随着他的话音，冒着呼啸的子弹，一

口气冲到数百米远的地方，与敌展开顽强的阻击战。报务员趁势架起电台，把敌情及时地报告给总部。总部立即向一、三军团发出增援五军团、火速向枫山坡进军的电令。这消息传到了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士气振奋，愈战愈勇。当一、三军团援军赶到后，五军团指战员就象一只只猛虎冲入敌群之中，霎时间，把敌人打得溃不成军，横尸遍野。在这次战斗中，李白显示出了一个红军指挥员沉着、果敢的才能，保证了联络的畅通和战斗的胜利，受到总部的嘉奖。

长征中，五军团是全军的后卫，任务艰巨。由报务员、机务员、运输班、监护班一百多人组成的无线电队，带着收发机、充电机、汽油、蓄电瓶等器械，行动更是困难。李白与战士们一起徒步行军，上级给了他一匹马，他从来不骑，专门用来驮机器或给病号骑。他提出“电台重于生命”的口号，带领大家克服一个个困难，每到宿营地，立即安机架线，收发电报。并以一个普通报务员的身份参加守台值班。

三月下旬，担负钳制敌人任务的五军团驻在赤水河边的茅台一带。为防空袭，无线电队驻在茅台村外的半山坡中。一天午后，报务员在草屋子里发着电报，忽然，两架敌机出现在空中。“快！快进防空壕！”李白急促地命令着，和战友们一个个跳进防空壕。这时，李白突然望见草屋门口还竖着两根孤零零的天线杆：“糟糕！”他跃身而起，似离弦之箭飞奔到草屋门前，对准天线杆猛踢两脚。敌机向他俯冲过来，并扔下两颗炸弹。炸弹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爆炸了，顿时，烟雾弥漫，尘土飞扬。“政委！”战友们都失声惊叫起来。李白仆卧在地，向战友们摆摆手，示意不要暴露目标。然后向防空壕匍匐前进。敌机仍在空中“嗡嗡”轰鸣，还在扩大盘旋范围，继续向地面

扔炸弹，这对驻在茅台村内许多友邻部队是极大的威胁。山顶防空哨开始向敌机射击，李白也跑到山顶哨位，他架起机枪，瞄准敌机射击，一架敌机被击中，拖着长长的黑烟倒栽在山沟里。另一架敌机见势不妙赶快逃命。

六月，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理县、懋功地区会师后，筹集粮食准备过草地北上。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不足，部队发生了粮荒。李白带领无线电队进山打猎，来到一座人迹罕至的大山坳里。这里有木耳、蘑菇及其它野菜，不到半天工夫，大家就采摘了满满几大兜，并打到了一头似鹿非鹿、似牛非牛的动物。经李白建议，大家把满满两担肉送到附近第二战伤医院。伤员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在粮食奇缺的情况下，这两担肉包含着多么深厚的阶级情谊啊！

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以后，红一、四方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进入草地。五军团为左路军的前卫，九月初抵墨洼附近，如果再过噶曲河，很快就能与右路军会合。可是，左路军总部却突然下令返回阿坝。为什么要重返草地？为什么不跟党中央一起北上？大家的心头聚集起疑云。四方面军中一部分人受张国焘的煽动和蒙骗，对一方面军的人进行辱骂，战士们心中都窝着一股子火。李白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对大家说：“目前的情况十分反常，原因也许很复杂，相信历史会作出公论。情况越是复杂越是要头脑清醒，要加强团结，防止涣散。”张国焘又对五军团进行了所谓“改造”，调走许多优秀干部，同时将无线电队全部人马调到三十一军，李白和周维分别担任电台政委和台长（四方面军的通讯编制为“台”）。接着，张国焘又另立中央，自称主席，擅自下令向川康边境退却。饥饿、劳累、愤懑，终使李白病倒在芦山。连日高烧折磨得他面容憔悴。

悴，力不能支。战友们要送他去治疗，他那布满血丝的眼睛深情地望着大家，说：“我离不开电台，也离不开你们。特别是现在，我更一步也离不开呵！革命这许多年了，什么苦我都能吃，这点病又算得了什么呢？”寥寥数语，辞切意诚，体现出一个共产党人在危难之中坚定的革命意志。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在朱德、贺龙、任弼时等广大指战员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的阴谋败露了。十月，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到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后，李白调任四军电台台长。

（三）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决定派遣李白到南京建立电台，担任报务工作。在中央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云阳镇，军委三局局长王诤与他长夜竟谈，殷殷叮嘱。李白也深感任务艰巨，决心要象圣洁的荷花，出污泥而不染，坚定地履行党所赋予的崇高职责。王诤陪送他乘卡车到达西安。当时秦邦宪（博古）正在西安即将启程去南京配合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李白便与他一起乘火车抵南京。由于国民党有关方面的阻挠，党中央这次在南京设立公开通讯电台的计划未能实现。李白又奉中央之命到上海从事与党中央的秘密通报工作。十月十日，李白乘火车到达上海，化名李霞，住在新闻旅社，等待前来接头的同志。由于地下工作的特点，电台的报务员、机务员和译电员均由交通员单线联系，并且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当时与延安通讯电台的报务员是田保洪，朱志良担任译电工作，涂作潮负责电台的修理。李白到上海后，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

任李克农和秘书长刘少文指派田保洪、涂作潮和交通员王少春分别到新闻旅社“会客”。李白见到自己的同志非常高兴。李白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紧紧地握着“客人”的手，悄声说：“我只盼望能早日工作，在这里简直是度日如年哪！”

然而，在上海建立一个电台并非轻而易举之事。由于各电讯材料商店对器材的严格控制，涂作潮组装电台所需的零件就不便在商店公开购买，只能通过其它渠道一点一点地积累。此外，寻找一处地点恰当、邻舍可靠的设台房屋也极不容易。上海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八一三沪战以后，“租界”以外地区屡遭日寇轰炸，市民纷纷涌入“租界”，致使房屋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党组织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出资租下位于法租界霞飞路（现淮海中路）贝勒路（现黄陂南路）口上的三层楼房，门牌148号。房子的问题解决了，还须找一个家庭作掩护。李克农有一位同乡朋友单志伊，为人正直，同情革命，其儿子是个医生。党组织遂决定由这个家庭来掩护电台。底楼作为诊所，二楼为单家住房，李白住在三楼设置电台。电台设在这里，论环境并不理想，繁华的霞飞路人来车往，噪声不绝于耳，附近还有嵩山法国巡捕房。但在这寸金之地的上海，很难找到十分理想的房子，李白就在这里栖下身来，执行党交给的任务。

过惯了戎马生活的李白初居都市，恍如踏进一个陌生的世界。他与十里洋场上灯红酒绿格格不入；反动军警遍地、捕房林立，使他的心中充满无限愤慨。为了李白和电台的安全，在建台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况下，组织上交给李白的任务就是熟悉并适应社会环境。十一月初，上海除英法势力控制的“租界”外，其余地界均被日军占领，“八路军办事处”随即迁址转入

秘密活动，李克农奉命离开上海，电台的领导工作由刘少文担任。在“八办”迁移期间，随刘少文身边工作的译电员朱志良到李白住所待了十多天。他们一起分析形势，李白情绪激动地说：“我的战友都在前方流血战斗，可是我却在这里过着安逸的生活，我的心不安哪！”他坚持每天抄收新华社电讯，以熟练抄报技术，为电台的建立作积极准备。

一九三八年初春，建台工作就绪。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马路上停息了喧闹的声浪，李白拉上窗帘，把收发报机搬到写字桌上，接上电源，戴好耳机，轻轻地按动电键，向延安发出了呼号。少顷，他一边慢慢地转动刻度盘，一边全神贯注地谛听着延安的呼号。当他从“嘶嘶”的电流声中分辨出延安的信号时，就象听到了母亲的亲切呼唤，心中充满了无比的喜悦。

电台具有迅速、准确和使用灵活的特点，但也有它的弱点。通报的时候，有灯光和电键声音，电波感应还会引起附近居民的电灯忽明忽暗。使用大功率电台这些现象显得更为严重。为了减轻这些现象的严重程度，涂作潮把发报机的功率由原来七十五瓦降低为三十瓦。但是，功率小发出的电波微弱，上海与延安遥距两千多公里，电波经过关山阻隔和空中各种电波的干扰，传到延安就微弱得几乎消失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和涂作潮一起反复琢磨、试验，终于摸索出时间、波长、天线三者之间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的规律，选择在人们都已入睡、空中干扰和敌人侦探相对减少的零点至四点之间为通报时间。从此，当人们酣然进入了梦乡，李白却悄悄地起床，轻轻地安好机器，静静地坐在电台旁，把二十五瓦的灯泡拧下换上五瓦的灯泡，并在灯泡外面蒙一块黑布，再取一小纸片

贴在电键接触点上，这样就能避免光线透出窗外和不使声音外扬。零点一到，他首先向延安发出呼号。延安收到他的信号，也马上发来呼号。接着“77”、“88”表示亲切友好的符号通过电波互相传送，把两颗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上海和延安之间架设起了一座“空中桥梁”。

电台担负着传达党中央指示，汇报党在上海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地方党组织的情况和潘汉年领导的情报部门收集到的日、蒋、汪以及英、美、法各方面的情报。李白这部电台建立后不久，田保洪因另有任务撤出上海，李白挑起了上海与中央通报的这副重担。

(四)

一九三九年二月，党中央派遣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广泛社会基础的龚饮冰接任电台领导工作。他以湖南万源湘绣庄总经理的公开身份到达上海。五月初，他的夫人王一知也到沪协助领导工作。根据新出现的一些情况，龚饮冰指示李白撤出贝勒路148号，另觅电台地点。李白时年三十，仍孑然一身，长此下去必然会引起敌人的怀疑。龚饮冰决定物色一位政治上可靠的女同志到电台来工作，表面上与李白扮作“夫妻”以应付环境、保护电台。龚饮冰和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人马纯古、张棋一同研究后，把这个任务交给共产党员、锦孙绸厂青年女工裘惠英^①。不久，李白和裘惠英住进蒲石路（现长乐路）蒲石村

^①裘慧英原名裘兰芬，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入党，调到电台工作后改名裘慧英。

18号底楼一个房间。蒲石村地处法租界，环境幽静。按照当地居民的经济水平，组织上为他们购置了几件普通的家俱，把房间布置得大方得体，既不寒碜，也不浮华。龚饮冰夫妇和朱志良等故意赶来“贺喜”。果然，邻居们都信以为真，见面就招呼“李先生”、“李太太”。

李白对待同志和蔼可亲，有时又极其严厉。裘慧英初来电台时，见自己干的工作仅仅是买菜、做饭之类的家务活，很不甘心，想回工厂去。李白批评她说：“你怎能无组织纪律到这样程度！你忘了你是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声音很低，却似千斤重锤直敲在裘慧英的心上。沉默了一会，他又接着说：“党把电台交给我们，我们都要对党的事业负责”；“别看这工作单调，可每一个信号都与革命事业有关。所以，干这一行得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甘当无名英雄的精神才行。”一席话深深打动了裘慧英。翌日起，李白又利用空余时间教她学习报务。裘慧英因为自己文化水平低而产生了畏难情绪，李白就以当年训练班学员勤学苦练的事例鼓励她。裘慧英在他的影响下，对工作的意义有了认识，并逐渐产生了兴趣，有时还担负一些传递情报的交通工作。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电台的任务随之艰巨。每次通报，电文短则几百组字码，长的达数千组字码。盛夏溽暑，李白在门窗关闭的屋内工作，全身汗水涔涔。严冬苦寒，深夜室内的温度降到零度以下，工作完毕，全身已经冷得发麻，手指冻得红肿。裘慧英则时而站在窗前，时而又走到门边，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为了使交通员尽量少露面，白天，有时他和裘慧英一起装作散步，把密电送到等候在约定地点的交通员手中。就这样，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撰写的《放手发

动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团结到底》、《揭露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等许多重要文章和中央对沦陷区人民抗日斗争的具体指示以及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况迅速传达到上海；上海以及周围广大地区敌我双方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大量情报也源源不断地传到了延安。每当这时，李白和裘慧英常常沉浸在工作取得成功的幸福之中。他们配合默契，互相体贴，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产生了纯洁的爱情，一九四〇年秋，经党组织批准，他们结成伴侣。

通报工作日趋繁忙，这部由陈旧的零件拼凑安装起来的电台连续发生故障。李白具有娴熟的报务技术，但并不精通机务，当电台发生了较为复杂的故障，就不得不中断联络，这使他产生了学习机务的愿望。他郑重地向组织提出这一要求，得到了党组织领导人龚饮冰的赞许。党组织出资在威海卫路（现威海路）338号开设了一家福声无线电公司，由涂作潮当“老板”、李白做“帐房先生”，并从工厂抽调一个青年党员当“伙计”。“338号”有上下两层，两层中间有一个四平方米的亭子间。底层是“公司”，电台设在亭子间，李白夫妇和涂作潮一家分别住在楼上两个房间。他们同吃一锅饭，相处如同家人。然而，一到底楼，涂作潮就以“老板”的身份对李白“很不客气”。李白偶尔接错了线，他就大声责备。所以，周围的人谁也没有怀疑过这家“公司”。威海卫路与南京路相邻，“公司”以修理收音机为主，因收费比南京路上的同类商店低廉，生意十分兴隆。“公司”开张以后，顾客们把一只只收音机纷纷送来修理，李白真是如鱼得水。在涂作潮的指教下，他每天从早至晚，埋头坐在堆满了电阻、电容、变压

器等零件的桌子前，一边修理收音机，同时钻研电台的安装和修理技术。

一九四一年春，李白经过半年时间的学习和实践，已能十分熟练地安装并修理电台。党组织决定登报出租“公司”和楼上的两个房间，涂作潮遂撤出“338号”。因为设台地点没有落实，李白夫妇移居亭子间，电台继续设在这里。党组织便对承接“公司”的人员作了安排。所以，当出租启事一见报，康瑜第一个赶来表示愿意照价支付，“双方”立即办好手续。李白和康瑜分属两条组织关系，相互间无横的关系。但是，李白与他相识不久，就判断出他是自己人。李白严守纪律，始终不同他谈论党内的事情。两个人心照不宣，关系和睦。

(五)

一九四二年七月，李白夫妇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临时转移到福履理路（现建国西路）福祿村10号，这幢三层楼房系《新闻报》主编、爱国人士许彦飞出钱建造。许彦飞和龚饮冰早年在湖南一同办过进步报纸，过从甚密。因楼房上面有个不易被人发现的阁楼，龚饮冰把这幢房子租赁下来，给郑执中作建台处所。但是郑执中不久又离开上海去新四军，留下家属居住在这里。李白夫妇即以“客人”的名义，准备在此渡过夏天。

当时日军进占“租界”，大肆搜捕共产党人，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李白把电台的功率降低到只有十五瓦，但是，仍被日寇的无线电雷达测向仪侦测出来。阴历八月十四日夜晚，李白正在阁楼里发报，裘慧英在三楼的房间里。忽然听到有杂乱

的脚步声，急忙掀起一角窗帘张望，朦胧的月色下，几十个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正在翻越围墙。她快步上楼，对李白说：“不好，出事了！”李白以最快的速度把最后一段电文发完，又拍发三遍“再见”暗示远方的战友^①，接着迅速把发报机拆散，拉开一块活络地板，将它藏在下面，旋即抱着收音机（为收报所用）回到三楼。他刚把收音机放好，敌人就破门而入。他们翻箱倒柜，把物品扔得狼藉满地。然后又冲到阁楼上搜查。李白坐在房间里，心象上了弓的弦绷得紧紧的，但脸上却是若无其事的神色。突然，“哇”的一声，一块活络地板被踩踏！敌人捧着一堆零件发狂似地窜到李白面前：“这是什么？！”李白从容地答道：“我们是郑家客人，郑太太住院，我们才住到这里，没有见过这些东西。”一个狡猾的日本人拉起李白的手看了又看：“哼！你是老资格啦！”不由分说，把李白和裘慧英捆绑起来，押上早已停候在外面的汽车。

在黑沉沉的夜色中，汽车开到四川路桥北崇明路6号日本宪兵队本部，李白夫妇被分别关押在两个牢房。敌人对李白刑讯逼供、威胁利诱，没有效果。又施以苦肉计，在李白受刑的时候，把裘慧英也押来。李白被绑在老虎凳上，脚后跟加到第五块砖的时候，他的腿骨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豆大的汗珠从他的脸上一滴滴地落到地上。敌人咆哮着：“你给谁发报？是延安方面还是重庆方面？”李白从敌人的刑讯中分析出日寇并没有掌握实情。于是，敌人再逼问时，李白便说：“我的朋友是专做生意的，他给我钱，我用电台帮他了解商业行情，这个人全国各地到处跑，来去无定规。”敌人气急败坏，

^①袁以辉：《零点到了》，载《星火燎原》，战士出版社1980年第3期。

又用老虎钳拔去他的手指甲，接着又把电线绕在他的手上，当拉上电闸，李白顿感万把尖刀扎身，眼前一片昏黑。他竭力控制着自己的神经，未吐露半点实情。为了维护党的事业，李白将生死置之度外，忍受了一切野蛮酷刑，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坚强意志。

李白被关在7号牢房，裘慧英在1号牢房。每次提审，李白都必经1号牢房门口，他总是向裘慧英投以坚定的目光。一个月后，敌人释放了裘慧英。这时党正在千方百计地进行营救工作。张建石通过我党一位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利用其特殊关系，将李白先引渡到极司非尔路（现万航渡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以便再进一步利用关系营救。李白在“76号”仍然坚持“私人商业电台”的“口供”，而在这个人员复杂的国际都市里也确有各种私设的电台，这个案子成了“无头案”。按照当时的规定，“无头案”期满六个月而没有其它的证据就应释放，但是“76号”却提出以殷实的铺保和释放后不得离开上海、随时接受传讯为条件。有哪一家店铺愿为一个“囚犯”作保呢？裘慧英找到了许彦飞，请他帮忙。许彦飞找到一个朋友开设在漕家渡的酒店，以这家酒店做保，敌人释放了李白。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日，李白获释^①，因仍处于敌人的监视中，他无法立即恢复工作。他度过了八个月的狱中生活，已被折磨得形容枯槁，一到阴雨天，全身的伤痛使得他彻夜难眠。但是对于李白来说，不能为党工作而产生精神上的痛苦远比肉体上的痛苦还要难受。裘慧英安慰他说：“你这身体不好好调

^①李白1943年6月21日给父亲的信中说：“男前患病住院数月于旧历四月初七出院”意即获释，“旧历四月初七”即公历5月10日，信的原件存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养一阵也没法工作呀。”李白情绪激动地说：“慧英啊，敌人打断了我的筋骨，但是没有摧毁我的意志。想到敌人对我、对千千万万个中国人民的残暴，我更感到自己身上的工作责任。”一天，他收到龚饮冰托友人从重庆捎来的信，信中说：在上海如果生活有困难，可到四叔家去。暗示他到新四军去。李白忙打点行装准备启程。但是去新四军的交通均被敌人严密封锁，无法成行。

一九四四年秋，抗日战争处在大反攻的前夜，形势错综复杂，党的情报工作显得更为重要和艰巨。这时，李白的组织关系转到潘汉年领导的华中情报局。党组织安排他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利用敌人的电台为党工作。他化名李静安，偕同裘慧英一起离开上海。他往返于浙江的淳安、场口和江西的铅山之间，以公开的身份，用公开的电台，为党秘密传送了日、美、蒋方面大量的战略情报。

一九四五年春末，场口一带战事吃紧，他奉命离场口西撤淳安，带了一部电台乘一艘交通船，溯富春江而上。船刚刚抵达淳安，一群国民党兵就上船进行搜查，电台立时就被查出。敌人把枪口对准李白的胸膛逼问，李白神色不变，从容不迫地从衣袋里掏出证件。但敌人仍然连推带搡地把他扣押起来，但李白没有暴露真实身份。经地下党组织派人出面交涉，翌日，他重新获得自由。

(六)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依仗美国的力量，阴谋发动内战。在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的严重时刻，李白根据

党组织的命令，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与裘慧英回到上海，在张唯一的领导下，继续从事与党中央的秘密通报工作。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开展党的秘密工作，犹如在龙潭虎穴里进行战斗。曾经两度被捕的李白更清楚自己随时都有牺牲生命的危险，但是他毫不畏惧，英勇机智地战斗在党的情报通讯战线上。为了避免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他凭着精湛的无线电技术取得了善后总署救济复兴岛渔业管理处修理渔船电器设备的公开职业。电台设在黄渡路107弄6号，他一清早就出门挤上开往上海市区东北端复兴岛的汽车，干完八小时的活，回到家里已是黄昏时分，深夜，他一往如故又进行通报。为了尽量使电台不被敌人测出，他奇迹般地用仅有七瓦功率的电台保持着与中央的联络。过度的劳累使他的额头和眼角添上了几条与年龄不相称的深深的皱纹，原来穿着合身的长衫都明显的变大了，唯有那双敏锐的眼睛仍然灼灼有神。一九四六年的一个秋日，他在虹口公园附近忽然发现一张熟悉的脸，定睛一看，竟是王一知，不禁惊喜交集。他巡视了一下四周，然后迎上去，连声说：“好久不见，真想得慌！”王一知见他比过去瘦多了，关切地说：“你在狱中吃苦了，现在可要注意身体啊。”李白满不在乎地说：“我年纪轻，受点刑，没什么的。”接着他伸出手来说：“敌人把我的手指甲拔去了，可我现在不是照样用这双手工作么！”^①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电台从黄渡路107弄6号转移到15号三楼，楼下的住户是党的情报工作者潘子康、何复基夫妇。是年下半年，复兴岛渔业管理处大批裁退人员，李白亦被裁

^①见1980年《人物》第2辑王一知的文章。

退。从此，他失去了职业的掩护，内战爆发后的上海，国民党的统治日益黑暗，党为了积蓄力量，一大批干部陆续撤退上海，张唯一等也离开了上海，电台的领导工作交给了刘人寿（当时叫李清风）。

一九四八年秋，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为配合解放战争的开展，夺取全国胜利，战斗在敌人心里的情报人员获取了敌人大量军事情报，一份份标有“十万火急”、“万万火急”符号的密电连连转到李白手中。国民党特务密布，警车飞驰，上海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一天深夜，电台旁边的小灯泡突然熄灭，耳机里的信号也随之中断。李白掀开一角窗帘，窗外一片漆黑。略过几分钟，那只小灯泡又亮了，他继续工作起来，可是灯泡又熄灭了……。他的心猛然一沉：分区停电！凭着多年积累起来的经验，他知道自己已处在危机四伏之中。然而，他没有惧怕。国民党陆军的部署、序列，海军的各舰驻地，长江江防计划以及国民党空军少尉俞渤在共产党策动下驾机起义的计划等等，这一切都随着李白发出的无数道电波飞往中央。

李白预感到自己难免被捕，为了不致在再入魔掌以后中断上海和中央的联络，他向刘人寿郑重提出建立预备电台的建议。刘人寿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表示赞同。李白即承担了收报机的组装工作。十一月中旬，收、发报机配备齐全，电台进入了调试阶段，李白亲临预备电台地点协助报务员排除故障。然而，由于北平我地下电台为敌破获，报务员叛变并受敌派遣到上海侦测我地下电台，正当预备电台即将进行正式通报之时，李白的电台被侦破了。那是十二月三十日凌晨，天低云暗，北风呼啸。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二大队出动几

个人埋伏在李白住所周围。两点半，敌人开始挨家挨户的搜查。裘慧英感到情况异常，急催李白收藏机器！李白一怔，但他马上又埋下头去，把最后几组电文发完，随即撕碎了电文底稿扔入厕所。这时，敌人已在敲门。住在楼下的潘子康故意拖延时间，李白迅速地拆除天线，收藏机器。这一切刚刚安排停顿，楼下门开了，敌人兵分两路，对这两户人家同时搜查。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摸摸床上的被窝，发现没有一丝热气，接着就去摸放在桌上的收音机。立刻狂叫：“啊！热的！你深更半夜的干什么？”

“我有失眠症，睡不着觉听听广播，”李白不慌不忙地回答。敌人立即动手严密搜查。藏在壁橱里的那只装有电器零件的肥皂木箱被查了出来。敌人厉声逼问，李白神色沉静，说：“我过去是电器修理工，现在失职在家，帮着私人修修收音机。”当敌人发现这一堆零件里有一只亮光光的电键时，不由分说对准李白拳打脚踢，血，从他的鼻孔涌流出来。李白又被逮捕。

敌人将李白押到四川北路警备司令部稽查第二大队，对他连续刑讯逼供三十多个小时，李白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敌人见刑具摧毁不了他的意志，又将他的妻子和儿子抓来诱供。但是，这一招又失败了。三十一日，李白被押到威海卫路稽查大队部；一九四九年二月四日，被解至黄渡略警备司令部；四月二十二日又解至蓬莱路警察局。这天晚上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第二天托人带出来，信中写道：“听说这里每逢星期一、五上午九至十时、下午三至四时可以送东西……我在这里一切自知保重，尽可放心。家庭困苦，望你善自料理，并好好抚养小孩”。裘慧英得信后，带着儿子去探望，见李白脸色苍白，由两个难友搀扶着，而那沉静的神情、和悦的目光宛如平日。

在狱中，李白把妻子送来的菜分给难友们吃，鼓励大家坚持到胜利的一天。五月七日，他对妻子说：“天快亮了，事到如今，对个人的安危，不必太重视。”儿子张开双手喊叫：“爸爸，抱抱我！”李白用爱抚的眼光看着他，说：“乖孩子，爸爸以后会来抱你的。”这时，解放大军正挥戈南下，上海就要回到人民的手中。蒋介石在行将灭亡之时，更加疯狂地举起屠刀，对李白案亲批“坚不吐实，处以极刑”。五月七日深夜，李白被秘密枪杀在浦东戚家庙。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了！八月二十八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市总工会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纪念李白烈士。刘长胜、潘汉年、张祺、刘少文分别致词，高度赞扬了烈士的崇高革命精神。

作者附记：

本文写作过程中访问过裘慧英、曾三、刘寅、江文、王子纲、涂作潮、王一知、朱志良、黄良成、梁茂成、黄萍、靳子云、邹毕兆、刘继山、邓国军、沈安娜、张建良、刘人寿、黄景荷、许彦飞、侯德华、谈宗安、陈建邦等同志；参阅了中央有关文件、烈士生前家信、浏阳县档案馆革命斗争史资料、黄良成回忆录、《忆长征》、裘慧英、周维、王一知、袁以辉、刘人寿等人的回忆文章。

沙文汉

姜沛南

沙文汉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和领导过宁波和上海的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曾任中共奉化区委书记，上海法南区团委书记，团江苏省委工人部部长。二十年代末去苏联留学，三十年代前期又流亡日本参加革命活动。回国后积极参与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和重建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历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华中分局城工部部长，上海局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等职。解放以后，主要在浙江省担任党政领导工作，曾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四年十二月起任浙江省省长。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一九六四年一月二日在杭州含冤病故，一九八二年彻底平反昭雪。

(一)

沙文汉原名沙文沅，字文舒，又名陈元阳、陈叔温、张登等。一九〇八年一月二十四日生于浙江省宁波府鄞县大咸乡（今塘溪乡）沙村。祖父沙忠禧，有田三十余亩，竹木山六、七块，瓦房七间。文汉出生时祖父已病故，家道逐渐中落。父亲沙孝能，业中医，体弱多病。文汉七岁丧父，兄弟五人由母

亲陈龄辛勤抚育，家中生计艰难。在五兄弟中，沙文汉居三；大哥沙孟海，著名书法家；二哥沙文求，广州暴动后牺牲的烈士；四弟沙方威（又名史永）和五弟沙季同，均为共产党员，五弟一九四二年已在延安病逝。

沙文汉六岁进本村梅溪小学，课余即帮助家中做杂活，读了四年就辍学种田。这时，他家中负债累累，每到年关逼债者盈门，母亲无法应付，时常叹气垂泪。这种愁苦的情景，给天真幼稚的沙文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感到世道不公，金钱的势力太可恶，心中愤愤不平。

沙文汉受父亲和大哥的影响，自幼爱读古诗文，尤其爱读史书和古典小说，如《史记》、《左传》、《水浒》、《三国演义》等。他对屈原、司马迁等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非常崇敬，对民间传说中的侠义人物也很景仰；而对那些横行乡里、欺凌弱小的土豪劣绅和流氓恶棍，则比作历史上奸佞邪恶之徒，十分仇视。十二岁那年，他立志要做一个抑强扶弱、除暴救世的英杰，为此写了《言志》一文，送请小学老师批阅，老师大加赞赏，并对他母亲说：“此儿非凡”^①。

五四运动对少年沙文汉也有一定影响。那年，宁波城里的一些学生，组成宣传队到乡下来演讲，发传单，揭露外国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野心。这些宣传使沙文汉感到触目惊心，诱发了他的爱国思想。

在将近五年的农夫生涯中，沙文汉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更深刻体会到劳动人民生活的痛苦与被压迫被剥削的状况。为了实现除暴救世的志愿，他渴望到外边去见世面、学本领。十五

^①《张登自传》（1944年8月），手写本。

岁那年，他二哥沙文求已入宁波效实中学读书，力主文汉也去宁波学习新知识。母亲变卖了部分田产，又得大哥孟海（已当教师）的资助，沙文汉得以继续求学。

一九二二年夏，沙文汉离开山村，考进了不收学费的宁波第四师范，半年后又转学到甲种商业学校。他勤奋学习文化知识，课余爱好习字作画，并注意锻炼体魄和毅力。他与一般同学都能友好相处，但有少数富家子弟仗势欺人，讥讽他是乡下来的“小黑炭”，使他很生气，忍不住要动手反击，为此受到老师的批评。二哥文求劝告他，胸有大志的人不应为小事动怒。他承认自己的火气太大，决心改掉这个毛病。有几次火气上升实在压不住，他就躲到厕所里别人看不到的地方，面壁而立，等火气渐平再跑出来，如此反复锻炼，逐步养成了能够“纳火”（宁波方言，意即制怒）的习惯，遇事不冲动，能冷静思考。

当时，中国共产党已同国民党实行合作，结成反帝反封建军阀的联合战线。一九二四年初，宁波城里也秘密成立了共产党支部，党办的《向导》和《中国青年》等刊物，已在进步师生中广为流传。在二哥的帮助下，沙文汉成为这些革命刊物的热心读者。经过认真阅读和思索，他逐渐懂得人世间的不平，根源在于阶级的不平等，只有推翻国内外反动派的反动统治，劳动人民才能得到幸福和自由。此后，他留心寻找共产党的秘密组织，认为既要革命，就应该参加这个最革命的党。

一九二五年四月，沙文汉由甲商同学倪毓水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上海地委派到宁波指导学生运动的贺威圣，主持了沙文汉的入党宣誓仪式。从这时开始，他“原先的英雄改造世界的观念，就慢慢地改变了，觉得英雄不是个人，而

应是群众。”^①

沙文汉入党不久，上海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宁波学生迅速响应，全市各中学一律罢课，并组织了宁波学生联合会。沙文汉革命热情高涨，带头参加爱国运动。这时他二哥已去上海大学读书，四弟文威在宁波四中上学。他们兄弟数人在反帝运动中相互激励，共同前进。沙文汉经常带领同学参加示威游行和纪念大会，发动同学进行街头宣传，募款支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总罢工，组织同学检查抵制英货日货，并揭露军阀奸商及国家主义派分子对反帝运动的破坏，等等。

五卅运动后，宁波士绅勾结军阀官僚压迫革命活动。为了便于工作，沙文汉遵照党的指示，参加了国民党，耐心细致地在青年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以推动反帝反军阀的人民革命事业向前发展。

(二)

一九二六年夏，沙文汉在宁波甲种商业学校毕业，主动要求中共宁波地委派他回家乡从事农民运动。在此以前，他大哥曾托人在青岛明华银行替他找了一个“金饭碗”，但他谢绝了这份美差，不去银行当职员，宁愿到乡下过艰苦的生活。这是他入党后，决心成为职业革命家的开端。

当时北伐战争已经打响。在共产党的发动和领导下，各地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全国处在大革命的热潮中。沙文求已在沙村农民中活动了半年，发起组织农民协会，建立了沙村第一

^① 《张登自传》（1944年8月）。

个党支部。以后，经中共宁波地委批准，沙文求去革命策源地广州学习，由沙文汉继任沙村党支部书记，领导本乡的农民运动。

沙文汉深入群众，进行宣传组织活动。一，反对官府横征暴敛；二，破除封建迷信；三，抵制和打击恶棍流氓对农民的敲诈勒索；四，发动更多的农民加入农民协会，把农民协会从沙村扩展到整个大咸乡，增强斗争力量^①。

同年十月中旬，军阀孙传芳属下的浙江省省长夏超倒戈，归附北伐军，被孙传芳发兵打败。孙部进占杭州，对革命群众运动严加镇压，中共杭州地委书记贺威圣惨遭杀害。沙文汉不得已暂时避往镇海一个朋友家，月余始返回，继续农运工作。这时年轻的沙文汉开始感到革命斗争的曲折艰难，十二月间他写信给二哥文求，附去七言诗一首：

要路多从险处争；
一波未平一波生，
几时曾见大江平！
百折千回流到海。

诗中抒发了他坚持革命不回头的豪情壮志。沙文求极为赞赏，将此诗抄寄给沙孟海说：“他的深思远虑的气概，于此可见一斑。”

正在革命运动蓬勃高涨之际，占领江浙地区不久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背叛革命，突然在上海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政变。

^① 《沙村座谈会纪要》（1984年3月7日）。

在宁波，蒋介石的爪牙于四月九日就动手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捣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党部，封闭总工会和学生会等革命团体，并在农村封闭农民协会。沙文汉亦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

四月十一日，沙文汉在宁波城里同地委领导人讨论如何对付农村的反动豪绅问题。城里的风声很紧，会议一结束，他立即下乡，刚走出城门就被国民党哨兵拦住盘问。幸好他扮成小贩模样，托言下乡贩货，哨兵查不出什么，才给他放行。他奔回沙村，分头通知共产党员和农会骨干，暂时离家隐蔽。他自己也转移到上海避难。这时有一个姓施的劣绅，勾结地方军警和披着袈裟的大地主，向农会发动进攻。他们首先打进设在邹溪庙的大咸乡农会会所，把驻会工作未及撤离的沙季同捕去，接着又冲进沙林，捣毁了沙文汉的老家。反动劣绅派人威胁沙母说：“如不交出沙文汉，就杀掉老五沙季同！”沙母很坚强，答称：“我有五个儿子，他杀掉我一个，还有四个会跟他拼命，看他敢不敢，”^①后经人说情，才把沙季同释放。在风声鹤唳中，沙母已无法在家乡安居，只得把山上的树木卖掉，带领全家老小避往上海，苦度颠沛流离的生活。过了很久，一家人才返回故乡。

对于背信弃义的国民党反革命派，沙文汉愤恨到极点。他说：“他们昨天还讲革命，今天就镇压群众了。天下之不义与无耻，我觉得再没有象国民党反动派那样的了！”^②他没有悲观，没有动摇，只有愤怒与反抗。不久，他冒着生命危险潜回家乡，跟反革命派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拚搏。

^①沙孟海：《一个革命家庭的母亲——陈龄》，未刊稿。

^②《张登白传》（1944年8月）。

(三)

一九二七年八、九月间，沙文汉遵照中共浙江省委的通知，重返宁波工作，担任中共宁波市监察委员，兼管东乡的农民运动。随后省委根据中央关于“浙江省委应马上准备一个广大的农民暴动”的指示，于十一月初制订了《浙东暴动计划》，提出暴动目标——夺取浙东要地政权，开始土地革命；规定暴动的区域和各地指挥机构以及进行步骤等等。奉化忠义区和鄞县大咸乡被列为暴动重点，并于十一月下旬成立中共奉化区委，派沙文汉为区委书记，卓兰芳为省委特派员，指导奉化暴动^①。沙文汉接到命令，连夜潜回故乡。他和卓兰芳分头收集和整理旧部，恢复各村党组织和农民协会，重建农民武装，准备年关暴动。由于国民党军警和土豪劣绅严密控制，沙文汉等冒着极大的危险，昼伏夜出，艰苦奋斗近两月，才组织了一千多农民，收集了二十多支短枪和几十支土枪，编成了农军，准备了标语、传单，预定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召开会议，研究决定暴动日期及行动大纲^②。

不料暴动消息泄露。一月三日那天，反动派先发制人，派军警突然冲进罗浦，破坏农会机关二处，捕去区委委员舒定山^③和农民十人。暴动还没开始就遭到了挫折。

这时，中共浙江省委机关已迁到宁波，省委书记夏曦等深恐鄞奉地区因遭受打击而停止暴动，接连写信催促提早发动，

^{①②}汪成法等：《奉化暴动》，载《浙江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第3期。

^③据史永来信（1985年8月4日），舒被捕后死于狱中。

并派省委委员沈本厚到忠义区松岙督战^①。卓兰芳、沙文汉明知力量不足，要占领奉化城很不容易，但省委坚持认为：“群众与枪械，只要暴动起来都可有办法的。”^②沙文汉等只得遵照省委的指示办理。一月八日晚上，区委在松岙召开会议，通过了行动大纲，决定次日发动农军骨干和松岙全体党员，先解决驻在马头村的省防军（有二三十支枪），同时发动鄞县大咸乡的沙村、周村、罗浦和奉化忠义区的湖头渡、五百岙、松岙、马头、即象山港沿岸一带各村的农民群众一齐动作，夺取奉化县城^③。

一月九日上午，卓兰芳、沙文汉派人把行动大纲分头送往各村党支部，可是大咸乡三个支部和奉化马头村支部负责人均找不到。晚上在松岙开会仅到二十余人，只占应到人数的一半。大家感到力量太小，不能突然行动，决定第二天下午先把松岙附近几个小村的群众发动起来，多收集些武器，然后到松岙汇合，举行暴动。

一月十日下午，农军干部卓阿德带领农军二十余人，在湖头渡一带率先起事。他们手拿长矛、大刀和土枪，扛着红旗，臂缠红布袖章，高喊“打倒国民党反动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从湖头渡到罗浦、五百岙巡行了一圈，沿途批斗豪绅，烧毁他们的田契和房屋，砸了宗祠和寺庙。可是其它各村农民都没有发动起来。这时谣传四起，说城里已派出大批军队到海边来镇压，因而人心惶惶，群众纷纷走避。至此，暴动计划完全落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区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停止暴动，农民武装分散隐蔽。省委和区委的领导人也分头

①③汪成法等：《奉化暴动》。

②《张登自传》（1944年8月）。

撤出敌人的封锁线^①。沙文汉在松岙附近的山上被围了几天，幸得两位农民帮助，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摸到海边，乘小舟出象山港至镇海，借宿在一个中学同学家里，然后从镇海秘密登轮，得以脱险到上海。国民党反革命派再次悬赏缉拿沙文汉，並到沙村搜捕，幸家人早已逃散，未遭毒手^②。

奉化暴动以失败告终。这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左”倾盲动的产物。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在一九二九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时（驻莫斯科），曾接见沙文汉，谈到奉化暴动的失败，他自我批评说：“这是一次典型的盲动主义，我要负责。”^③沙文汉也承认自己的错误：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而“过高地估计了当时群众的条件和浙江的革命形势……实际上我们是只应组织农民打游击战争，而不应企图大规模的暴动。”^④

沙文汉后来回顾总结他参加领导奉化暴动时的思想情绪说：“当时我总觉得我可以死，但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的地主资本家决不可让他们活着舒舒服服地来剥削与压迫工农！”他分析这种感情冲动和盲目行动，“是在革命失败下，对敌人最残酷的阶级进攻发生强烈的报复心为基础，再加上‘八七’会议以后，以极左的观点来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而产生的”。他还说：“我们一股脑儿只想给国民党和地主资产阶级尝尝我们的味道，把统治权从他们手里夺过来……我们连对失败的可能都没有去考虑过，所顾虑的至多只有怕犯右倾机会主

①汪成法等：《奉化暴动》。

②《史永同志来信》（1985年8月4日）。

③陈修良：《沙文汉同志战斗的一生》。

④《张登自传》（1944年8月）。

义的错误，怕不能如期完成省委所给的任务。”^①

（四）

一九二八年一月，沙文汉自奉化撤到上海，又考进日本人办的东亚同文书院。但他很少去上课，只是作为一种身份掩护。这个书院里大部分是日本人，中国学生也不少，其中还是一些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沙文汉名义上是大学生，实际上秘密担任上海法南区（即法租界和南市区）的共青团团委书记，一度还被派带宣传队去参加上海郊区奉贤县的庄行暴动^②。

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白色恐怖异常严重，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下，中共党、团组织遭到很大破坏，群众革命情绪低落。本来应该充分吸取血的教训，整顿自己的队伍，耐心地团结群众，稳扎稳打，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恢复和积蓄力量，相机支援农村的武装斗争。但在一九二八年春，中共中央仍然认为中国革命尚在高涨中，革命即将成功，反对退却，要求坚持进攻，因此在城市工作中必然要表现出“左”的行动。遵照上级指示的精神，沙文汉当时在共青团的主要工作，就是布置和带领团员青年去冲锋。例如发动工厂和学校里的团员向群众演讲，公开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成立苏维埃，拥护苏联；鼓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等等。但这一切都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并无具体办法去领导群众斗争。而这样公开的宣传鼓动，自然会引起敌人的

^①《张登自传》（1944年8月）。

^②庄行暴动发生在1929年1月间，领导人系中共奉贤县委书记刘晓等同志，结果也失败了。

戒备，于是群众也不敢再来听讲了。不能去厂内校内演讲宣传，只得改变方式，利用工厂放工，厂门口马路上人多拥挤的时候，去进行突然的街头演讲和散发传单；或者利用各种纪念日，如五一、五卅、十月革命节，由赤色群众团体发起举行纪念会和游行示威，有时在闹市区举行“飞行集会”等等。在这些活动中，许多革命志士陆续被捕，沙文汉也几次险落敌手；但他并不感到有什么可怕或不值得，因为他思想上准备的就是被捕坐牢和牺牲。后来他回忆说：“似乎革命只要靠罢工罢课与开群众大会，靠同志们的勇气去冲锋就可以解决……在当时领导同志对我奖励之下，我更觉得自己的坚决勇敢与这一套公式化的冲锋主义工作办法，甚为满意，因而变得脑子反而不如从前会思考”^①。

针对沙文汉“左”的思想情绪，二哥沙文求曾从广州来信给以热情的教育帮助。信中说：“雄大的胆量是可贵的，但不要以这一点为自满，应更求技术之精良，去贯彻和增进原有的胆量；更求知识之充实，使在行为上完全和一只猛兽有所区别。猛兽是很容易落阱的，最怯弱的人还是要笑它！”^②沙文求希望三弟有勇有谋，有胆有识，却不可象猛兽一样莽冲直撞。这封信，给沙文汉很大的启迪，他由此逐步认识到革命不能光靠冲锋，不能一蹴而就，必须学习理论，讲究策略，改造作风，长期奋斗。

一九二九年初夏，上级领导派沙文汉到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任党团书记。六月间，他被选为该同盟代表，前往柏林参加

^①《张登自传》（1944年8月）。

^②《沙文求致三弟信》（1928年5月21日）。同年8月沙文求在广州被捕牺牲。

世界青年反帝国主义大会。因交通梗阻，他不能如期赶到柏林开会，在途经莫斯科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把他留在苏联，分派他进少共国际主办的马列主义学院学习。

（五）

到苏联去留学是沙文汉多年的愿望。一九二九年七月，他欣然前往马列主义学院报到。在莫斯科将近一年的学习，为他打下了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的基础。他特别重视革命导师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经过刻苦研读，他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和无产阶级意识的自觉性大为提高。

一九三〇年四月，沙文汉在马列主义学院结业，成绩优良，学院领导准备送他进高级研究院深造，可是中共代表团要他回国工作。

一九三〇年五月，沙文汉从苏联回到上海，共青团中央和江苏省委仍派他担任法南区团委书记。其时正值立三路线雷厉风行之际，李立三主持的党中央领导机关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提出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计划，在上海则要发动全市总同盟罢工，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这样一种不切实际的“左”倾冒险主义，必然要遭到党内有一定政治经验的干部的怀疑或抵制。沙文汉也感到迷惑不解。在一次团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他主张先要加强团的组织力量，然后再发动总同盟罢工。他以法南区为例，指出当时全区只有三四十个团员，团的基础比他出国前已大为削弱，而且保存下来的团员积极性都不高，无力发动和领导罢工，所以他提议法南区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和发展团组织。他的正确意见却被领

导上指责为“右倾保守”，在联席会议上争论了两天，直到他承认错误才罢休^①。

沙文汉在法南区委工作了两个多月，“因为饿饭饿得太厉害，半个月中只吃了三餐，以致病倒，只好休息。”^②当时党内经费很困难，他不愿向组织上申请津贴，“觉得这样才算是一个好党员”。八月间，他身体稍好，组织上调他到津浦、京沪等四路总工会去做青工部部长。他发现铁路工人中几乎没有青年工人，建议撤销青工部。这个意见被采纳了，他被调到团江苏省委担任工人部部长，兼上海总工会的青工部部长，并参加总工会的党团。这一时期的工作，概括起来说，就是集中全部力量去冲厂，组织罢工。这时冲厂的目的，已不是发动经济斗争，而是发动政治罢工和暴动，直至夺取政权。这种主张是错误的，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实际工作难于展开。沙文汉在上总党团会议上委婉地提出，当前应深入下层去组织群众，克服脱离群众的现象。他的意见立即遭到领导人的批驳，他只得服从组织的决定^③。由于身心交瘁，至十二月间他患痢疾和肺炎，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疗。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一伙窃取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他们指责李立三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从而提出了更“左”的错误主张。对于四中全会和王明一伙的上台，沙文汉在医院里一无所知。出院后他发现人事结构已有很大变动，立即打报告给组织，要求分配工作。报告打了好几次，却迟迟没有回音。原来王明宗派小集团对沙文汉不信任，主要根据是因为他在莫

^{①②③} 《张登自传》（1944年8月）。

斯科时不跟他们走。后由团江苏省委书记袁炳辉（后叛变）证明沙不是“右派分子”或“立三分子”，王明才同意派团省委组织部部长胡大海（工人、后叛变）去找沙文汉谈话，酌情分配工作。沙文汉盼了一个多月，总算盼来了胡大海。胡决定派他到沪西区团委“帮助工作”，但不是区委委员，实际上是考察性质^①。

沙文汉因怀疑立三路线，虽然挨过批，并未受处分，这次无端遭到王明一伙的歧视，内心觉得很难过。但他仍积极工作，接受组织上对他的考察。他在沪西“帮助工作”了几个月，团区委工作已略具规模；随后又把他调到法南区团委，仍是帮助工作，也不是区委委员。到了十二月间，由于工作和生活上过分艰苦，加上营养不良，沙文汉患了严重的头晕病，不得不请假休息。一九三二年三月，淞沪抗战刚停息，沪东仍被日军控制着，团省委又派他到沪东区团委“帮助”工作。这时团省委新任组织部部长胡南生分管沪东区工作，发现沙文汉工作态度和作风都很好，决定调他到组织部当干事。沙文汉很兴奋，庆幸自己被考察已经“毕业”，此后大约不会被排斥了。五月间，他正在交接工作的时候，忽然旧病复发，时常昏过去，甚至晕倒在马路上，只好再度休息。胡南生为人尚称宽厚，鉴于沙文汉在上海生活无着，批准他去南京大哥家暂时养病，组织关系仍保留在胡南生手里^②。

十多年后，沙文汉回顾这一段挨整的岁月忧心有余悸。他说：“起初对于组织要考察我，我虽有些难过，但倒还没有什么。后来在工作中慢慢地知道许多反支部派（指反王明小宗派）

^①《张登自传》（1944年8月）。

^②陈修良：《沙文汉同志战斗的一生》。

的同志，都受组织的冷遇或遭打击性的处罚，有的简直丢掉不管；这使我也寒心起来，认为组织对我也有宗派成见”。他认为四中全会后仍旧搞“飞行集会”等那一套极左的做法，很不妥当，“但我不敢正面提出意见，生怕闹出乱子来，连党籍都搞掉了。”他还说：“因为慑于自己党籍可能搞掉与当时家长式的领导，许多问题简直没有勇气去考虑它，把自己弄成了好象是一架没有头脑的工作机器！”^①这些肺腑之言，是对王明“左”倾错误和宗派主义的深刻揭露和批判！

（六）

一九三二年五月，沙文汉去南京养病。临行前夕，他的老战友陈修良置酒与他道别。陈修良因同样受到王明小集团的排斥，被停止工作，隐居在上海郊区一间小屋中，名为“蜗居”。沙文汉忙于革命斗争，已多年不写诗了，此夜正值雨声敲窗，百感交集，他应陈修良之请，即席赋诗一首留赠给她：“落寞应怜意境同，风尘何处盼重逢，三更雨打芭蕉绿，莫管明朝尽此盅。”题为《初夏之夜蜗居饮别》^②。革命战士也有喜怒哀乐，这首诗真实地反映了沙文汉无端挨整后哀而不伤的心情。

沙孟海当时在南京中央大学任秘书，文汉在他家静养了一个多月，头晕病减轻了，不过身体还是很虚弱。他在养病期间翻阅了一些古书，并练习书法和国画。他尤其喜欢画梅，十分赞赏梅花不畏严寒、刚健秀美的品格。他时常临摹各种梅花画谱，不仅为了排迁病中的寂寞，而且寄寓着要做一个坚强革命者的

^①《张登自传》（1944年8月）。

^②陈修良编：《沙文汉同志诗词选》（未刊）。

深意。

南京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受到反动派的严密控制。住在这样的险地，沙文汉自当格外小心，何况国民党对他的通缉令并未撤销。他在大哥家里，几乎足不出户，生怕落入叛徒特务手里。从养病期间所写的一首《自勉》诗中，可以看出，他身处逆境，贫病交逼，但气不馁、志不衰的革命气概。诗云：

吾道无人识，频年独苦行，
贫遭街犬侮，病驴寒鸡鸣。
楚国虽三户，秦皇徒万兵，
勿云时未至，有志事方成^①。

他不管世人（包括王明之流）对他如何误解和歧视，坚持走革命道路；他根据历史的规律，相信“楚虽三户，亡秦为楚”，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必将被日益发展的人民力量所推翻，有志者事竟成，革命前途是光明的。

可是南京的政治环境毕竟太恶劣，他担心长期闲居会引起别人的怀疑，还怕连累他的大哥，便决定异地休养。于是通过沙孟海的介绍，改名沙房山，前往安庆，在安徽教育厅当科员。二三个月后，在安庆老家养病的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余飞被敌人逮捕，向警察局供出了沙文汉的地址。警察局立刻派人搜捕，幸得同事帮助，他才逃出虎口，又扮作挑夫，乘江轮抵达上海^②。十一月，沙文汉在上海与陈修良结成了生

^①陈修良编：《沙文汉同志诗词选》（未刊）。

^②参见朱庭祐：《沙文汉生前事迹之一》（1979年4月2日）；沙孟海：《沙文汉同志安庆脱险经过》（未刊）。

死相依的革命伴侣。

(七)

沙文汉回到上海后，急切要寻找党的组织关系。但是，原先同他保持联系的胡南生，不幸已被捕牺牲，他只得同陈修良商量，二人联名写信给党中央，汇报安庆事件的经过，请中央提高警惕，防止破坏，并要求中央批准他们转移到江西苏区去工作。信件由陈修良交给一位做内部交通的女同志转送。过了不久，他们看到余飞在南京《中央日报》上刊登的自首启事，上海报纸上也刊载了余飞出卖同志的消息，感到十分气愤，再次要求党中央立即让他们去江西苏区。可是几经周折，那位女交通员住的机关忽被敌人破坏，陈修良已无法通过这唯一的渠道与党组织联系。在茫茫人海中，到哪里去找党呢？沙文汉估计现在东京的同文书院同学汪孝达（即汪成模，抗战时牺牲）可能有党的关系，马上写信去探问。汪很快回信说：“同家人有关系”，欢迎沙文汉夫妇同去东京，并可代办入境手续。夫妇俩喜出望外，沙文汉设法弄到一张护照，化名陈元阳，陈修良则借用她姐姐一张助产学校的毕业文凭，改名陈维真，他们就这样悄悄地流亡到日本。其时国民党特务正在到处缉捕他们，对沙文汉来说，这已是第三次被通缉了。

一九三三年二月，沙文汉夫妇到达东京，通过汪孝达接上了组织关系。汪要他们安心留在日本，参加工作。为了取得掩护，汪又帮助沙文汉考入日本铁道学校。不久，汪孝达等因公开宣传反对日本侵略和反对国民党卖国，并为江西红军募捐，遭到逮捕并被驱逐出境。幸而汪等被捕没有影响到沙文汉夫妇的安

全，他们继续同陆久之保持联系，参加一些秘密工作。

在东京期间，沙文汉抓紧时间，刻苦研读日文版的《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写了许多读书笔记。这是他一生中能够精心钻研理论，并且冷静思考总结过去工作的绝好机会。

当时国内正在掀起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沙文汉密切注视着这场牵涉到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争论，并撰文批驳托派分子的谬说，其中有一篇是《驳任曙关于中国经济结构》^①，长达万余字。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有力地驳斥了托派“理论家”任曙^②关于中国经济已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中国革命性质已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等反动观点。

一九三四年秋，沙文汉夫妇获悉四弟沙文威在上海工作，与党中央情报部门有关系，便以回国省亲为名，从东京回到上海。沙文威介绍上级领导人吴先清与他们相见。吴与陈修良原是留苏同学，她又带陈去会见上级领导人肖炳实（即肖项平）。商谈结果，老肖仍要沙文汉夫妇回日本，并说吴先清也要去那边加强工作。于是他们再次东渡。数月后，吴先清果然也来到东京，一同进行工作。

一九三五年初夏的一天，吴先清匆匆来到沙文汉寓所说，驻上海的中央机关被破坏，老肖通知她赶快回去，等她到上海后再通知沙文汉夫妇回国。但她一去便无音讯。同年十月间，因东京与上海失去联系，沙文汉夫妇和陆久之一同回国寻找组织关系。他们从夏衍处得知，当时上海的党组织因李竹声、盛

①这篇论文大约写于1935年，因形势恶化，未能刊出，原稿存陈修良处。

②任曙，即任卓宣，又名叶青，三十年代著名的托派“理论家”。

忠亮等相继叛变，接连遭到严重破坏，损失惨重，已无法转关系。这是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恶果。后来陆久之因公事仍回日本，沙文汉夫妇决定留在上海继续找党的组织，几经周折，终于同中央特科接上了关系^①。

(八)

沙文汉回国之日，正是抗日救亡运动兴起之时。一九三六年初，党组织决定凡是能做文化工作的同志，都应当拿起笔来战斗，宣传抗日，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因此，沙文汉以文化人的姿态，积极投入文化界的救亡工作。他接受过去的教训，深知敌人的狡诈，在“爱国有罪”的环境下，必须谨慎从事，决不可盲目冒进。这一时期，他精神振奋，笔力雄健，在上海一些进步的和中间的刊物上，发表了许多篇针砭时弊的文章。从一九三六年二月起的一年内，单是在《世界知识》杂志上就先后刊出署名陈叔温的论文如《外蒙问题的告急》、《日苏纠纷的总检讨》、《阿军失败的原因及其教训》、《日本战斗力的估计》等六篇。他通过这些国际时事论文，不露形迹地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日纲领，启迪广大读者认清世界形势发展的趋势，从中找到中华民族的出路。如在《阿军失败的原因及其教训》^②一文中，他热情地赞颂了伟大的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坚持七个月的抗意战争，悲壮激越，虽败犹荣。他指出，阿国的抗战证明了“凡弱小民族要解放自己，只有用武装的反抗才能维护其独立与自由”，证明弱小民族

^①陈修良：《沙文汉同志战斗的一生》。

^②《世界知识》第4卷第5号。

“以武装来抗击帝国主义的企图，是有现实的成功的可能”，关键在于“在抵抗作战中应该以最大的努力来运用人民的战争意志力，启发其潜在于民间的无限战斗力”。他还提出，弱国在抗战时“应该运用游击战的战斗方式，以对抗技术配备极高的现代精兵”；还要普遍发动群众铲除内奸，“使其不能成为反帝运动的阻力”。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散布的“恐日病”谬论，沙文汉在《日本战斗力的估计》^①一文中，作了科学的分析与批判。他指出，日本的“物质的战斗力”——军备、生产力、经济力相当强大，但资源贫乏，财力不足，难以维持长期作战；而在“精神的战斗力”方面，则弱点更多，如侵略中国师出无名，国民的战斗意志不强，等等。因此，“恐日病”是毫无根据的，故意夸大敌人力量者是别有用心的汉奸，认识不清者应清醒过来，“希望大家在知己知彼的条件下确定我们的救亡大计。”沙文汉写的这些文章同王明之流的党八股截然不同。他不靠搬弄教条或空喊口号来吓人，而是摆事实，讲道理，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因而是有说服力的。

同一时期，在综合性大型刊物上还刊登了沙文汉的长篇经济论文，如《中国财政的根本问题》^②和《中国景气论》^③等。这些论文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为指导，详尽地分析了中国财经的情况和问题。前一篇指出，中国财政经济发生危机，其根源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因此，“只有在我国脱离帝国主义的一切拌缚，建立修明而且真正统一的国家机关”，才能根本解决问题。文章论据充足，说理透

① 《世界知识》第4卷第11号。

② 《东方杂志》1936年8月号。

③ 《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7年夏季号。

彻，引起文化界学术界的瞩目，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九三六年救国会的工作，仍然受到王明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一些影响，如不断发动积极分子游行示威，高呼不切实际的政治口号，公开散发反蒋的传单，因而屡次遭到中外反动派的镇压，许多爱国志士被打被捕，广大群众望而却步。这年十一月下旬，救国会七君子也被捕入狱。沙文汉沉痛地说，决不能再搞“冲锋主义”了，一定要利用合法的机会进行活动，必须联合广大的各界爱国群众共同救亡。七君子被捕后，党组织调沙文汉到救国会去加强工作，他以全国各界救国会组织部干事的名义进行活动，大约工作了四个月，后来他回忆说：“当时我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克服救国会‘左’的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并改造其冲锋主义的作风，企图把救国会变成真正广大的群众救亡组织，来挽救它在国民党有计划的进攻下已被孤立起来、行将遭受严重打击的危机。”^①

一九三七年春，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党的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委），书记冯雪峰，委员王尧山和林枫。不久林枫调到北方工作，沙文汉参加“临委”，又称三人小组。它的主要任务是整顿幸存的分散的地下党组织，为重建统一的上海党组织作准备。此后，沙文汉便离开救国会转入地下，进行党的秘密工作，与王尧山一起，分别负责整顿戏剧界、文艺界、教育界和学生方面残存的党组织。沙文汉日夜不休地考虑各方面可能发生的问题，细心筹划在新形势下党员如何密切联系群众，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由于过分劳累，他的旧病时时发作，面部浮肿，呼吸困难，但他心情愉快，坚持带病工作，和

^① 《张登自传》（1944年8月）。

同志们一起团结奋斗，为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中重建上海地下党组织多作贡献。

(九)

七七事变前，中共中央特派刘晓到上海，全权负责重建上海地下党的工作。冯雪峰把临委联系的党员名单都交给了刘晓，便转往潘汉年主持的中共上海办事处（后改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公开对外）协助工作。根据中央规定的方针，刘晓对临委联系的党员分批进行认真的个别审查，经审查合格再个别接上党的组织关系。第一批审查合格确认其党籍的，有王尧山、沙文汉、林枫、陈修良等二十余人^①。接上组织关系后，刘晓由王尧山陪同，到沙文汉夫妇的寓所看望他们，了解上海的情况，谈了中央的意图。沙文汉获悉中央批判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已制订了白区工作的新方针，即后来概括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从此城市地下工作有章可循了。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上海人民的抗日情绪更加高涨。根据刘晓建议设立了一个党的群众工作委员会，负责联系工人、职员、学生、妇女等救亡团体，加强对群众抗日运动的领导；同时审查各个系统的党员，加速恢复和重建上海地下党的组织^②。沙文汉因病未参加“群委”，但仍参与策划。当时上海的党员

^①刘晓：《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建前后》，上海《党史资料》1979年第1辑。

^②王尧山：《关于上海地下党重建的经过》，上海《党史资料》1979年第1辑。

为数甚少，不足一百人，可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经过数月的筹备，至十月间，党中央正式批准成立上海地下党统一的领导机构——中共江苏省委，刘晓任书记，刘长胜为副书记，张爱萍为军委书记，王尧山为组织部长，沙文汉化名张登，担任宣传部长。

中共江苏省委刚成立，上海即沦陷。十一月十二日起，战事西移，上海租界区成了四面被日军包围的“孤岛”。省委领导机关设在租界区，利用英法租界当局与日寇的矛盾，利用租界内某些特殊条件，坚持在“孤岛”进行战斗。

为了加强党对各方面工作的具体领导，省委决定按系统建立党的工作委员会，如工委，职委，学委，教委，妇委，文委，还有难民工作委员会等。省委内部也进行了分工，沙文汉分管学委和文委。一九三八年秋，因沙文汉任务太重，省委决定派陈修良去具体领导学委工作，省委分工仍由沙文汉负责学委。到一九四二年省委撤退为止，他一直分管上海学委工作，培养和训练了一批学生干部。

沙文汉在文化工作方面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他主持创办了省委机关刊物《真理》和《党的生活》；同时通过群众组织出版公开的报刊进行抗日宣传，如《译报》、《译报周刊》、《上海周报》、《学习》、《求知丛书》等，还派党员帮助文化界出版了《鲁迅全集》和《西行漫记》等重要著作。在沙文汉指导下，文委在话剧、电影、音乐、曲艺界深入展开活动，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上海虽是一个小小的“孤岛”，但在全国来说仍然是一个文化中心。

“孤岛”上的文化宣传活动，影响遍及全中国。上海党的力量当时还很虚弱，但在文化工作方面却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这是

江苏省委与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密切配合，正确贯彻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广大的爱国人士，利用一切合法的形式，同心协力艰苦奋斗的结果。沙文汉代表省委经常同“八办”负责人之一刘少文联系磋商，或到文委书记孙冶方家中开会研究工作。他奔波策划，尽了自己的力量。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省军委书记张爱萍调往武汉，由沙文汉接替他的工作。随后省委成立外县工作委员会，主管全省各地的抗日武装斗争，沙文汉任书记，林枫为副书记。外县工委迅速派出党员干部，秘密奔赴市郊和苏南、苏北农村开展工作。沙文汉又通过公开刊物指导武装斗争。他在《中国农村》第四卷第五期^①上发表论文《怎样组织抗日游击运动》（署名陈叔温），号召人们去敌后农村进行游击战，对当时发动大江南北的武装斗争起了一定作用。在省委领导下，外县工委先后在浦东、浦西、苏南东路地区以及苏北南通，如皋、启东、海门地区开辟了几个抗日游击区。一九四〇年春夏之间，江苏省委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决定将外县武装斗争工作划归新四军统一领导。为此，沙文汉于五月专程从上海到常熟，会见新四军东路军政会负责人谭震林，将苏南东路特委和青浦、嘉定、浦东三个工委及其所属抗日武装，移交给东路军政会领导。七月，江苏省委又将江北特委和崇明县工委移交给新四军苏中区党委领导^②。此后，江苏省委的任务主要是领导城市地下工作。外县工委的工作重点，也从领导农村武装斗争转向城市秘密组织工作，先后把沪宁、沪杭铁路沿线城市的党组织恢复起

^①1937年12月1日在南昌出版的“战时特刊”。

^②参见翁三新：《抗战时期党领导上海近郊武装斗争的组织状况概述》，载上海《党史资料》1985年第2辑。

来。

为了向中共中央东南局汇报工作，刘晓和沙文汉一起，曾于一九三九年夏经宁波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会见了东南局项英等领导人。他们回上海后，通过组织发动党内外群众，为宣传和支援新四军做了大量工作，经省委动员输送到新四军去的各类人员至少有三四千人，还输送了大量药品、军需品以及布匹、胶鞋等物资^①。一九四〇年初，刘晓和刘长胜同去重庆，向南方局汇报请示工作，省委书记暂由沙文汉代理。一九四一年初，发生皖南事变，东南局一些主要干部在沪隐蔽，饶漱石曾在沙文汉家里住了四个月。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的铁蹄踏进了上海租界。原在“孤岛”上坚持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统统被迫停刊。对于从事爱国教育的大专院校，敌伪勒令登记，强制实施奴化教育。广大爱国师生面临失业、失学的危机，连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纷纷要求去敌后抗日根据地，继续办校和学习。根据群众的愿望和中共中央《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江苏省委刘晓和沙文汉等于一九四二年春夏之间数次开会研究，商定在淮南或淮北根据地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培养一批高等文化水平的干部。中共中央华中局批准了省委这个建议，并具体指示学校定名为江淮大学，由新四军军部领导并提供经费和给养，筹办工作交由江苏省委负责。省委即指定沙文汉具体负责筹备事宜。沙文汉会同文委书记梅益等，紧张而又细致地做好上海教师的组织动员工作，又通过学委发动学生进江淮大学。从八月到十月陆续输送一百余名师生安全到达根据地，

^① 《上海人民对新四军的支援》，上海《党史资料》1985年第2辑。

圆满地完成了筹备任务，使江淮大学得以如期开学，开创了敌后办综合大学的先河^①。

一九四二年秋，中共中央鉴于上海的环境过于险恶，为了更好地保存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干部，决定把江苏省委领导机关转移到淮南根据地，沙文汉也随同撤退。

从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到撤出上海的五年间，与沙文汉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认为他凡事深思熟虑，对秘密工作很有经验。这一时期尽管环境险恶，工作紧张，沙文汉的心情是舒畅的，创造力是旺盛的。他参加整风时曾说：“江苏省委是我所经历到的作风较好的一个组织，同时看到全党实事求是的作风也大为增强，并对过去处理同志过分的地方也已开始有所批评，因此感觉到我们党是大大进步了……我觉得党内充满了为党工作可以自由地去创造、不怕负责的新鲜空气，它使我工作中的心境大为愉快。”^②正是在这种实事求是、敢于创新的气氛中，沙文汉和省委诸同志团结奋斗，开创了上海和江浙一些城市地下工作的新局面，巩固和发展了地下党组织。一九三八年年初上海只有党员百余人，至一九四二年已发展到二千多党员^③，为尔后迎接抗日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积聚了坚强的骨干力量。

(十)

一九四二年十月，中共江苏省委机关转移到淮南根据地天

① 《江淮大学校史》（二稿），1984年12月编（未刊）。

② 《张登自传》（1944年8月）。

③ 王尧山：《关于上海地下党重建的经过》。

长县顾家圩子，在那里开办干部训练班，进行整风学习。沙文汉经常在训练班讲课，并在整风学习中，和同志们一起总结近几年来白区工作的经验。至一九四三年初，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撤销江苏省委，成立城工部，领导敌占区城市工作，由刘晓、刘长胜任正副部长。沙文汉则被派往浙东工作。他和战友们临别依依，留词一首，《告别顾家圩子诸同志》（调寄浪淘沙）：

相聚兴方浓，谈已论公，乍而行色又匆匆。如此国家多事日，难卜重逢！

大地正秋风，烽火涨空，萧萧征马各西东。谁把强敌消灭尽，算是英雄①！

沙文汉离开淮南转辗到达浙东四明山游击区，传达华中局的指示，同浙东区党委负责人谭启龙、何克希等商量，决定浙东游击队仍在三北、四明山地区坚持下去，并遵照华中局指示精神，尽量利用国民党部队的番号，坚持隐蔽斗争，不刺激敌顽的方针。华中局一度打算让沙文汉留在浙东工作，后因战争形势的变化，仍调他回淮南根据地。

一九四三年六月，沙文汉返淮南向华中局复命，随即被分配到华中局党校任教务处长，参加领导整风工作。次年二月，他被调到新四军军直属队，参加整风审干工作，至七月结束。

一九四四年八月，沙文汉调任中共淮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次年四月，为了加强敌占区的城市工作，淮南区党委撤销

①陈修良编，《沙文汉同志诗词选》（未刊）。

敌工部，成立城工部，由沙文汉任部长。这时，有些长期在敌占区工作的同志，撤到了根据地，沙文汉从中挑选了一部分到城工部工作。这些同志在敌占区有许多复杂的社会关系，有利于开展秘密工作。城工部还开办了训练班，培训来自敌占区的青年，教育他们懂得白区工作的方针政策，向他们介绍地下工作经验。经过训练与审查后，再派往江南敌占区各城市工作。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寇投降。中共中央华中局立即派出一个支队，由沙文汉率领南下，去办理日本侵略军的投降事宜。部队从驻地冒雨急行军，在六合县东沟南划子口连夜飞渡长江，抵达南京郊外栖霞山地区，准备配合新四军第二、六师大军，接管南京城。沙文汉在进军途中的战马背上，兴奋地赋诗二首，抒发他迎接抗战胜利的豪情壮志。诗文如下：

雨中进军，
倏然霹雳破山鸣，
闪闪刀光掠野明；
敌垒不摧壮士志，
当于十月四五行。

与此同时，国民党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用飞机抢运大批人马到达南京，与我新四军对峙，气氛紧张。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决定中止进攻长江以南的大城市。新四军奉命迅速撤回江北根据地，沙文汉也随军回到淮南。他告别金陵时，对于那些飞扬跋扈、下山抢摘胜利果实的国民党反动派，不胜愤慨，写下了“狐鼠豺狼休自得，到头天下属人民”的诗句，坚信总有一天美丽的南京城会回到人民手里的。

（十一）

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共中央华中局随新四军军部去山东，改组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在新四军原驻地，即以两淮为中心的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地区，建立了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一九四五年十月华中分局设立城工部，由沙文汉任部长，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各城市党的工作。城工部设在淮安城内西长街，对外称华中军区参事部。

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猛烈进攻，内战全面爆发。为适应战争需要，华中分局城工部多数同志都派往蒋管区。至十月间，沙文汉也离开解放区进入蒋管区工作。他从苏北乘木船到上海，途中受了风寒，得了肺炎，加重了原有的肺气肿和哮喘病。他顾不得休息，病稍愈，即和同志们一起投入了紧张战斗。

沙文汉回沪前数月，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已经成立，由刘晓、刘长胜任正副书记。这次沙文汉来沪，仍用华中分局城工部的名义，领导所属各城市的地下党组织。一九四七年一月，

党中央决定撤销华中分局城工部，沙文汉领导的组织全部合并到上海分局，并改称为上海局。沙文汉调任上海局的宣传部部长，后又兼统战部部长，同时分工领导南京和杭州的地下市委。

沙文汉在宣传和统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和张执一共同负责上海的上层统战工作，并进行策反活动，取得了成绩。

一九四七年四月间，上海局在沙文汉寓所内一个亭子间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刘晓、刘长胜、沙文汉和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与会者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一致认为中共中央对时局的估计是正确的，群众生活困难问题是敌人的致命伤，也正是我们发动斗争的一个突破口。当时广大学生公费极少，一天的伙食金只能买两根半油条，迫切要求改善生活待遇。从反饥饿问题出发，就能很自然地引导群众反对内战，把矛头直指国民党的内战反共政策。会议决定首先在南京突破，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然后由上海、杭州、北平、天津等地配合响应^①。这次会议后，分管南京工作的沙文汉即帮助南京市委坚决贯彻执行上海局的决定，迅速发动了震动中外的“五二〇”运动。“五二〇”运动标志着蒋管区群众的觉醒程度已有很大提高，运动遍及全国七十多个城市，并且持续到六月间，大大地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紧张的地下战斗生活，使沙文汉的病体日益不支。一九四八年春，他接受刘晓的劝告，去杭州风林寺休养，并检查杭州党的工作。风林寺座落在杭州葛岭风景区，庙里开设有疗养

^①刘晓：《一九四七年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一些回顾》，载上海《党史资料》1985年第3辑。

院，是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必要时隐蔽“养病”的安全处所。杭州地下党组织专派一位党员，住在庙里做保卫工作。沙文汉在那里休养了半个月，病况有所好转，也找杭州的同志商谈和部署了工作^①。

(十二)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党中央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获得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广泛响应，使国民党反动派更加陷于孤立。这时上海局的刘少文已撤往解放区，刘晓和钱瑛去香港主办干部训练班，随后由港转往解放区。上海局只留下刘长胜、沙文汉和张执一等主持日常工作。当时上海局发出的重要文件和电报，大多由沙文汉执笔起草。九月间，上海局讨论了形势和任务，即由沙文汉起草了重要指示文件，题为《京沪一般形势的特点》及《当前的基本方针与我们的具体工作》^②。文件简要地说明了“从东北大捷后，接着是华中的飞跃发展”的大好形势，指出“我军在大江南北两岸歼灭敌人主力的胜利战斗不会很远了。”文件中详细分析了各阶层人民对解放战争的态度，主张发动广大群众进行护厂护校斗争并加强对中间阶层的统战工作，特别指出要集中力量在敌军中进行策反与瓦解工作，使他们在解放军兵临城下时实行起义或投降，“尽可能使京沪不遭战争破坏”。文件还提出各部门各系统要进行调查研究，为接管京沪作好准备。

上述文件下达后，京、沪、杭各地党组织进行了认真讨

^①访问史莽记录（1984年2月25日）。

^②此件存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

论，作了具体贯彻的部署，有力地推动了各城市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①。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沙文汉代表上海局赶往南京检查和指导工作。他在南京市委的秘密会议上，传达了党中央和上海局的指示，要求市委立即抓紧各项工作，准备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南京市委遵照上级指示，加强了情报和策反工作，千方百计策动国民党海陆空军起义（如国民党第九十七师王晏清部起义，俞渤等驾机投奔解放区等），为迎接南京解放作出了贡献。

一九四九年一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来电明确指示说，人民解放军已占有绝对优势，要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破坏，保护工厂、机关、学校，配合解放军，维护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接管城市^②。上海局坚决贯彻中央指示，在上海解放前夕进行了紧张艰难的战斗。沙文汉和张执一等用很大精力，抓紧领导策反工作，尽可能使京沪早日解放，减少战争破坏。一九四八年秋，上海局即专门设立了策反工作委员会，以张执一为书记，沙文汉为副书记，委员有王锡珍（即陈约珥）、李正文和田云樵等^③。因张执一常去香港，一九四九年三月即由港去解放区，李正文同行，故日常工作主要由沙文汉领导。在南京、上海解放前，策反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国民党海陆空军一批又一批举行起义，其中有些重要的起义是沙文汉直接参与策划和领导的。

在国民党海军方面，沙文汉指导策反工作干部王亚文和王

①②张承宗：《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的人民革命运动》，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2辑。

③张执一：《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载《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第4期。

锡珍等，通过一些思想进步的国民党军官，策动了巡洋舰重庆号和第二舰队所属全部舰艇的起义。重庆号舰长邓兆祥，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感召下，弃暗投明，于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五日率领全舰五百余官兵起义，重庆号从上海吴淞口胜利驶往解放区。接着，王亚文和王锡珍又通过关系，策动国民党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领舰队二十五艘舰艇，于四月二十四日在南京东北的巴斗山宣告起义，对配合解放军渡江作战起了积极作用^①。

在国民党陆军方面，沙文汉指导王亚文，曾策动爱国将领张权率炮兵旧部准备在上海起义。原定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举事，因叛徒出卖，张权不幸被捕牺牲^②。这期间，蒋军特种部队伞兵三团起义却获得了成功。先是策反委员李正文与该团团团长刘农峻取得联系，李离沪去香港后，沙文汉即派田云樵、舒怀接替工作。经过周密部署，该团起义领导小组利用全团调防福州的机会，于四月十三日夜间在海上宣布起义，逼令运输船调头北上，十五日胜利到达解放区连云港^③。在“战上海”的紧急关头，策反委员会又配合人民解放军，策动驻守在苏州河以北的蒋军军长刘昌义起义。五月二十六日，刘昌义全军放下武器，上海市区在没有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全部获得了解放^④。

沙文汉在进行策反工作的同时，还着重抓紧上海文化界和

①②王亚文：《向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工作的回忆》，载《革命史资料》（2）。

③舒怀：《国民党伞兵三团起义经过》，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4辑。

④田云樵：《解放前的策反工作》，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4辑。

工商界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他曾指派金学成参加工商界的聚餐会，通过聚餐座谈，揭露美蒋反动面目，联络更多的工商界人士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一九四九年初春，从华北解放区传来了南北通邮、通商、通航的建议，金学成把这个消息带到聚餐会上，工商界人士很感兴趣，纷纷联名派代表去南京请愿，结果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拒绝，引起公愤。根据沙文汉的指示，金学成及时向工商界人士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工商政策，即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等等。这些宣传消除了上海工商界一些人的疑虑，有利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迎接解放^①。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解放军攻进了上海闹市，苏州河以南地区首先获得解放。这天上午，沙文汉奉上海军管会之命，前往福州路接管国民党的上海警察总局。他庄严地命令警察总局及各个局在正午十二时前一律向解放军缴枪。该总局代局长陆大公遵令照办，立即通知所属各局悬挂白旗投降，听候接管。随后，沙文汉把警察局的接管工作交给了新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和杨帆。至此，沙文汉胜利地完成了配合解放军接管上海的历史任务。

(十三)

全国解放以后，沙文汉感到极大的欢欣和快慰。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归功于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尤其归功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的千千万万烈士。他深切

^①金学成：《解放前夕的工商界聚餐会》，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3辑。

怀念牺牲了的老战友卓兰芳等，每月必从工资中寄一部分给这些烈士的家属，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必须继续努力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这样才能告慰烈士的英灵。

一九四九年六月，中共中央华东局派沙文汉去杭州，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翌年四月，他奉调回上海任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一九五一年九月，又被调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教育厅厅长，后又兼任浙江大学校长，党内职务为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一九五二年十月，中央调沙文汉去外交部，准备出使印尼，后因病回沪疗养。一九五四年春，出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同年十二月由浙江省人大推选为浙江第一任省长，还担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党内仍为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从此，他主持省人民政府工作，直到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

为了适应新的情况，沙文汉严格要求自己：一是“加强有系统的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学习，首先应从（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党的决定与苏联的建设经验学起”；二是“在工作上应努力去取得公开政权下具体而有系统的实际经验。”^①他就是按照上述要求，在理论与实际工作的结合中不断探索前进，因而在他分管的政权建设、文教工作和统战工作诸方面，都有所建树，有所创造。

沙文汉对人民政权的建设十分重视。他参加了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回到浙江进行传达时，主要讲的就是如何发挥新政权的作用，强调人民民主专政要通过政权机关来体现。在浙江建立各级政权机构的工作，主要由他负责。他要求各级干部依靠

^①沙文汉：《自我鉴定》（1950年），原件存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档案室。

广大人民，搞好生产建设，要关心人民疾苦，全力为人民服务。浙江人民怀念这一段好时光，也怀念为此作出过贡献的好省长。

沙文汉对知识分子历来很关心和爱护。他认为要改造旧知识分子，必须真诚地团结他们；要办好学校，尤其是办好高校，要依靠老教师带徒弟，培养青年教师；要尊重教师，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各校党委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曾经伤害了一些教师的自尊心。沙文汉在华东局宣传部工作时，便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纠正“左”的偏向，改善了党群关系。在文化工作方面，他认真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注意调动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积极性。他曾支持浙江省文化局和戏曲界演出昆曲《十五贯》，得到周恩来的肯定，拯救了这个垂危的剧种。一九五五年五月，浙江学术文化界组织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沙文汉应邀作第一讲讲授，题为“为什么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他除了正面阐明学习辩证唯物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重要性外，特别强调有唯心主义思想的人，绝大多数是认识问题，因此进行批评应该谨慎，“决不可以采用粗暴简单化的办法，更不可侵犯或损害学习的自愿与自觉的原则。”^①他的演讲深受广大知识分子的欢迎，六月间讲稿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供不应求，后又增印。

沙文汉还是浙江省第一任统战部部长。他亲自帮助省里几个民主党派组织起来，建立机构，展开活动，从而团结了大批民主人士和工商界爱国人士。对于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和各界知名人士，沙文汉都精心作了安排，有的推荐为各级人民代

^①沙文汉：《为什么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表，有的聘请为政协委员，以发挥其积极作用。在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浙江省提供的名额较多，罗致人才的面较广。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和童第周、茅以升等，都是沙文汉向中央统战部推荐的。沙文汉认真执行少数民族政策，保护浙江少数民族畲族的合法权益；认真执行宗教政策，保护宗教界的正当活动，并注意保护名山古刹，如普陀山珍贵的一千罗汉像和天台山国清寺一套明代嘉靖年间的佛经等，都列为重点保护文物。沙文汉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有深刻的体验和理解，他身体力行，同党外人士真诚相交，因此，许多民主人士和党外专家都愿意向他反映问题，提出建议，从而起到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作用。

（十四）

由于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形势，一九五七年党中央领导机关和毛泽东领导开展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沙文汉就是被错划为右派的党内干部中级别最高的一位，也就是所谓党内最大的“右派分子”。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通过了开除右派分子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四人党籍的决议。当时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在省党代会上批判沙文汉等的长篇报告，由北京《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8日）及各省市党报全文转载。《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一次收获巨大的省党代表大会》（1957年12月29日），作为全国反右派运动中处理党内右派分子的重大典型事例，广为宣传，引起

了海内外的震惊。

沙文汉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罪状”是，他在一九五六年七月浙江省党代会上的发言，被认为“公开宣扬资产阶级的政权观点，诬蔑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反对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①事实上，他的发言是主张发扬党内民主，实行党政分工。他批评了省委领导人骄傲自满、主观主义、脱离群众的领导作风，着重指出省委包揽一切行政事务、以党代政的种种弊端；力主在党委领导下，党政必须明确分工，即一方面要使政府机关“具有宪法所规定的完整的形式和内容，使它能按照党的意志和方针政策去动员与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与对反动势力作斗争；另一方面是党怎样去运用政府机关，发挥这个庞大机关的作用，从而使党委本身能在政治思想和重大方针政策、工作步骤上的领导加强。”^②沙文汉为维护党的正确原则和宪法的尊严，在党代会上秉公直言，是合乎党章规定的，而且言之成理，切中时弊，得到与会许多代表的赞同。不料一年后竟被说成是“反党”，“反人民民主专政”！

另一条“罪状”，说沙文汉积极“支持右派分子宋云彬、李士豪、陈修良等对党的猖狂进攻”^③。实际上，沙与民主人士宋、李的关系是正常的统战关系，与陈修良（当时任省委宣传部代部长）也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后三人并未反党（一九七九年均已改正平反），说沙支持他们反党，纯属不实之词。

沙文汉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出党以后，抑郁成疾，身体更

① 《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沙文汉的错误向中央、上海局的报告》（1957年），原件存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档案室。

② 沙文汉在省党代会上的发言，原稿存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档案室。

③ 《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沙文汉的错误向中央、上海局的报告》。

坏。但他没有沮丧，还是要坚强地活下去，还想为党为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他写了一首感人肺腑的诗，题为《病中有感》：

莫说沉痾久未愈，
但看形影日枯衰，
孤灯夜永油将尽，
老马路遥力不支。
梦里少年犹意气，
望中功业岂狂痴，
人生得失毋须计，
毕竟事成总可期。

尽管年老病重，身处逆境，他坚信青年时期的奋斗和追求决非狂痴，个人的得失算不了什么，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定会成功。

一九五九年春，沙文汉身体稍好，勉强起床工作。他本想研究中国现代史，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因为不允许他去借阅档案材料，只得研究中国古代史了。他写信给正在嘉兴下放劳动的陈修良说：“我已经不能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了，只好去研究死人的政治——历史，或许可以借到史料。”^①

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必须懂得甲骨文。他知难而进，重温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真细致地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经常带病工作到深夜。他决心要在一九六三年党的生日之前，赶写出一部文稿，作为向党和人民的献礼。在十分艰难的处境下，他坚

^①沙文汉：《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持探索科学的真理，终于如期完成了七万多字的史学专著《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

这部凝聚着沙文汉最后几年心血的专著，也和作者本人一样命运不佳，被关了多年禁闭，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重见天日。一九八三年《浙江学刊》编辑部把这部专著郑重地发表在该刊第三、四期上，标明“沙文汉遗作”，列为第三期首篇，并加了“编者按”，表示对作者的深切怀念及对其遗著的高度评价。一九八四年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又出了单行本，更引起了理论学术界的重视。

沙文汉写完这部专著，已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他原计划休息一阵之后，再“继续深入研究”，却成了不能实现的梦幻。一九六三年冬浙江省政协开会，他冒着风寒前往参加。因天气太冷，他患了重感冒，突然转为肺炎，病况危急，被送进浙江医院抢救。在他临终前两天，中央统战部来电话给他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他勉强说了一声“谢谢”，就陷入昏迷状态，从此没有再开口。他似乎还有许多话要说，可惜来不及了，无情的病魔夺去了他的宝贵的生命，时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二日清晨。终年五十五岁。

沙文汉逝世后，葬于杭州南山公墓。十年内乱期间，一些打手们举着“打倒地富反坏右”的旗帜，又把他的墓碑砸碎。笼罩在他头上的乌云，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渐被驱散。

一九七九年，陈修良一再向党中央申诉，要求为沙文汉彻底平反。在中央督促下，浙江省委才对沙文汉这一错案进行复查，并向中央写了复查报告。这份复查报告虽提出对沙文汉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予以改正，恢复党籍和政治名誉，但却

留有很大的尾巴，说沙文汉“同省委离心离德的问题 是存在的”；说沙在一九五六年“党代会上的发言，是有错误的”；此外还有个别同志提供的沙在历史上曾经被捕的问题尚待核查。因此浙江省委认为沙文汉“在当时是有错误的，而且错误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可以不划为右派分子。”^① 总之，被歪曲了的事实没有澄清，被颠倒了的是非没有分明，被诬陷的政治问题没有平反。

沙文汉的家属和一些老战友，对上述情况都感到惊异和不平，尤其是孙冶方。他不顾开刀后的伤痛，在首都医院的病榻上向党中央赶写报告，为沙文汉申诉。他把沙文汉在一九五六年党代会上的发言稿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相对照，确认沙的发言是完全正确的。他写道：“沙文汉同志当时提出这两个问题（即发扬党内民主，实行党政分工），不仅在当时，而且也是当前放在我们党面前要坚持讨论解决的问题。我读了沙文汉同志这篇发言稿之后，认为即使把它全文登在今天的报刊上，也不失为切中时弊的好文章。”孙冶方在报告的末段说：“此外，浙江省还说沙文汉曾经被捕过，据我所知，这也不是事实。而且当年沙文汉同志被打成右派也不是根据这个理由。这无非是当年给沙文汉同志戴上右派帽子的原省委负责人，感觉到今天这顶帽子戴不住了，又想找个理由为自己辩护而已！”^②

经过几番周折，到了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七日，中共浙江省

①中共浙江省委对沙文汉问题的复查报告，存浙江省委组织部档案室。

②孙冶方1979年12月27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转引自陈修良：《孙冶方革命生涯六十年》，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113页。

委在《浙江日报》上公布了对沙案进一步复查的结论，标题为《沙文汉同志错案得到彻底改正》，内称：沙文汉等四人“共同反党”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沙在省党代会上就党政分工问题所作的发言，“基本上是正确的”；沙的“一生没有被捕过，政治历史清楚”；所以省委再次复议认为，一九五七年将沙划为右派是错误的，应当彻底改正，并撤销有关决议，对因沙案而受到株连的同志，“应一律予以彻底平反，消除影响”。次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又在浙江省党代会上正式通过了撤销一九五七年党代会开除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四人党籍的决议，承认那个决议“是错误的”^①。至此，沙文汉这一大错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昭雪。

“文化大革命”中被砸烂的沙文汉墓碑已经修复，由沙孟海题字，重新树立在杭州南山公墓。这真是“青山有幸埋忠骨”，后人将永远怀念这位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为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奋斗了一生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陈修良：《沙文汉同志战斗的一生》，载《浙江革命史料选辑》（5）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 《张登自传》（即沙文汉自传）（1944年8月），抄件存陈修良处。
3. 沙孟海：《一个革命家庭的母亲——陈龄》，（油印稿，未刊）。
4. 《沙村座谈会纪要》（访问记录），1984年3月7日。
5. 汪成法等：《奉化暴动》，载《浙江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第3期。

^①1983年11月26日《浙江日报》。

6. 陈修良编：《沙文汉同志诗词选》（未刊）。
7. 刘晓：《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建前后》，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1辑。
8. 王尧山：《关于上海地下党重建的经过》，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1辑。
9. 谭启龙：《党在浙东地区坚持敌后抗战的概况》，载《浙江党史资料通讯》第4期，1984年4月。
10. 刘晓：《一九四七年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一些回顾》，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5年第3辑。
11. 张承宗：《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的人民革命运动》，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2辑。
12. 张执一：《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载《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第4期。
13. 王亚文：《向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工作的回忆》，载《革命史资料》（2），1981年出版。
14. 金学成：《解放前夕的工商界聚餐会》，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3辑。
15. 《沙文汉档案》，包括简历表，自我鉴定，以及错划右派及平反的有关材料，存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档案室。
16. 访问陈修良、唐守愚、沙孟海、史莽、彭瑞林、孙章录、史永、朱福炳、何其等的谈话记录及来往信件。

陈 刚

何 盛 明

陈刚本名刘家镇，入党时名刘作抚，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出生于四川省富顺县赵化镇。一九二四年中学毕业后，当了一年小学教师，由于不满家庭包办婚姻，于一九二五年毅然离家出走，到北京考入中国大学。当时正值国共合作高潮时期，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在风起云涌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许多有志青年受到大革命的洗礼，纷纷投身革命洪流，陈刚也是在反帝爱国斗争中受到锻炼，思想上起了飞跃的变化。他初进中国大学时，抱着强烈的求知欲，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除了课堂就是图书馆。以后逐渐参加了一些爱国反帝的学生运动，开阔了眼界，接受了革命思想。一九二七年一月，经徐廷栋、孙其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他对自己一生中这一关键时刻的回忆是“由柏拉图思想进入共产主义思想”^①。

陈刚入党三个月后，革命形势发生逆转。一九二七年四月，坐镇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兵搜查俄国使馆，逮捕并杀害了我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当时我党北方负责人李大钊。在南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时乌云笼罩着祖国南北大地，

^①陈刚《自传》。

“反共讨赤”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有些同志陆续从北京转移到外地，陈刚被调到北京西城区区委工作。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传来，西城区立即成立了军委，准备在十月组织武装暴动，陈刚任暴动总指挥。十月暴动未遂，陈刚、郑润民、唐在刚等被捕入狱，因李勃海、关天佑叛变，出卖了狱中同志，并指供陈刚是暴动总指挥。陈刚立即被提审对质，二十一岁正血气方刚的陈刚，在刑堂上横眉冷对，正气凛然，一见叛徒关天佑出庭对质，怒火万丈，大骂叛徒无耻。他堂堂正正地宣告：“我是刘作抚，共产党员，西区暴动总指挥，要杀就杀吧”^①。敌人要尽花招，企图软化、收买这个年轻的共产党人，经威胁利诱无效，最后判陈刚有期徒刑十二年。在狱中他机智勇敢地和敌人斗争，同时团结在狱同志，暗中串连、组织越狱暴动。不幸，越狱失败，只有郑润民、胡德芬二人脱险，其余参加暴动的人都被加了大镣手铐。虽然越狱计划未成功，但能有两个同志脱险，陈刚心中仍然感到欣慰，他继续鼓动大家要团结斗争，经受考验。他还在狱中开展统战工作，同狱有一个冯玉祥部的旅长刘一凡，他用谈心的方式宣传革命思想，作点滴的争取团结工作，逐渐得到刘的信任和器重。一九二八年五月刘一凡被保释出狱，即着手组织同志革命军热河先遣师，部队初建亟需用人，刘一凡通过社会关系把陈刚等人保了出去。陈刚出狱后设法与中共顺直省委联系，报告了出狱经过和先遣师的情况，省委决定派他们去这个部队工作。陈刚到先遣师后任该师少校参议，又利用刘一凡的社会关系，陆续营救了一部分同志出狱。

八月，先遣师组建工作就绪后，顺直省委通知陈刚和唐在

^①陈刚档案资料《被捕经过》。

刚去上海，由中央派赴江西苏区工作。陈刚到江西苏区先后任江西工农红军七十九纵队党代表，赣西南特委委员兼秘书长。一九二九年调江西省委任省委委员和特派员，巡视赣西南地区。江西春夏多雨，夏秋酷热，他常年手持雨伞，身背包袱，奔走于深山老林之中，有时同志们见他很疲惫，劝他休整两日再走，他笑笑说：“你们放心！我身体很好，只要饱吃一顿，睡上一觉，明天照样行走百里”。

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四岁的陈刚，被中央派为提款委员，以中央特派员的名义，到各苏区执行提款任务，这是个长年奔波而又担风险的艰巨工作。这一年的冬天，陈刚到江西苏区提款，他和交通员把江西上交的千余两黄金首饰，熔化成金条装成九龙带，各自捆扎在身上，外罩棉袍，爬山涉水，风餐露宿，日夜兼程赴送中央。途经赣西富田，碰上富田事变，陈刚化名易尔士，住在红二十军军部。十二月十二日，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率第一营包围了军部，陈刚与二十军军长刘铁超同时被扣捕。在大会上，不明真相的群众高呼口号，反对总前委。陈刚虽被捆绑与会，却勇敢的站起来说：“同志们，我是中央特派员易尔士，你们无权扣留我，把全部黄金还我带回中央。你们不要受欺骗，有什么问题应等待中央解决”^①。于是，会场气氛发生变化，有的人动摇了。江西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等只得将陈刚解缚，送到省行委暂住，并向陈刚汇报了富田事变经过，段说：“我们不反对党，不反对中央，也不反对总前委，我们是反对肃反中屠杀我们自己的同志”^②。还提出怕

^①陈刚档案资料《富田事变被捕》。

^②《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因误会，遭到红一方面军的攻击，发生内部战争，而有利于敌人，要求撤到河西等待中央解决。面对如此复杂的事件，年轻的中央特派员，一时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早在七月他巡视赣西南时，对李韶九的问题曾于七月二十二日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李韶九是三军（即西南的六军）一纵队政委，在部队出发前，训话非常勇敢，作战则畏惧怕死”，“一纵大部分人不满意他”，特别是北路地方党部与群众更反对他，曾“向特委建议撤销他的工作给予处分。”当时，用这样的人掌握肃反大权，滥捕乱杀难免激起民愤，但陈刚认为采取军事行动对抗是决不允许的。于是，他斩钉截铁地说：“你们应立即停止自由行动，听候总前委或中央解决。段良弼等有顾虑，坚决不同意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解决，坚持要撤到河西等待中央解决。部队撤到河西永阳后，又派人找陈刚谈，陈刚明确指出，如果你们真正觉悟悔过，愿听中央解决，我是中央特派员，就应首先听从我的意见，必须立即做到三点：第一，无条件恢复我和刘铁超的自由；第二，停止一切叛乱活动，同我和刘铁超一道去总前委解决；第三，把我带来的黄金还我，还要将省苏维埃应上缴的黄金与现钞全部交我带去前委转中央^①。段等同意听候中央解决，当晚把陈刚和刘铁超送走。肩负重任、腰缠千金的陈刚不敢久留，立即和交通员起程，历尽艰辛，穿越敌人重重封锁，把千两黄金安全运送到了上海，并向党中央汇报了富田事变的真实情况。

一九三一年四月至七月，蒋介石纠集几十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接连发动了两次“围剿”，同时加深对白区中共党

^①陈刚档案资料《富田事变被捕》。

组织的疯狂破坏。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重，局势更加复杂，上海不仅间谍特务密布，更有叛徒当鹰犬，党的地下活动处于十分险恶的环境。正是这年的五月，陈刚被调到中央交通局工作，负责国际国内情报和交通联络。秘密交通工作，是联系党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交通线路，负责传达中央指示、文件；转运物资；发送经费；接转各地来上海联系的交通，周密安排接头地点，以及他们的食宿安全；还要接转和护送路经上海到各苏区的各级干部；安排出国或回国干部的接头。他们作为党的耳目，还要密切注意收集敌人的动态；及时发送警报，迅速安排和掩护同志转移。这条战线在党内被誉为党的神经系统。为了做好这项重大的工作，陈刚于一九三一年五月至八月，在上海开设木器店作为党的联络点，同时通过商业经营，与社会各方面取得广泛接触的机会，了解社会情况。八月正式接手交通局工作，当时各省派交通员到上海联系工作很频繁，陈刚细心安排和检查接头地点、联络方式。各地交通员到上海常常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错过接头时间，或临时必须改变接头地点而失去联系。陈刚从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和对同志的关心，总是安排交通局的同志千方百计找到他们。因为这些交通员都是身负重任来到上海，人地生疏，如若失去联系，不仅安全受到威胁，有时连生活都成问题。同年十月，河南省委派出交通员李子健到上海，陈刚得到通知后，立即安排好联络接待的准备。李子健来到上海，身揣一只接头用的瓷水牛，按接头规定，必须住进其昌旅馆，把瓷水牛摆在房间的桌上，就会有人来联系。李子健到达上海的当天，恰好其昌旅馆出了事，旅馆内外都有特务监视，要有铺保才能住宿。李子健住不进店心急如焚，接头时间只剩下两天了，只好先找一家小店住下，再

揣着瓷水牛到其昌旅馆附近去观察。当李子健为联系不上而焦急万分的时刻，陈刚早已得知其昌旅馆出了事，及时布置了两位同志在旅馆附近等候。李子健在其昌旅馆附近转游时，突然急中生智摸出瓷水牛在街上叫卖，被陈刚派去的小王发现，通过联络暗语接上了关系，以后李子健就留在上海交通局，负责北线各省、市的交通联络工作。几个月后陈刚由小王带去李子健处，小李第一次见到这位久已闻名的领导人，不觉大吃一惊。只见这位相貌堂堂、身材魁伟，肩宽胸阔的领导者，身穿灰色哗叽大褂，手提一个黑色大皮夹，活象一个阔绰的绅士。以后李子健发现陈刚的内衣十分破烂，便开玩笑说：“你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呵”，陈刚立即借机对小李进行教育，他郑重地说：衣服对我们有两用，一是保暖蔽体，二是应付敌人。我们要学会伪装掩护自己，并叮咛小李在布置住房和服饰上，也要考虑适合他当时乔扮“坐庄掌柜”的身份。

一九三四年四月，河南省委通知中央交通局将派来一位名叫张贺的医生，由上海转送中央苏区，陈刚及时派出交通员去接头，而那位医生却早到了两天，交通员怕错过时间，在静安寺路横穿马路时发生车祸，未能接到人，张贺医生孤身住在旅店里，引起特务的怀疑，把他抓到公安局审问，又抓不到什么把柄，张贺终于斗智脱险，被交通局的“小机灵鬼”们找到。

交通局的同志多是年轻人，都有一股子初生之犊不畏虎的猛劲，在紧张战斗中常常忽视生活安排，有时饱一顿饿一顿，甚至忘了吃饭。陈刚对他们十分关心爱护，对他们的衣食住行都经常检查，尽可能给以安排照顾。有个交通员因忙于找外地来的同志接头，一天没功夫吃饭，到事完后才在一家小食店胡乱吃了一点不卫生的东西，因此食物中毒，正上吐下泻，腹痛

得在床上打滚，恰好陈刚去检查工作，见此情景，立即忙碌起来。他还真有一点江湖郎中的本领，上街买了一些胡椒面，轻轻吹进病人鼻孔，又在病人身上扎了几处银针，疼痛立即得到缓解，他象亲人一样守护在病人身旁，直至病人渐渐入睡。在工作上他对年轻的交通员们的要求十分严格，特别强调组织纪律，如果有人犯了纪律，他是决不放松的。一九三三年八月满洲派来的交通员迟走了两天，陈刚知道后立即追查，了解是负责北线交通的同志要求不严，允许他迟走了两天，他立即找到负责北线的交通员李子健，严厉指出：东北抗日联军在同日寇生死搏斗，处在紧急关头，满洲省委派出交通员来请示，准备发动罢工斗争来支援，立待中央指示，你竟马马虎虎，随便同意交通员迟走，他越批评越上火，竟瞪起眼睛，拍起桌子来了。“这是贻误军机的大事，简直是对革命犯罪”。陈刚严厉的批评，使小李深刻认识到纪律对于地下交通员的极端重要性。竟后悔得流出了眼泪。为了使小李不感到紧张，陈刚用缓和的口气对小李说：好了，别哭鼻子了，有缺点改了就是，我也有缺点，对你帮助不够。接着又仔细讲地下交通工作对纪律和时间的重要性，一点也马虎不得，一定要保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作风。直说得对方心服口服。

交通局的同志在陈刚领导下，长期与敌人斗智周旋，多次化险为夷。一九三三年三月中旬的一天早上，陈刚身揣反日救国、抗捐抗税、准备配合反“围剿”，发动年关斗争等党的重要机密文件到各联络点分发，当他走到小沙渡路口，突然发现前面闹哄哄的，有许多警察特务正在抓人，他急忙闪进一条弄堂，不料迎面走来两个便衣警察拉住行人搜身，这时退避已来不及，身揣的机密文件岂能落入敌手，真是千钧一发，十分危

急！他内心着急，却面不露色，摆出一副有身份的“绅士”派头，冲着警察走去，当警察用枪对准他要搜身时，他瞪着眼怒斥“干甚么”吓得警察倒退一步，他便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当同志们知道他街头遇险，临危不惧，威镇警察的事，大家都惊羨不已，称赞他具有古人所说猝然临之而不惊的“大勇”，他却鼓励大家说：“什么大勇、小勇，共产党人为广大劳苦群众谋解放，应将生死置之度外，胸中有正气，就能压倒一切敌人。”①一九三四年三月底，要由上海向中央苏区转运一批珍贵的药品和医疗器材，这是敌人严防运往苏区的物资。陈刚作了精心部署，亲自包装安排，他对同志们说：“这批物资是中央苏区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材，而敌人严禁运出，我们就是要冲破这个封锁。同志们要特别小心！坚决完成任务。”②当四大箱货物在十六铺码头托运时，有两个既有特殊检查监视任务，又专门找旅客敲竹杠的流氓包打听，拦住货物要检查，交通员小黄正难于应付，忽见陈刚坐着一辆黄包车赶到。他身穿一件藏青华达呢大褂，戴一顶灰色礼帽，架一副金丝眼镜，提一根文明手杖，夹一个公文皮包，威风凛凛。小黄喜在心里，赶紧机灵地迎上去说：“这些小事何须你老人家亲来照应”，边讲边弯腰让坐。陈刚绷着脸，大咧咧地坐下，随手把帽子仰放在桌上，以威严的口气说：“为什么还不上船？”小黄连忙后退一步说：“这个……”陈刚假意大声怒斥道：“这个什么嘛！我在‘社’里早知道有人找麻烦，抄我的靶子，真是岂有此理！也不打听打听咱爷儿们是干啥的！”边说边解开上襟一

①李子健：《瓷水牛》，载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编印的《革命回忆录》（一）。

②李子健：《瓷水牛》。

个纽扣，两个包打听一见陈刚这气派早已心虚，又见他仰放帽子和解开上襟，这是帮会“老头子”架势，连忙点头哈腰陪不是。陈刚又摸出一纸“公文”往桌上一拍，指着货物“要拿你们就一起拿走吧”。两个流氓特务吓得看都不敢往桌上看，连说“不敢，不敢”，匆匆退后溜走，这批珍贵的货物便顺利地上船起运了。陈刚战斗在上海的四年，是他政治上的成熟期，烈火炼真金，实践增才智，在艰苦险恶的环境里，在特殊的战线上，使他的革命意志愈炼愈坚强，也练就了一身对付敌人的特殊本领。陈刚在上海负责秘密交通战线的四年，正是革命低潮时期，上海党组织接连受破坏，斗争环境异常艰苦，陈刚率领交通局的同志们日夜奋战，在上海神出鬼没，使党的红色交通线一直畅通无阻。在这默默无闻的党的秘密交通战线上，凝铸着他和他的战友们的心血，闪烁着他们青春的光华。

一九三二年二月，陈刚和何叔衡的女儿何实山在上海结婚。何实山在上海也是一个机警的交通员，参加南线发送文件和经费的工作。在工作中他们结下深厚的战斗情谊，何叔衡在上海担任共产国际救济总会工作时，也十分器重陈刚。他们结婚后，陈刚对实山要求很严格，按交通员工作纪律，除工作外不能随便上街，更不能串门访友，当时上海正在上演轰动一时的电影《渔光曲》，年轻的实山，还没有看过一次电影，十分想看，陈刚坚决不同意，不因是自己爱人而稍有让步。实山还保管交通经费，陈刚要求一月一结，决不允许发生错差，有一次差三角钱，陈刚帮她复查重算，一直算到深夜仍查不出，实山感到很不过意，她想陈刚一天劳累，晚上应该让他休息；就说三角钱我补上，就不查了吧。陈刚竟有些生气，他说“有多就有少，一定要查清”。实山文化较低，陈刚经常抽空帮助

她提高文化和理论水平。陈刚经常出外工作，实山在生活上十分体贴照顾，陈刚喜欢吃肥肉，但当时两人只有二十元生活费，伙食吃得很简单，实山省吃俭用，给陈刚买些咸肉吃。他们无论在艰苦环境或建国以后，始终是互相尊重，互相支持。

一九三五年五月，陈刚告别年轻的妻子，随同孔原一道去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闭幕的当天，也就是八月二十日，何实山也随陈云、杨之华等到了莫斯科，以后，陈刚夫妇俩就留莫斯科，同时进入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度过了两年紧张、刻苦的学习生活。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他们结束了学习生活，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临行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季米特洛夫接见了他们，当面交代他们回国后，就在上海参加共产国际联络点的工作，并交待了他们如何在上海接关系。五月，陈刚夫妇回到上海，由于形势变化，已无法接上关系。年底，他们取道新疆到了延安。一九三八年春，陈刚由组织分配，参加敌区工作委员会的组建，负责干部部工作。他十分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在延安主持办了八期特别工作训练班。他除重视课程安排、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外，还十分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注意加强忠贞勇敢、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教育，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对当时一些刚参加革命的同志，有很强的感染力。他还很注意对干部的熟悉和了解，经常找同志谈心，思想工作做得很细。如在分配林一做机要秘书时，他仔细地对林一讲明机要工作的重要性，工作中要严肃认真，不辜负党的信任。特别强调机要工作的保密性，第一、做到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讲的不讲；第二、工作要细致，不能出差错；第三、工作要及时，到手立即处理。通过陈刚的谈话，林一打消了顾虑，增强了信心，愉快

地走上了工作岗位。整个训练班为党培养了大批保卫工作的专业干部，在抗日战争时期，分送到各抗日根据地各级党委部门工作，他们战斗在锄奸肃反的第一线，活跃在日伪统治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直至建国后也是保卫战线的主要骨干力量。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由于日寇的疯狂“扫荡”，国民党的包围封锁，陕甘宁地区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进一步号召解放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在大生产运动中，陈刚兼任枣园中央机关生产委员会主任。他积极筹组了枣园农场，以身作则，亲自参加农场管理和田间劳动，还组织运输队解决生产供应问题。枣园机关生产，在陈刚直接领导和操劳下，副食品和办公费用都做到自给有余，对大生产运动起到了带头和推动作用，他被评为特等劳动模范，受到边区政府的嘉奖。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枣园石匣玉农场生产队副队长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因炭窑崩塌而牺牲。身为枣园中央机关生产委员会主任的陈刚，为战友的牺牲十分悲痛。他亲自为张思德换衣、入殓、抬棺、下葬，并组织了隆重的追悼会。他把张思德的事迹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九月八日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演。

一九四二年全党开始整风，陈刚积极参加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他眼睛不好，又患有高血压病，但他常常在油灯下学习到深夜。还亲自检查一些同志的学习情况，勉励大家为了做好革命工作，一定要加强学习。整风期间，李克农向整风委员会汇报枣园机关整风情况时，谈到了陈刚吃苦耐劳，廉洁奉公的好作风，毛泽东听后表扬说，陈刚是个好同志。又

说，陈刚在困难时期，跟大家同甘苦，共患难，很值得表扬^①。在整风运动中，陈刚对一些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尽可能予以保护。如有人揭发机要科的申余，说他主编的“机要科的墙报是资产阶级的宣传工具”，还说申余“写了许多稿子是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相呼应的”。申余因而被送到西北公学受审查，长期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非常苦闷伤心。陈刚知道后，他把几十张墙报逐篇细看一遍，发现申余只写过一篇短文，而且没有错误。他查明事实真相后，如实向组织作了报告。以后，为了解除申余的思想负担，特地找到申余，对她说：“机要科墙报你没有错误，你只写过一篇短文，经过审查认为内容还是正确的，组织上早已查清了，你要丢掉思想包袱，大胆工作。”申余听后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从她盈眶的热泪中，表达出发自肺腑的感激之情。

整风运动结束后，一九四五年四至六月，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陈刚被选为七大代表，党组织在他的代表资格鉴定上写的意见是：“陈刚同志在敌人的监狱中、刑堂上，坚贞不屈，在长期的白区工作中，在最秘密、困难、危险的环境中，出色地完成了党的任务。”

抗日战争结束后，党中央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了加强争夺东北战略基地的力量，决定从延安和各解放区抽调大批主力部队和几万名干部到东北。陈刚根据中央领导指示，于一九四五年十月，率领枣园中央机关干部百余人，从延长出发，奔赴东北。他虽

^①1984年5月国家安全部部分同志座谈提供资料。

配有一匹马，但却一直坚持步行，把马让其他病弱的同志骑。一九四六年六月陈刚一行到达东北。陈刚一再要求下基层，经组织同意派到合江省的依（兰）勃（利）桦（南）地区任中心县委副书记，兼桦南县委书记。依勃桦地区在松花江南岸，东靠苏联，气候寒冷，是国民党残兵、特务、土匪、汉奸猖獗成灾的地方。桦南是个仅有六万人口的小县，东面有大山，山高林密，是过去东北抗日联军活动的地区。东北解放后，许多打着国民党或东北治安军旗号的政治土匪窜据在这一带山区，不时出来扰乱，老百姓顾虑很大。陈刚初到桦南时，只带了一个独立团的武装，因兵力不足，打土匪还不能远追，只能守住县城。他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采取步步为营的办法，逐步向县城附近的乡村开展工作。首先，他带了一、二十人的武装到城西二十多里的天主堂村去开辟工作，在群众中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开始还不敢住在那里，当时他身患关节炎，行动不方便，但在一天劳累之后，还要和大家一道步行回城。天主堂村工作稍有头绪后，他又率工作队到城南七八十里的复兴村开辟工作。这时，北安村有个恶霸地主闻风蠢蠢欲动，陈刚派出武装抓了这个民愤极大的恶霸，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公审，对群众鼓舞很大，党的政治威信大大提高，使桦南整个工作局面很快打开。当时派到桦南的干部和武装多是工人同志（独立团就是当时任依勃桦中心县委书记陈郁在大连时组织的工人武装的一部分），都不熟悉农村工作。陈刚带队下乡，在实际工作中培养干部，如彭光伟初调阎家区任区委书记时，工作局面一时打不开，一次在汇报工作中，陈刚说：“搞农村工作要抓季节，主要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根据群众需要办事，这样就可以打开局面。彭把这几句话记在心上，适时指导当时工

作，果然收到实效。桦南寒冬早，十月开始下小雪，十一月下大雪。一九四六年十月底，阎家区正进入抢收季节，一股土匪突袭阎家区司令沟，把所有的牲口抢走，使粮食抢运发生极大困难。彭光伟在陈刚的启示下，立即召开各村负责人会议，集中各村牲口全力支援司令沟，仅一天时间就把玉米抢运回家，得到群众拥护，打开了工作局面，还受到县委表扬。陈刚十分注意对本地干部的培养和选拔，他在梨树园子工作时，培养和提拔了本地干部孙广辉为区长，以后选拔到县里任桦南县县长。在清匪反霸中，他发现一个恶霸地主的长工，在斗争中积极勇敢，经培养选为乡农会主席，以后提为县农会主席。陈刚在桦南工作一年多，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发动组织桦南人民粉碎反革命武装，开展土地革命运动，为开辟和建设东满革命根据地，把东北建设成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基地，作出了一定贡献。

一九四八年五月，陈刚调吉林市委工作，十月调长春市任市委委员兼民运部长。十二月调回党中央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以后随中央机关到了北平，一九四九年八月，他又请求参加解放大西南的战斗，经中央同意调西南服务团工作，任服务团五大队政委。四川解放后，中央要他担任川南区党委的领导职务，而他再次要求到基层工作，后由组织决定担任川南区党委委员兼内江地委书记。他原是内江地区富顺县人，从一九二五年离开家乡已有二十五年。他怀着回乡的欣喜来到内江，十分想为家乡的建设贡献力量。他一到内江，就对城乡经济和各阶层情况进行调查了解，立即抓紧征收公粮和稳定市场物价的工作。征粮工作曾一度进展迟缓，陈刚就到内江县三区几个乡进行调查、座谈，他十分尊重基层干部的意见和各方面的反

映。根据内江生产甘蔗，缺乏粮食的实际情况，决定实行以糖抵粮，并订出合理的抵折比例，受到群众拥护，促进了征粮任务的顺利完成。一九五〇年春节前，内江市场曾出现抢购食油的邪风，引起了陈刚的警惕。他果断地采取紧急措施，使抢油风很快平息，稳定了人心，也打击了少数不法商人。为了使内江人民过好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陈刚十分注意春节的粮食供应问题。他到粮食部门查问市场供应和库存情况，指示粮食部门的同志不仅要学会做生意，还要善于和不法商人作斗争。陈刚不只是交任务，还和大家一起研究如何从实际出发，正确处理当时国家粮食牌价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如何调动和发挥各县粮食部门的力量，尽快组织货源等，保证了春节的粮食供应。在稳定物价、征粮剿匪的同时，他又积极组织力量着手制糖业的恢复。内江地区盛产蔗糖，内江市素有甜城之称。抗战时期，全区最高年产糖量达十六万三千多吨。解放前的一九四九年年产糖量只有二万四千五百吨。为了尽快恢复糖业，陈刚组织有关部门干部下乡，动员糖房复工，砍蔗开榨，还由人民银行发放贷款，帮助解决复工中缺少资金、煤炭等实际困难，使全区甘蔗和制糖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至一九五二年甘蔗总产量已达十四亿六千多斤，产糖量达四万多吨，比解放初期翻了一番多。其次是正确贯彻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安定了人心，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一九五二年秋，陈刚调任中共四川省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一九五六年任省委书记，直至一九六三年调西南局任书记兼中央监察委员会西南组组长前，他主管四川工业生产长达十余年之久，为发展四川地方工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一贯重视调查研究，根据实际情况解决问题。在他主管

城市工作委员会期间，每年要组织和率领干部，到各地工厂进行几次调查或蹲点工作。一九五三年我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恢复阶段的四川工业，开始欣欣向荣地进入发展阶段，许多工业开始基本建设，一些重点矿区开始勘探。陈刚除积极筹划发展四川工业的整体规划、选点布局，统筹安排外，还经常爬山涉水进行实地考察。一九五三年彭县铜矿刚开始勘探，他先后几次到白水河铜矿，爬上大山区马松林矿区，和采矿工人一起生活，和勘探工人一路勘察矿层露头，一直下到矿洞进行详细勘察，对彭县铜矿初期勘探工作，提出不少切实可行的意见。也是这一年，四川开始了石油勘探工作，他亲自率领干部到江油、自贡、隆昌、简阳等地，了解地质构造生成情况，探索四川油气生成的规律，并组织干部到各个探区进行蹲点调查。为了掌握地质的基本知识，他认真阅读了李四光著的《中国地质学》，还经常找曾鼎乾等高级技术人员研究四川石油地质情况。同时，很注意在四川工作的苏联专家对开发四川石油有关勘探工作的意见，力图从四川复杂的地质构造中探索出一条科学的石油生成规律来。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工业战线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他掌握全局，不断组织新的平衡。工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能源燃料不足的矛盾，他率领计划、工业、交通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工程技术人员，到珙县山区考察，进一步开发煤炭资源，对开发芙蓉矿区提出了合理的规划。为解决矿石供应不足，根据地质部门提供的报告，他又带领有关人员奔赴巫溪，爬越了一百多里的陡险山路，到桃花矿区实地勘查，发现运输问题一时难以解决，便选择开发泸沽铁矿，由成昆铁路转运矿石的方案，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个主张是正确实用的。

同时，由于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工矿企业旧有的一套管理方式已愈来愈不适应，而当时大批管理干部多是才从各个岗位转业到工业战线，既不懂工业生产业务，又缺乏企业管理的知识。陈刚要求他们努力学习，尽快掌握领导管理工业建设的知识。同时组织干部深入基层，使他们从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因此，当时城工委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组织干部下厂蹲点，加强调查研究，帮助基层建立社会主义企业管理。陈刚经常到岷江电厂、威远煤矿、宜宾纸厂、曾家山煤矿、威远钢铁厂等企业调查，并在岷江电厂蹲点进行查定工作的试点，分析、总结了定额管理工作中的优缺点和经验，工厂党委如何在建立企业管理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通过以点带面，逐步在厂矿企业建立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岗位责任制和经济核算，不断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为四川工业建立社会主义的科学管理，初步摸索和积累了一些经验。

他在工作上深入细致，脚踏实地的作风，给四川工业战线的广大干部留下深刻的印象，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一次，一个企业领导干部向他汇报工作，谈到铸件废品率高的问题，陈刚立即追问原因，回答是气眼多。又问为什么气眼多？汇报者就答不上来了。他接着说：“你们要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工作作风，钻到沙眼里面去和技术人员、工人一起，认真找出原因，研究解决办法。他下厂工作不是先听工厂领导的汇报，而是首先深入到工厂现场，他到威远、永荣等矿区，都是先下到井巷，了解工人井下作业的情况，甚至深入到各个工作面，了解井巷开拓、采掘、运输等实际存在的问题，然后召开老工人、班组长、技术人员等各种座谈会，听取各方面对生产的意见，这才找矿的领导干部听取情况汇报，共同研究问题，如果

汇报中只能讲一般化的问题，他就把生产现场了解到的和群众会上反映的问题和意见，提出来和基层领导们研究解决办法，不仅有助于推动基层工作的深入发展，也能使他们感到工作深入实际不够，而有助于工作作风的转变。一九五四年威远煤矿推行长臂直线采煤法，他亲自深入到井下工作面，和技术人员、工人一起，共同研究总结了推广这一先进采煤法的布局、条件以及优缺点，还详细了解了工人的思想状况，总结推广中如何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然后召集有关部门开现场会，率领大家下井边看边学，不仅使大家学到了先进技术、工作方法，还学到了政治工作如何结合经济工作的好经验，收到了阵前练兵的实效。

陈刚是分管工业的书记，但胸怀全局。一九五三年在农村社会主义运动即将进入高潮之时，他即预见到农业生产的发展，将给工业生产提出新的课题，他积极组织有关部门，切实安排了磷肥、农机、电力、交通运输等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为建设四川省支农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一九五六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刚下达，他立即组织有关干部学习，联系发展地方工业的实际，贯彻工业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他还带领工作组到永川，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提出了发展地方工业应该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面向农村的方针和相应的计划安排，受到省委的重视，在四川省第一次党代会上讨论通过。

一九五六年他被选为党的八大代表，中央监察委员。

在他任西南局书记主持监察工作期间，对每个案件都要经过反复调查，从不轻率处理。一九六五年监察组收到一封匿名信，检举一个干部是美蒋特务，藏有“秘密电台”，这是一件

涉及一个同志政治生命，甚至身家性命的大事，陈刚没有轻信匿名信的揭发材料，他指定专人调查，查明纯属挟嫌诬告，这个诬告人就是监察组的一个干部。陈刚对这种诬陷同志的行为十分气愤，根据调查结果，对诬告者给以留党察看和行政降级的严厉处分，打击了邪气，保护了干部。

陈刚身肩重任，职务愈来愈高，生活待遇也逐渐改善，但他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从不以权谋取私利。他任内江地委书记期间，原分配他住一幢没收的小洋楼。他坚决不要，最后让另一位孩子多的领导去住了，他只在办公楼上要了一小间作寝室。一次因重病由内江到重庆就医，他坚持按医院规定，排队挂号依次应诊，经医生诊断是伤寒，才作为病危抢救处理，住进了医院。他刚能下床，就帮助病友倒水、喂药、拖地板、倒便盆，使大家深受感动。直到他病愈出院，病友和医护人员还不知道他是地委书记。他担任省委书记以后，身边仍然不离两件珍品，一是早已磨成平板的人字呢大衣，那是一九三七年在莫斯科由共产国际赠送的，虽已破旧不堪，领子、袖口补了又补，但他仍舍不得丢掉，进川后组织上发了一套呢子衣料，他却送给了缺衣的警卫员。二是三十年代在白区工作时组织上发的一只怀表，入城后他一直舍不得换新，经常在工作时把怀表掏出来看看、听听、摇几下，侧头问身边的同志：几点了？同志们不由地笑劝他该换只新表了，他笑眯眯的说：“还可以用嘛！”陈刚下厂下乡从不许当地为他设宴，即使一般的招待也不允许。他经常在途中找个清静的小饭馆，吃顿豆花饭，加碟小菜和泡菜，边吃边和老乡闲聊，吃得津津有味。一次他到边远的盐源县，当地为省委书记第一次远来，准备了比较丰盛的酒菜招待，陈刚严肃地说：我们是来工作的，不要把我们当

客人，省委书记也不应该特殊嘛！最后，只吃了一顿便饭，跟随他一起出差的同志对陈刚这种不搞特殊的优良作风，至今感佩不已。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陈刚被“勒令”检查，同年底被关进“牛棚”。在反对所谓“二月逆流”时，那些别有用心的家伙逼迫他揭发朱德、贺龙在四川策划“二月兵变”的内幕。在大抓所谓叛徒时，又逼迫他交待什么“通敌”、“叛变”等“罪行”。揭批他是李（井泉）廖（志高）的“死党”和“干将”，是“迫害”刘（结挺）张（西挺）的帮凶。六十多岁的陈刚，身体遭到摧残，精神受尽折磨，他没有屈服，但被折腾得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齐发。他的生活无人过问，疾病得不到治疗，却被“造反派”从病床上拖起来，逼着去看“揭发”他的大字报。由于病体不支，竟摔倒在大字报棚前。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陈刚含恨离开了人间。正当“四人帮”及其在四川的代理人刘结挺、张西挺一伙急于处理尸体，妄图焚尸灭迹的时候，传来了周恩来的指示：陈刚同志的政治历史是清楚的，这个由中央负责，你们必须保护遗体，查明死因上报。经过成都、上海、北京、武汉等地医院医生会诊、解剖、化验、鉴定，一致结论是：“由于心脏病恶化，发生急性心力衰竭致死”。可是这个结论被压制封锁，拒不向周总理报告，也不让家属知道，使陈刚的遗体长达六年之久不能安葬。直至一九七三年五月，中央批准为陈刚举行追悼会，沉冤才得到昭雪。一九七九年四月，他的亲密战友许梦侠、杨超、刘海泉、宫搵书以“一片丹心，一身正气”为题，在《四川日报》发表怀念的文章，文章写道：“陈刚同志为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赴汤蹈火，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实践了入党

誓言”。“现在，国贼已除，冬去春来，英灵有知，当会含笑九泉！”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陈刚档案资料：自写履历、自传、被捕经过、富田事变被捕、自我鉴定、工作检讨和总结、思想检讨等。
2. 许梦侠、杨超、刘海泉、宫榭书：《一片丹心 一身正气——深切怀念陈刚同志》载 1979 年 4 月 19 日《四川日报》。
3. 陈刚同志被害致死情况——摘自四川省委整党检查组调查编印材料。
4. 1984 年 6 月国家安全部部分老同志座谈整理材料《艰苦奋斗的模范 枣园好传统的一个典型——深切怀念陈刚同志》。
5. 李子健：《深切怀念陈刚同志》、《瓷水牛》载重庆市委组织部编印《革命回忆录》（一）。
6. 熊志华：《秘密交通工作回忆及其他》载《上海党史资料》1980 年第 3 辑。
7. 李培南：《四年交通工作纪实（1930 年 4 月至 1934 年 1 月）》载《上海党史资料》1981 年第 4 辑。
8. 高文华：《关于上海地下党工作的几点回忆》载《上海党史资料》1982 年第 1 辑。
9. 1984 年 12 月吴允中同志口述陈刚在江西工作及富田事变前后情况。
10. 曲日新：《培养青年 循循善诱》。
11. 杨长春同志回忆：和陈刚一起在桦南工作情况。
12. 彭光伟同志 1984 年 10 月 9 日于四川茂汶口述《陈刚战斗在桦南》。
13. 内江地委部分老同志座谈、搜集、整理提供《陈刚同志在内江》。

14. 原四川省委城市工作委员会部分同志口述回忆提供资料。
15. 石础（原名何实山）：《我对陈刚的怀念》、《关于陈刚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情况》、《我的经历》。
16. 孔原、许梦侠、杨超、英德、王炎堂、盛炳道、刘志汉、申余、林一等几十位老同志函复或口授对初稿（征求意见稿）的补充、修改意见。

熊 寿 祺

中央民族学院
《熊寿祺》编写组*

(一)

熊寿祺，字景昌，号唯知，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四日生于四川省邻水县福兴（长滩）乡周家湾。父亲熊大沛，是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清末进成都法政学堂读书，辛亥革命后，任邻水县议员，是有名望的中医。他希望独子熊寿祺学好中医、法律、堪舆^①，以保身、保家、保世。

熊寿祺六岁启蒙，读经书。其父怕他染上旧社会的不良习气，规定不准外出，不准赶场（上街），家中专聘教师，闭门教读。熊寿祺记性悟性都好，能诗文，秉性诚实，颇受师长器重。十五、六岁时，受“五四”思潮的影响，厌恶封建文化，很想外出读新书。但其父封建观念浓厚，反对读新学。他只好在家阅读《资治通鉴》、《三国志》、《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历史文艺书籍。一九二二年，熊寿祺学了《蔡子民先生言行录》、《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吴虞文录》等五四时代的新书，感到别有天地，更不满塾师

*本传由方效功（一至七）、张永君（八）、何宗荣（九至十）撰写，方效功统编定稿。

①堪舆：即“风水”，迷信术数的一种。指相宅、相墓之法。

的迂腐说教和父亲的束缚。一九二三年，母亲病逝，父娶后母。和熊寿祺志同道合的五姐，抗婚跑到邻水县城读新学，也重病夭亡，这使他更加感到苦闷和孤独。一九二四年春，他得到叔父母的支持，悄悄从家里逃出，考入邻水县立高等小学。入学后有较多机会读到新书，思想更开豁了。由于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是该校优秀生之一。和好友交谈中，他提出为人要作大事业，要以天下为己任。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开展反帝宣传，声援上海工人和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当时邻水县旅沪学生苏幼农、张晓飞等从上海把五卅运动的宣传材料寄回邻水广泛传播。点燃了邻水这个落后小县的革命之火，熊寿祺开始接触到革命。为抗议帝国主义制造的五卅惨案，他和苏雁秋、熊湘皋、李映白、李修业等一起组织同学罢课，高举“还我河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标语牌，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并发动进步同学，沿街讲演，组织后援会，到各机关团体募捐到二百余元，寄往上海总工会，支援上海工人的大罢工。

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当时邻水县旅京的进步青年，受革命群众运动的影响。组织“新邻社”，创办刊物《新邻》，向群众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提倡妇女解放，婚姻恋爱自由的新思想，传播马列主义。熊寿祺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浅说》、《新邻》等书刊，使他受到革命的启迪，初步接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忧国忧民的思想日臻强烈。这对他以后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回忆说：“这时，才知道了反帝、反军阀的道理，联系自己的家庭，也必须反了。”同时感到自己年岁已大，还读高小，觉得后人。因此，高小还没有毕业，就决心出夔门，到川外去见大世面，探求新知识。一九

二五年秋，他违抗父命到武昌，考入武昌私立中和中学读初中。在武汉时期，熊寿祺是党的外围组织醒民社的成员，参加学习党的文件，还读了《共产主义ABC》、《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什么》、《向导》、《中国青年》等，对革命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对中和中学不问政治，死啃书本的沉闷空气日渐不满。他得知上海革命分子多，上海大学有附中可上，于是抱着“胸怀大志，舍死革命，气吞长江，再望父母”^①的宏愿，到上海投身到滚滚的革命洪流中。

(二)

一九二六年秋，熊寿祺入上海大学附中读书，挚友苏雁秋除继续给他找来革命书报让他阅读外，还带他秘密去散发革命宣传品。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苏雁秋介绍他与共产主义青年团上大支部书记杨振铎接头，宣誓加入了共青团。

一九二六年冬，熊寿祺和群众一道，沿街宣传打倒军阀孙传芳和欢迎北伐军，被包探逮捕，拘入上海南市淞沪警察局。因警官查无证据，关押了十天后，宣布取保释放。

出狱后，熊寿祺由团江浙区委派到虹口区，领导该区机器厂的青工运动。一九二七年三月，他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熊寿祺率领虹口青年工人参加全市总同盟罢工，随即到宝山路取运枪枝子弹，参加攻打上海北火车站。在铁路工人的配合下，成功地占领了车站。这次行动，显示出他的组织才

^①熊寿祺离开武汉去上海前给父母的信，引自“邻水县长滩乡志”

干。当天晚上，他挥毫写下《革命歌》^①号召人民起来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

社会是一个很科学的牢笼：
它把我们禁锢了，
它把我们束缚了，
它把我们吞噬了，
我们还不知其罪恶！
——还只咀咒着蔚蓝色的苍天。

……

人们啊！
醒啊！
社会之谜，
已被我们先觉的朋友们揭破了！
我们要振作精神去追随，
鼓着勇气去革命！
革命啊！
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解脱。

……

人们啊
醒啊！
革命啊！
冲锋啊！！
流血啊！！！！

^①《新邻》第25期，1926年出版，存四川省邻水县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解放，
才能使我们快活。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四月十三日，熊寿祺带领虹口区机器厂的工人群众，到宝山路参加游行请愿，要求国民党发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支，释放被捕工人，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屠杀。国民党反动派天天抓人杀人，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根据党的指示，熊寿祺转入地下工作。

一九二七年五月，熊寿祺奉命调往武汉，由团中央派赴汉阳黄陵矶，作团的区委书记。他深入基层，利用各种场合，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据张执一回忆：有一次，熊寿祺去黄陵矶小学参加游艺晚会，跟几个青年谈当时的革命形势，讲为什么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什么要打倒贪官污吏和铲除土豪劣绅的道理，并动员他们参加共青团的组织。

七月十五日，武汉汪精卫集团公开背叛革命，国共分裂，形势剧变。七月二十三日，熊寿祺被调回武汉。进入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干部连当兵，开始了戎马生涯。警卫团团长沙德铭，连指导员宛希先，班长何长工，同班当兵的有陈士渠等。他入伍后，由团转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三)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日下午，熊寿祺随警卫团乘船东下，准备和南昌起义部队靠拢。航行两天，侦察得知武汉军分校的学生，在九江被张发奎缴械了，不能通过。警卫团当即决定从阳新县黄颡口登陆。登陆后，沿武宁、靖安前进。到奉新后，了

解到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南下，南昌被张发奎的部队占领。卢德铭召集团的领导干部研究，决定改变追赶南昌起义部队的计划，率部开往修水、铜鼓，一面休整，扩充部队；一面筹备钱粮，等候命令。团长卢德铭因要暂时离开部队去武汉请示中央，警卫团由第一营营长余洒度代理团长，指挥部队。

部队在修水训练一个月。江西省主席朱培德闻讯派人到修水，要收编这支队伍。为了缓和与朱培德的矛盾，警卫团决定派宛希先去朱培德部交涉，以受编不受调为条件，接受“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番号。这时，卢德铭从武汉回到修水，带来了中央指示：把部队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由卢德铭担任起义部队总指挥。熊寿祺被调到团部参谋处当服务员。

九月九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了。一团由修水出发，去打湖南平江的长寿街。第二天，当部队攻击敌人时，四团邱国轩部突然叛变，从后面开枪与敌人夹攻一团。部队被冲散，熊寿祺集中起几十名被冲散的战士，在铜鼓附近的一个教堂里，找到了团部。因团部缩小，熊寿祺重新下连当兵。

几天以后，熊寿祺所在的一团和驻在铜鼓的第三团会合，一同开往浏阳文家市。九月十九日，他在文家市第一次见到了中央派来的毛委员。九月二十日，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向罗霄山脉中段前进。二十二日晨，部队从芦溪出发，在离芦溪十五华里的山口岩，遭到敌人伏击。由于仓促应战，部队伤亡过半，卢德铭壮烈牺牲。九月二十九日，部队开到永新县三湾村，进行著名的“三湾改编”。这次改编，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实际是两个营。改编后，熊寿祺编入第一营第一连当兵。这时党的支部开始设在连上，并建立士兵委员

会。党的领导机构“前委”要挑选士兵党员参加。党代表何挺颖推荐熊寿祺作为士兵代表参加前委。当晚，他参加了毛泽东召开的前委扩大会。

在这次前委会上，毛泽东仔细地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当前的行动方针和工作任务。指出在连上建党和建立士兵委员会的必要性。

根据前委的决议，熊寿祺积极参与了在连里建立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的工作。

三湾改编后，部队于十月三日开入宁冈古城，当天，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熊寿祺跟随毛泽东走上了进军井冈山的道路。

(四)

上井冈山前，毛泽东派人与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联络，并送给他们一百支枪。十月七日，熊寿祺随工农革命军到达茅坪。毛泽东再三说明，此根据地是友军袁、王防区，工农革命军要注重纪律，不许拿老百姓一根草，不许有不好的行动。

十月上旬，熊寿祺随部队在井冈山周围的酃县、遂川一带打游击。二十三日，到达江西的大汾，突然遭到地主武装肖家壁“靖卫团”的袭击，大家分几路往井冈山方向退却。退到半山口，见到毛泽东。跟随毛泽东经黄坳返回井冈山，驻在茨坪休整。十一月，探知湖南茶陵敌人空虚，毛泽东指示由团长陈浩和一营党代表宛希先指挥打茶陵。十八日占领茶陵县城。后部队驻茶陵城郊进行操练。熊寿祺大部分时间参加三操两讲。在军事训练上，营长员一民同士兵共甘苦，待士兵很和善，作

战很勇敢，军事训练要求很严格，亲自带领部队打野外。熊寿祺回忆说：“我学作战是从员一民那里学起的，他是我学作战的第一个老师”。

驻守茶陵一个多月，团长陈浩不执行毛泽东发动群众的指示，不做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熊寿祺是士兵委员会委员和前敌委员会委员，他和员一民、宛希先在党支部会议上对陈浩等人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抵制和批评。在茶陵期间，党代表宛希先传达毛泽东两次指示：一次是建立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另一次是不要打硬仗，要敌进我退。十二月中旬，湘敌吴尚的一个团加上地主武装，共二十二个连的兵力，扑向茶陵。团长陈浩不肯撤退，与敌人硬打硬拚。熊寿祺所在连打前锋，他在连里当尖兵，和陈士渠等六、七个人，冲在最前面。在一个小树林里，经过反复冲锋，打退一股敌人，又上来一股敌人，几进几退，他头部负伤，鲜血蒙面，仍继续坚持战斗。这时，何廷颖、张子清率领三营从城外赶来增援，打退了敌人的围攻。部队撤到茶陵的湖口，毛泽东也率部由井冈山来接应。当晚，熊寿祺带伤参加了毛泽东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毛泽东拿出许多划了圈圈杠杠的报纸给大家看，并向大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再三说明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意义。主张我军回宁冈休整，以后再伺机歼敌。但团长陈浩认为，湖南敌人空虚，主张把部队开往湘南各县去游击。毛泽东批评了陈浩的错误主张，指出：离开根据地到群众还没有发动和组织起来的湘南去，是军事冒险，是流寇主义。熊寿祺从以往战斗胜败的经验教训中，深感把部队带到无群众基础又脱离根据地过远的地方去的危险，因此，他和宛希先、何廷颖、张子清等都积极

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决定，部队返回井冈山。第二天清晨，熊寿祺随部队向宁冈砦市前进。

（五）

部队回到砦市后，进行新的改编，任命张子清为团长，何挺颖为团党代表，熊寿祺由士兵提升为连党代表。

改编后的第二天，部队在砦市河边召开大会，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茶陵战斗的经验教训。在充分肯定部队作战英勇顽强的同时，批评了不打土豪筹款、不做群众工作的错误。并着重指出，革命军队不能光是打仗，一定要做群众工作，宣布工农革命军有三大任务：一、打仗，消灭敌人；二、打土豪，筹款子；三、做群众工作，建设根据地。

一九二八年一月五日，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毛泽东命令部队以连为单位分散到县城及其周围的各圩镇去发动群众。熊寿祺率领部队在遂川城里搞宣传，打土豪，把筹集到的白布和中西药一包一包地抬上井冈山，解决了部队的被服和医药问题。

在遂川城里，毛泽东召集各连党代表开会，听取各连汇报后，针对所反映的情况，提出了六项注意。

一月二十二日下午，正是旧历除夕，熊寿祺向全连传达了毛泽东的六项注意，并作了具体解释。他说：（一）上门板。指宿营时睡老板的门板，走时要上好。（二）捆禾草。指宿营时借老板的禾草，走时要捆好。（三）讲话和气。指对工农讲话时，不要做出恶样子，要和和气气。（四）买卖公平。指买卖东西不许强买强卖。（五）借东西要还。指借老板的任何东西

都要送还了才走。（六）损坏东西要赔。指损坏了老板值钱不值钱的东西都要赔偿后才走。正月初二，遂川工农兵政府成立。过新年又加上庆祝工农兵政府的成立，到处喜气洋洋。

正当此时，熊寿祺的父亲盼子不归，很着急写下：“青山绿水任老夫消磨岁月，亚雨欧风恨小子浪荡乾坤”的对联寄给熊寿祺，后来毛泽东看到了，笑着说，“这老头子很潇洒”。

部队在遂川住一个月后，又重返宁冈。

一九二八年二月，毛泽东派熊寿祺任袁文才营第一连党代表。帮助袁部建党，成立士兵委员会，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

同年春夏之交，朱德、陈毅率部在湘南各县发动群众。四月，毛泽东派熊寿祺连作先锋前往联络。不久，因连长游雪程负伤，由党代表熊寿祺代理连长。经酃县往资兴，在资兴的滁口打败了胡凤章。这对朱德、陈毅部队和湘南地方武装上山会师，起了重要的掩护作用。

四月二十八日，朱德、陈毅部和湘南地方武装在耒市同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五月四日，在耒市召开了庆祝会师大会，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朱部主力一团编为第二十八团，湘南地方武装编为第二十九团和第三十团，合为第十师，朱兼师长。毛部主力一团编为第三十一团，袁文才部编为第三十二团，合为第十一师，毛兼师长。五月初调整干部时，熊寿祺调任第二十八团第一营党代表。

二十八团第一营是全军主力，在五、六、七三个月的重要战斗中，第一营，不是担任前卫，便是担任后卫。五斗江战斗，第一营首先出击；二打永新城，第一营是先锋；龙源口战斗，第一营首先从老七溪岭冲出龙源口。这三次战斗都表现了

熊寿祺对部队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效果，也表现了他的勇敢和机智。

首先，大战五斗江。五斗江是个高低不平的山镇。一九二八年五月上旬，熊寿祺带领部队由黄坳至五斗江，探知前面有敌，在五斗江驻下。第二天上午，敌人大模大样地由永新方面来攻。王尔琢命令第一营首先渡河抢占长满丛林的小山。熊寿祺带领一营战士迅速出发，占领小山，埋伏在丛林中迎敌。不久敌人散开向小山扑来，在小山上头，发现有敌军向下射击。熊寿祺指挥第一营战士一个冲锋把山上那股敌人冲垮了，转而包围前方来敌。王尔琢指挥全团同时出击，敌军不支，全部溃退，此役打垮杨如轩部一个团，红军大获全胜，俘虏大批敌军。这是朱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全军欢腾。

五斗江大捷后，熊寿祺率部追击敌人，经拿山到永新，敌人全部撤退，红军首次进占永新城。五月中旬，杨如轩重振旗鼓，企图东山再起，率领四个团直扑永新。红军采取“敌进我退”的战术，撤出永新城。五月下旬，二十八团由茶陵高陇回到永新的龙田、潞口间休息，杨如轩不战而拿下永新，进逼宁冈，非常得意。国民党报纸也为他喝彩报捷，说什么如何收复永新，围困朱毛。这次是江西敌人再次以重兵进攻井冈山，又以永新为前进基地。枪械、服装、粮秣、辎重等陆续由吉安向永新集中。敌人以为大军压境，可以一举攻下井冈山。

一天午后，杨如轩部一个团由永新城向西北方向开来，红军在永新群众的掩护下，于草市场将来敌全部消灭，敌团长刘胡子当场被打死。从俘虏口中得知永新的详情后，二十八团团部决定，二打永新城。熊寿祺、林彪率领部队担任前锋，星夜急驰，一夜走过潞口、沙市，第二天清晨到达里田。里田是一

个上千家的大集镇，离永新城约二十华里。群众清晨起来，突然看见红军回来了，象见了家人一样，欣喜若狂。接着红军由里田出发，一路上群众纷纷前来报告敌情，这时熊寿祺带领尖兵连疾奔永新城，入城后，守城敌军莫名其妙，有的惊慌失措地逃跑了，有的放下武器不战而降。熊寿祺率领尖兵连直冲杨如轩师司令部，杨如轩正在留声机旁听音乐，闻讯不相信，要大家不要无事惊慌。当熊寿祺率部冲进司令部时，杨如轩头上挨了一枪才仓惶逃走。辎重处装满银洋的木箱堆放一屋，军需处的械弹、服装撒满一地。

一九二八年六月，蒋介石组织湘赣敌军近十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进行围攻。敌人以杨如轩部的三个团担任主攻，向老七溪岭进犯；杨池生的两个团为助攻，向新七溪岭进犯。熊寿祺在新城参加毛泽东召开的营以上干部会议。部署二十八团守老七溪岭，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一营守新七溪岭。老、新七溪岭相离六华里，是宁冈到永新的一个阻隔山，守住了它，宁冈就能保住。熊寿祺率领一营从六月二十二日拂晓打起，一直到天黑，打垮了敌人多次冲锋，取得了龙源口大捷，俘虏敌军甚众。接着红军追击到永新，第三次占领永新城，敌之围攻被红军彻底粉碎。

龙源口战斗后，湖南省委来信要红军去打湘南。一九二八年七月初，熊寿祺参加了毛泽东在永新主持召开的军委、特委和永新县委的联席会议。会上，毛泽东分析了湘赣两省的形势，认为江西的敌人杨如轩、杨池生已被打垮了，江西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湖南敌人比较强，不好打。因此毛泽东主张，对湖南的敌人取守势，对江西的敌人取攻势，应在江西发展，坚持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要去湘南。湘南在三月份执行了

盲动主义路线，搞烧杀政策，工作没有做好，群众没有起来。永新的工作已经搞起来了，应该继续搞下去，造成边界割据的局面，同时把永新附近的泰和、莲花、安福等县的群众也组织起来，坚持和敌人斗争。会上，熊寿祺和其他同志都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只有杜修经、杨开明两人不同意。他们错误地分析形势。会后，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由军委带领，在莲花、安福进行游击活动。

七月中旬，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到酃县执行战斗任务。到酃县后，军委召开会议。会上，二十九团提出要到湘南去，认为湘南空虚，很容易被红军占领。二十八团团团长王尔琢不同意到湘南，认为应遵守永新联席会议的决定，在边界附近几个县进行游击活动。熊寿祺支持王尔琢的意见。但由于当时毛泽东远在永新。杜修经支持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结果决定去湘南。七月十七日，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由酃县出发，向郴州前进。七月二十四日，占领了郴州。

七月三十日，红军大队在郴州遭到敌人突然进攻，由于敌情不明，部队闹哄哄地出城往资兴方向撤退。在这紧急关头，熊寿祺率领第一营留在后面，掩护大部队撤退。在这次慌乱的撤退中，二十九团大部分人跑回家了，其他部队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失，由于二十八团、二十九团离开井冈山冒进湘南，结果造成郴州和井冈山两处的失败，又丢掉了二十九团，毛泽东称这次行动为“八月失败”。

八月十八日，红军大队撤到桂东，组织桂东行委，何长工任行委书记。毛泽东带领一个营来桂东迎接红军大队回井冈山，在桂东召开前委扩大会。会上毛泽东说，如果红军大队不去湘南，那是个发展革命的好机会，因为江西敌人内部发生冲

突，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大好形势，使根据地向北发展。流寇主义不要根据地，不要群众，是不行的，这样红军就不可能生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使红军得到发展，非要根据地不可。应该吸取这次教训，把部队带回井冈山。王尔琢、熊寿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原来支持到湘南去的领导人，也认为搞错了。大家认识一致，使部队有了胜利的保证。八月二十三日，会议进行中，桂东县城遭到敌人袭击，熊寿祺率领第一营占领桂东西南边的山头，沉着、勇敢地指挥部队作战，从中午坚持到天黑，压住敌人，出色地掩护了部队撤退。

红军大队赶到桂东寨前宿营。当晚，在一个农民家里继续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部队经江西的崇义、上犹，重回井冈山。八月二十五日清晨，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军大队从寨前分两路向井冈山挺进。但是，在红军大队回井冈山的途中，担任前卫的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擅自带了四个步兵连和机枪连、迫击炮连，向崇义县的思顺圩方向插去，企图叛变投敌。队伍走了一段，三个步兵连和机枪连的干部，发觉行动方向不对，不受袁崇全指挥，连夜带部队返回大队。军部得到报告后，要团长王尔琢带第二营六、七、八连去包围袁崇全。结果另外两个连也争取回来了，但团长王尔琢却英勇牺牲。袁崇全叛变之前，第一营的同志已发现他有叛变的行迹，进行了揭发。熊寿祺根据一营的揭发，迅即写材料报告军部。在步田圩开党的会议时，提出了这个问题。会上，袁崇全恶狠狠地骂熊寿祺“造谣”。熊寿祺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们营里的同志们反映的，不是我个人讲的”。袁崇全暴跳如雷，举起驳壳枪就要打熊寿祺，幸亏何长工用手按住他，说：“不许打”。朱德也责问袁崇全，“你要干什么？”熊寿祺毫无惧色。袁崇全叛变的迹象已很明

显，军委决定调动他的工作，但尚未执行。袁崇全便利用行军担任前卫的机会叛逃了。在和叛徒袁崇全的斗争中，熊寿祺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①。

部队到上犹、崇义以后，进行游击活动和筹款工作，赣敌刘士毅部追至遂川。九月十三日，熊寿祺率领一营参加打刘士毅部，缴枪数百支，占领遂川。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六日，特委在井冈山召开会议，讨论中央六月四日的来信。参加人员有特委委员，军队中及地方的活动分子，共三十余人，毛泽东、朱德、陈毅、何挺颖、何长工、熊寿祺等都到会，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中央来信除一、二点（游击区域过宽与废除党代表制）具体事项外，全部原则及政策是切合实际的，应遵照执行。

一九二八年底，在一次战斗中，营长胡少海负伤，由熊寿祺代理营长。

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井冈山前委召开“柏露会议”，讨论军队行动计划。决定红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

（六）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红军主力二十八团、三十一团由茨坪出发，经过下庄、黄坳，离开井冈山，向闽赣边界进发，一月二十四日到大庾，敌军掩至。红军逾大庾岭走南雄，赣敌李文彬旅穷追不放，至信丰。熊寿祺率第一营阻击李文彬部，

^①肖克：《回忆熊寿祺》，（1985年2月14日）。存中央民族学院《熊寿祺传》编写组。

掩护大部队渡河。他正举着望远镜指挥战斗时，一颗子弹从左手腕穿过，他顾不上伤口剧疼，撕下一块衣服自己包扎止血，坚持到部队全部过河。渡河后，红军走龙南，至寻鄜，经会昌，至瑞金，适为农历除夕，敌又将至，红军过城不入，速退至城北三十里之大柏地，严阵以待。大柏地丛林茂密，夹谷当涂，熊寿祺率部埋伏在两山茶林中，敌进入伏击圈后，被截为数段，激战至暮，敌军大溃，红军大获全胜，俘虏敌数百人。当夜，红军宿营大柏地，群众将所有番薯干等过年粮食都借给红军。次日熊寿祺率部到宁都筹款数千元，月余后再过大柏地时，毛泽东把部队库存银元全部拿出来分散给大柏地的群众，说：我们上次过路吃了你们的东西，现在来赔还你们。群众深受感动。

后来熊寿祺回忆大柏地战斗前后的情景时，深有感慨地说：“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一九二九年三月间，红军转入闽西，打下汀州。在这里，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军委扩大会议，对红四军进行整编，把团的建制改成纵队的建制，成立三个纵队。六月十八日，在龙岩的小池，朱德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和部署攻打龙岩的战斗。六月十九日，进攻龙岩，熊寿祺指挥第一纵队第一支队作前锋，战斗在最前线。打下龙岩后，熊寿祺升任第一纵队党代表。

六月下旬，在龙岩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围绕领导工作的方式方法问题发生了争论。一些同志主张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制”，一切问题都由大家来讨论决定，加上中央要求朱、毛离队，最后，会议没有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指导工作。

一九二九年六月底，蒋介石发动对闽、粤、赣三省的第一次“会剿”，红四军决定分兵作群众工作。熊寿祺率领第一纵队和第四纵队在永定、龙岩等县分兵发动群众。他提出“一纵队不是福建人，但一定要在短期内变成福建人，对福建的一切都要熟悉。”^①在熊寿祺的领导下，部队深入群众，帮助群众分田，建立苏维埃政府，组织并训练赤卫队。这样工作一段时间，一纵队的士兵同群众的关系搞好了，群众很欢迎他们。在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下，一、四两个纵队更巩固了，并扩大了红色区域，建立了闽西红军的基础。

这段时间，二、三纵队出击闽中。但闽中土匪很多，土豪的炮楼也很多，沿途的群众没有发动。部队开过去，不仅打不到土豪，连吃饭都成了问题。熊寿祺说，这次二、三纵队开向闽中的大田、德化一带时，“沿途丛山峻岭，河水深及颈项，上山把脚走痛了，过河把小孩子淹死了，穷乡僻壤，没有米吃，虽然有番薯等物，又因土匪太多，群众又不了解，一律躲避我们。我们到一处硬是无法可想。只得把老乡的门打开，自己去把东西拿来吃，吃了后照物价算钱，把钱封好。写一封信一起放在他屋内……沿途失联络。大炮抬不起也丢了，步枪背不起只得送土匪，叫他们帮我们安置伤兵。计算这一次要损失三百多人，一百多支枪，士兵群众都不肯走了。他们起初由白沙集中，集中时慌忙乱跑，想由闽中过马江入浙赣边境，几乎覆没。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②于是，朱德决定，回师闽西。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熊寿祺率领一纵队和二、三纵

^{①②}熊寿祺1930年5月给中央的报告：《红军第四军状况》，存中央档案馆。

队及上杭群众一起，打垮土著军阀卢新铭部，攻占上杭。九月下旬，在上杭太忠庙，召开红四军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极端民主化的气氛中开幕的。“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引起许多同志不满。关于八大会议前后的情况，熊寿祺一九三〇年五月给中央的报告说：“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一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前委还认为这样才是无产阶级的办法，因此当时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重心，对政治分析也是由大家来慢慢讲，各级同志又没有报告，哪里议得出！在上杭时天天为调人调枪争论，……这样的指导路线，把各级党的机关变成各级联席会了，这就是九次大会前各级指导机关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的现象”。

八大以后，有很多党员写信给朱德，要求请毛泽东回来。于是由朱德主持，在上杭召开的前委会议上，推举熊寿祺、郭化若、彭祐三人写信，请毛泽东回来。敦请信写好后，派人去请毛泽东，但毛泽东说：“现在我不出来”。仍留在闽西，一面养病，一面指导地方工作^①。

一九二九年十月上旬，熊寿祺在武平接到党中央指示，要红军到东江去。熊率部前往东江。十月三十一日，攻打梅县失利。十一月，熊寿祺率领一纵队再入闽西，在上杭之高梧，击溃周志群旅两个营，打下汀州。熊寿祺组织力量五日内赶制了六千套棉衣，解决了全军过冬的棉衣问题。

十一月间，陈毅从上海回到红四军，并带着周恩来的意见去上杭苏家坡请毛泽东回军。毛泽东听说周恩来支持他的主张，非常高兴，连声说：“好，好，我这就走。”

^①郭化若、肖克：《关于古田会议前的回忆》，存古田纪念馆。

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回到四军前委。二十八日，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部队整训，同时准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十二月初，熊寿祺率领一纵队驻连城的新泉，参加部队整训。

在此期间，毛泽东用半个多月的时间，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他亲自召开纵队、支队、大队干部会议，了解情况，分析问题，提出意见。并由前委召集支队以上的书记、宣传、组织等干部开会，起草各种大会提案，为召开四军党的九次代表大会作准备。熊寿祺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些会议，积极反映了部队的情况，并协助毛泽东搜集、整理材料和制定古田会议决议草案。

十二月二十八日，古田地区下着大雪。我党我军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古田会议在古田的溪背村廖氏宗祠召开了。

会上，毛泽东作关于大会政治决议草案的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就禁止枪毙逃兵问题作了发言。由于大会决议草案是会前经过充分酝酿、集体讨论后，由毛泽东起草的，因此一致通过。这就是“古田会议决议”。它为以后党和军队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次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前委。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十一人为正式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三人为候补委员。会后熊寿祺调前委，作前委的日常工作。

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熊寿祺率领一纵队和三、四纵队离开古田，在连城停留两天，一月九日到达宁化，十六日占领广

昌。这次行军使闽西、赣西南和红军本身都有发展。恰巧这时毛泽东率二纵队由连城、清流、宁化入广昌，并由洛口入东韶，与红军大队会合。

到东韶后又分兵，熊寿祺率领第一纵队直取乐安。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四军前委邀集赣西特委和五军、六军负责人，在吉安县的陂头镇召开联席会议。毛泽东、熊寿祺和宋裕和三人组成红四军前委代表团参加会议。会议决定采用“傍着发展，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即依傍原有根据地，逐步向外发展的方针，逐步扩大红色区域，争取江西全省政权。为了加强领导，会议决定成立四、五、六军和赣南、赣西、闽西、东江地方党组织的共同前委，常委是毛泽东、朱德、曾如柏、刘士奇、潘心源；候补常委是黄公略、彭德怀。四军前委相应改为军委。军委委员有朱德、潘心源、林彪、熊寿祺、伍中豪等。毛泽东离开四军军委，专作前委工作。由林彪任四军军长，潘心源任四军政委兼四军军委书记。但当时潘作为中央巡视员正在湘赣边界和五军活动，不能到四军任职，因此由熊寿祺代理红四军军委书记^①。

陂头会议后，熊寿祺随毛泽东、朱德把红四军带到富田养精蓄锐，待机进攻敌人。此时蒋介石嫡系部队唐云山独立十五旅，突然单独冒进，到了距富田四十里的水南、富滩，值夏，分兵三路向红军进犯。第一天，毛泽东、朱德、熊寿祺等指挥红四军先打水南，消灭敌人约两个营。第二天，又由施家边抄敌后路，战斗至晚，敌十五旅被我完全击溃，全旅损失三分之二。

^①熊寿祺1930年5月给中央的报告：《红军第四军状况》，存中央档案馆。

(七)

一九三〇年四月一日，熊寿祺率部越梅岭关，打败吴文献部两个营，俘虏数百敌人，占领南雄。在南雄接到中央通知，召开全国第一次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前委和毛泽东决定，派熊寿祺作为红四军及闽赣苏区代表，赴沪参加会议。

熊寿祺从南雄出发，由交通护送，自广州经香港时，与南方局负责人李富春接洽后，乘船到上海联络点。吴德峰安排熊寿祺住西藏路苏州河边一个旅馆的二楼房间，熊寿祺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直至会议完毕才离开。

大会前，熊寿祺在旅馆起草报告。为安全起见，他赴沪时未带任何文件。离军前毛泽东已和他详细商妥了向中央汇报的内容。到上海后熊寿祺追记成书面材料，以“红军第四军状况”^①为题向中央报告了红四军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〇年四月的情况：（一）四军行动之经过；（二）行动的原则与作战路线；（三）扩大红军与武装地方工作；（四）军队组织现状及军事工作；（五）政治组织现状与政治工作；（六）党的组织现状与党的工作。五月十六日，他将报告送给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后，李立三几次找他谈话，说现在一支枪也要集中起来，扩大红军，攻打大城市，夺取一省、两省的首先胜利。要熊寿祺开会时按他的意见发言，不要介绍毛泽东那一套作法。但熊寿祺认为，毛泽东的办法是正确的。他坚持了毛泽东的主张，抵制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如实地向大会报告了红四军

^①熊寿祺1930年5月给中央的报告：《红军第四军状况》。

在闽赣边区的斗争情况和毛泽东提出的正确方针。并坚定地认为：这些原则、方针、路线是正确的。熊寿祺报告后，当时中央批评红四军否认突然扩大，不去进攻大城市，是“新的右倾主义”和“逃跑主义”。在中央的压力下，熊寿祺在报告中也表示：“目前革命形势有这样的转变，党的策略亦有这样剧烈的转变，要猛烈扩大红军，四军接受这种转变的路线”。

一九三〇年六月初，大会闭幕后，吴德峰派一个交通送熊寿祺乘船到厦门。六月中旬，由厦门到漳州，在城区河中一家坐家船上过宿。准备次日由饶平、永定转汀州回军。不料清晨一起床，岸上即有便衣和警察多人守住。熊寿祺和船上其他人全部被捕，拘入漳州公安局。

敌人审讯时，熊寿祺按预定口供镇定地说：“我是饶平人，在外面读书，放暑假回家，路过漳州看朋友，现在返回饶平”。敌人不信，用刑逼供，熊寿祺仍一口咬定说：“是饶平学生”。后来，同船上有人叛变，说熊寿祺是由外地到苏区去投军的，不是饶平学生。熊寿祺急中生智，将计就计说：“我是上海一个穷学生，四川人，在上海失学，得同乡介绍往苏区找人安排工作的”。由于熊寿祺身上无文件，年轻貌似学生，那个叛徒只知道他是去苏区的，不知其他情况，敌人便相信了。十二月底，派人将熊寿祺押送到厦门开往上海的轮船上，驱逐出境。到上海后，因交通联络被破坏，未能返回苏区。

熊寿祺在上海住同乡熊昌翼家，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要找到党的组织是极其困难的，而没有社会职业又难以长期容身。于是熊寿祺于一九三一年春，考入上海文生氏英文补习学校，就读一年多。在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又向上海进攻，全国抗日运动兴起。他组织了文生氏学校

学生会，参加上海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去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收复东北失地、支持爱国军队的“一·二八”抗战。蒋介石对学生爱国运动进行残暴的镇压，文生氏学校学生杨同恒（四川人）在南京请愿中被反动军警枪杀。请愿队伍回上海后，熊寿祺和同学们抬着杨同恒的尸体在南京路上游行抗议，极大地激起上海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和对蒋介石的愤恨。

一九三二年夏，熊寿祺考入上海光华大学，组织同学学习李达译的《唯物辩证法教程》。不久他在光华大学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学生运动。

一九三四年夏，熊寿祺被光华大学当局以入学手续不全为借口，开除学籍。他听说在日本读马列主义著作比较容易，便决定东渡日本留学。

（八）

一九三四年秋，熊寿祺到了日本东京，先在东亚补习学校补习日语，一九三五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当时，东京出版的马列主义书刊很多，他如饥似渴地努力钻研马列主义。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变中国为它独占的殖民地，进一步向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国内人民的抗日运动出现了新高涨，中国留日的进步学生深受其影响，但在侵略者的腹地如何开展抗日活动是需要深思熟虑和认真对待的。鉴于日本反动政府当时尚允许学术团体的存在，熊寿祺联络了一部分较熟悉的同学，成立了一个叫“社会科学座谈会”的文化团体，利用合法的形式，以研究学术为名，引导留日的中国学生学习

马列主义和进行抗日救亡运动。他和张持平、冯基民、姚耐、黄一寰、李肇嘉、卓如等被推选为座谈会的发起人，经常参加活动的共二、三十人。

在“社会科学座谈会”成立的同时，留日学生中还出现不少文化团体，如：文化座谈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现代问题座谈会、妇女会、《杂文》、戏剧协会……。这些团体大都是反对国民党右派，拥护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拥护苏联的。所以人们称之为左翼文化团体。

一九三六年春，熊寿祺感到，为了统一留日学生的抗日步调，必须把各种座谈会联合起来。于是他和左翼各文化团体的负责人商谈，一致同意成立“东京左翼文化运动大同盟”（即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熊寿祺、解树椿、王子光被推举为执行委员组成执委会。“大同盟”的成员最关心的是如何团结抗日，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经常讨论国际政治形势、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革命性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西安事变”等等。在讨论这些重大时事政治问题的过程中，执委会迫切感到需要得到党的领导，否则，众说纷纭，方向不明，行动难于统一，于是决定同国内党组织取得联系。

一九三六年暑假，熊寿祺等推派解树椿回国找党，几经周折，找到了党的北方局。北方局决定在“大同盟”的骨干中，建立中共东京特别支部，并就东京的形势、党的任务和建党的原则给予了指示，还规定了联系办法。九月，解树椿将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带回东京，于是，“中共东京特别支部”成立了，熊寿祺任支部书记^①。熊回国时，由王子光代理书记。从此，

^①王子光：忆中共东京特别支部。见《革命史资料》第3期，1981年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东京中国留学生的抗日运动纳入党的领导之下，使斗争有了正确的方向。根据北方局的指示，东京特别支部只限于在中国留学生中发展党员，吸收党员的条件同国内一样，只是手续从简。由于支委会的努力工作，特别支部的党员逐渐增多，党的力量不断壮大。熊寿祺亲自发展张持平入党。特别支部创办了秘密油印小报《星火》，并继续利用“座谈会”的形式，对留学生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到一九三七年初，东京中国留学生的文化运动（实际是抗日运动）有了较大的发展。各校左翼学生纷纷要求成立东京留日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会）。以东京国民党留日学生监督处陈治溥和东京国民党头头陈固亭为首的右翼学生，为了分裂中国留学生的抗日运动，决定成立同学总会。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四日，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日本《朝日新闻》称此事为西安事变第二。

特别支部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东京中国留学生的抗日活动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应“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东京，要团结广大中国留学生共同抗日。为了这个目的，左右两派应化干戈为玉帛，消除对立。经过特别支部的努力，终于达成协议，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九）

一九三七年六月，熊寿祺由日本返国，适逢发生七七事变，遂决定留在国内，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七年冬，熊寿祺回四川任成都东城区抗敌后援会指导员，并任《国难三日刊》主笔及《川康通讯社》的编辑。在抗敌后援会中，他结识了地下党员饶茂文和犹凤岐等。一九三八年初，熊寿祺和饶茂

文、犹凤岐一起，在成都发起成立“群力社”。熊寿祺为“群力社”写了社歌，社歌的开头是“道理从大，抗日第一，抗日力量，必须团结……”。这首社歌概括了“群力社”的宗旨，即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手发动群众，反对片面抗战，坚持抗战到底。熊寿祺任“群力社”的总务主任，犹凤岐任组织部长，饶茂文负责党的领导。一九三八年四月，“群力社”组织宣传队到成都附近的新繁、郫县等地流动宣传，遭到伪郫县县政当局造谣毁谤，污蔑“群力社”宣传队有托派汉奸嫌疑，将宣传队全体队员拘捕，企图破坏团结，破坏抗日救亡活动。事件发生后，熊寿祺联合成都各方面的抗日力量，对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最后，伪四川省政府不得不下令无罪释放了全体宣传队员，并登报公开道歉，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一九三八年春，党中央派邹风平回成都清理组织，熊寿祺向他报告了自己的全部历史。这时，熊寿祺以刘湘日文秘书和幼兵队教官的公开身份，从事统战工作和抗日宣传活动。他乘熊复、甘惜分去陕北的机会，写一密信给毛泽东，介绍他们去延安抗大学习，并向毛泽东报告了自己当时的工作情况。三个月后，收到毛泽东亲笔回信，欢迎他去陕北。由于四川党组织挽留，未能成行。

一九三八年夏，熊寿祺随潘文华系的周瑞麟去重庆川江航务管理处作助理秘书，训练水上保安团，编辑《航务周报》。他利用工作之便，对保安人员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为《航务周报》撰写抗日救亡的社论。

在重庆期间，熊寿祺还向罗世文、廖志高、林蒙汇报他所了解的潘文华部的情况。并根据重庆市委安排，利用业余时间

间，为邮电、商店等部门的党员讲党课。据郭劳为回忆：当时熊寿祺一段一段的对他们讲列宁主义、讲矛盾的对立统一，讲主观和客观要一致，等等。听了他的讲课，得益很深。

一九三八年春，熊寿祺回邻水。同年七月，根据罗世文的指示，协助重庆市委重建邻水县党组织。一九四〇年春，熊寿祺返成都，任《华西日报》印刷所经理。国民党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成都以“抢米事件”为藉口，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大规模逮捕。罗世文、车耀先先后被捕。当时，党曾派人通知熊寿祺转移，但他未及转移，仍忙于整顿印刷所，印刷抗日救亡传单，组织工人夜校等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六月初，他出城躲避空袭时，突然被特务绑架。

熊寿祺被捕后，先后关押在四川省警察局、特务机关姜公馆，后又押送到灌县青城山劳动营。敌人采取各种手段，对他进行逼供，强迫他打柴、修路、抬石头，对他进行残酷的折磨，但他始终未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一九四二年暑假，在亲友熊昌冀、余作楷的营救下，他脱离了劳动营，回到家乡。

(十)

两年的监狱生活，使熊寿祺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患了湿气病，在老家休养。一九四三年底，他年满三十七岁才结婚。当时地下党员潘实之在重庆，因敌人跟踪，不能立足，以吃喜酒为名，跑到他家隐蔽约半月之久。一九四四年，地下党员周致远，在重庆被特务机关逮捕，从监狱逃出来，跳进嘉陵江，逃到熊寿祺家，熊寿祺将他留住一个多月，并和重庆党组织联系，为他安排好工作，准备好路费，才让他离开。在家乡养病

期间，熊寿祺除掩护革命同志外，还捐田办学，亲自任教。一九四五年秋，熊寿祺负责筹划修建一条沟通邻水、广安两县的邻广公路。他让地下党组织人力包工修路。这样既便于地下党活动，又解决了地下党的活动经费问题。一九四七年秋，熊寿祺捐助一批谷子，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他这些活动，引起了邻水反动分子的仇恨，他们向当地清剿驻军告发熊寿祺是共产党，阴谋杀害他。反动清乡团长吴尧春驻在他家，进行监视。熊寿祺见形势紧张，准备出走。一九四九年秋，熊寿祺秘密离开邻水赴重庆。

一九四九年底，熊寿祺在重庆和潘实之、周致远、杜特夫、李御良等策划，通过民盟负责人鲜特生两次劝说杨森在重庆起义，打开西南大门，被杨森拒绝了。后又通过杨森的夫人要杨森任命李御良为重庆卫戍总部参谋长，以便必要时宣布起义，又未果。最后由潘实之打入卫戍总部军训处，主管军粮。杨森如果阻挡我大军入川，抗拒解放，则焚毁敌军粮。

解放后，熊寿祺先后在重庆、汉口会见了任白戈、张际春、肖克、邓子恢、张执一等老战友。

一九五〇年，熊寿祺任中南交通部办公厅主任。

一九五一年六月，熊寿祺任中南局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中南民族学院院长。当中央访问团到中南访问时，他任中南组副团长，到湖南、河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后，带领中南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见到了离别二十一年的毛泽东、朱德。十月七日，熊寿祺给毛泽东写信，报告他的工作情况和各少数民族人民对毛泽东的热爱、感激之情，同时随函附上他撰写的《井冈山首创革命政权的回忆》剪报。十月十四日，毛泽东给他亲笔回信说：“寿祺兄：十月七日给

我的信及剪报，收到了，很高兴！你现在担任的工作很重要，望加意研究，做出成绩”^①。

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熊寿祺相继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南行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熊寿祺调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分管教学工作。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深入系科、教研室参加有关会议，指导工作，还安排时间到课堂听课，了解教学情况，为党的民族教育事业尽心尽力。

一九五七年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诗词十八首，其中有《咏大柏地》（菩萨蛮）一首，触起了熊寿祺对大柏地战役的回忆。他就毛泽东原韵，挥毫填词两首：

东风隔岁催红紫，花开南国红旗舞，逐北浴寒阳，旋军夜色苍。起来闻巷急，欢动军前壁，冲击万重山，鹰扬从此看。

陇头麦浪翻金紫，高炉几处青烟舞，大柏映朝阳，弹痕陈迹苍。洪分江汉急，路拓天山壁。回首旧关山，愈来愈好看。

熊寿祺把这两首词寄给毛泽东。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回信嘉勉说：“寿祺兄：来信收到，甚慰。大作写得很好。多久不见，待有时间，拟约一谈。”^②

①毛泽东给熊寿祺亲笔信，1951年10月14日，原件存中共中央办公厅。

②毛泽东给熊寿祺亲笔信，1957年4月21日，转引自熊寿祺给熊尔纯的信。

一九五八年，熊寿祺当选为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并任中東友好协会理事。他在中央民族学院还兼任统战部长。在从事民族教育、统战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为了团结知识分子，专门为教授、副教授设立“茶馆”，办“交心”刊物，让大家自由地无拘无束地相互谈心、交心。一九六〇年底到一九六三年初，他又以开“神仙会”的方式，对统战对象作工作。“神仙会”坚持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的“三自”方针，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方针。启发、引导知识分子自觉自愿地进行思想改造。一九六二年春，他代表院党委诚恳地对在“拔白旗”运动中受到冲击、批判的老教授赔礼道歉。由于他政治工作经验丰富，熟悉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谈话合拍，工作效果很好。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岁月里，熊寿祺蒙受不白之冤，遭到残酷的迫害。逼他提供井冈山时期老同志的所谓“叛徒”材料和所谓“反毛主席的罪行”。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二日，他给家属写信说：搞专案的“日夜挤压，一定要在最近按他们的预定计划处理。我在敌牢里，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从来没有暴露党的组织，从来没有出卖同志，问心无愧。你们自己努力吧，党有政策，好好努力，自有前途”。熊寿祺在高压和逆境中，诬陷吓不倒，折磨压不垮，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坚信党和人民的力量，坚信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但这种无休止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终于使他不幸于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四日在北京含冤去世，终年六十五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熊寿祺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党和人民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正如悼词指出：

“熊寿祺同志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我们党的好党员、好干部。他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熊寿祺：《革命歌》，载《新邻》杂志25期，1926年。
2. 熊寿祺：《第一次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红四军代表报告》，1930年5月16日。
3. 熊寿祺：《自传》1951年6月。
4. 熊寿祺：《井冈山首创革命政权的回忆》，载1951年7月1日汉口《大家看》报。
5. 熊寿祺：《给毛泽东的信》1951年10月7日。
6. 毛泽东：《给熊寿祺的信》1951年10月14日。
7. 熊寿祺：《忆大柏地战役恭贺毛主席韵》1957年3月。
8. 毛泽东：《给熊寿祺的信》1957年4月21日。
9. 熊寿祺：《秋收起义和井冈山的革命斗争》1959年5月15日。
10. 熊寿祺：《井冈山初期的连队生活片断》1970年。
11. 王子光：《忆中共东京特别支部》，载《革命史资料》第3期1981年9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2. 何长工、肖克、陈士榘、张宗逊、宋任穷、王云霖、曹里怀、韩伟、吴梅林、张执一、吴德峰、滕代远、王子光、张持平、朱起奎、廖志高、熊复、甘惜分、犹凤岐、林蒙、郭劳为、苏雁秋、熊尔纯、周致远、潘实之、张志刚、田一平、王古泽、倪梅皋、倪耀光、黄正国、黄是云、周德华、王华珍、罗朗、李修业及熊寿祺夫人殷正华等的回忆材料或访问记录。

龚 饮 冰

龚 育 之

龚饮冰，湖南长沙人，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入党的党员。他长期在白区坚持党中央交托的秘密工作，建国以后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和党中央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为党、为人民、为中华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

一八九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旧历八月二十二日），龚饮冰出生在长沙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他的父亲是私塾教师。因为父母早丧，他少年时代就只身在外谋生求学。进过善化学堂，后来毕业于湖南大学法政专科。辛亥革命后加入国民党，参与过反袁驱汤和护法斗争。以后从事新闻工作，曾任《新湖南日报》、《民本日报》记者、编辑。在五四运动和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及群众反帝反军阀斗争的影响下，思想倾向进步，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二年秋湖南铁路、泥木、印刷等各业工人罢工迭起，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后，湖南工团联合会发动了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群众斗争。龚饮冰当时主办亚陆通讯社，任社长，并任《霹雳报》主笔，在新闻战线为这些斗争日夜奔走呼号，虽劳累至咯血，仍不稍息。就在这时，经何叔衡、郭亮介绍，龚饮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三年三月，因交涉收回旅大和否认中日不平等条约

二十一条，全国兴起反日运动，长沙成立湖南外交后援会，号召国民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六月一日日本水兵在长沙码头枪杀前来检查日货的群众，外交后援会组织数万人抬尸游行，掀起轰轰烈烈的抗议运动。湖南反动当局宣布戒严，扬言要捉拿后援会负责人。当时，郭亮是后援会主席，龚饮冰先后任常委、文书委员、宣传部长、秘书长，并参加党在外交后援会中的党团。

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以后，龚饮冰被党派去帮助湖南国民党建立各级组织。这期间他还参加过《大湖南日报》的编辑工作。一九二六年北伐军攻下长沙，国民党省党部创办《湖南民报》，由他和谢觉哉主持，他任总编辑，谢任主笔。在党内，他任省委宣传委员会委员。同时，还奉党的派遣，担任湖南省政府秘书。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做联络统战工作。长沙市新闻记者联合会成立，他被选为执行委员。湖南省新闻记者联合会成立，他被选为主任委员，并任党团书记。反文化侵略大同盟成立，他被选为执行委员^①。从一九二五年底开始，他还担任中国济难会湖南省总会的总务干事^②、常委、党团书记。在大革命高潮中，进行了多方面紧张的革命工作。

一九二七年五月马日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湖南，大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被捕杀。龚饮冰也被列入捕杀名单，幸而他的朋友肖石朋得到消息，赶紧告诉他，帮助他化装出城，潜往武汉，寻找党组织。在当时仍是革命中心的武汉，他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并任全国济难会常委等职，继续为革命奔走。七月十五日，武汉汪精卫分共叛变。八七会议后，

^①1926年12月15日湖南《大公报》。

^②1926年1月1日《济难》创刊号。

中共中央机关搬到上海。龚饮冰也到上海任中央主管会计，在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下工作，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余年的地下秘密工作生涯。主管会计这一职务负责筹措和管理党中央的经费，在当时环境下任务是很艰辛的。以后这项工作由熊瑾玎接替。

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龚饮冰作为工作人员赴莫斯科参加会议。

一九二九年中央派邓小平去广西组织起义，为了保持同中央的联络，中央派龚饮冰跟邓小平同行，负责机要工作。他多次往返于广西上海之间，进行请示和传达^①。张云逸写的《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一文中说，这年十月，“我们派到上海向党中央请示的龚饮冰同志秘密回到百色，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中央批准了我们的建议，要我们在左、右江地区创造根据地，创造红军，颁给的番号是红七军，委任我当军长，邓小平同志为政治委员。左江地区的部队编为红八军。我们再派龚回上海，把撤退到右江地区后，部队和地方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并且表示，我们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大概需要四十天的准备，就可以就绪，那时便立即宣布起义。”^②十二月十一日广州起义二周年纪念那天，百色起义成功。

十二月二十五日广东省委给七军前委的信中，提到“若臣同志（即龚饮冰）于十二月十四日到港，报告桂军委工作经过，以及成立前委，转变军队为红军的情形和今后的工作布置”，“若臣同志现已赴中央报告，”“前委在若臣同志去

①邓小平办公室遵小平同志嘱给中共百色地委党史征集办公室的信，载《百色地区党史资料》1985年8月30日第1期。

②《星火燎原》第1集下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45页。

后，更能坚决实行转变，发动游击战争，加紧群众工作……坚决执行中央及省委正确策略，（省委）认为非常满意”^①。

龚饮冰没有被再派回广西，而是被中央留在上海。其间曾派他去鄂豫皖根据地巡视，因受阻未能到达。一九三〇年六月又派他去山东。原山东省委已遭破坏，新的省委由任国桢、张若臣（即龚饮冰）、杨汝贤三人组成常委，任为书记兼组织部长，龚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杨为军委书记^②。青岛是工业城市，省委为恢复和建立产业支部，组织和发动工人罢工斗争，做了很艰苦的工作。当时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在指导思想上有“左”的冒险主义的错误，但群众的斗争是英勇的。不久，山东省委又遭破坏，龚饮冰被调回上海，在中央特委工作，任印刷科长，负责筹办地下印刷厂等事宜。

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路线的党中央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名义下，大批打击、排挤党的老干部，龚饮冰也被排斥于党中央机关工作之外。他同后来也回到中央的邓小平等一起在上海闲居一段时间等待中央分配工作。后来党派他往北方，要求他以商业为掩护，潜伏下来作特科工作。一九三一年以后的几年中，他来往于天津、北平和日本占领下的奉天（今沈阳）、长春（伪满洲国成立后称新京）、哈尔滨，化名龚泽鸿，用党的资金同他人合股开设了在几个大城市都有分店的万源湘绣庄。龚任总经理，经营了一个供党中央使用的秘密联络和交通系统。刘少

① 《粤省委对七军前委的指导信》，存广西区党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② 《满洲省委烈士传·任国桢》，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奇、李维汉等许多同志从苏联回国都使用过这个交通系统^①。为了便于隐蔽，一九三四年在长春时他装作信佛，参加过佛教会，还照了一张身披袈裟的相片。这就是建国以后他任轻工业部副部长时，毛泽东笑称他为“和尚部长”的由来。

抗战开始，龚饮冰从敌人炮火下的平津辗转来到武汉、长沙，同周恩来取得联系，此后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继续潜伏在反动统治地区从事秘密工作，直到全国解放。

一九三八年初，周恩来派龚饮冰和王一知前往上海，要龚负责组织日本占领地区的交通情报财务工作。他和王一知建立了三个同中央直接通报的秘密电台，即李白台、杨健生台和郑执中台^②。直到一九四二年九月，与党中央电台的联络工作都很顺利，成为把地下党同党中央连接起来的重要桥梁。刘晓是当时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他在记述这段历史时写道：“这个机要系统由龚饮冰负责。地下党可以使用机要系统的电台，但电台不属地下党领导。当时的交通也是由机要系统派出的^③。”地下交通员宋季仁回忆过龚派他以茶商身份做掩护跑香港送密码和文件以及去西安向十八集团军办事处送情报等情况^④。

李白台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中秋节晚上被日本人破获。李白是在江西苏区培养，经过长征考验，由延安派来上海的党的通讯

①李维汉：《六届四中全会前后》，载《党史通讯》1985年第11期。

②王一知：《永不消逝的怀念》，载《人物》杂志1981年第2期。

③刘晓：《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建前后》，载《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页。

④宋季仁：《战斗在地下交通线》，载《党史资料丛刊》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1页。

战士。他在敌人的酷刑下，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一点党的机密，只承认自己设电台是为富商报行情。敌人没有抓到其他把柄。龚饮冰托他在湖南办报时的老友、爱国人士许彦飞将李白保释出狱^①。后来，李白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逮捕杀害（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就是以李白为生活原形而拍摄的，重现了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这位忠贞战士的光辉形象）。

为了防止敌人“放长线钓大鱼”，李白台当时不能再使用。党决定郑执中、杨健生等撤退到淮南抗日根据地。龚饮冰、王一知等一批人则西撤，经武汉、沙市，偷渡洪湖、长江、洞庭湖，辗转湖南、广西，然后到重庆，同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秘密联系^②。

在重庆，龚饮冰继续以商人身份出现，化名龚再僧，用党的资金同一些湖南人合伙，创办了建业银行，龚任银行董事。银行经营出现亏蚀，董事们间发生矛盾，龚饮冰被推举出任总经理，使这个银行在同著名的民族工业家范旭东的永利、久大公司密切合作中得到发展。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龚饮冰秘密到中共重庆办事处，同毛泽东作长谈。不久，龚到上海，建业银行总管理处迁上海，并陆续在几个大城市建立分行（建业银行是个小银行，因为有党的资金在内，建国以后成为最早的公私合营银行）^③。

一九四八年春，因为上海地下党一个交通员被国民党逮

①郭佛宜：《李白同志被捕前后》，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1年第2辑第78—80页。

②李沛群：《回忆解放前党的地下交通工作》，载《党史资料丛刊》第1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页。

③黄肇兴：《我所知道的龚饮冰和建业银行》，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88辑第32—63页。

捕，党决定龚饮冰等留住香港。在香港期间，由上海局组织部长钱瑛主持，一批长期从事地下秘密工作的老同志认真进行了关于党的历史、理论和政策的学习。这年秋冬，全国局势发生重大转变，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开始，党护送大批民主人士和党的干部分批从香港转赴解放区，龚饮冰在第三批，同民主人士李济深、党的干部卢绪章等一道，于圣诞节第二天悄悄登上苏联轮船出发^①。他经大连、沈阳前往河北西柏坡党中央城市工作部。

这时党中央正在加紧准备进入大城市，解放全中国。一九四九年三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去天津调查研究，指导执行党的城市政策，特别是工商业政策，龚饮冰随行。刘少奇在天津特地要龚陪他去看看万源湘绣庄，说他曾经利用过这个交通点，表示不忘地下秘密工作的艰危和辛苦。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大军渡江，龚饮冰被派赴华东前线，在丹阳准备进入和接管中国最大的城市、中国共产党的发祥地——上海。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龚饮冰任上海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委员^②，并以首席军代表身份接管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任中国银行总经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周恩来为总理的政务院组成，龚饮冰被调往北京，任轻工业部副部长（黄炎培为部长）、党组书记，兼迁京的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总经理。在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的繁忙工作中，他带病操劳，为妥善处理外国在华的金融和轻工业企业，为调整工商业

^①钱之光：《接送民主人士进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回忆》，载1983年8月14日《人民日报》。

^②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601页。

和采取恰当步骤实行对私人轻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建设新的轻工业骨干企业，付出了心血。在一次向党中央汇报轻工业工作的会议上，龚饮冰摆出材料强调利用沿海基地发展轻工业对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和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的重要作用，毛泽东表示支持他的观点，并以“牛长角是为了斗争”作比喻，鼓励他为自己的观点作斗争。后来在《论十大关系》这篇著名讲话中，毛泽东精辟地论证了正确处理轻工业和重工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的问题。

一九五四年，龚饮冰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九五六年出席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八大以后，龚饮冰被调往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任副部长。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团结各界人士，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特别是搞好对党外人士的安排和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作出了贡献。一九五九年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同时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一九六五年被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一九六〇年曾奉周恩来的派遣，到香港作调查和考察。

因为长期的肺病（从二七罢工时开始）和心脏病，龚饮冰感到体力不支，从六十年代起逐渐退出第一线工作。

“文化大革命”时，早已不任实职、在家养病、编入中央组织部管理的离休老干部支部的龚饮冰，仍不能避免林彪、康生、江青一伙的迫害。在他们开列的名单中诬陷他有“特务嫌疑”，“历史上有重大政治嫌疑”。一九六九年，龚饮冰已不能行走，住在医院，离不开氧气，仍被遣散出京，到江西抚州安置。林彪叛亡后，一九七二年才重回北京。重病住院的周恩

来总理，想到龚饮冰已入党五十周年，托邓颖超前去看望，对他的身体健康和生活安排关怀备至。一九七五年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次去医院看病，听说龚饮冰住在医院，也特地看望了他。这些关切，给在病中深忧国事的龚饮冰以极大安慰。一九七六年周恩来逝世，“批邓”又起，天安门群众运动被镇压，一时间黑云压城，龚饮冰心情沉重，病势加剧，经常询问“大耳朵”（这是他用来说“邓”字的暗语）的情况如何。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医院逝世。追悼会上朱德送了花圈。不几天朱德也逝世，这成了他为别的同志逝世所送的最后一个花圈。

逝世前龚饮冰给家人留有遗嘱，其中回顾自己的一生，说：“我幼年失父母，飘流在外，竟能从万恶的旧社会中，找到了中国共产党，跟着党，闹革命，在毛主席领导下，见着民主革命成功，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对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表示怀疑过，当时并未敢坚决反对；对于瞿秋白的暴动和李立三的盲动，均在会上发言反对，均被批驳未能坚持。自毛主席领导全党革命以来，我是衷心拥护毛主席的领导，从未动摇过。”

“今后希望你们认真读马列主义书和毛主席著作，最要领会其精神实质，干一辈子革命。”他还嘱咐说：“自1927年马日事变后到中央工作以来，我的生活费用全靠党给。现在剩有之钱，应全部缴作党费，值钱衣物，你们不必要用的也应拍卖，钱交给党。”

龚饮冰未能活着看到“四人帮”被粉碎。这在他是多大的憾事啊！但党和人民终于胜利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共产主义事业，在粉碎“四人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又胜利前进了，他也可以瞑目于九泉了。在人民审判林彪、江青的起诉书上，记载了他们诬陷、迫害大批党和国家领导干部

的名单，其中有龚饮冰的名字。

龚饮冰一生为党勤勤恳恳，埋头工作，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的事迹不大为人所知晓，他自己也很少向人谈及。但是党内一些同他有过接触的老同志，是常常记起他的。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杨尚昆在一次会议上特别讲到，当年在上海党中央机关“有个无名英雄，叫龚饮冰。”^①

^①国家档案馆印发的《杨尚昆同志在广东省档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邓 洁

叶 晔

(一)

邓洁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中共党的第一任满洲省委书记。解放后历任全国合作总社副主任、轻工业部副部长等职。他原名邓鹤皋，别名邓和高。湖南省安乡县安华乡人，生于一九〇二年。父亲邓伦源是前清秀才、廪生，家有土地二百多亩。

邓洁从小在他父亲办的私塾里读书，后到长沙兑泽中学上学。五四运动时期，邓洁参加了毛泽东组织和领导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是当时兑泽中学参加学联的四个代表之一。

一九二二年，因家中要他停学回家继承祖业，维系封建门庭，他毅然离家出走，到北京考入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同年由何孟雄、黄日葵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与陈毅、乐天宇等由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九二四年，邓洁任团北京地委组织委员和共产党北京西城支部书记。当时北京的共产党组织只有东城和西城两个支部^①，西城支部的党员有：李大钊、王荷波、袁子慎、于树德、邵式平等。邓洁主要是在学校中开展革命活动，有时也搞

^①邓洁：《历史简历》，现存轻工业部。

工人和农民运动。他曾经到长辛店工人中进行宣传，脚着胶鞋，身穿一件带补丁的蓝布大褂，完全同贫苦学生一样。那时北京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人力车，他很少乘坐，来来往往大多是靠步行。有时为了发展组织、传达通知、联系工作，一天得跑好几十里路。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在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赵世炎等的领导下，邓洁等党员积极活动，在北京组织民众连续举行了三天的悼念活动，先后有三十万群众参加。出殡那天，又有十余万市民“恭送”，借此他们开展了广泛的革命宣传运动。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北京共产党组织立即行动，号召群众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赵世炎和邓洁等首先组织北京学生沪案雪耻会和北京工人雪耻会进行声援，接着于六月五日组织了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六月十日，各界群众在天安门召开北京国民大会，通过了《北京国民大会宣言》，会场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响彻云霄。这些影响很大的游行示威活动，有力地声援了上海人民的革命斗争。

一九二六年三月，冯玉祥所部国民军驻守京津一带，日本帝国主义军舰于十二日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被守军击退。十六日，日本竟联合美、英等国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等无理要求。当天，中共北京地委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研究紧急措施。十七日，北京的二百多个团体召开联席会议，会后分为两组，分别到外交部和执政府请愿。李大钊率邓洁等一百余人到执政府去见段祺瑞和贾耀德，要求执政府驳复最后通牒。守卫不许请愿代表

进门，并用刺刀刺伤多人。十八日，在中共北京地委的组织领导下，北京总工会等二百多个团体的五千余群众集合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示威大会。邓洁参加了大会。会后，他和其他爱国青年组成两千多人的请愿团，再次到执政府请愿。执政府军警用马刀、刺刀向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血腥屠杀，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三一八惨案。邓洁机智地跳墙脱身^①。他跑到沙滩，通过在红十字会做救济工作的夏秀峰找到了三、四部救护车，又立即带着救护车回到现场，以红十字会的名义，指挥将伤员抬上汽车，送往医院妥为安置，整整忙了一个通宵。十九日白天，他又忙着处理死者后事，并组织慰问队到医院慰问伤员。事后，邓洁同陈毅等还在北京大学三院组织师生为死难烈士举行追悼会^②。鲁迅给追悼会送来了一幅挽联，上面写道：“死了就算罢了，何须萦怀留恋，慈母依闾，幼儿在抱；活着将怎样着，无非多经几次，枪声惊耳，弹雨淋头！”^③鼓舞活着的人要为牺牲者报仇，要继续与反动派战斗下去。

三一八事件后，北京卫戍司令部下令禁止群众集会游行，并通缉一批人，邓洁亦在通缉之列^④。

邓洁在北京工作期间，李大钊曾赠给他一首诗，开头两句为：“邓生今杰士，英名天下闻。”^⑤表彰他英勇斗争的精神。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大连日商满洲福岛株式会社（简称“福纺”纱厂）的工人，为改

①②④乐天宇 1982 年谈话记录，现存陈光宇处。

③邓洁 1976 年 4 月在陕西汉阴口述，长女邓华笔录。

⑤邓洁 1962 年对陈光宇的口述记录。

善待遇和争人权、反奴役，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大连一向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称为他们在关东洲的一块“无风地带”。这场罢工使日本帝国主义者瞠目惊心，急忙实行镇压，逮捕了大部分工人领导骨干，使罢工陷入僵局。为了加强党对大连地区的领导和妥善处理罢工问题，中共北方区委派邓洁去大连工作。临行之前，李大钊、陈乔年向邓洁交待：一要圆满地解决“福纺”纱厂的罢工；二要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影响。李大钊说：“大连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有发展，形势是比较好的，但在帝国主义力量集中的地方，工人不宜长期罢工。只要在经济上争到某些胜利，就要及时复工，以保存力量，便于长期斗争。”^①

一九二六年七月，邓洁取道天津乘船于七月九日抵达大连。他以美专学生实习为名在大连报上临时户口，住在黑石礁海边一处瓦房中。

在大连，邓洁担任中共大连地委书记。他首先抓组织整顿，健全大连地委机关。与此同时，他多次深入“福纺”纱厂，了解情况，稳定工人和家属情绪，鼓励工人斗志；并和基层骨干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当时，工人中出现有“左”的和右的两种思想：有的罢工领导人认为既然已经罢工，就非得彻底胜利不可，否则决不复工；有的则考虑，敌人进行大逮捕后，罢工的困难太大，又加上工人生活困难，许多人情绪不稳定，应早日复工。邓洁及时传达了北方区委的指示，并针对上述两种思想提出：斗争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讲究策略；既不能草率收兵，又不必提出过高要求。他还鼓励大家，要树立必胜的信心，在坚

^① 《大连工人的反帝怒潮——关于大连“福纺”纱厂百日大罢工的综合报告》，载《大连党史资料通讯》增刊，1983年10月。

持斗争的同时，要寻找有利机会复工^①。

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工人阶级的大力声援下，日商被迫答应了改善工人待遇的要求，“福纺”纱厂的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既打击了敌人的凶焰，又长了工人阶级的志气，显示了大连无产阶级的觉悟和力量。

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中共大连地委和邓洁决定：在工人中发展党员的同时，要从旅顺师范、西岗公学堂等单位吸收一批知识分子入党。经过努力工作，到十月底，党员数量从五月的二十二名增加到九十五名。从此，中共大连地委改属中央直接领导^②。

为了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革命理论，教育党员和群众，中共大连地委决定出版一种定期刊物。但大连的日本当局控制很严，所办刊物很难发行，邓洁便用大连旅京同乡会的名义油印发行了《大连人民》。作为大连地委机关刊物，在党员和进步群众中秘密传阅^③。

一九二七年初，南方的农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中共中央一再指示要在各地开展农民运动，支援北伐战争。而大连农村的农民正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重税盘剥和残酷掠夺。为改变这种局面，邓洁在这年三月的一次地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派共产党员到旅顺的胡家村进行建党活动。两个月后，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基层支部，把革命的种子播向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大连农村。

中共大连地委为了地下工作的安全，先后在大连西岗子人

^①《大连工人的反帝怒潮——关于大连“福纺”纱厂百日大罢工的综合报告》。

^{②③}《邓洁传略》，《大连党史通讯》1985年第7期。

和堂中药店和西岗大龙街益记笔店建立了党的地下联络站。邓洁经常在益记笔店中开展革命活动，后来益记笔店发展成为掩护党的活动的机关，在党的地下交通、联络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同年四月，邓洁代表大连地委赴武汉参加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会上汇报了大连党团工作的发展和工人运动以及四二七大罢工的情况。会议期间，他担任五大职工委员会秘书长，起草职工运动报告。大会秘书长蔡和森曾对他说：“主席团准备提名把你列入中央委员候选名单，要我征求你的意见。”邓洁当即表示自己还年轻，理论水平、斗争经验和工作能力都还不够，还需要在斗争中锻炼和考验。蔡和森认为邓洁的意见是诚恳的，向主席团做了报告^②。在这一点上，邓洁表现了一心为革命，不贪图个人名利的高贵品质。

五大会上，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满洲省委，统一领导东北三省党的工作，并改中共大连地委为中共大连市委，任命邓洁为满洲省委书记兼大连市委书记^③。

邓洁回大连后，召开党、团干部联席会，传达五大精神，结合大连地区的实际情况作出决议，指出大连党的任务是扩大党的组织，健全市委领导，号召党员要不怕牺牲，向敌人勇猛进攻。会后不久，大连党员发展到二百二十多人，建立基层支部二十三个，党的力量遍布到各大厂矿和学校以及贫民阶层中。与此同时，他积极从事中共满洲省委的组建。至六月中旬，筹建工作基本完成，他决定把中共满洲省委机关设在奉天（沈阳），但在他动身去奉天之前，中共奉天支部遭到破坏，故

① 《邓洁传略》。

②③ 邓洁：《历史简历》。

未能成行^①。

(二)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连的形势日趋严重，日本殖民当局派出大批汉奸、特务到学生会、青年会等进步团体中监视侦察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活动，陆续搜捕了一些共产党员。七月二十五日，邓洁由于叛徒丁文礼的出卖而被捕。尽管敌人连续三天三夜对他施行吊打、拶指、灌凉水、抽皮鞭、坐老虎凳等残酷的刑罚，把他打得口吐鲜血，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但他一直抗刑不供，除了因叛徒质证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身份外，始终没有向敌人吐露真情，为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转移争取了时间，为党保存了力量。

九月十九日，大连法院第一次开庭，公开审判邓洁等人。邓洁利用法庭宣传了共产主义。二十八日，法院对十七名共产党员进行判决时，邓洁承担全部责任，要求法院赦免其他党员。他说：“我们同志之间，有的目不识丁，只是随声附和而已，本人不仅同情他们，更认为对这些被告不必审判，应赦免他们。”十月十日，法院宣布对两名党员免于判刑，除邓洁外，其余均予减刑^②。邓洁被判“禁锢十年”。他被关在一个单身监号，不准与外界有任何接触。狱室十分阴冷潮湿，不久，他就得了严重的关节炎，四肢红肿，行动不便。由于监狱中的生活十分恶劣，连掺有很多砂粒的高粱米饭也不让犯人吃饱，还要从事繁重的劳动，邓洁的身体日益衰弱。他当时虽然

^{①②} 《邓洁传略》。

只有二十几岁，竟已满头白发^①。一九三四年九月底刑满（中经伪满洲国皇帝登基和得子两次大赦，减刑两年十个月）出狱^②时，他连话都不会说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邓洁经由上海到达杭州，找到杭州艺专校长林风眠，通过他找中共党组织。林风眠派该校秘书长李朴园夫妇陪同邓洁到上海，找到中国左翼文化运动总同盟的阳翰笙、孙师毅和王尧山，进而找到周扬。邓洁将自己向中共中央写的《出狱报告》交给了周扬，并要求组织上给他恢复党籍和分配工作^③。

一九三五年六月，组织上恢复了邓洁的党籍，并分配他到文委领导下的左联和文总工作。一九三四年以前，上海地下党在王明“左”倾错误领导下，经常组织“飞行集会”等冒险活动，不仅严重脱离群众，而且使党组织受到很大损失。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上海文委曾决定由邓洁担任纪念广州暴动的“飞行集会”总指挥。邓洁几次在会上严肃指出：“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应该服从政治任务的需要，政治任务变了，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就应该随着改变。‘飞行集会’不适应现实斗争形势，它只能使我党受到不必要的损失”。由于邓洁的坚决抵制，这次计划召开的“飞行集会”被取消了^④。

一九三六年初，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邓洁任临委书记，委员有胡乔木、钱俊瑞、王翰、吴敏（杨放之）等^⑤。中共上海临委是在原左翼作家联盟、社联、剧联、影联、教联、

①黄佩兰、孟心波、何慧君的回忆。

②④邓洁：《我的申诉》。

③王尧山1984年11月初口述。

⑤钱俊瑞1983年的回忆。

音联、美联、世界语联中的党组织和党员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

此后，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岁月里，邓洁和其他上海临委领导人一道，在领导抗日救国的运动中，竭力纠正“左”倾的斗争方式，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并根据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推动和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先后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各行各业的救国会，以促进和发展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

上海临委成立后，邓洁等即着手筹备举行一·二八四周年的纪念活动。他化名高雄写了一首《一二八纪念歌》，唱出了“中华民族要生存”、“中华民族不可灭”的爱国心声。歌词是：

一二八，一二八，
我们曾经流过多少血！
一二八，一二八，
我们曾经流过多少血！
敌人的炮火曾经淹灭了我们的上海，
战士的热血曾经淹死了凶恶的仇敌。
我们英勇的牺牲者啊！
你们为着民族生存，奋斗到底，牺牲一切！
用你们的热血唤醒民众，这是你们的功勋！
中华民族不可灭！中华民族不可灭！

一二八，一二八，
我们曾经受过多少牺牲！

一二八，一二八，
我们曾经受过多少牺牲！
民众的力量曾经粉碎了敌人的野心，
停战协定曾经断送了民族的光荣。
我们英勇的牺牲者啊！
我们要替你们报仇，踏着血迹，勇猛前进！
用我们的热血完成革命，这是我们的责任！
中华民族要生存！中华民族要生存①！

这首歌由吕骥谱曲，通过钱俊瑞在进步刊物上发表后，在地下党组织一部分党员和进步群众中流传、学唱。

一月二十八日那天，在苏州河北面的总商会召开了一·二八纪念大会，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沈兹九、沙千里等社会著名人士参加了大会。集会后，邓洁等地下党领导人组织游行队伍到江湾烈士公墓进行公祭，游行队伍一路高唱着《一二八纪念歌》等歌曲，并高呼“民众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情绪激昂、悲壮，爱国市民无不动容。

此后不久，中共上海临委的邓洁、胡乔木、钱俊瑞等又发动和组织数千名群众到南市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抗日和释放被捕的爱国青年。这次活动虽未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其声势和影响都是很大的②。

同年五月，在中共上海临委领导下，五卅纪念运动指挥部的沈钧儒等与上海市政府潘公展进行谈判，要求举行五卅运动

①吕骥：《一二八纪念歌》，《永生》1936年1月，后来编入《大众歌声》第1集。

②钱俊瑞1983年的回忆。

纪念活动。潘答复说：你们要纪念可以，但不准游行、发传单、喊口号。沈钧儒等根据中共上海临委确定的灵活而有策略地进行斗争的方针，答应不用游行示威名义，而采取“出祭五卅死难烈士”的形式组织纪念活动，并答应不喊口号、不发传单。但在实际行动中群众的爱国热情勃发，仍然高呼抗日救国口号。这次公祭活动以后，邓洁写了一篇报道，题为《伟大的五卅在上海》，在进步刊物《大众生活》上发表。

从一九三五年六月到一九三六年上半年，邓洁在上海还参与组织领导了上海人民为声援北京一二九运动的示威游行和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纪念会等革命活动。

邓洁在上海工作时，生活十分艰苦。他常以美术家身份做掩护，身穿一套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不太合体的白色西服，脚穿一双旧的白色皮鞋，没有钱买鞋油，便将白色油画颜料涂在鞋上，以此应付场面。因为他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所以连维持基本的生活也有困难。有时就在饭摊上买碗菜饭或买几个粽子、大饼充饥。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尽力帮助别的同志。有一次，有两个女同志向邓洁汇报工作之后，说起她们现在生活困难，已经身无分文。邓洁就让她们稍等片刻，他到街上把自己穿的大衣当掉，回来送给她们五元钱。

一九三六年九月，邓洁在去兆丰公园与中共中央派驻上海的代表冯雪峰会面之前被捕。冯雪峰派王学文通知掩护邓洁的房东孟心波、何慧君夫妇，把邓洁的书籍、文稿等都转移了。当敌人第二天押着邓洁到他的住处搜查时，什么都没有搜到。在狱中，敌人使用各种残酷的刑罚折磨他，但他一口咬定自己是国难教育社社员，只是一名普通的爱国抗日群众。因敌人并不了解他的真实身份和情况，便于十一月由孟心波和新桥小学

校长黄克昆具保，释放出狱^①。

邓洁出狱后在新桥小学教书。因受到敌人注意，无法开展革命活动，便于一九三七年二月由冯雪峰派的中央交通员徐汉光将他护送到西安，同路的有王学文、瞿宪文。到西安后，他们又设法搭车于三月五日到达延安。同年五月，中央派刘晓去接任上海临委书记，邓洁和王学文向刘晓详细地陈述了上海的形势及党组织和各方面的情况，为刘晓后来在上海开展工作提供了便利^②。

一九三七年春，刘少奇听取从上海到延安去的同志汇报上海临委的工作情况后说，上海红旗不倒^③。

（三）

一九三七年五月，邓洁参加了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六月，他任中央党校五班（即高级干部班）班主任。九月任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主任。十二月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

在这期间，邓洁曾在中央党校、马列学院、自然科学学院、陕北公学、中组部训练班讲课，讲授的内容有：中国革命运动、秘密斗争经验、政治经济学等。他常将浅显的实际事例和深刻的革命理论融会贯通，并结合形势和自己亲身的斗争经历进行讲述，深入浅出，具体生动，给听课的同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①孟心波、何慧君1983年的回忆。

②王学文口述，记录存陈光宇处。

③方铭的回忆。

一九四〇年，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想用切断供应和贸易往来的办法扼杀边区的生机。边区的经济原来就很落后，几乎没有工业生产，必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绝大多数需要从外面输入。国民党停发经费和封锁经济后，一度使边区的财政和生活发生了很大困难。

根据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直属财政经济处，邓洁被任命为处长，负责中央直属机关、学校等一万余人的财政经济工作和生活供应工作。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林伯渠的领导下，他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确定的“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提出了自给自足的计划，除粮食由边区政府供应外，自己组织生产蔬菜，养猪，烧木炭，解决运输问题。为了保证每个同志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他根据边区政府的规定，制定了中央直属机关的生活供应办法，除规定每人每日的粮、油、盐用量外，还规定每个窑洞配给一盏比拳头还小的灯壶，一灯壶油要用一个星期，冬季每天每孔窑烤火用木炭三斤。邓洁对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使用的马和运输队使用的牲口配给多少草料，都计算得很仔细。在服装方面，他也做了各种规定，并且号召大家缝缝补补节约着穿，对于从事体力劳动的公勤人员，衣服容易破损的，他还作出了更换补充的规定。

这年春季，邓洁和王首道、乐天宇到南泥湾进行考察。当时的南泥湾，遍地荆棘，满坡荒草，但土地肥沃，潜力很大。此地距国民党统治区不远。他们感到南泥湾既是一个边防重地，又可以成为一个生产基地。于是他们写了一个考察报告，向中央建议开发南泥湾，并在那里驻扎军队。中央批准了这个建议。

邓洁还倡议创办中央直属机关南泥湾农场。中央直属机关和边区政府各机关，这年都到南泥湾建立了农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一九四〇年除夕，邓洁与自然科学学院初中部指导员陈光宇结了婚。他们是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认识的。

一九四一年春天，邓洁陪同朱德总司令到南泥湾视察。当年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实行生产、战斗、学习三结合，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物产丰富的米粮川。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被推向一个高潮，南泥湾成为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一九四一年，邓洁调任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同年十一月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主管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所属各部、委的生产、生活、供应等工作。他在中央财政经济部李富春直接领导下，团结所属各处、科干部，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做了很多具体工作。有一次，李富春召集杨家岭中央机关干部大会时说：“在杨家岭中央机关的行政工作、生产、生活供应方面，我们的叫花子头是邓洁，大家以后都要听邓洁的指挥。”^①因当时生活很艰苦，同志们经常笑称自己是“叫花子”。从此，很多同志都称呼邓洁为“叫花子头”^②。

有一次，毛泽东找邓洁谈话，勉励邓洁做好杨家岭的行政工作。他说：杨家岭不仅是延安的杨家岭，而且是全国的杨家岭，因为是党中央的所在地，你们工作做得好与不好，对全国都有影响，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都要向你们学习^③。

一九四三年，为了适应大生产运动的需要，邓洁组织了生

①②韩增胜、夏耘的回忆。

③谢邦选1985年6月口述记录。

产合作社，从事纺线、纺毛、做鞋、编织毛衣等劳动。当时，杨家岭机关从首长到后勤人员，人人动手参加生产。为了解决物资供应困难，邓洁还组织了运输合作社，把合作社的人员、大车、牲口等都折合成了工分，按多劳多得的原则进行分配，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一文中充分肯定了运输合作社。由于人人参加生产，粮食多了，中央各机关的粮食供应便由原来全部向边区政府领取，发展到一半自给，达到了毛泽东指示的“减轻人民负担，使人民能做到耕三余一”的要求。猪养多了，肉食和油的供应也多了；小作坊生产的酱油、酱菜自己吃不完，还拿到新市场商店去卖。不但改善了生活，而且个人的收入也增加了，每人每月除领到一至二元的津贴费外，还获得了劳动报酬，人人都有零花钱。从一九四三年底开始，基本上做到了丰衣足食。

由于邓洁在机关行政工作、组织生产、保障供应等方面成绩显著，受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奖励，荣获特等劳动模范奖状。

在延安，邓洁还兼任延安平剧院院长。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他组织平剧院经常到杨家岭演出，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

邓洁十分重视后勤人员的文化、政治思想教育。一般在每天午后组织他们补习文化、学习政治。秋收以后，便对农业生产队、烧炭队的同志进行冬训。他还请周恩来、杨尚昆、李富春、王首道、赵毅敏、程子华等领导同志当教员，讲授革命理论和生产运动、勤俭节约的意义，以及各战场的战况和国际国内的形势等。通过这些学习，大大提高了同志们的文化程度和思想政治水平。

一九四五年四月，邓洁作为中央直属机关的代表，参加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负责代表们的生活供应和安全保卫工作。他全力以赴，使会议的供应比较丰富，经常是肉、禽、蛋等四大陶盆菜和一个汤。机关生产队种的西红柿用汽车拉到大礼堂门口，请代表们随意吃。来自各个战区的代表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于一九四六年六月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一九四七年春又重点进攻山东和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纵队，杨尚昆任司令员，邓洁任副司令员。在胡宗南进犯延安时，他和纵队司令部的领导同志一起，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主席，使党中央机关安全转移，做了许多出色的工作。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央撤离延安时，邓洁负责组织中直机关的撤离和安置工作。三月二十四日，他在瓦窑堡附近吴家寨子的中央纵队司令部，得悉青化砭作战急需炮弹，而西北野战军和当地支前部门运输力量一时不足，就主动派遣了一支刚从晋西北运物资来的运输队，替西北野战军向青化砭前沿阵地运送炮弹；运输队以急行军的速度，准时赶到指定地点，支援了著名的青化砭战役。三月底，邓洁担任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亚洲部”司令员，曾陪周恩来来到吴堡县宋家川巡视渡河指挥部。周恩来到晋西北安排中央后委的工作，他留在河西。四月初，周恩来自河东西渡，因一位同志工作失误，使他与中央失掉了联系。为保证周恩来的安全，邓洁星夜冒险去找中央，将近黎明时分，终于在一个小山村找到了党中央。他又接受毛泽东的命令，立即火速赶回宋家川，并带了一支骑兵小分队护送周恩来来到青阳岔同毛泽东会合。不久，邓洁奉命东渡黄河到晋西北临县，参加由叶剑

英主持的中央后委工作。九、十月份，邓洁又奉命调回河西中央机关，为中央会议进行准备工作，并参加了在米脂县召开的十二月中央会议。宜川瓦子街战役之后，党中央决定离开陕北。一九四八年三月，邓洁护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渡过黄河，经由晋西北临县、兴县到达了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完成了中央交付的任务。

(四)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恢复和发展经济。这时，邓洁担任中央直属经济建设部部长兼新中国经济建设公司总经理。在财政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山东省为支援中直经济建设，提出划几个工厂给新中国经济建设公司。邓洁根据毛泽东“不能吃现成饭，要靠自力更生来解决经济问题”的指示精神，谢绝接收山东的工厂，下决心自己从头做起，在北京、天津、石家庄、大连等地办了不少工厂、供销社和农场。在北京办了新中国牛奶厂、新中国食品厂、新中国乐器厂、新中国大有制药厂、昌实电机厂、儿童玩具厂等；为了活跃文化生活，还办了红星电影院。在石家庄办了新中国制糖厂、农机厂、卷烟厂、石墨厂等。这些企业，有的如烟厂、农场，是为中央机关服务的，有的是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后来都成为地方工业的骨干力量，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九五一年，邓洁写了《摸索》一书，总结了新中国经济建设公司成立以来组织生产的经验。一天，他在中南海见到了毛泽东，便送给他一本。毛泽东一看书名就说：很好，我们进

城以后，搞经济建设没有经验，不懂的事太多了，应该去摸索^①。

一九五二年，邓洁任中华全国合作总社副主任，主管手工业工作。中国是个体小生产占优势的大国。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对“占有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决议还指出：“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邓洁深知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手工业合作化事业的发展上。当时，手工业合作社还处于重点试办阶段。他积极宣传党的互助政策，宣传列宁的《论合作制》和毛泽东的《组织起来》的思想。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提出了“一化三改”的历史任务，邓洁更加坚定不移地为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努力工作。针对有的同志只愿搞大工业，认为手工业可有可无的思想，他利用开会、作报告、写文章等种种形式，不失时机地大讲手工业同大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他把手工业同大工业的关系，比喻为游击队和正规军，说明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意义。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并派人到北京市和河北省高阳县等地帮助总结办社经验，采用典型示范、树立旗帜的方法，积极引导广大手工业者走合作化道路。他经常用“破铜脸盆熬糖”起家的北京第一食品合

^①陈永清 1985 年的回忆。

作社（现北京第一食品厂）和“三把榔头”起家的上海铁床生产合作社（现上海第三自行车厂）的事迹，说明组织起来的优越性。这年冬天，他主持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朱德在会上作了《把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报告。程子华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三种组织形式——生产小组、供销生产社、生产合作社。邓洁则着重对三种组织形式的生产管理、产销结合和工资分配等问题做了详尽的阐述。这次会议确定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对指导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五四年，邓洁任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全国手工业合作社副主任。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光辉照耀下，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发展很快，到一九五四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组），由一九五二年的二千多个发展到四万一千多个。组织起来的手工业合作社（组），多数底子薄、工具落后、资金短缺。国家为了扶持手工业合作社的发展，决定将清包呆滞物资拨给手工业合作社利用。邓洁对国家的支援非常珍惜。他要求各级手工业部门必须“接好、管好、用好”这批物资，并指定专人起草《接收物资处理办法》，上报中央财委和发至各省、市执行，还组织力量同有关部门具体签订交接呆滞物资的协议。不到一年的时间，接收的呆滞物资价值一千多万元，解决了部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的资金、设备和原材料的困难。有些合作社将废旧机器修复使用，由手工操作变为半机械化生产。

随着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对一些政策性的问题，需要明确回答。邓洁根据党的方针，经过调查研究，在一九五四

年底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上，强调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要坚持“四服务”的方向，即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为工业建设服务，为出口服务。“四服务”对以后发展手工业生产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邓洁还从我国实际出发，对雇佣十人以下的私人企业入社问题，手工业劳动者协会的性质和发展对象问题，农村手工业合作社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分工结合问题等，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在会议期间，有的地区提出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应明确阶级路线。邓洁经过分析，说服同志们在手工业劳动者内部不提阶级路线。这对正确地贯彻党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鼓励手工业劳动者走合作化的道路，鼓励老师傅积极传授技艺和发展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邓洁在工作中一贯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他从社会上招收了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在生活上关心他们，在工作上重用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这一年，他筹建了中央手工业合作干校，为省、市培养师资和处长以上的干部。他要求各省、市建立手工业干部学校，培养统计、财会和生产管理等方面的人才，以适应工作需要。

一九五六年，在实现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手工业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手工业者都组织起来了。由于运动来势迅猛，加上对手工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认识不足，准备工作不够，发生了盲目集中，撤点过多的问题，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大不便。四月，邓洁根据陈云的指示，主持召开了农村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会议，着重研究集中生产和分散生产的问题。他在会上强调：“手工业组织起来以后要保持原有的经营特点”，“要防止不顾具体

条件，机械地搬用大工业的一套管理办法。”他指出：我国手工业有制造业，也有修理服务业，有固定的小作坊，也有游街串巷流动服务的，非常方便群众。合作化以后，组织形式要多种多样，不要千篇一律；集中生产和分散生产可以配合，大社和小社，生产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应该并存；手工业合作社要发扬个体手工业者精打细算，勤俭经营的优良传统，坚持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方针，反对“家大业大、浪费点没啥”的大少爷作风；要发扬手工业者固有的关心自己产品质量和适应人民需要的特点，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努力创造名牌货；要发扬个体手工业机动灵活的经营特点，恢复原有的产销关系，前店后厂，摆摊设点，送货下乡，通过多种渠道销售产品，不要当“坐商”“等客上门”；要发扬手工业就地取材的特点，采取自行收购，加工订货，带料加工，以产品换原料等办法，开辟原材料来源，充分利用大工厂的边角余料和社会上的废弃物资，变废为宝。邓洁要求各级手工业管理部门建立供销机构，做好组织业务工作，为基层生产服务，并亲自领导建立了手工业合作总社物资供应站和东北、华东、中南、西北供销办事处（组）。

邓洁热爱工艺美术工作，对开拓新中国的工艺美术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经常说：我国的工艺美术是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为了保存和发扬我国工艺美术的精湛技艺，邓洁在工作中坚决贯彻党的“保护、提高、发展”的方针，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发展工艺美术的措施，使一些旧中国由于生活所迫而不得不改行转业的老艺人归了队，使不少失传的著名工艺美术品恢复了生产。他提出要提高老艺人的政治地位，要给予老艺人较高的工资和技术津贴，使他们能安心创

作，传授技艺。在一九五六年召开的工艺美术座谈会上，他要求各地保护老艺人，爱护老艺人，学习和推广彭真对北京市著名工艺美术艺人杨士惠、刘德赢给以高薪待遇，并选为人大代表的经验。他还要各地认真组织艺徒向老艺人学习，大力培养新生力量；允许老艺人带自己的子女进社学艺，帮助老艺人将装在脑子里、掌握在手上的技艺和经验世代相传下去。

这年，邓洁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印染、装饰系的基础上，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工艺美术高等学府——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他兼任院长，主持制订办院计划，提出办院方针，确定教学计划。他多次强调学院的教学工作要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结合生产，学以致用。为此，他从手工业合作总社资金中拨出专款给学院建立实验工厂，支持教学人员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为教授、专家创造条件编写教材，聘请老艺人到学院讲课。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该院培养的七百多名学生，大多已经成为工艺美术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一九五七年，手工业合作总社召开了全国工艺美术代表会议。邓洁在讲话中，根据“双百”方针，提出要在继承我国工艺美术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的基础上，在世界独树一帜。他说，继承民族优良传统，既不是提倡复古，也不是号召排外，而是在中国工艺美术原有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吸收外国的好东西，丰富我们的表现形式，用近代工艺美术的科学知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适应时代的要求，创造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工艺美术。他还提出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和工艺美术集中的省、市，要结合实际需要成立专业的或综合的工艺美术科研机构，开展工艺美术科研工作。为了配合工艺美术研究，各地要根据具体情况，设立小型陈列室、样品间；举办展览会和技

术交流表演会；出版书刊，推广先进经验。后来在他的领导下，创办了全国工艺美术研究所，一些省、市相继成立了工艺美术研究所，对推动工艺美术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邓洁还领导创办了《装饰》双月刊杂志，亲任主编，并为《装饰》写了发刊词。这是我国第一本工艺美术刊物。

为了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邓洁主持编印了一部《中国工艺美术》画册，集中反映了建国十年来我国艺人精心创作的美术成果。他还领导举办了第一次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向首都人民汇报，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朱德和董必武等中央负责同志参观了这次展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五）

一九五八年，邓洁任轻工业部副部长、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代理主任。他对手工业的技术改造提出“循序渐进”的方针，即根据需求和可能，有计划地将最新技术成就与手工业的传统技艺结合起来，由手工业生产逐步向半机械化、机械化发展。他明确提出，手工业技术改造，不能依赖国家调拨设备，供给资金，配备技术力量，而要自力更生，采用“培养母鸡、母鸡下蛋”的办法，自己武装自己。他号召人人动手动脑，在大搞技术革命的同时，从实际出发，搞好小改小革。他还亲自抓技术革新的典型，召开现场会议，推广先进经验。在他的倡导下，各省、市手工业管理部门都兴建了自己的机械厂，成为手工业技术改造的物质基础。到一九五八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社（厂）拥有各种机器设备十二万台，用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的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有了明显提高，手工业生产的落

后面貌有了改变。那时建立的上海江湾机械厂、大连红旗机械厂、沈阳轻工机械厂，已经发展成为轻工业机械行业的骨干力量。

邓洁一贯重视手工业支援农业的工作。他要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不但要生产各种旧式中小农具供应农业，而且要生产改良农具和新式农具，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为了方便农民，他提出要建立“三级修造网”，做到乡乡设点，社社有人，随叫随到，小修不出乡、大修不出县”^①。当时，全国建立了两万多个固定的农具修配站和流动修配组，生产出了多种农业机械和中小农具，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生产的铁木农具达二亿三千多万件，平均每一农户可得到两件。

邓洁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和合作化工作的经验，写了《中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总结》一书，对我国手工业的历史、特点，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手工业合作社的组织形式，民主管理，生产管理等各方面做了系统的总结和论述。这是邓洁参与领导手工业合作社事业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和做法的集中体现，是他的代表作。刘少奇看到此书时赞扬说：“想不到手工业十年还写出本书噢！”^②

“大跃进”开始以后，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许多轻工业产品和手工业品供应紧张，群众买不到铁锅和饭碗，妇女买不到发卡，中小学生的课本和作业用纸质量低劣，颜色黄黑，影响孩子们的视力，群众意见很大。面对这种情况，邓洁难过地说：“旧社会群众有锅没有米，现在我们不能让群众

^①邓洁：《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总结》，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②邓洁1976年4月在陕西汉阴向长女邓华口述记录。

有米没有锅。”“我们搞轻工业的人怎么能让下一代用这样的纸学习呢？”^①他就这一问题实事求是地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

一九五九年，邓洁参加了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大中城市副食品和手工业生产会议，研究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的方针政策问题，参与了中共中央《关于迅速恢复和进一步发展手工业生产的指示》的起草工作。

一九六一年，邓洁任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局长。这时，全国正在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纠正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等“左”的错误，调整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比例失调现象，努力发展农业和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根据毛泽东指示，手工业要象“农业六十条”那样搞个条条。邓洁带领工作组到天津、河北进行调查，尔后又参加李先念主持的《中共中央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三十五条”）的起草工作，并担任起草小组的组长。“手工业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手工业要有三种所有制，要将转厂过渡不适当的手工业合作社恢复为集体所有制，成立专管机构，按行业分管全民、集体和个体三种所有制的手工业，纠正了手工业工作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同年底，他主持召开了全国手工业厅局长、联社主任会议，交流执行“手工业三十五条”的情况，研究进一步贯彻的意见。此后，邓洁为解决当时市场最短缺的产品，如铁锅和砂、瓦、陶、小五金等的生产问题，召开了专业生产会议，做

^①李靓丽口述记录。

了具体的生产安排。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他号召大家“上山下乡”，寻找原材料来源，“要利用山头、湖泊，黄河故道植树造林，建立原材料基地。”^①他用“不蓄三年之艾，九年无成”的古语，引导大家把眼光放远些，因地制宜地开发资源，以补国家原材料供应的不足。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各地建立了一批手工业原材料生产厂和楠竹、蔴草、棕草、小林场等原材料基地，部分地解决了生产的需要。

(六)

一九六三年，邓洁调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他十一月一日上午去石油部报到，下午就乘火车去大庆，参加部里召开的现场会议。他说：“我是石油战线上的一名新兵，是来学习的。”现场会结束后，他在寒风刺骨、冰雪交加的祖国北疆，每天不停地参观油井勘探、油井管理、“地宫”、龙凤炼油厂、被服厂、职工宿舍、家属宿舍，还参加工人們的评功摆好会，晚上整理笔记，请工程师讲解石油的形成和开采，炼油工艺，“常减压”、“热裂化”等科学知识。在大庆近两个月的参观学习中，邓洁写了一册《大庆战歌》即《萨尔图颂》诗集。他在诗集中满腔热情地歌颂大庆人的英雄业绩，石油部党委把它铅印并发至各油田，受到广大职工的欢迎，鼓舞着石油战线的广大职工学大庆人，做大庆人。他在石油部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就有七、八个月在基层，大庆、兰州炼油厂、玉门油矿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①邓洁1961年在全国手工业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五年，在手工业管理总局的基础上成立第二轻工业部，邓洁调任副部长。他上任后见到同志们时，高兴地说：我去石油部学习一年回来了，现在不能说是毕业，还要和大家一道学习石油部，共同把二轻部的工作做好。他对自己主管的工作抓得很紧，对支农工作极为重视，主持召开了全国支农会议和山西支农现场会，举办了农业机械展览会，交流和推广手工业机械化支援农业机械化的经验。为了尽快发展新兴塑料工业，他先后到北京、上海等地进行了调查，创建了二轻部塑料研究所。

邓洁工作一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他那种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反对违反科学、不负责任的浮夸、虚报等不正之风，是一位实事求是，勇于直言、敢于负责、有自己主张的实干家。

十年动乱期间，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从反对中央“手工业三十五条”文件着手，诬陷邓洁是“叛徒”、“日本特务”。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邓洁从天津刚回到家，就被“造反派”劫走，非法关押，七月中旬转入北京卫戍区。从一月到七月，邓洁共被揪斗十一次，小型批斗会百余次。他们采用法西斯手段，对邓洁施以几十种刑罚，打得他皮开肉绽，鲜血直流，牙齿大部被打落，头发被大把揪下，耳朵被打聋，外耳萎缩变形。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蔑中共上海临委整个组织是“叛徒、内奸、特务组织”，还妄图通过所谓邓洁的“叛徒”问题，陷害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他们用各种残酷手段，逼迫邓洁进行“交待”和“揭发”，但邓洁有如“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使他们的罪恶阴谋未能得逞。

一九七五年，邓洁被江青反革命集团流放到陕西省汉阴县，直到一九七八年一月病重住进医院、五月病危回到北京医治。在长达十一年的逆境里，他始终坚信党，坚信人民，坚信共产主义必定胜利。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三日，邓洁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被推倒。七月二十六日，邓洁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七岁。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大连党史资料通讯》增刊，1983年10月。
2. 《大连党史资料通讯》，1985年第7期。
3. 上海《大众歌声》第1集，1936年。
4. 邓洁：《我的申诉》、《历史简历》（1976年2月）。
5. 邓洁：《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总结》，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6. 邓洁：《大庆战歌》（萨尔图颂），1963年石油工业部党委印行。
7. 中央轻工业部1979年8月在邓洁追悼会上的悼词。
8. 乐天宇、夏之栩、纪锦章、赵秀德、门丽棠、黄佩兰、王尧山、王学文、孟心波、何慧君、钱俊瑞、韩增胜、陈永清、谢邦选、叶子龙、吕骥、孟波等的回忆和访问记录。

田家英

彭亚新

田家英从二十六岁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在党中央、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八个年头。他呕心沥血地宣传和普及毛泽东思想；夜以继日地参与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通过调查研究和信访工作，不断地沟通党中央、毛主席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他坚持真理，敢于指出党在工作中出现的失误；他无私无畏，当党内斗争出现错误偏向时，不惜牺牲自己保护同志；他刚直不阿、针锋相对地同危害党的事业的野心家、阴谋家作坚决地斗争。十年动乱初期，遭陈伯达、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致死。

(一)

田家英，原名曾正昌，一九二二年一月四日（农历十二月初七）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市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曾国融，经营一家小中药店。母亲周氏在家操持家务。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他排行最后。

曾家原是小康之家，由于四川军阀连年混战，社会动荡，曾家的生意一直不景气。田家英三岁那年，父亲去世，大哥继承家业，由于不善经营，家境日益艰难。

家庭的衰落使母亲忧虑万分，她把希望寄托在小儿子身上。在母亲的爱护下，田家英从六岁起开始读私塾，念《三字经》、《千字文》和“四书”、“五经”，背诵古文和诗词。

读了两年半私塾，田家英进入成都省立北城小学就读。完成小学学业后，一九三三年考入成都南薰中学。在班上，他学习刻苦，聪明过人，善作文，成绩优秀。

就在田家英读完初中一年之后，母亲病故，家庭经济困难，田家英不得不中途辍学，告别了喜爱的学校，在家里的药铺里当了学徒。他并不屈从命运的安排，立下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志向，在自己的蚊帐上写下了“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的对联，立志刻苦自学。

田家英四处借书读；有了一点零花钱也几乎都用来买书。空闲时间，他成了西玉龙街、祠堂街书店里的常客。大哥大嫂心疼油钱，不准他晚上读书。他就背着家人，把油灯藏在铁桶内，盖上一块铁皮，借着桶内透出的光线偷偷读书。

学徒期间，田家英结识了许多小伙伴，其中一人的父亲是个文学爱好者。经常介绍鲁迅、郭沫若的文章给田家英看，使田家英对新文学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他希望成为一名作家，并开始尝试着写一些短小的文艺作品向报刊投寄。

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给田家英以熏陶，五四以来优秀的新文学给他以影响，社会底层的艰苦生活更滋润了他的笔力。经过一段练笔之后，一九三五年，田家英的文章开始在一些报刊上出现。他主要写散文，偶尔也写诗歌、小说和书评。他的笔名较多，但用得最多的是田家英。这个名字逐渐引起成都文坛的注意，但谁也没想到这只是个十三四岁的少年。田家英这个笔名以后为大家所熟悉，而曾正昌的

本名则鲜为人知了。

田家英勤奋写作，拿到了一点微薄的稿酬，这时他又萌发出重新上学的念头。家里没钱供他上学，田家英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重返学校。一九三六年秋，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当时成都教学水准最高的学校之一——成都县立中学。

回到向往已久的学校，家庭切断了对他的经济支援，迫使田家英走上了卖稿维持学习和生活的道路。年少的田家英经常受到饥饿和贫困的威胁，但再苦也不向家里伸手。艰苦的生活把田家英磨练得更坚强。

(二)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制造的“华北事变”，触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九运动。这场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在共产党员的推动下，成都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狂涛。

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田家英逐渐觉醒。他阅读了很多反映东北人民悲惨命运、揭露日寇暴行的新闻报道和文艺作品，常和一些爱国青年一起，抒发抗日救国的情怀。他们感叹祖国大好河山被人蚕食鲸吞，大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一九三六年八月，成都爆发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川饭店事件”^①。田家英参加了这次反日斗争活动。十一月，日

^①1936年8月24日，成都人民反对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抗议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吞并华北的爱国反日事件。事件发生在“大川饭店”，故称。

军串通蒙伪军进攻绥远东部，傅作义将军率部抵抗。消息传到成都，各界人士纷纷起来声援。田家英和同学们到街头茶馆宣讲、散发传单，声援绥东抗战将士。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田家英结识了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其中尤以侯方岳^①对他的帮助最大。在他们的影响下，田家英阅读了《大众哲学》、《斯大林传》等通俗读物，以及《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他的思想开始变化，行动更为果敢坚定。

一九三六年冬，田家英参加了由共产党员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海燕社”。一九三七年春，他参加了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学生救国联合会、文化界救亡协会等团体。他在学校、农村、街头巷尾串连和动员群众，在《华西日报》上发表文章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一九三七年五月，“海燕社”和“成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成都“民先”），这两个由共产党员领导的、广泛团结青年的抗日救亡团体实现联合，对外统称成都“民先”。田家英从此也成为“民先”队员。

革命真理的启迪，斗争实践的锻炼，使田家英的思想开始发生很大变化，在抗战前夕产生了一个飞跃。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记叙了思想转变的过程和当时极度喜悦的心情：“我看到很多朋友，拿自己的生命维护他们宝贵的理想，来实现他们的希望。这些全使我十分感动……我爱着那些为我讲述真理故事的书本，它对我是一种诱惑，一种魅力，它指示给我一条坚决的道路，使我看清现实，它要我皈依真理，教我在应当交出生命

^①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抗战初期成都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后长期在云南工作，现已离休。

的时候，就把一切全交出来。……我读着，我咀嚼，我流泪，我兴奋，接着我又感到坦荡的舒服。……我想伸开我的翅膀，扑向火焰，蜕化出自己新的生命来。”^① 田家英急切地寻找党的组织，盼望成为里面光荣的一员。但是，四川地下党自一九三五年遭到严重破坏后还没有恢复；坚持在成都活动的只是些与组织失掉联系的党员。延安，这时成了田家英日夜向往的圣地，热望着有一天能去那里加入共产党的行列。

一九三七年秋，田家英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学校开除了。他便和“民先”队员赵石英、黄怀清（即羊路由）、刘纪元，向“民先”组织提出了去延安的要求。侯方岳为他们办理了去延安的手续。老党员赵世兰^②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延安的同志写信，介绍了他们的情况。十一月下旬，田家英一行四人告别了亲人和故土，踏上了去延安的征途。他们经重庆、武汉、郑州、西安，于十二月到达延安。

（三）

来到延安，田家英进入陕北公学（简称“陕公”）学习。陕公是培养政治理论干部和抗日人才的学校。这里生活艰苦，条件简陋。田家英懂得，乐于吃苦正是共产党的伟大和力量所在。认定自己选择的道路没有错。入校不久，田家英向学校党组织提出了入党要求。经过考察，党组织决定吸收田家英入党。当时陕公总支书记申力生这样回忆说：田家英虽然年纪很

^①《畴零篇（续）》，载1937年7月4日《华西日报》。

^②共产党员，赵世炎的姐姐，抗战初期四川妇女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轻，但思想进步，不仅有民族觉悟要求抗日，而且还有阶级觉悟，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对社会的腐败，对封建军阀也很痛恨，对党非常热爱^①。

一九三八年二月，陕北还是天寒地冻的季节，田家英却感到了春天的温暖：他庄严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

三月，田家英学习毕业，留校工作。他先后担任校总支秘书、中国近代史教员、宣传科教育干事等职。

一九三九年夏，陕公开赴前方，田家英留在延安马列学院继续学习。在校期间，田家英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自学时间，他常一人跑到静僻的山上埋头苦读；讨论时，他思想活跃，问题不弄清不肯罢休。周末，延安的青年喜爱聚在一起跳舞，田家英总是关在房子里读书。在这里，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史。

一年以后，田家英毕业留校工作。先后担任中国问题研究室研究员、学院教育处干事和中国现代史教员。当时他年仅十八九岁，是最年轻的教员，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小教员”。

一九四一年夏，为了克服党内严重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加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室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根据国统区和沦陷区发行的各种报刊，研究国民党和日伪的情况，供中央参考和对外宣传使用。田家英先在经济组研究过一段抗战时期的“工合”运动（即工业合作社运动），以后又到政治组从事大后方文化教育

^①访问申力生谈话记录。

情况的研究。这时期，国民党在大后方加紧了法西斯独裁统治，抗战的言论受禁锢，进步的文化遭摧残，青年学生受到监视和迫害。为了揭露和批判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间，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写了《奴才见解》、《从侯方域说起》、《沙漠化的愿望》等文章，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其中《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曾引起毛泽东对田家英的注意。

在政治组里，田家英认识了董边。田家英喜欢这个处事稳重，性情温和而又富有才华的女青年；他的聪明刻苦，热情诚恳也博得了董边的爱慕。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这对年轻人结成了终身伴侣。

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运动，田家英思想上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和同志们一起学习讨论整风文件，写思想自传，进行自我解剖。在讨论他的思想自传时，同志们肯定了他的优点，也诚恳批评了他骄傲自满和自由主义的毛病。这些批评给田家英很大的触动。当晚他没有吃饭，躺在床上哭了。董边问他为何这样难过。田家英说：“思想改造需要自觉，不经过痛苦的思索，不想清楚缺点产生的根源，是改不了的。”对思想改造，田家英非常认真。他响应杨家岭党委的号召，到群众中和基层去接受教育和锻炼。业余时间，他到杨家岭理发室和工人交朋友，帮他们学文化，细心体验他们的思想感情。此事他坚持了一两年从未间断。一九四三年，田家英被评为模范工作者，出席了杨家岭模范表彰大会。

一九四三年夏，田家英调中央宣传部历史组工作。在中宣部期间，他写了《从九一八到七七》、《东北历史问题真相》、《‘堵河’》等文章，编写了《民国以来大事记》。

一九四七年初，田家英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到达晋西北的静乐县搞土改。在土改斗争中，他和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为了防止地主阶级的报复，村里一个贫农经常手拿大刀，暗中保护田家英。当地生活很苦，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房东大娘每晚总炒些豆子放在田家英的枕头旁。后来，他染上了“出水病”（即伤寒），房东一家轮流守候在炕前细心照料。他们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小米熬成米汤喂田家英，想尽办法为他治疗。在房东一家的照料下，田家英恢复了健康。边区人民的深情厚意，永远地留在了田家英心里。

在延安，在革命队伍的大熔炉里，田家英度过了一生当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年。他迅速地成长，逐渐地成熟。

（四）

一九四八年八月，年仅二十六岁的田家英担任了毛泽东主席的秘书。解放以后，他又担任了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务。毛泽东很赞赏田家英的工作，曾多次给予很好的评价。

编辑毛泽东著作，宣传和普及毛泽东思想，是田家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田家英参加了毛选四卷编辑的具体工作。从文章的选定、整理和注释，到文字的校订和出版印刷，大量的工作都由他承担。他以满腔的热情和极端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这项工作。田家英对自己和他领导的同志要求极严，不允许出丝毫的差错。他经常引用清代著名学者包世臣的一句话：

“每临行文，必慎所许，恒虑一文苟下，重诬后世”，说明编辑出版工作中任何细微的疏忽，都可能损害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甚至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

田家英还是《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的编辑者。从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开始，田家英就注意收集毛泽东的诗词。有些诗词正是由于他的收集才得以保存和流传下来。如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就是一例。一九四九年春天，党中央、毛主席由西柏坡迁到北京香山。当人民解放军攻占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的消息传来，毛泽东兴奋万分，当即吟咏出《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一首。此诗即由田家英抄录收集。在编辑毛主席诗词时，他把这首诗送给毛主席。毛泽东说，对了，还有这一首^①。

建国后的十几年中，田家英在《学习》和《中国青年》等刊物上撰写了许多文章，热情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极端重要性，介绍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容。《毛泽东选集》出版以后，他又撰文向广大读者介绍选集的内容，还经常到中央党政机关作学习毛选的辅导报告。

负责信访工作，不断沟通党中央、毛泽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田家英担负的又一项重要工作，并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建国伊始，田家英就协助中央书记处处理人民的来信来访。随着人民来信来访的日益增多，党中央成立了中央书记处秘书室（后改为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即现在中办信访局的前身）承办信访工作，由田家英具体领导。他倾注了很多心血着手信

^①参见杨述：《悼田家英》，载1980年4月1日《人民日报》。

访工作的建设。建国初期，他发现有些领导机关对信访工作不够重视。田家英和秘书室的同志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了专门的报告，提出要高度重视人民的来信来访，建议各级领导机关指定专人或成立专门机构负责这项工作。毛泽东看过报告写了这样的批语：“这是专门为我处理人民来信的秘书室写的报告，其观点和所提意见是正确的。必须重视人民的通讯，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①毛泽东的批语连同秘书室的报告很快转发全国，推动了全国各级信访机构的建立和工作的开展。

处理群众来信，怎样做到既解决群众实际问题又及时向中央反映带普遍性的问题，使二者兼顾而不偏废。田家英提出了“分别处理，综合反映”的原则，要求秘书室处理群众来信信件有落实，同时又把一段时间来信中有代表性的情况，随时写成综合情况报告党中央。这个原则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意，在秘书室贯彻执行。

通过信访，田家英向党中央反映了很多重要情况，为中央从政策上解决一些问题提供了依据。一九四九年夏，田家英看了上海反映群众失业和生活困难的来信，立刻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这对党中央作出“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的重大决策起了重要作用^②。一九五〇年，北京大学有人反映学生负担过重，学生健康水平下降。田家英把这封信及时送给了毛泽东，

^{①②}引自原中央办公厅秘书室部分同志文章，《密切联系群众的榜样》，未刊稿。

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教育部门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及时改进了工作，从而改变了学生功课太重的状况^①。

在信访工作中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问题，田家英对此十分重视。一九六一年，许多群众反映，因写信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而遭到打击报复。田家英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刘少奇当即批示：凡是反映重要情况和揭发干部错误的来信，不转原件，将来信人姓名、地址和可能找到来信人的有关字句抹掉^②。秘书室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处理人民来信，保护了写信群众不受伤害，维护了人民的民主权利。

田家英是个有革命正义感的人，在信访工作中始终注意保护群众的正当权益，而对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则旗帜鲜明地进行斗争。他常给秘书室的同志讲古代义侠救人急难，解人困厄的故事，启发他们敢于维护真理，勇于保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他自己首先身体力行。信访工作中凡遇涉及高级干部的问题，他要亲自过问，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批办。事后他还要了解处理结果，直到问题妥善解决才肯罢休。

在处理人民来信中，田家英忠实执行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禁止对党的领导人歌功颂德。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对群众中这类来信，秘书室在回信中总要宣传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说服他们不要再这样做。对群众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送来的礼物一律退回；不便退回的按市价付款。后来，田家英还代中央起草了禁止给领导人送礼的通知。秘书室严格执行了不收群众礼物的制度。

^{①②}原中央办公厅秘书室部分同志文章：《密切联系群众的榜样》，未刊稿。

田家英还经常参与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和文章的起草工作。我国第一部宪法、《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等文件，田家英都参加了起草工作。

一九五六年，田家英参加了党的八大文件的起草工作。他为毛泽东起草的大会开幕词（经过政治局讨论修改），在会上受到代表们的称道。会议休息时，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赞扬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毛泽东以极赞赏的口气对这些同志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①

在毛泽东身边，田家英常被委以调查研究的重任。坚持实事求是，紧密联系群众，思维敏锐和方法灵活，是田家英在调查研究中最突出的特点。凡与他接触较多的同志和他去过的基层，人们都有深刻的感受。

一九五九年二月，田家英率工作组到四川省新繁县崇义大队（现为新都县大丰乡）调查。到后不久，社员和干部很快被田家英与众不同的风格所吸引。他衣著朴素，待人和气，见了人都热情打招呼。他特别喜欢孩子，有时前面抱一个，后面还背一个。到食堂吃饭，他问：“好不好吃？我尝一下。”说着拿过社员的筷子就要夹。社员忙说：“要不得，拿一双干净筷子来。”他说：“筷子颠倒过来就行了。”群众都说，田主任这人没架子，不象当官的。别看田家英热情和气，可批评起错误来又毫不留情。在整顿干部作风的会上，他狠狠批评了一些干部强迫命令瞎指挥的不正之风。有些社员害怕将来遭打击

^①访问逢先知谈话记录。

报复，不敢揭发批评干部的错误。田家英为他们撑腰说：“如果有谁今后要打击报复，你们就给我写信，或到北京来找我，来回车费都由我付。”田家英很快赢得了干部群众对他的信任。

下来不久，田家英发现，这里的干部群众都说一九五八年水稻大丰收，平均亩产一千斤。可是公共食堂的情况却很糟：社员吃不饱，油荤也很少，白天大家在食堂吃饭，晚上躲在家里煮菜充饥。田家英对汇报的产量问题有了怀疑。一天，他与公社会计摆“龙门阵”^①，会计无意透露了一九五八年有两笔帐：一是上报产量，一是实际产量，上报数字比实际数字多出四百二十斤。问题弄清之后，田家英对农村中的浮夸风有了深刻感受，多次批评教育干部以后再不能做这种损国家害群众的蠢事。共产党一定要实事求是。

三月，早稻开始插秧。省里要求各地推广高度密植的方法。深知其害的大丰干部群众不满这种瞎指挥的作法，但又不敢违抗。正在这时，毛泽东给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下达了。信中指出：插秧不可太稀也不可太密，密植程度怎样为好要由群众商定，上级不要下死命令，各地要从实际出发，不要管上级的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但是省里要求从“积极”方面理解这封信，继续推行高度密植。

田家英召开了干部会议，亲自宣读了毛泽东的通信。事后又在全公社反复广播这封信，让每个社员都知道毛主席的意见。他又召集了一次有老农、中年和青年代表参加的会议，专门研究插秧问题。大家都认为高度密植行不通，要想丰收，就

^①四川俗语，即说家常话。

要从本地实际出发，七八寸见方栽一窝秧，一定可以丰产。田家英和工作组否定了高度密植，决定照群众的意见办。

插完早稻，为保丰产，田家英建议组织人力去成都拉粪。他和工作组的同志也参加了拉粪的行列。田家英身体不算壮实，但拉车争着拉中杠。大丰距成都二十多华里，白天粪车不准进城，社员只有晚上进城，粪车拉回大丰已是半夜。田家英有时还和社员连跑两趟，回到公社天已大亮。田家英等干部的行动鼓舞了社员群众，每天拉粪十几万斤，保证了水稻生长有充足的养料。

田家英和工作组抵制高度密植，带领社员进城拉粪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周围的公社，群众纷传：大丰来了个青天。他们跑来看大丰的庄稼。一片片喜人的秧苗，引起人们的称赞，他们打心眼里敬佩这样的好干部。

对田家英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常给予具体指导，使他学到了许多科学的方法，调查工作收到了明显效果。一九六一年的浙江农村调查，毛泽东就指示田家英要用对比的方法，“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①通过分析对比，从中发现问题。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田家英率调查组调查了浙江省嘉善县魏塘公社和合大队和富阳县东洲公社五星大队两个典型。和合大队过去是富饶的产粮队，由于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一九五八年以后粮食产量连年减产，造成群众生活非常困难。五星大队干部作风正派，敢于抵制上面的瞎指挥，所以粮食没有减产，群众生活也不很困难。通过对比，调查组得出结论：这里没有

^①引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74页。

天灾，主要是“五风”造成了生产下降和人民生活困难。

调查当中，田家英的方法非常灵活。他常对身边的同志说，调查可以开座谈会，也可通过摆龙门阵了解情况。调查不能只找干部和贫下中农，也可找地主、富农、二流子等典型人物。他们谈的情况是否真实，我们还可以核实嘛。到一地调查，田家英很注意阅读当地的县志。他说，这可以了解本地的风土民情，历史沿革，对调查很有帮助。

田家英所做的调查研究工作，给党中央、毛泽东反映了很多有价值的情况，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一个时期，有些省市的领导同志向毛泽东要求，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工作。毛泽东不同意。他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田家英不能放，需要有人给我反映情况^①。

要当好毛泽东的秘书，就要求有比较广博而扎实的知识。田家英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一生抓紧点滴时间博览群书，刻苦学习。就是外出调查，间隙时间也是读书或买书。他的工资除衣食之外，大部用来买书和买明清人的翰墨。他收藏的字幅已近千件，各种书籍近万册。他特别喜欢中国历史和近代作家的杂文，这类书收藏最多。他说自己是“爱书爱字不爱名”。这件事被一些人认为是件蠢事。可田家英认为，学习就得有这么股傻劲。勤奋刻苦，使田家英具备了丰富的知识，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为做好本职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没有什么文凭和学历，而学识得到了毛泽东的欣赏和社会的承认，很多人为他自学达到的水平吃惊。田家英也以自己的学识和专业水平，担任了《红旗》杂志常务编辑、中共党史编委会委员、中国科

^①访问逢先知谈话记录。

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稿》的编委等职。

（五）

经常的农村调查实践和信访等工作，使田家英和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实际情况有比较深的了解。因而当五十年代后期以后，党的工作出现失误的时候，田家英能及时地察觉。这个时期，他坚持实事求是地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反映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热心地提出不少改进工作的建议，积极参与了党中央一些纠正农村“左”倾错误的文件起草工作，为纠“左”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

一九五八年十月，田家英在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调查，发现了小麦产量浮夸的情况；还了解到社员劳动强度大、时间长，而公共食堂伙食差，社员体质下降，造成劳动效率很低等问题。在修武县的调查中，县委书记张洋芹向田家英反映了他不赞成现阶段人民公社实行全民所有制的意见。他说，现在实行全民所有制，如果碰到天灾，农业减产，国家能不能把农民包下来；如果丰收了，国家要调农民的粮食，农民干不干？田家英赞成这种看法，并向路过新乡的毛泽东作了汇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一些人急于实现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想法。多次赞扬修武县委书记有头脑、看得远。这次会议还针对新乡等地反映出的问题，规定了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田家英在四川新繁县大丰公社搞了将近半年的农村调查，使他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严重存在的高指

标、浮夸风、瞎指挥和“共产风”等错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调查刚结束，他参加了庐山会议。会议期间，田家英如实向毛泽东汇报了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并递交了工作组反映新繁县全国劳动模范罗世发情况的材料。罗世发曾向工作组反映了上面强迫他搞浮夸和高度密植的问题，也反映了农村中存在的其他问题。这份材料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看过之后，批转给四川省委负责同志。

会议初期，田家英还多次和一些同志向毛泽东建议，让陈云重新出来主管经济工作^①。

田家英对毛泽东是敬仰和尊重的，但不盲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他对毛泽东的缺点看得比一般人清楚，殷切希望毛泽东能吸取一九五八年的教训，摆脱一些日常事务，潜心于理论研究，著书立说，以指导党的工作。在庐山，他给李锐说了一幅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即是指这个意思^②。

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实事求是地陈述了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党内“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却遭到毛泽东和一些思想还不冷静的同志的反对和指责。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严厉批判彭德怀。会后，田家英与李锐、吴冷西等四人心情沉重，来到山腰一个石亭，远眺长江天际流去，近听松涛阵阵，四人相对无语，心绪万千。亭中有一巨石，上刻古人七绝一首，亭柱却无联刻。有人提议写幅对联。田家英感慨万端地写下了这样一首：“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③

^{①②③}李锐：《怀念田家英》，载1980年第1期《战地》。

在庐山，田家英不顾个人安危，时刻关心和保护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彭德怀的信印发以后，会议气氛趋于紧张。而张闻天仍准备在小组会上发言，陈述他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工作的意见，促使会议能认真总结“大跃进”、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得知这一消息，田家英即打电话给张闻天，劝他别讲某个问题，因为上面有不同看法^①。会议转到反“右倾”以后，李锐受到批判。田家英非常同情他遭到的不幸。一天深夜，田家英冒着危险跑到李锐住处，对党内民主生活的不正常表示了义愤，给了李锐安慰和鼓励，并转达了胡乔木对李锐的关心。

后来，田家英也受到批评指责和围攻。他在会议初期反映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被人抓住大做文章。他说的准备提三条意见的事被揪住不放。田家英曾对一个朋友说过，如果允许他离开中南海，想给毛泽东提三条意见。其中一条是主席听不得批评意见；还有一条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这三条意见都是无可指责的，是一个党员对领袖的关怀和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表现^②。有人甚至怀疑田家英同彭德怀有联系。事后调查的结果说明他们之间并无联系。三条意见的事也被同志们遮掩过去。毛泽东后来在一个发言材料上批道：这是挑拨！秀才还是我们的。这个批示暂时保护了田家英。

田家英始终认为，彭德怀等人在庐山的行为是光明磊落的，所提意见也是正确的，对他们的批判是不公正的。庐山上

①肖扬：《忆庐山会议前后的张闻天同志》，载1985年第16期《新观察》。

②李锐：《怀念田家英》。

党内民主生活的不正常，没有使田家英屈服。他说过：“庐山会议可以把我压碎，但不可以把我压扁。”

庐山会议上，田家英虽然受到了错误批评，但他没有消沉。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强烈责任感，驱使他继续为纠正“左”的错误而努力。

一九六一年初，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亲自组织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田家英负责浙江组的工作。经过调查，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嘉善县魏塘公社和合大队的情况。这个大队地处杭嘉湖平原，过去是个产粮大队，由于“五风”的影响，一九六〇年粮食单产每亩只有二百九十斤。这使毛泽东对当时农村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有了深刻印象。在一些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引用和合大队的例子说明农村的严重问题。田家英还反映了农民对公共食堂的强烈不满。这个情况对毛泽东后来下决心解散公共食堂起了积极作用。

这次在浙江农村调查，田家英发现农村干部违法乱纪、强迫命令成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无章可循，不懂得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社员群众也缺少一个章程以监督干部，抵制他们的瞎指挥和强迫命令。他向毛泽东建议，制定一个农村工作条例。毛泽东非常赞成。一九六一年二月下旬，毛泽东召集各调查组负责人于广州，同部分地方负责人一起，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田家英是起草人之一。《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的制定，是继“十二条”^①

^①即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它是党中央重新纠正农村中“左”倾错误的开始，对重新制止“共产风”，扭转农村局势起了积极作用。

之后，党中央解决农业问题上“左”倾错误的又一重要文件。毛泽东赞赏田家英在制定“六十条”上起的作用。他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

“六十条”草案在试行过程中，各地反映，由于基本核算单位太大，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还没有彻底解决，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仍受压抑。毛泽东首先提出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建议。党中央也通知各地对此问题进行调查。奉毛泽东指示，田家英组织调查组到山西省潞城县农村进行调查。调查表明，下放基本核算单位有利于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广大农民和干部是拥护的；生产队的规模以二三十户一队为宜。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田家英在山西代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随即送毛泽东、邓小平审定，于翌年七千人大会讨论通过，下发全国。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和刘少奇指示田家英带调查组去湖南他们的家乡，了解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以后，农村贯彻“六十条”的情况，看看农村还有些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来到两位主席的家乡韶山和花明楼，调查组碰到一个新问题——当地群众纷纷要求包产到户。田家英带调查组深入细致地进行了解，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认为包产到户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迅速战胜经济困难。不久，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泽东反映了湖南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毛泽东不赞成搞包产到户。对新生事物的探索田家英是不肯轻易放过的。当他得知安徽省很多地方实行了包产到户责任田，回到湖南立刻派出三个同志去安徽调查责任田的情况。在安徽无为县，前去调查的同志看到与湖南迥然不同的兴旺景象。由于实行了包产到户，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不到一年的时间，严重

困难的局面得到扭转，人们的衣食比较充裕。事实令人信服地承认，包产到户确实是恢复生产、战胜经济困难的好办法。从湖南回到北京，田家英与杨尚昆商定，再派一些人到各地做些调查，进一步核实包产到户的问题。各地调查的结果都说明实行包产到户有较多优越性。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了调查情况。刘少奇指出，如果农民实在要求，可以试行包产到户。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指示下，田家英开始起草《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多种经营方式都可以搞，不要“一刀切”，以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

不久，毛泽东批评了包产到户的主张。田家英也因向毛泽东提出过这类建议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党内主张包产到户的同志都受到了错误的批判。田家英受到了不点名的批判。后来，他被迫对包产到户的问题作了检查，但没有为保全自己而推诿责任。他始终没有说出刘少奇委托他向毛泽东提建议一事，也没有把责任推给下面调查的同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坦荡无私的宽阔胸怀。

(六)

田家英是个有强烈革命正义感的党员，是个坚持和捍卫真理的勇猛斗士。对党和人民他无比热爱，对危害党的肌体的蛀虫，则毫无惧色，坚决斗争。当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骤风暴雨袭来的时候，他挺身而出，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来表示抗争。

陈伯达、江青、康生之流是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野心家、阴谋家。田家英在长期的接触中对他们的恶劣本质早有所

觉察，并同他们进行过不妥协的斗争。

江青是田家英极端厌恶的一个人。她三十年代的丑史，田家英早有所闻。江青平时生活讲究，作风霸道，对待身边工作人员凶狠。对此，田家英常常嗤之以鼻。除工作关系不得不与江青打交道外，对她尽量回避。对田家英这种冷淡而蔑视的态度，江青极为恼火，总是寻找机会加以报复。北戴河会议上，田家英因主张包产到户受到错误批评。江青趁机大骂田家英是“资产阶级分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就伙同陈伯达等对田家英进行诬陷和迫害。

田家英与陈伯达共事二十余年，深知陈伯达残暴虚伪的政治品质。陈伯达有极强的政治野心和权力欲，为达目的惯于见风使舵和察言观色。他当时已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仍不满足，经常向田家英探听“气候”。如：“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等等。田家英对此很反感，骂陈伯达是小人。一九五八年，陈伯达鼓吹不要商品生产和取消货币，以表示自己的“革命”，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但他没有吸取教训。庐山会议前期，他也曾主张纠“左”，但后来立刻转向，大写批判彭德怀的文章，好象他一贯正确。鉴于这些，田家英认为陈伯达是一个奸臣，和他长期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陈伯达也把田家英视为眼中钉，急欲除之而后快。“文化大革命”一到来，他就迫不及待地对田家英下了手。

阴险狠毒的康生，惯在党内兴风作浪整人害人，田家英认为康生是个危险人物，对他必须有所提防。

田家英手下有个小人物，叫戚本禹。此人利欲熏心，行为卑鄙无耻，喜爱投机钻营，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秘书室开会批评过他的个人主义。田家英当时说过：你个人主义不改，早

晚会垮台。戚本禹劣迹太多，田家英后来将他调离秘书室。戚本禹对此怀恨在心，因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迫害田家英的凶恶打手。

一九六五年，在京剧《海瑞罢官》的问题上，田家英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把此剧说成是为彭德怀翻案，不同意对作者吴晗进行批判。

一九六四年前后，江青、康生就多次在毛泽东面前诬蔑说《海瑞罢官》有重大阴谋，是替彭德怀翻案。毛泽东曾叫田家英阅读《海瑞罢官》的剧本，提出自己的意见。田家英看过之后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看法：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大阴谋，如果硬说这个剧本有阴谋而展开批判，以后没人敢研究历史、敢写历史剧本。但是江青、康生继续在毛泽东面前挑拨。毛泽东最后同意了他们的看法，决定对《海瑞罢官》进行批判^①。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发表，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海瑞罢官》打成大毒草。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田家英等人谈话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②

田家英对毛泽东的意见有保留。为了保护这场批判运动可能伤害的同志，在整理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时，田家英毅然删去讲话中涉及彭德怀的内容。还删去了毛泽东表扬关锋、戚本禹

^①侯方岳：《回忆田家英同志》，未刊稿。

^②转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365页。

的一段谈话。

整理讲话的事被关锋得知，他与戚本禹合谋向江青告密。江青立刻给田家英加上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

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田家英意识到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降临，而首当其冲的是知识分子。他气愤地说：“这是一场文字狱，是整知识分子的运动。”一九六六年初，田家英对国内日益升级的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忧心忡忡，对江青等人借机兴风作浪的行为表示了极大愤慨。他对来京的侯方岳说：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①，这是我的人生座右铭。真理我要坚持到最后，直到停止呼吸，绝不出卖灵魂，绝不向错误屈服。”^②表达了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斗争到底的决心。

一九六六年五月，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一场内乱由此开始。二十二日下午三时，王力、戚本禹等人来到中南海田家英住地，声称宣布中央决定：田家英一贯“右倾”，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决定立即停职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当晚，在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会议上，办公厅一个负责人又给田家英加上一条“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二十三日上午，田家英怀着满腔悲愤离开了人世。临终留下了对党至死不变心的遗言：“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①这是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七律中的两句，意即：如果有利于国家就不顾生死去做，怎能因为个人的祸福就躲避或追求呢。这两句诗是田家英的座右铭。

②侯方岳：《回忆田家英同志》，未刊稿。

十年浩劫终于过去。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一九八〇年初，田家英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强加在他头上的种种罪名推翻了，开除的党籍恢复了。三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追悼大会。邓力群在悼词中，对田家英在参加毛泽东著作的编辑、注释和出版工作，宣传和普及毛泽东思想，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参加中央有关农村政策文件的起草工作和处理信访工作中，对党和人民做出的突出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对田家英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刚直不阿，牺牲自己，保护同志，坚持真理，勇于斗争以及对工作认真负责，勤奋好学的优良品质进行了赞扬。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邓力群：《在田家英追悼会上致的悼词》，载1980年4月19日《人民日报》。
2. 董边：《忆家英》，载1981年第5期《人物》。
3. 李锐：《怀念田家英》，载1980年第1期《战地》。
4. 杨述：《悼田家英》，载1980年4月1日《人民日报》。
5. 史莽：《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避趋之》，载1980年第1期《浙江学刊》。
6. 原中央办公厅秘书室部分同志：《密切联系群众的榜样》，未刊稿。
7. 侯方岳：《回忆田家英同志》，未刊稿。
8. 访问董边、逢先知、侯方岳、李锐、陈秉忱、赵石英、马仲扬、缪楚黄、汪大漠、史敬棠、申力生、徐方略、曾彦修、林克、吕澄、朱固、丁伟志、裴润、彭达彰、戴碧湘、李公绰、叶兆琪、王乃端、王乃斌、王若兰、罗远述、罗世发、周明久、陈世昌等人的记录。

鲍 罗 廷

翟作君

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是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苏联顾问，也是这一时期在中国具体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决定的主要代表。他在协助孙中山改造国民党、推动国共合作和第一次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协助中共广东区委、推动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武汉时期也犯有严重错误。

(一)

鲍罗廷曾用名格鲁津贝尔格，一八八四年七月九日出生在俄国维帖布斯克州雅诺维奇村的一个贫苦家庭里。他在拉脱维亚度过了幼年和少年时代。一九〇三年他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次年，被派往瑞士从事党的工作。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流血的星期日”后，党组织派他到俄罗斯传达列宁的指示，不久又奉调参加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里加委员会的工作。一九〇六年四月，鲍罗廷代表里加出席了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后回国不久，被沙皇秘密警察逮捕，获释后，被党派往英国，在旅英俄侨中从事革命活

劲。一九〇七年春，由英赴美，先后在波士顿、芝加哥一边做工，一边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与朋友们一起创办过《美国工人》刊物，参加了美国社会党，担任援助俄国政治犯委员会主席。在芝加哥，他为俄侨设立了一所进步预备学校，还在一所大学任课和进行研究工作。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鲍罗廷于一九一八年七月返回祖国，在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一九一九年三月，鲍罗廷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不久，他受列宁的委托，化名布兰特温，带着列宁写的《致美国工人的信》前往美国，成为共产国际派往美洲的第一位使者。鲍罗廷从芬兰乘船，一路上历经风险，刚到纽约就被警方发现，无法在美国住下去，便于当年初夏从美国转往墨西哥。在墨西哥，他遇到了马纳本德拉·纳特·罗易，并引导罗易推动墨西哥社会党转变为共产党，并加入了共产国际。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鲍罗廷到西班牙，作为苏俄代表参加了在马德里举行的万国邮政协会会议。一九二〇年二月，他参加了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共产国际会议。之后，他经由柏林返回莫斯科，继续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并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译成了英文。一九二〇年七月，鲍罗廷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次年一月，他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柏林的特使。一九二二年二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时，他任英国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了《共产国际》杂志英文版的编辑工作。此后，他被派往英国，化名乔治·布朗。同年八月在格拉斯哥被捕，判苦役半年，期满后便返回苏俄。

一九二三年一月，孙中山“为了改造国民党，建立革命军队和为了进行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请求苏联政府支援中国

的革命运动^①。五月，苏联政府在给孙中山的电报中明确表示，苏联政府准备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开始援助的形式，是给中国派遣志愿的军事顾问、政治顾问以及其他的顾问。这时，鲍罗廷的好友加拉罕出任苏联驻中国大使。他建议派遣鲍罗廷到中国担任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的首席顾问。因为鲍罗廷曾长期在国外协助各国无产阶级开展革命运动，并系统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经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同意，鲍罗廷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政府驻中国国民党首席政治顾问的身份，前往中国。

(二)

一九二三年八月，鲍罗廷离开莫斯科，经哈尔滨、沈阳，九月抵达北京，首先同加拉罕长谈，然后同李大钊取得联系，并同中共北京地区的负责人一起讨论了国共两党联合战线问题。鲍罗廷强调，就中国革命的客观形势看，需要国民党与共产党无条件地统一起来；还提出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加入国民党的具体建议。九月下旬，他携带加拉罕给孙中山的介绍信前往广东。月底途经上海，会见了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即乘小船南下，于十月六日到达广州，向孙中山递交了加拉罕的介绍信。加拉罕在信中说：“鲍罗廷同志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多年来一直从事俄国的革命运动。鲍罗廷同志不仅是我国政府的代表，而且是我个人的代表，阁下可以和我一样同他友好共事。”^②十月九日，孙中山举行招待会欢迎鲍罗廷。孙中山在

^{①②}转引自《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0页。

欢迎辞中说：“鲍罗廷来自一个短期内结束内战而立于强国之林的国家，苏俄不愧为中国革命的模范。”^①鲍罗廷向中国朋友介绍了苏俄革命的经验。十月十五日，国民党员在广州市立公园举行盛大集会，鲍罗廷应邀出席，并发表演说，号召群众团结在国民党周围。在广州国民党员、外交部以及廖仲恺个人举行的欢迎会上鲍罗廷多次阐明建设一个组织良好、团结好、矢志民族解放的党的重要性。十月十八日，孙中山正式任命鲍罗廷为中国国民党组织教练员。从此，他就在孙中山身边，积极为推动国民党的改组，建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而努力。

鲍罗廷曾同孙中山进行过多次长谈，回答了孙中山关于俄国革命、俄共(布)党以及列宁的工作、学习、生活等各种询问。也听取了孙中山关于国民革命的设想。他对改组国民党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前景很有信心。他对孙中山表示，要以六个月的时间将广州变为党最巩固的地盘，在一两年间将革命精神普遍于全国，相信革命成功虽较俄国为迟，而最终是会成功的。他决心为实现他的计划而奋斗。他还向孙中山表示：“假定中国革命的工作能够完成，我就死在中国。”^②孙中山对鲍罗廷的到来，给以极为热烈的欢迎和款待，多次在公开的场合下介绍鲍罗廷与群众见面，并号召全党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他说：“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和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他还说：“因为要学习它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

①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 6 月版第 292 页。

② 转引自元邦建，《鲍罗廷在广东的几个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84 年 3 期。

的教练员，使之训练我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①。鲍罗廷还以很大的精力，同国民党其他领导成员交谈，说服他们认识国民党改组的重要性，认识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的重要作用。

由于鲍罗廷既是苏联政府派驻中国国民党的代表，又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所以他的使命除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外，还要指示共产党进行革命活动。因此，他到广州不久，就召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两中央局的驻粤委员和中共广东区委委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委员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党改组进行方法，力劝孙中山召集改组会议。”^②广东的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联席会议，讨论关于国民党改组问题，鲍罗廷到会详细报告了他来华后的工作情况，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使民族革命运动真正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国民党的改组正朝着这个方面进行。”^③会议讨论了由他参加起草的国民党党纲草案和章程草案的意见，决定派谭平山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确定在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与会的党团员要统一认识，并注意联络国民党的进步分子。鲍罗廷在工作中，很重视正确处理与中共广东区委的关系。他把自己作为中共广东区委与广州国民党之间的桥梁，互相尊重，互相支持，而不是凌驾于广东区委之上。正如当年曾任中共广东区委秘书的赖玉润所

① 《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基础》（1923年11月25日在广州大本营讲话），载《孙中山最近演讲集》。

②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③ 转引自元邦建：《鲍罗廷在广东的几个问题》。

回忆的：“广东区委尊重鲍罗廷的意见，鲍罗廷的意见也是经过广东区委研究集体决定之后才能贯彻执行的。”^①

一九二三年十月下旬，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讨论改组计划和章程草案。孙中山在会上发表演说：

“同是革命，何以俄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全由于有组织、有训练的革命党及党员之奋斗。”他还说：“吾党要从今日起……不专尚个人的奋斗，要靠党的成功。”^②鲍罗廷就国民党改组和所制订的章程草案作了报告，指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进行着长期斗争，而力量的联合成为生死存亡的问题。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了进行坚决斗争团结人民群众。要在中国完成类似的任务，国民党应当进行改组，通过人民明白易懂的纲领并以各种通俗易懂的方法向广大人民群众介绍这个纲领。他强调，只有强大的组织严密的党才能达到统一和独立的目标。会议期间，由孙中山委任廖仲恺、胡汉民以及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广东区委书记谭平山等九人组成新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五人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十月二十八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鲍罗廷被聘为临时中央执委会顾问，谭平山被推为临时中央执委会书记，具体办理国民党改组事宜。会议还决定，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办国民党周报，草拟党纲，组织临时委员会上海执行部。

鲍罗廷为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首先，下功夫改变国民党组织成分比较复杂，工人、农

^① 赖玉润：《在广东革命洪流中的一段回忆》，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向导》周报第48、49期。

民、进步分子数量不多的状况。据统计，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登记在册的国民党党员数为三千六百四十九人。在鲍罗廷以及中国共产党各地组织的努力下，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并带动了一批进步青年学生加入，为国民党补充了新鲜血液，使国民党的组织迅速得到发展和扩大。到第二年一月，党员已发展到八千二百十八人^①。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鲍罗廷出席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各区分部联席会议，并在会上提出如下建议：一，各区执行委员应有集中办公的地方，并应组织训练党员，研究党纲党章以及社会政治状况的学校，每期三个月，凡党员均参加训练，然后足以传播主义和发展新党员；二，颁布给农民分配土地、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以及使小资产得到好处的法令。这些建议，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成。

其次，帮助健全国民党的组织机构。鲍罗廷建议在国民党部分组织中试行委员制，取得成绩和经验后再广泛推广。孙中山接受了鲍罗廷的建议，指定一些年轻的党员成立国民党广州临时区党部，实行委员制。广州临时区党部执行委员会在共产党员的带动下，实行民主集中制，改变了过去互相扯皮的旧作风。孙中山一开始也不习惯委员制，很少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因为他了解不到实际情况，而且决定了的事情也往往由于右派的反对和阻挠贯彻不下去。特别是一些官僚，害怕国民党改组以后会失去高官厚禄而阳奉阴违。鲍罗廷建议孙中山经常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以避免出现上述问题，孙中山同意了。

^①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记事录》，转引自元邦建：
《鲍罗廷在广东的几个问题》。

鲍罗廷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得到了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使改组计划得以逐步实现。但也遭到谢持、邓泽如等右派的阻挠和破坏。他们企图挑拨孙中山与鲍罗廷之间的关系，达到反对改组国民党的目的。十一月二十九日，邓泽如、林直勉等十人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说国民党的“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实多出自俄人鲍罗廷之指挥”，“闻俄人替我制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①，等等。但孙中山看清了邓泽如等人的阴谋，他相信鲍罗廷，坚定地实行联俄、联共政策。十二月三日，他在邓泽如等的“弹劾案”上亲自批示：“党章党纲等草案稿，为我请鲍君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②十一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又在大本营发表演说，进一步阐述国民党改组的用意，强调要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③孙中山的观点鲜明，有力的挫败了右派分子破坏国民党改组的阴谋。

在孙中山的信任和中共广东区委的支持协助下，鲍罗廷积极努力地工作。经过九个月的酝酿筹备之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在这次会议上，鲍罗廷和瞿秋白等共同起草并经孙中山定稿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经过代表们的讨论通过了。同时，鲍罗廷被聘为顾问。

这次大会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正式形成，无疑，鲍罗廷是

①解放军政治学院编印：《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320页。

②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上海中正书局1948年版。

③《中国国民党周刊》第2期，载《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64页。

起了重要作用的。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三)

鲍罗廷在协助国民党改组，推动国共两党合作的过程中，紧紧依靠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团结一致，不断揭露、孤立和打击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使革命的统一战线得以迅速地建立和巩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右派并不甘心失败，继续进行分裂和破坏活动。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国民党监察委员谢持、张继专程到广州东山鲍罗廷的住所，指责说：“俄国对中国革命，究取何种态度，是否只求友国民党，抑同时扶助共产党双方并进乎？”还责问鲍罗廷说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是否承认党中党”？鲍罗廷严正地指出：“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在国民党内实际存在着左右派之分，“如方瑞麟等对中俄协定之宣言可认为右派，共产党则为左派”；“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鲍罗廷还驳斥谢持、张继等取消共产党的主张，说：“国民党中央干部，尚未能组织完好，不能指挥全体党员……共产党不能取消自己的组织，坚持必须保留在国民党内”^①。

一九二四年八月，鲍罗廷针对国民党右派妄图排斥共产党，分裂统一战线的阴谋，通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再次肯定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并明确指出：

^①解放军政治学院编印：《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328、343页。

“中国共产党，乃中国正在发展之工业无产阶级自然的阶级斗争所涌现之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之组织，既系如此，则自不能不为国际无产阶级政治组织之一部。即使吾人能以人力解散现存之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必不能随之消灭，彼等必将另行组织，故中国国民党对于加入本党之共产主义者，只能问其行动是否合于国民党主义政纲，而不问其他”^①。鲍罗廷在国民党内紧紧掌握一条方针，就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团结和依靠国民党左派，不断揭露和打击右派分子的阴谋，维护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坚持革命统一战线。由于国民党中央设立政治委员会，鲍罗廷被聘为顾问，故常常列席政治委员会的会议，并参加一些重大问题的决定。

鲍罗廷与孙中山合作得很好，孙中山有事常找鲍罗廷商量，鲍罗廷则经常请示孙中山。鲍罗廷说：“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常常遇到了困难，遇到了挫折，我们就去请教总理的引导，我们依了他的引导去做的时候，我们得到的结果就不会十分错误”^②。鲍罗廷经常宣传孙中山的伟大人格和卓越功勋，而孙中山也多次在各种场合热情赞扬鲍罗廷。一九二四年二月十六日，孙中山在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契切林的信中说：“我对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为我们做出贡献的鲍罗廷同志表示深深感谢。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他的中国之行显然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③孙中山北上时，在北京成立国民党新的

①解放军政治学院编印：《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343页。

②《鲍罗廷在广州国民政府欢迎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宴会上的演说》，载《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69页。

③《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24页。

政治委员会，鲍罗廷继续被聘请为顾问。孙中山与鲍罗廷的友谊一直持续到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生命的最后时刻。当孙中山因胃癌和肝癌病卧北京生命垂危之际，鲍罗廷与宋庆龄一直守护在他的病榻旁。孙中山将遗嘱和致苏联遗书交给了鲍罗廷。孙中山在遗书中写道：“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①孙中山在弥留之际，“还对汪精卫、何香凝说：‘要师事鲍顾问’。孙中山对鲍罗廷有托孤之意，这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所周知的。”^②

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后，右派的活动更加猖狂，鲍罗廷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但是他一如既往，坚持团结左派、打击右派的政策。从右派分子邹鲁的谈话中也可以说明这一点，邹鲁说：“当时第三国际派来广东支持共产党的是鲍罗廷，他又是政治会议的顾问，他托庇于联俄容共政策之下，又有党内共产分子的撑持，更联络汪兆铭等，以巩固自己的势力和地位。”^③

在鲍罗廷的支持下，为限制各省驻广东的军队随便征收和抢夺财政收入，政治委员会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召开会议，决定统一军队和省、地方的财政，不管是谁，如敢反抗，严加惩办。但是窃踞广东大学校长职位的邹鲁，借口“教育经费独

① 《孙中山致苏俄遗书》，载解放军政治学院编印：《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144页。

②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317页。

③ 解放军政治学院编印：《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335页。

立，”坚持要按广东大学过去的办法，独立收税，反对财政统一。邹鲁所以敢于不执行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决议，是因为背后有一批右派在支持他。鲍罗廷为了打击以邹鲁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嚣张气焰，在政治委员会上指出：“教育经费之独立，比较军人盘踞财政，为害尤烈”。“国民政府之成立，即教育经费独立之保障”，“教育机关直接征收财政收入，破坏财政统一，决不可行。”^①并建议派人接收广东大学的财源。邹鲁寻找各种理由，借口孙中山同意“教育经费独立”，甚至以欧美国家为例，认为这些国家的教育机关直接征收基金，并没有破坏财政统一，因而拒绝接受政治委员会关于财政统一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鲍罗廷就建议撤销邹鲁的校长职务。但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庇护和支持，政治委员会仅决定给邹鲁以书面严重警告处分^②。

鲍罗廷帮助中国革命的积极行动，受到国民党新老右派的仇视。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参加西山会议的国民党老右派分子通过决议解除鲍罗廷的职务。国民党左派和广大革命人民群众都拥护和支持鲍罗廷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在国民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程潜提议“俄国顾问鲍罗廷先生任政治委员会高等顾问后，以其经验及学问，至诚帮助我们革命，其一种互助奋斗精神，吾人应感激之。”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以大会的名义赠送一座刻有“共同奋斗”四字的银鼎给鲍罗廷^③，并继续聘请鲍罗廷为高等顾问。

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

①②解放军政治学院编印：《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337页。

③《工人之路》特号第195期1926年1月8日。

立。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谭延闿任军事部长，孙科任建设部长，鲍罗廷被聘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八月二十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胡汉民与许崇智是阴谋刺廖案的重大嫌疑犯，广州政府改编了许崇智的军队。鲍罗廷提出要坚决镇压右派，逮捕一批嫌疑犯罪分子，在国民党内开展肃奸运动。但受到右派势力的阻挠。何香凝曾回忆说：“仲恺被暗杀之后，苏联顾问鲍罗廷立即提出非常正确的主张，要把胡汉民、胡毅生等嫌疑的人立即逮捕起来，但是立刻遭到右派喽啰的反对。”^①鲍罗廷在廖案发生后在中共广东区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大会上作报告，指出廖案和肃奸运动在革命与反革命政治斗争中的严肃意义，并指出政局的暂时稳定朝着有利于革命的形势发展，要求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应该掌握有利时机，为实现统一广东、巩固广东革命基础而斗争^②。

根据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日渐统一与巩固，以及广东工农革命运动进一步高涨的有利形势，鲍罗廷主张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开除一批国民党老右派的党籍，扩大左派势力。周恩来回忆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我从汕头回广州，和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同志、苏联派到广东的国民党和政府的顾问鲍罗廷商量。当时，我们本来确定的政策是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我们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中央执委中我们党员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的优势”。“当时在国

^①何香凝：《我的回忆》，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②赖玉润：《在广东革命洪流中的一段回忆》。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左派占了绝对优势，实现上述计划是完全有保证的。”^①但是中共中央来电不同意这个计划，居然还在上海与戴季陶公开谈判，请戴季陶等回粤参加国民党二大。鲍罗廷对这种做法很不满意，指责派到广东担任这次大会的党团书记张国焘，“为什么广东方面将那些阴谋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右派分子驱逐出去了，现在却又把他们请回来？”鲍罗廷认为此时决不应退让，退让会助长右派的气焰。他虽然不赞成中共中央对此事的右倾退让政策，但又觉得这是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维经斯基、甚至是共产国际所支持的政策，不能不执行。因而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时，“向右派作了极大的让步”，“结果造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②从此，造成接踵而来的恶果。

（四）

鲍罗廷在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过程中，十分注意革命武装的建立。

一九二三年十月，鲍罗廷到达广州时，广东和全国各地一样，到处是军阀割据和混战。当时广东革命所需的费用，要依靠滇、桂军阀杨希闵、刘振寰支持。孙中山在广州建立的大元帅府所能管辖的范围，也仅仅是广州市及周围不远的地区。在广东省内，北边有桂系军阀沈鸿英、东边有粤系军阀陈炯明，西边和海南岛主要有军阀邓本殷。广州实际上是处于军阀的四

^{①②}《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8—119页。

面包围之中，革命政权极不稳定，就连驻扎在广州地区的滇桂两军，也是心怀鬼胎、各有打算，表面上拥护而实际上阴谋反对孙中山的大元帅府。此时，军阀陈炯明的军队攻占了石龙，政府军向广州退却，广州郊区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市内戒严，人心浮动，国民党的改组，正面临夭折的危险。十一月十三日，鲍罗廷出席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召开的广州各区分部执行委员会议，并发表演讲，强调有目的军事行动的重要性和要重视发动农民的工作。他指出前线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国民党在农村农民中的工作薄弱。会议根据鲍罗廷的建议，立即动员国民党员行动起来，发起组织国民义勇军，保卫广州根据地。当时，广州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纷纷带头报名参加国民义勇军。这支保卫革命政权的武装力量建立后，迅速击败了陈炯明对广州的进犯，从而使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更坚定了孙中山的信心。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鲍罗廷大力协助孙中山建立革命军队，首先是帮助建立黄埔军官学校，培养革命军事干部。鲍罗廷受孙中山的委托，和廖仲恺在一起，负责对黄埔军校的设置、军事组织、政治制度等计划的制定和实行。四月十六日，鲍罗廷应孙中山的要求，与加拉罕一同向莫斯科发出求援电，要求：“一，选派五十名工作积极的军事人员组成顾问团来广东；二，让具有丰富作战经验、能使孙中山敬服的同志率领这个顾问团。”^①五月间，苏联政府派出了以巴甫洛夫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来到广州。巴甫洛夫参与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改组工作；同年七月，在东江不幸

^① 《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第27页。

遇难。苏联又改派瓦西里·布留赫尔（加伦）为首的军事顾问团来华。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苏联派到中国担任军事和政治顾问的专家达九十二人，其中五十九人在广州工作过。鲍罗廷及在他领导下的这批苏联军事顾问人员在平定商团叛乱和刘震寰、杨希闵叛乱的斗争中，在东征南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建立革命军队过程中，鲍罗廷还向孙中山具体介绍了苏联红军的战斗生活。孙中山对苏联红军的组织和政治教育制度很感兴趣，他说：“这是我们的军队所没有的，我们也必须全部这样做。”^①从此以后，孙中山就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鲍罗廷经常抽出时间到军校做报告，对学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鲍罗廷为创办黄埔军校，积极争取苏联政府给军校以武器和军费上的支持，做了大量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仅黄埔军校的开办费，苏联政府就拨给了二百万卢布的现款。一九二五年，苏联政府又一次拨给广东政府四十五万卢布的整编军队费用，以及大批军械。

同时，鲍罗廷还协助中共广东区委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李富春、徐成章、聂荣臻、熊雄等为委员，负责领导广东的军事行动，在广东地区从事军事工作的党团员统归军委指挥。中共广东区委在当时仍然是秘密的组织，为了方便进行公开的工作，争取团结各军队中的进步分子，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以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联合粤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分校、桂军军官分校等青年军人，在一

^① 《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第27页。

九二五年二月初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五月十七日，青年军人联合会举行第一次全体职员联席会议，鲍罗廷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出席，对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给予热情的具体的支持和指导。这个联合会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革命力量，打击国民党右派势力，同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鲍罗廷还征得孙中山的同意，从黄埔军校等部门抽调了一批军事干部，成立了一支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长徐成章，副队长周士第，党代表廖乾五，军事教官赵自选，政治教官曹汝谦，都是共产党员。这支队伍在中共广东区委的直接领导下，在支援工农运动、镇压地主豪绅的反抗，保卫广东革命政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后来，在这支队伍的基础上，扩大成立了以叶挺为团长的第四军独立团，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武装。

但是，鲍罗廷在建立革命武装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错误。他在广州期间，虽然协助广东区委建立了铁甲车队和独立团，使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一支武装。但在当时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下，这支武装的力量与其他各种政治势力所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较，相差悬殊。这支武装仅三千人，而且后来也未能得到发展扩大，更谈不上以此对付复杂形势的变化。对此，鲍罗廷是有责任的，他还片面主张支持蒋介石为军事领袖，不赞成过快地发展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军事力量。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发生时，鲍罗廷不在广州。四月二十九日，鲍罗廷自苏联回粤后曾说过：“国民党有两个利器，一个是党，一个是军队。党和军队有联结之关系，党和军队是一个，军队和党也是一个，不可分离。我们以

军队作党的先锋队，只认清党与军队是一个利害，绝对团结，于军队方有希望。现在四面八方均是敌人，各派一定要联合起来，共同去打倒敌人。敌人既推倒之后，方再讨论革命原理，否则先是分裂必影响革命前途”^①。鲍罗廷等不敢大胆放手发动无产阶级自己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仅是一般号召军队与党要团结，不要分裂，其实质就是怕得罪国民党蒋介石。

鲍罗廷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之后，开始觉察到蒋介石的不可靠。他说：“我们不能依靠国民党，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不稳定的政党……即使它今天和我们站在一起，到了明天它就会和我们反目成仇。”^②因此，他采取的策略是与蒋介石暂时妥协退让，支持蒋介石从广东出发北伐，以后再组织力量推翻蒋介石。李立三曾这样讲过：“在北伐过程中广东党的总路线要准备推翻蒋介石，积极准备我们的力量来反对资产阶级。鲍罗廷当时的计划确是向着这一方向走，不过因为这不仅是广东问题，而且是全国问题，就是拥护蒋介石，还是打倒蒋介石，这一问题丝毫不能动摇，他的意见是要打倒蒋介石。”^③

一九二六年七月，蒋介石离开广州北伐，鲍罗廷开始在广州积极准备组织自己的武装。当时，省港大罢工为了配合北伐已经结束对香港的封锁，工人武装纠察队也要解散。鲍罗廷考虑到如果能将这支经过训练和锻炼的工人武装保留下来将是一件大好事。于是在与中共广东区委商量后，“提出利用蒋介石与宋子文的矛盾，以罢工工人纠察队为基础，帮助当时广东国

①《海外周刊》第14期，1926年6月21日。

②《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第31页。

③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0日）。

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建立一支‘缉私卫商团’的武装组织。这样，既可以保存工人武装力量，又可以成为将来对付蒋介石的一支力量”^①。中共广东区委陈延年接受了鲍罗廷的这一建议，调区委委员、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总教练徐成章担任该团团团长，施卜任参谋长，许多连排长都由共产党员担任。鲍罗廷还与邓中夏、苏兆征等亲自到“广州郊区某地考察地形，看是否适宜队伍驻地”^②。这个团由一千多工人武装纠察队组成，最初在东莞虎门进行训练，以后又调回广州。四一五广州的李济深、古应芬、钱大钧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也举行反革命政变，缉私卫商团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激烈的抵抗，终因力量悬殊而被解除了武装。

与此同时，鲍罗廷还协助中共广东区委抽调一批干部配合北伐战争，在军队中建立党团组织，随军进入江西，准备在军队中组织我们的力量，并制定了一份组织大纲，由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委员聂荣臻带到上海报告党中央^③。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的这一计划，在当时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但是，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不仅不给予支持和领导，反而批评指责中共广东区委是“越俎代庖”，“组织的原则实属错误”、“自由行动”等等^④，致使这一军事计划未能实现。

（五）

鉴于广东已形成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和中心，鲍罗廷曾建议中共中央搬迁到广州，以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但是，驻上海

^{①②}黄平：《往事回忆》。

^{③④}《中央致粤区信》（1926年10月4日）。

的党中央不同意迁移广州。不过，中共中央同样也感到广东工作紧急，所以在一九二五年五月指定中共中央委员谭平山、周恩来和罗觉（罗亦农）会同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及鲍罗廷等五人组成中央临时委员会，指导广东一切实际工作。之后，在中央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大大推动了广东工农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

一九二五年六月，省港大罢工爆发，鲍罗廷集中力量协助中共广东区委和全国总工会党团解决了罢工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省港罢工委员会是一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它的组成人员中，有各种代表人物，既有坚定的革命的工会组织代表，也有黄色工会、行会工会组织的代表，情况比较复杂，特别是后者，参加罢工的目的，不在于反帝，而是想谋取私利等。后来这些人逐渐感到无利可图，对罢工的事又不能随意指挥，因此转而无理取闹，制造摩擦，干扰罢工斗争的进行。为此，邓中夏、苏兆征、陈延年等罢工领导人与鲍罗廷一起研究对策。鲍罗廷根据自己过去的经验提出：“除了已有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之外，再组织一个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使工人群众明了真相”^①。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由各行各业罢工工人按人数比例共选出八百多人参加，作为罢工的“最高议事机关”，凡一切重大问题，均需罢工工人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再交罢工委员会执行，这样，就使党的领导深入到群众中去了。罢工工人了解了事情的真相，群众起监督作用，而黄色工会领袖的活动也受到了限制，保证了罢工运动的顺利进行。

省港罢工初期，由于形势错综复杂，斗争经验不足，因而

^①黄平：《回忆往事》。

在武装封锁香港、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同时，又提出了“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一作法，显然是没有注意到斗争的策略，扩大了打击面，“其结果不仅是封锁了香港，而且也封锁了自己”^①，并会造成各国协同起来对付我们。罢工领导人及时发觉这一问题，便与鲍罗廷共同研究解决办法。鲍罗廷认为，武装封锁香港这把刀子是两面利刃，一面割到敌人，另一面又将割到自己，对英不利，对我们自己也不利。经过研究，再由鲍罗廷与广东国民政府商量，决定改为“单独对英”的中心策略，规定凡是英国货、英国船或者经过香港的外国船，都一律不准进口；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不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接来广州。这一斗争策略执行结果，拆散了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争取了各阶层人物的同情和支持，进而解除了广东经济的困难，促进了广东经济的发展，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保证了罢工斗争能长期的坚持下去。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宣布取消对香港的封锁。为了维护中国人民的尊严，妥善地解决结束罢工后罢工工人的生活问题，鲍罗廷提出了“凡进口的外国货物关税均需增加百分之二点五的附加税”的办法，作为遣散罢工工人的经费。当时，中国的海关完全为帝国主义所控制，鲍罗廷提出这一征收附加税的主张，帝国主义被迫接受，这就意味着中国人民终于夺回了部分海关权利。

广东的农民运动，开展得比较早，大革命时期已成为全国农民运动发展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地区之一。鲍罗廷对广东农民运动给以很高的评价和支持。一九二四年，广东农村

^①《反帝国主义唯一的策略》，载《工人之路》特号第13期，1925年7月6日。

各地豪绅地主组织反动武装民团，攻击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镇压农民运动，而国民党右派却支持豪绅地主，破坏农民运动。鲍罗廷极力推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多次通过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并派出军队支持各地农民自卫军，打击地主豪绅、反动武装民团。

鲍罗廷认为：中国农民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只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将反帝反封建斗争推进一步。否则“国民革命若未得到人数众多、而且受压迫最甚之农民了解与参加，国民革命必不能成功。”^① 鲍罗廷通过大量的调查得出结论说：“我个人认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尤其是在广东最主要的支持不是军阀，而是落后的、中世纪的土地关系”。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四日，鲍罗廷在北京向苏联来华考察团团长布勃诺夫的报告中讲：“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唯有通过土地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的人，才算是国民党左派”^②。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鲍罗廷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一文中强调：“解决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能扫除帝国主义”。“以前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都因土地问题未解决而失败了”。他认为“仅叫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是不够的。如果不解决土地问题，那些口号便成空的了。清朝也反对帝国主义，但不能叫革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清朝不能解决土地问题，若解决此问题即是打倒清廷自己，所以他愿屈服于帝国主义”。“我们如能解决土地

①《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03页。

②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载《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302页。

问题，则中国大多数的民众都站在我们这边来了。”^①他还指出：“打倒军阀，这是一个任务。但是，要着手改变土地关系、租税制度，这就更是一个不可比拟的任务了。这里将会遇到整个的反抗，”“并不是所有的国民党人都赞成土地改革，让他们参与这个改革就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②，所以，他号召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要到乡间去，努力领导农民解决他们切身的痛苦，以便唤起民众，组织民众，投入到国民革命这个伟大的事业中去。

(六)

一九二六年的下半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国革命的中心从广东转移到了两湖。于是，把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就成了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可是，当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便把总司令部设在南昌，把南昌作为他的反革命大本营，并指使他的嫡系部队在福建、江西一带霸占地盘，扩充实力。他反对迁都武汉，多次提出迁都南昌的主张，妄图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置于他的控制之下，篡夺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鲍罗廷坚决反对蒋介石的这一阴谋，力主迁都武汉。

在鲍罗廷的支持下，国民党中央于十一月十六日举行了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十二月十日前后，鲍罗廷与宋庆龄、徐谦、孙科、宋子文、陈友仁等以国民党中央暨国民政府代表团名义到达武汉，筹备迁都事宜。十二月十三日，由第一批到

^① 《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载《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09页。

^② 《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第32页。

达武汉的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组成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临时会议，开始行使最高职权。但当第二批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途经南昌时，却被蒋介石扣留了。

一九二七年一月，蒋介石公然以国民党的名义宣布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甚至宣布先期到达武汉的多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及湖北政务委员会主席等组成的党政联席会议为“非法”。一月十一日，蒋介石从南昌到武汉，要求取消联席会议，由他行使最高职权，并再次提出迁都南昌的无理要求。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断然予以拒绝。鲍罗廷当面批评蒋介石说：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个人独裁是不行的。蒋介石理屈词穷，提出延期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但也未达到目的。蒋介石回南昌后便给当时的党政联席会议主席徐谦发了电报，硬说鲍罗廷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罗廷顾问的职务。二月九日，武汉的国民党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上多数人反对撤换鲍罗廷，只有徐谦主张顺从蒋介石的要求。徐谦说：“照顾蒋介石的面子，把鲍罗廷换一换吧！”吴玉章说：“这不是面子问题，鲍罗廷是否撤换，应由大多数中央委员来决定，蒋介石一句话怎能算数，究竟是蒋介石服从中央，还是中央服从蒋介石？再说鲍罗廷的话根本没有错误，凭什么理由要撤换他？这不是鲍罗廷个人的去留问题，这是蒋介石对中央、对政府的蔑视。我们一定不能让步！”^①会议不仅否定了蒋介石的这一无理要求，而且提出了反对独裁、实行民主，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等主张。同时推举吴玉章、邓演达等五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同蒋介石斗争的领导机关。

^①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8 年版 第 140—141 页。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鲍罗廷出席了会议，对会议表示积极支持。会议肯定了一月以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的合法地位，追认联席会议的一切决议均为有效。这次会议虽然没有撤销蒋介石北伐军总司令的职务，却有力地挫败了蒋介石企图控制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阴谋。鲍罗廷在组织武汉国民政府以及政府内部，都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因此，武汉国民政府在成立初，曾具有鲜明的革命色彩。在国民政府管辖下，长江中下游的革命运动继续发展，这都说明鲍罗廷对此是作出了贡献的。

鲍罗廷在武汉政府工作期间，也有其错误之处。表现之一，是对唐生智的看法及与其关系的处理方面。当时，唐生智为取代蒋介石军事首脑的地位，曾一度“左”得出奇。鲍罗廷抵武汉后，曾向唐生智说：“现在谁能忠实履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谁就能成为中国最伟大的人物。”唐生智答道：“我愿意这样做”，并表示“一切愿听指挥”。唐生智还任命湖北区委书记彭泽湘作为自己的政治部主任，表示无条件的支持工农运动，甚至要求加入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日，苏联军事顾问铁罗尼曾向鲍罗廷报告说：“唐好几次向我这样说：‘蒋介石已疲惫不堪……如果我取得指挥权的话，我不但要攻下江西，同时还要攻取南京’。唐生智为要取得总司令的地位，决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去击败蒋”。鲍罗廷虽一方面看到了唐生智的野心和欲望，但另一方面也确有联唐制蒋的打算。其次，共产党人虽然参加了政府，但在政府中的力量并不强大，并没有真正掌握对政府的领导权，发挥应有的作用。鲍罗廷在安排国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时，没有选择坚定的左派，而是以徐谦为主席。徐谦为大革命曾做过有益的工作，但并不是坚定的左派，

以后又成了宁汉合流的推动者之一。鲍罗廷还大力支持“迎汪”复职运动，把汪精卫看成革命的左派，想以支持汪精卫来抑制蒋介石的反动气焰。但汪到武汉掌握了武汉的党政大权后，日益右倾，这就使得汪精卫集团得以实现其反革命政变。

(七)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猛烈发展，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也更加表面化了。鲍罗廷在广州时曾说过，北伐打到北京时，国共便要分家。可是他到达武汉不久，认为由于蒋介石的加紧反共，国共分家之事已大为提早了。尽管如此，鲍罗廷还是希望蒋介石能回心转意。他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发言中，一方面说，蒋介石在上海“已经形成一个反动中心，这一定要失败的”，并尖锐地指出：“这种反革命行为，究竟与孙传芳何异？”一方面又说：“假使我们不是爱惜蒋同志，就任从他在上海听他将来弄到一个失败的结果给我们看的。现在我们要他离开上海反革命重心，免他受包围走去反革命”^①。可是，蒋介石根本不听从他的劝告，公然于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四月十九日，南京国民党政府还发出了逮捕鲍罗廷、陈独秀等共产党“首要分子”的命令。

严酷的事实教育了鲍罗廷。他说，历史上任何一个革命都要先肃清内部，现在我们内部已产生了第二个陈炯明，怎么还能谈到继续北伐呢？他主张在当时情况下，应乘蒋介石立足未

^① 《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载《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97页。

稳，迅速东征，除去这个心腹之患，武汉才能立足得住。可是，几天之后，鲍罗廷自己对东征的意见却又产生了动摇。他在一次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表示：现在奉张军队正沿京汉路向信阳南下，如果此时东征，武汉将有受军阀张作霖侵袭的危险。因此，武汉的军队应先配合冯玉祥部消灭河南方面的奉军，再定第二办法。东征之议因而暂被搁置，而改为第二次北伐。四月，唐生智、张发奎等沿着京汉路向信阳集中，进行北伐。四月底，南京、武汉两方面同时受到张作霖的军事压迫。孙传芳及张宗昌部经由徐州向浦江挺进，张学良部则由京汉路南下威胁武汉，他们乘革命内部分裂之危，企图予以分别击破。南京方面对付武汉国民政府的行动是相当积极的，但因孙传芳、张宗昌部进至浦江、扬州一带，南京受到威胁，所以蒋介石不得不同时应付孙传芳他们，故而口头亦高唱继续北伐。武汉方面先行东征之议成为泡影，也就意味着鲍罗廷反蒋计划的失败。鲍罗廷此时把自己前些时候一再主张的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完全寄托于武汉国民政府的身上。四月二十六日，鲍罗廷在武汉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上发言时讲：目前，要解决土地问题有困难，因为农村政权不在农民手中。怎么办呢？他提出：“应该在国民政府之下，成立专门机关，农政部须根据科学的方法，研究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用党部的名义，提出省民会议，议决后，成为单行的法令，在各省施行。”^①鲍罗廷的这种主张，实质上是取消土地革命，因为武汉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如汪精卫等，是一直对工农有戒心、反对土地革命的。

对统一战线内部工农运动的发展和国民党左派的压制之间

^① 《怎样解决土地问题》，载《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06页。

的矛盾这一事实，鲍罗廷认为“在取得这些军事行动（按：指第二次北伐——引者）的胜利之前，国民党左派还不会与中共中央决裂”。他再三申言：“我的箱内还有草（苏援），他（唐生智）还要吃我的草，不致于跑掉”^①。这样，他把处理与国民的关系问题，变成了“吃草”政策。一旦到了“左派”们感到有比“吃草”更急迫的事情时，中国共产党被出卖的日子就必然会随之而来的了。这个政策，诚然并非鲍罗廷个人的主张，实际上这是共产国际设计中国革命模式必然带来的后果。

罗易把鲍罗廷在政治上的退让，回避土地革命，利用二期北伐转移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等一系列的做法，称作“西北学说”。他对鲍罗廷的“西北学说”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们正在跳出油锅而跌入火坑”，“立即北伐意味着小资产阶级在某些军事领导人的压力之下将转身逃跑，抛弃群众。这等于背叛农民、背叛上海、广州和武汉的无产阶级，背叛那些受苦难、牺牲自己去获得胜利、引导革命走向最后胜利的群众”^②。罗易特别强调：“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本身不是目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与它合作是为了发展国民革命，如果国民党不再是国民革命的机构，那么我们对它的态度和策略就须根本改变。”^③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鲍罗廷在会上主张坚持同国民党保持团结，维护统一战

①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②罗易：《革命的基础和社会力量》，载《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165页。

③罗易：《国民革命纲领》，载《罗易赴华使命》第332页。

线。为此，他不惜向汪精卫以及唐生智、何健等国民党军官让步，把原先主张没收土地改成减租减息。罗易在会上则强调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要巩固革命基地、深入土地革命。他批评鲍罗廷、陈独秀把革命根据地移到西北去的理论是错误的。但大会实际批准了这种理论。五大决议案说：“革命基础之地域，需要很快地扩张”，“现在要巩固革命于中国的中部及南部，并不是忽视广大革命地域之可能与必要。”^①五月二十一日发生了“马日事变”。鲍罗廷、陈独秀反对派兵镇压，主张和平解决。鲍罗廷认为现在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他们没有错误和不良倾向，一切错误都在于农民运动“过火”，我们的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领导农民运动，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的是“痞子”和“哥老会”。他还说：“我们现在必须向‘左’派让步，继续同他们合作，假若同他们决裂便是中国革命的完全失败，我们将什么也没有。继续与国民党合作，便是指与他们现在中央合作。国民党的中央现在还是好的，离开他的中央，或推翻他的中央，这不是决裂便是政变。现在党内有此危险的倾向”，应攻击此倾向（暗指罗易）等^②。鲍罗廷同陈独秀一样，认为现在“弄糟了”。他提议由他会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前往长沙进行调查，以期用和平方式解决“马日事变”。于是，在征得汪精卫的同意后，武汉国民政府在五月五日派出谭平山、陈公博、彭祖湘、周鳌山、邓绍芬（后两人是唐生智的代表）和鲍罗廷等人组织查办团奔赴长沙，声称一方面查办许克祥的叛变，另一方面查办农民运动的所谓“过火运

^①解放军政治学院编印：《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402页。

^②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动”^①。查办团到达岳阳，许克祥电令岳州驻军将谭平山等扣留枪决。谭平山等知道了，连忙返回武汉。

五月二十四日，湖南反动派在长沙召开所谓“各界联席会议”，正式组织“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委员会”，取代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领导权，宣布“拥护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拥护蒋汪合作”，通令恢复全省地主武装团防和团都组织，指令各地土豪劣绅摧毁农民协会和工会，捕杀工农群众积极分子。面对反动派的野蛮屠杀，鲍罗廷仍未放弃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案。他把希望转向当时正在河南前线的唐生智，祈望能拉住汪精卫和唐生智“吃他的草”，暂时与他们合作“东征”，待东征成功，渡过目前的难关后再谈别的。他提出，现在的交换条件只是要他们答应在“东征”时期暂不实行“分共”，这个问题保留到打倒南京中央再说；希望他们在将领间“疏通疏通”。但何健公开宣称：不分共不能东征，不愿“为C·P东征”^②。事实上，唐生智反对蒋介石只是基于他争夺权力的目的，而他的军官们并不愿反对蒋介石，他们倾向于南京远远超过武汉，而且有些反动军官已与南京方面取得联系。唐生智在武汉也直接间接的表示分共案最好保留到南京打下后再讨论。汪精卫把谭平山请去，要他与苏兆征立即上辞呈退出武汉国民政府。唐生智则提出优待的办法——送谭、苏出国考察。鲍罗廷对后一个办法表示可以采取，要苏兆征、谭平山以示威的姿态退出国民政府。唐生智的态度完全说明了他对鲍罗廷的“草”已不感兴趣，而是与汪精

①《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四次扩大会议速记录》（1927年），载《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309页。

②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卫一伙正加紧其反共和反革命政变的活动了。鲍罗廷的妥协退让的“吃草政策”也趋于破产。

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武汉国民党中央通过决议，决定解除鲍罗廷顾问的职务。六月十七日，陈友仁将这一决定正式通知了鲍罗廷。七月十三日，大革命失败已成定局，鲍罗廷同瞿秋白一道离开武汉前往江西庐山，研究对策，并商量如何重建中共中央的领导。七一五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宣布解除一切苏联顾问的职务。

鲍罗廷初时一再推迟了他离开汉口的日期，因为他的妻子范娅还在张作霖处被当作人质扣押。七月十二日，范娅在北京被宣布无罪，随即被送进苏联使馆。鲍罗廷知悉后，便决定离开中国。他在决定回苏前，要汪精卫作一公函致苏共中央政治局，证明他在中国工作的情形及武汉左派代表赴俄的决定。汪精卫答应了，后用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名义，并每人签名，写了一封信给苏联当局。信中说：“苏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诸同志：鲍罗廷同志自被任本党顾问以来，尽心赞助，厥功最多。今因鲍罗廷同志回国之使，特修此函，证明鲍罗廷同志之工作，为本党同志所感念不忘。最近本党感于国民革命之进展与环境之关系，曾经决议于最短时间，派遣重要同志前来苏俄，商量中俄两国之联合方法；同时本党与中国共产党之合作方法，亦欲得所承教。关于此中曲折，鲍罗廷同志必能详述一切也。”^①

鲍罗廷与苏联顾问一道，乘京汉路火车北上，于七月二十七日到达郑州。当晚，冯玉祥为鲍罗廷举行了一次宴会。原来

^①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

冯玉祥曾表示在他管辖的地盘上保证鲍罗廷等人的安全，可是在八月一日清晨。鲍罗廷突然命令大家打好行李，准备当晚离开。与鲍罗廷同行的斯特朗得知这次仓促离开的起因是由于汪精卫给了冯玉祥一道命令，要冯逮捕鲍罗廷，把他送回武汉。当时正渴望与南京及莫斯科保持良好关系的冯玉祥复电汪精卫说：“很遗憾，鲍罗廷走了”。后来鲍罗廷由洛阳取道陕西、内蒙古，于十月回到莫斯科。

鲍罗廷返回苏联之后，仍然很关心中国问题，多次发表有关中国革命的演说、文章，参加过关于陈独秀问题的讨论。十月二十三日，他在莫斯科向布尔什维克作了关于中国进行斗争的教训的报告，他认为“三二〇”事件“在任何程度上都不可能妨碍工农运动的发展”，在通过“整理党务案”的那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作的让步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中国共产党不作出让步，那就意味着同国民党合作的终止，革命力量就会局限在一个省里。”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日，他在《中国革命的前途》报告中讲：在中国革命中的错误，在于他与陈独秀之间发生了重大不同政见，而未能把这些不同政见引到公开斗争。他说当时有广东路线和上海路线的对抗；假若他的路线与陈独秀的路线引起公开斗争，就不会有武汉时期那样的失败^①。

鲍罗廷返回苏联后不久，便被停止了在共产国际中的工作。一九二八年六月七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中批评了鲍罗廷，指出鲍罗廷在大革命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对于大革命的失败也负有重要责任。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会上

^①蔡和森：《论陈独秀机会主义》。

也批评了鲍罗廷，指出鲍罗廷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又是苏联顾问，他的话是有实际作用的，因为他身后站着的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因为他相信谈判，只注重同汪精卫、蒋介石这些人谈判，而不去发动群众。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建立七个工农师，而鲍罗廷不办。布哈林还批评鲍罗廷把共产国际的指示隐匿起来，这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当然，鲍罗廷在中国大革命中是犯有错误，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布哈林的批评是不实事求是的，因为鲍罗廷不少错误就是来源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

鲍罗廷返回莫斯科后，曾历任苏维埃劳动人民委员会委员，塔斯社代理负责人，并在外文出版社工作，一度曾任《莫斯科新闻》英文版编辑主任，与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起工作。一九四九年，苏联政府指控斯特朗为“间谍”，将她驱逐出境。这一事件株连了鲍罗廷。于是，鲍罗廷被监禁。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九日，鲍罗廷死于远东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劳动营中。一九五六年，苏联党为鲍罗廷平反昭雪，恢复了他的名誉。

作者附记：

本文编写过程中，除参阅鲍罗廷在中国的演说、报告、文章；《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苏联顾问在中国》、《苏联问题研究资料》、《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大事提要》；以及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毛泽东、周恩来、吴玉章、包惠僧等关于鲍罗廷的回忆资料外，还参考并吸收了向青、杨云若、陈志凌、元邦建、马菊英等同志有关鲍罗廷研究的资料。

封面设计：王艺光

ISBN 7 — 224 — 00230X / K · 6

统一书号：11094 · 222 定价：2.60元